
当代社会历史

(1949 ~ 1985 年)

一、从解放到实现社会主义转变 (1950年~1957年)

四川从全境解放到实现社会主义转变,历经了近8年时间。这一时期是四川发展最为顺利的时期之一。其间,又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949年底到1952年底,主要是建立和巩固各级人民政权,完成各项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处理旧社会留下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把四川改造成为新民主主义的新社会;在此基础上,自1953年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同时全面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胜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

(一)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

四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大陆上除西藏外解放最晚的地区,各项工作固然存在许多有利条件,但由于解放较晚,国民党残余势力集中,旧社会摊子很大很乱,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开展各项工作,经历了艰苦复杂的斗争。

1 接管旧政权,建立新政权 四川解放之初,按照中央人民政府的决定,划分为川东、川南、川西、川北4个行署区和重庆市,共5个省级行政区域,西

康仍为1个省。解放后,立即在各行署、省、市所在地及其他主要城市建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任务是:接管旧政权及其所属一切公共机构,没收官僚资本,维持社会治安,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解放前夕,国民党中央及其所属军、政、宪、特等机关陆续迁来四川,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90余万军队也大部分在四川,各省溃退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大量麇集于此,加上四川原有的国民党各级军政机构,其人员之众多,情形之复杂,为全国所罕见,接管任务十分艰巨。

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是:旧政权遗留下来的军政公务人员,只要他们不反抗新秩序,一律采取包下来的政策,维持其生活费用,并酌情分别安排录用。没收官僚资本,收归国有。但是对官僚资本企业则采取与对待国民党政权不同的办法,即不是打碎他们的机构,而是先按照原来的组织机构和生产系统,“保持原职、原薪、原制度”完整地接收下来,由军管会监督其生产,然后逐步进行改造。对于国民党军队,则贯彻“宜集不宜

散,宜养不宜赶,集中整理,认真改造;分别对象,逐步处理”的方针,恰当地进行整编。

各军管会在入城前,就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进行了认真的准备,调查了社情,制定了严密的制度和纪律。入城后,军管人员有计划派出,以各种形式,向各阶层人民广泛宣传了“约法八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及中央人民政府的有关政策法规,先后召开了与中共地下党员的会师会、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大中学校教职员工及学生代表座谈会、妇女代表座谈会等。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在重庆、成都的有关会议上与群众见面,解释中央的有关政策。接管工作有重点有步骤地展开。军管人员纪律严明,秋毫不犯,廉洁奉公,待人和蔼,受到各阶层人民的竭诚拥戴。各界人民纷纷主动向军管会提供情况,帮助接管,使接管工作有条不紊地迅速展开。

接管工作在解放后的2至3个月间集中进行。仅成都市就接管了国民

党政权机关及各种公共机构284个,各类人员56万余人(不含军队),还接管了包括28架飞机、2300多辆汽车、1500余支枪、10000多两黄金在内的大批物资。重庆市在接管中没收官僚资本工业企业80家,固定资产共计12728万元(人民币新币,以下均同),占全市工业固定资产的79%,为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打下初步基础。全省没收官僚资本的金融机构158家,从而掌握了金融命脉。对在四川起义、投诚的共7个兵团、41个军部和113个师的国民党军队,则指定地点进行集训,在教育改造的基础上分别情况进行整编,除对少数解放后进行叛乱的首犯给予严厉打击外,其余均编入人民解放军,愿意回乡的发给遣散费,加以妥善安置,使之不在社会上流散;对起义部队给予适当照顾,部分起义将领并参加了当时军管会及人民政府的工作。各军管会还收容散兵游勇,登记国民党反动骨干分子,加强治安及交通管理,使社会秩序逐步走上正轨。

在接管旧政权的同时,在西南军

1949年4月2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的形式发布对新解放区的基本政策,主要内容是: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工商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五、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的国民党各级政权组织的一切人员,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六、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人民解放军或人民政府投诚报到,交出武器。七、有准备有步骤地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逐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改善人民生活。八、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以后统称为“约法八章”。

政委员会和川西北军政委员会 的领导下 经过中央人民政府批准 陆续筹组和建立了省、市、行署一级的政权机构。重庆市人民政府最先于 1949 年 12 月 9 日成立 市长为陈锡联、副市长为曹荻秋、胡子昂。接着成立的有 川东行政公署 主任为阎红彦 副主任为魏思文、余际唐 川南行政公署 主任为张国华(1950 年 2 月后为李大章) 副主任为郭影秋、刘披云、罗忠信 川北行政公署 主任为胡耀邦 副主任为秦伸方、刘聚奎、裴昌会 川西行政公署 主任为李井泉 副主任为阎秀峰、钟体乾 西康省人民政府 主席为廖志高 副主席为张为炯、鲁瑞林、格达(藏)、夏克刀登(藏)、果基木古(彝)。各省、市政府及行政公署都吸收了相当一批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工商界、文教界知名人士及少数民族代表参加工作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

各地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在进行接管工作的同时 还担负着经济工作的繁重任务。解放不久 一些投机商即利用匪特暴乱 城乡物资交流阻塞之机 大肆进行黄金白银黑市交易 囤积居奇 哄抬物价 造成物价大波动。1950 年 2 月 各地粮、油、棉、纱、糖等

25 种主要商品价格较 1949 年底上涨三分之二以上 其中尤以大米、棉纱上涨幅度最大。成都市以 1949 年 12 月物价指数为 100 1950 年 2 月中熟米每斤价格为 878 78 20 支特红雁棉纱每件价格为 421 83。重庆市 1950 年 2 月大米、面粉价格较 1 月份上涨约两倍。私营工商业者忧心忡忡 怕人民币站不住足 因而惜货保值 闭门拒售。社会上人心惶惶 生活不安。面临这种情况 1950 年 1 月《西南区金银管理办法》公布 各地军管会、人民政府禁止金银外币流通 严厉打击黑市交易 宣布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 加强对私营银行、钱庄、银号及信托公司的管理。新成立的国营粮食公司和花纱公司 积极组织货源 低价抛售粮食、纱布以平抑物价。为保障人民生活 人民银行举办了折实储蓄存款 以一定数量的大米、白布、菜油、盐、煤等 5 种实物的价值为一单位 以前 5 日市场价格为标准 按折实单位计算存取。实行薪给制的职工也按折实单位计发工资。同时 各地还积极整顿市场。重庆市成立了粮食、花纱、棉布等 15 个市场管理委员会 向工商界阐释新中国的经济方针 消除疑虑 鼓励他们正当经营和生产。通过采取这些措

1949 年 11 月 7 日 毛泽东主席在给贺龙并中共中央西北局及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中说 为了统一指挥第十八兵团及其他临时配合作战的部队 为了领导川西北地方工作在未与西南局合并前 军事、政治、党务、民运等项工作 该委员会以贺龙为主任 王维舟、李井泉为副主任。以后 随着以上地方党、政机构的成立 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的工作即告结束。

施,3月份以后物价普遍下降,到5月份回落到正常水平。6月间,朝鲜战争爆发,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到来”的谣言蛊惑下,投机分子再度兴风作浪,物价又一次发生波动。但这时国营贸易公司已掌握较为充裕的物资,市场管理也较更为有效,涨风很快即告平息,自此以后再无大的波动。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基本消除,新生的人民政权也经受住了一场严峻的考验。

2 发扬人民民主 召开各代会 1949年8月,中共中央指示:“人民代表会议,新解放区应在占领两三星期后即可举行”。1950年2月23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又发出《关于迅速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责成各地迅速召开各代会,指出要把这一工作“视为团结新区各界人民,克服困难,开展各项工作的重要方法”,并批评了一些地方“只相信少数人的干部会议,不相信人民代表会议的官僚主义作风”。

重庆市率先于1950年1月23日召开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刘伯承作施政报告,邓小平作总结报告。市长陈锡联《关于重庆市接管工作的报告》宣布接管工作已结束。接着各地相继召开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至4月份,全省各县首届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均已举行。按照市、县每3个月召开一次会议,省、行署区每年召开一次会议的规定,当年多数县、市举行了

3至4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各省、行署区的各署区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至9月份也相继举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通过推选和协商产生,包括了各民主阶级、各行业相当广泛的代表,非党代表占很大比重。会议的议题有接管、治安、救灾、调整工商业及减租退押等大政方针。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还选举产生其常设机构——各级协商委员会,以处理代表的提案,协调与政府的工作。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举行,是各界人民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参政议政活动,激发了他们极大的政治热情。璧山地区的代表在开展活动中,人民代表遭到潜伏匪特残杀达10人之多,一些代表的家庭被抢,房屋被烧。但代表们毫不气馁,仍坚持不懈地工作,与匪特展开斗争,使当地治安很快好转。达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广泛宣传各项政策,使工商界消除疑虑,商店纷纷开门,工厂复工,并迅速办起了纸厂。西充县人民代表带头募捐粮食,救济生活困难的灾民。南部县人民代表积极参加剿匪工作,两三天即搞清匪首刘二麻子的踪迹,使其迅速被捕归案。人民代表提出的许多提案,适当调整了当时的阶级关系,弥补了工作中的缺陷,使党的政策得以顺利执行。在这一期间,全省207个县(含县级市及大城市的区)的人民政府相继成立,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起,顺利推进了

各项工作。

至于乡镇基层,新政权尚未建立前,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先召开农民代表会议,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农民协会,以代行政权职能。至1950年下半年,全省乡镇都召开了数次农民代表会议,各县、市、省、行署区也召开了农民代表会议,各级都成立了农民协会,训练了大批农会干部及积极分子,成立了农民武装自卫队。到1950年年底,全省农民协会会员已发展到1000万人以上,有武装自卫队员100万人以上,训练了数十万农会干部和积极分子。农民协会担负起了征粮剿匪、减租退押等工作的领导权。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基础——保甲制度,实际上已被摧毁。1951年秋季到1952年,各地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相继结束后,乡、镇普遍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或农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乡、镇人民政府。区作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成立了区公所。至此,“四区一省一市”自上而下地,普遍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

3 剿匪征粮,镇压反革命 四川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后据点。1949年,国民党统治集团一面在四川负隅顽抗,一面布置了一套“应变计划”,即准备在败退后发动所谓游击战争。为此在全省安插了约8万名特务,训练了大批“游击干部”,并依托恶霸、土匪、反动会道门及其他封建势力,建立据点,配给武器、电台,授以各种番号。

解放大军神速控制四川各地城市及交通沿线后,曾出现短暂的平静。但接着从1950年1月底、2月初起,各地便相继发生武装暴乱。2月5日,包括部分起义后又叛乱的国民党军人在内的武装匪特,在成都市东北郊龙潭寺、石板滩发动暴乱,杀害军政人员40余人。匪势迅速蔓延,温江专区14个县城被围。川东区3月份匪特暴乱达到顶点,全区35个县几乎县县发生土匪暴乱,秀山县城被劫占,重庆市一度处于半隔绝状态。川南、川北区有百人以上以上的股匪100余股。国民党军统少将田栋云率交警第十二总队,纠集其他国民党军队残余及地方封建势力,在川黔滇边境一带大肆作乱。简阳县匪特到处袭击区、乡人民政府,杀害军政人员及农民积极分子100余人,杀害群众1000余人,烧毁民房800余间。在西康省大恶霸、匪首、“反共救国军总司令”程志武等,纠集匪众近万人围攻雅安,起义后又叛乱的西康省保安团与土匪合谋,从背后袭击解放军,天全县城被围攻达7天之久。

中共中央西南局对匪特暴乱早有准备,在成都战役刚结束时,就告诫部队“要准备打第二次仗”,并且指出剿匪斗争的本质是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反封建的斗争,因此必须采取“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方针,但政治瓦解的工作只有军事打击见成效的条件下才能展开”,强调剿匪斗争中必须贯彻

“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军事斗争要与群众工作相结合。

剿匪斗争是在西南军区的统一部署下,由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军区和西康省军区直接指挥进行的。各级成立了剿匪委员会,吸收各阶层代表参加,实行统一领导。按照部署,首先集中力量大力肃清交通要道及富裕地区的匪特。川西剿匪部队在迅速镇压了龙潭寺、石板滩暴乱之后,多次重点进攻匪特巢穴和据点,摧毁了温、郫、灌3县匪特总指挥部,歼灭土匪4万余人,平息了温江、眉山专区的土匪暴乱。川东军区在璧山地区打响剿匪战役,接着组织兵力对涪(陵)、南(川)、巴(县)三角地区的土匪实行围剿,获得歼匪1万余名的重大战果。川南军区在首先使长江北岸地区净化后,然后把剿匪重点转向江南山区。川北军区在渠江、涪江、嘉陵江三角地带组织围剿,并镇压了南充、射洪、中江地区的匪特暴乱。西康军区2月份集中力量围歼了天(全)、芦(山)、宝(兴)一带的匪特,接着在3月下旬配合友军解放了西昌,扫除了直接指挥全川暴乱的国民党残部最后基地。至6、7月份,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土匪暴乱基本平息,接着开展了捕捉匪首的运动,继而剿匪斗争转向边缘少数民族地区及与邻省结合部位。至1950年底,全省共歼国民党土匪武装46万余人。

1951年后剿匪斗争的重点主要是在川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窜入阿坝地区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头目、成都稽查处长周迅予、第七十二军副军长傅秉勋、原十六行政督察区专员何本初、国民党“游干班”主任王旭夫等,纠集反动力量,先后在懋功(今小金县)、靖化(今金川县)、黑水、草地一带作乱,是西昌解放后国民党匪特盘踞在四川的最后据点。台湾国民党当局十分看重这支力量,称之为“陆上台湾”,先后多次空投特务、武器、黄金等予以支援,妄图以此配合朝鲜战争,“扰乱中共战略后方”。由于这一地区地形险峻,交通十分不便,历史遗留的民族隔阂严重,加之历来盆草地之争战乱频仍,纷争不息,因此剿匪任务十分复杂艰巨。历时3年之久,曾经3次收复懋功,两次解放靖化,1952年秋在前线指挥部的领导下,终于胜利完成了黑水战役,拔除了匪特的最后据点,匪首刘野樵被击毙,傅秉勋投河自尽,周迅予、何本初、王旭夫等被藏族上层华尔功成烈解送人民政府。全省剿匪斗争的胜利,不但巩固了人民政权,安定了社会秩序,而且从此消除了长期危害四川的匪患。

与剿匪同时进行的另一重要工作就是征粮。四川解放时,全省境内接收国民党政府的存粮及部队缴获的粮食仅有1750万公斤,而当时在四川的解放军部队、公教人员、国营企业职工

和起义、投诚、被俘的国民党军队官兵有 100 万人以上,还有广大城市和缺粮农村需要供应。正如邓小平在当时所说的,如不解决好吃饭穿衣问题,“势必大乱……将会使整个工作陷于被动和混乱之中”。川西北军政委员会在 1950 年 1 月 12 日发出的指示中也指出:“成都解放,川局初定,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很多,但最中心而又最重要的就是粮食供给,迅速的征到粮食,就是我们当前最严重的政治任务。”

解放伊始,各地就派出大批征粮工作队下乡征粮。由于 1949 年秋后国民党溃退,大部分地区均未征粮,因此决定首先统一迫征 1949 年度公粮,但过去已向国民党政府交纳公粮、持有赋串者,准予抵缴公粮。为减轻群众负担,1950 年夏季不再派公粮任务。秋收之后,按《新解放区农业税条例》依率计征当年公粮。征粮实行“粮多者多出,粮少者少出,赤贫者不出”的合理负担政策,各省、区、市按当地情况规定出合理的起征点,有粮低于起征点者免征,高于起征点者依率计征。各地先后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都以征粮为议题进行了讨论,广泛宣传人民政府征粮“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政策。

征粮是一项艰苦的斗争。因为当

时农村封建势力尚未触动,旧乡保政权依然存在,匪特活动猖獗,广大农民对人民政府的政策尚不了解,而大部分粮食又掌握在地主、恶霸手中。各地组织了有农民代表参加的评议委员会,评定各户公粮负担,并发动群众,向顽固抗粮的恶霸地主展开斗争。初期的征粮工作紧密结合剿匪斗争进行。不少人因此献出生命,用鲜血换来了宝贵的粮食。简阳县在“三·三”土匪暴乱中,征粮工作队员被匪特杀害达 159 人。正式登记在册的四川省革命烈士名录中,这一时期牺牲的川籍征粮军政人员达 1078 人,加上外省籍及未录入烈士名录的人员,实际牺牲者远不止此数。据不完全统计,各地农民在运粮、护粮中被匪特杀害的有 257 人,重伤 325 人。

至 1950 年底,全省共征得两年度公粮 201 万吨(部分为实物和款项折粮),川南区平均每一农业人口负担 1949 年度公粮 36 公斤,川东区平均每人负担 55.7 公斤(均为原粮)。这些粮食保障了军需民用,解决了经济建设、文教卫生及各项社会事业费用的开支,并支援受灾的华东、上海等地大米 7.5 万吨,至 1951 年共支援进藏人民解放军粮食 5.5 万吨,对支援全国作出了贡献。

在各地股匪暴乱基本平息以后,

不少反革命分子潜伏各地,社会治安仍存在隐患。1950年年底开始,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全省各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镇反运动的重点,是打击匪首、惯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镇反贯彻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政策。运动采取大张旗鼓的方式进行。各地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农民代表会议、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座谈会等,并通过广播、墙报、文娱表演等形式,向各阶层人士广泛进行宣传。重庆市召开广播大会,由副市长曹荻秋、公安局长刘明辉报告镇反工作,收听广播的市民达30余万人。

广大人民群众热烈拥护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开展检举揭发活动。许多潜伏的反革命分子纷纷被捕归案,其中罪恶尤大者有:曾于1946年杀害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的原国民党云南警备司令部稽处长王子民;参与制造“皖南事变”的罪犯倪志操;杀害著名民主人士邓演达的凶手李照元;1951年纵火焚烧川北行署大楼的特务庞林;解放前夕重庆“中美合作所”血案的凶手刘志钦、徐贵林;成都十二桥血案的凶手、中统特务杨沛熊;策动起义部队302师叛乱、杀害军代表的特务裴元俊等。解放后在各地策动土匪暴乱的许多元凶纷纷落网。四川原

来反动会道门林立,全省计有40多种、450多个支系,并成为全国“一贯道”的活动中心。运动中各地明令取缔反动会道门,仅成都市登记自首的道首就有1100多人,许多被欺骗的教徒纷纷声明退道,并揭发他们的罪恶。

大规模的镇反运动进行至1951年底,然后转入清理隐蔽更深的反革命分子的工作。至1953年上半年,全省共清查出匪首和惯匪17万余名,恶霸11万多名,特务4.6万余名,反动党、团骨干2.8万余名,反动会道门头子3.7万余名,其他反革命分子1.9万余名,基本上清除了国民党在四川的残余势力,为土地改革及各项社会改革扫清了道路。

4 实施民族区域自治 四川是多民族的省份,世居着14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人口在全省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虽小,但其聚居区域却占全省总面积的57%。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也是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四川来说,对稳定全省政治形势,发展经济文化,更有着重要的意义。

解放初期,中共中央西南局即决定,把在西康省藏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整个西南地区的试点。邓小平指出:“……在西南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首先开步走的应是康东(即甘孜地区——编者注),因为各种条件比较具

备,第一藏族同胞集中,第二,历史上有工作基础,第三,我们进军到那个地方后,同藏族同胞建立了良好关系,第四,那里还有个进步组织叫东藏民主青年同盟,有一百多人。”

西康省人民政府成立后,西康省负责人即在雅安会见了藏族著名宗教界人士阿旺嘉措、日库等,向他们征询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意见。康定军管会及中共康定地委在康区广泛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通过各种形式同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及各界代表进行磋商,并随即组成了藏区民族协商筹备委员会,进一步就建立民族区域自治政权的地位、性质、名称、区划、人选及首府设置等问题进行充分协商。中央人民政府派出了以刘格平为团长的中央民族访问团进行指导。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各种意见很快趋于一致。1950年11月,即在康定解放7个多月后,全区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康定举行,宣告西康省藏族自治州(后更名为甘孜藏族自治州)成立,选举产生了自治区人民政府。政府的职务绝大多数由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人士担任。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最先建立的州一级民族区域自治政权,积累了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经验,并对毗邻民族地区、尤其是西藏地区产生过很大影响。其后几个月

内,全区除色达以外的20个县人民政府也相继建立。

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区,历史上尚无统一的政权。解放初,大部分划归西昌专区管辖。在中央民族访问团帮助下,1951年1月先在西昌县彝族聚居的红毛妈姑区建立起第一个彝族民族区域自治政权,为其他地区做出榜样。接着在昭觉、盐源等县建立了县一级自治政府和民族联合政府。1951年冬,中共西康区委和西康省人民政府报请中共中央、政务院批准,决定将西昌专区所辖彝族聚居县及相邻部分彝汉杂居县划出,筹建一个地区级的凉山彝族自治州。经过逐步在凉山腹心地区艰苦地开辟工作,并与彝族各家支上层人士及其他代表充分协商后,于1952年9月举行了凉山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了凉山彝族聚居区(后更名为凉山彝族自治州),产生了自治区人民政府。这是凉山彝族聚居区历史上第一次建立的统一政权,也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的区域自治政权。

阿坝地区由于国民党匪特相当大规模的骚乱,阻滞了民族区域自治政权的建立。1951年8月,在平定了懋靖匪乱后,在马尔康召开了有“四土”(梭磨、党坝、松岗、卓克基土司,今马

尔康地区)、阿坝、黑水、壤塘等地的少数民族和宗教界上层人士参加的会议,成立了四土阿坝卓斯甲临时军政委员会,在这一地区暂行政府的职能。1952年12月,在绝大部分地区匪患平息后,召开了全区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了四川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后更名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1952年8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4年9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作了明确规定。此后,四川的民族区域自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除3个自治州外,还陆续建立起9个民族自治县、119个民族自治乡,并对一些少数民族较多的县实行了按民族县对待的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政权的建立,使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实现了民族平等,并为逐步进行本民族的社会改革,发展经济文化事业,提供了前提和条件。

5 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953年3月新中国第一部选举法颁布后,各级成立了选举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培训了8万余名普选干部及10万余名登记工作人员,在广泛宣传的同时,选择若干地方先进行普选试点。鉴于全省区域广,人口多。部分地区交通很不方便,普选采取分期分批的办法进行,由人民直接选举乡、镇人民代表,召开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然后逐

级选举产生县、市(州)、省人民代表。各地人民群众敲锣打鼓,放鞭炮,舞龙灯,兴高采烈地参加选举。全省共登记选民36855440人,参加投票的选民占登记选民总数的91.08%,共选出50余万名基层人民代表。土地改革后,为便于管理,各地适当划小了区、乡,使全省乡、镇总数由解放初的9515个,增加为乡11373个,镇404个。选举紧密结合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和反违法乱纪的斗争(即“新三反”)进行,使许多新涌现出的各界优秀分子当选为人民代表或进入政府工作,有违法乱纪行为的原有干部落选。

在进行普选的同时,还进行了四川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普查。各地组织大量人力,进行宣传,登记,复查,基本上达到了“不重复,不遗漏,全面确实”的要求。普查以1953年6月30日24时为标准时,统计全省人口(包括重庆市、西康省)为64803848人,并进行了人口分析,为发展社会、经济事业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在基层选举的基础上,至1954年上半年,全省各乡、镇、县、市的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先后召开,选举产生了乡镇、县、市人民政府。1955年后改为县、市人民委员会。1954年8月1日至10日,四川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成都举行,审议了省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选出了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1955年1月,

四川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四川省人民委员会,李大章为省长,邓锡侯、阎红彦、任白戈、钟体乾、余际唐为副省长,王叙五等49人为委员,选举赵方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选举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任命谷志标为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从此形成了省级政权组织由省人民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检察院构成的格局。1955年10月西康建制撤销,与四川省合并。同年11月举行了有西康代表124人参加的四川省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增补桑吉悦希(天宝)为副省长。

(二) 各项民主改革任务的实施

各级人民政权成立后面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四川的各种封建剥削制度以及畸形、丑恶的社会现象进行彻底改造。这是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主要有以下几项:

1 土地改革运动 四川是一个农业省份,解放初9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农村,而农村的封建土地占有制根深蒂固,构成农村社会的基础。据调查,四川的土地占有情况远比许多省份集中。在华东、中南地区,地主占有的土地约占总耕地的30%~50%,富农经济较为发达,占有10%~15%的土地。在四川仅地主占有的土地即达70%~80%,一些地区还超过此比

例。重庆市由于部分工商业者将资金又转为购置田产,郊区总耕地的95.6%为只占人口2%的地主所占。在川西大邑县,解放初人均占有耕约2~3亩,但只占总户数2.9%的地主,平均每户即有户田3000亩以上,最多的达到3万多亩。地主的租额很高。据川西华阳县(后并入双流县)调查,租额占大春总产量的87.5%,占大小春总产量的70%。农民租种土地要交纳押金(一些地方又叫“稳首”、“随租”、“庄头”),押金金额相当于年租额,有的甚至相当于年产量。如遇天灾人祸,农民交不够租额,地主即从押金中扣除;年成好时,又要加租加押。不少农民为交纳押金租地而被迫负上高利贷。于是,高租、高押、高利贷,便成为农民头上的“三把刀子”。除此以外,一些地区地主阶段的当权派——恶霸,还凭借所掌握的基层政权、武装和反动会道门组织,巧取豪夺,为所欲为,对农民进行超经济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在四川农村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实际上是由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几个阶段逐步完成的。1950年夏,当大部地区股匪剿灭以后,不少匪首转移到农村隐蔽,其中许多人就是当地著名的恶霸。这些长期形成的

“东霸天”、“西霸天”压在农民头上,严重阻碍着工作的开展。各地纷纷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自卫队,开展捕捉匪首的运动,并对发动叛乱、负有血债的恶霸展开斗争。各地法院组织了临时人民法庭,巡回进行公开审判,及时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匪首和恶霸,为工作扫清了道路。

紧接着清匪反霸,1950年秋后各地普遍展开减租退押。减租退押不仅是一场经济斗争,而且是进一步打击封建势力,改变农村中阶级力量对比的“淮海战役”。中共中央西南局及各省、区党委都十分强调在斗争中要充分发动群众。各地工作团、队及农协会通过“吐苦水”、“挖穷根”、算剥削账等方式,启发农民认识封建剥削制度是自己贫困落后的根源,解除封建意识、迷信思想的束缚,组织起来向抵抗减租退税,或明减暗不减,或先减租后加租等现象展开斗争。根据《西南区减租暂行条例》及《西南区退押实施办法》的规定,凡地主、旧式富农及一切机关、学校、祠堂、庙宇、教会所出租之土地,其租额一律按照原租额减低25%,减租后租额最高不得超过土地正产物的35%,所有押金须于1951年秋前全部退完,退押不记利息,但应保值计算。至1951年4月,各地减租退押大体结束。川东区农民从减租中获

得稻谷18亿斤,川西区农民从减租中获得大米7亿斤,全省共退押金折合大米约30亿斤,每户农民平均318斤。减租退押,不仅使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而且沉重打击了农村封建势力,使农民树立起掌握自己命运的信心。

1950年6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四川在减租退押的基础上,从1950年冬季开始,各地陆续分期进行土地改革。各级人民政府组成了土地改革委员会,负责指导处理有关土改的各项事宜。在农村,乡农民协会成为土地改革的合法执行机关。土地改革执行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路线。四川的土地改革同老解放区有所不同,除没收地主占有的土地外,执行了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富农所有的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加以保护,不加侵犯;同时保护工商业,包括地主经营的工商业在内;对小土地出租者也给予适当照顾。各地广泛发动群众,并依靠群众,经过调查,划定农村阶级成份,登记及没收、征收土地,然后分配土地,发放土地所有证。

由于部分农村地主寓居城市或兼营工商业,城市部分工商业者在农村出租土地,运动中注意了城乡相互配

指大量出租土地、具有很重的封建和半封建剥削性的富农。

合的问题。重庆市及川东区工商业家兼地主者较多,有些人因当时资金周转困难,一时退不出押金,当地农民一度纷纷进城算账,甚至提出将机器设备抵作押金。中共中央西南局及时发现并通报各地注意保护工商业,组织了城乡减退联合委员会,和川东区农协会驻渝办事处妥善加以解决,成都也成立了华阳、双流等7县农协驻蓉办事处。川西区首批组织了各界民主人士到农村参观土地改革,取得很好效果,各地纷纷仿效;仅川北区就分3批组织了6000多名各界人士参观或参加土地改革。北京、天津等地也组织多批民主人士来四川参观土改。由于土地改革法不适用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改革只是在汉族地区进行。在民族杂居地区,对出租土地给汉族农民的少数民族地主或土司、头人,一律实行不分不斗的政策;少数民族农民租种汉族地主土地的,则同汉族农民一道参加分配,享受同样的经济果实。

全省土地改革运动进展健康顺利,至1952年初,在除少数民族地区外的134个县、约5000余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改,共没收、征收土地5700多万亩,使数千万无地少地农民分得了土地和相当一部分耕畜、农具、房屋等,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后,土地占有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川北潼南县的情况具有代表性。该县土改前人均耕地1.78亩,各阶层每人

平均占有的情况是:地主10.4亩,富农4.1亩,小土地出租者4.71亩,中农2.08亩,贫农0.53亩,雇农0.2亩。土改后,各阶层每人平均占有的情况是:地主1.16亩,富农2.73亩,小土地出租者2.1亩,中农2.28亩,贫农1.56亩,雇农2.6亩。80%的土地转到了贫农、雇农和中农手中,富农所占土地略多,这是因为执行了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其他各阶层都占有适量的土地。土地改革的巨大胜利,使四川城乡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并促进了其他各项社会改革。

2 工矿企业的民主改革 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城市工矿企业也进行了以清除封建把头 and 反革命分子,废除压迫工人的不合理制度,实行管理民主化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改革。四川的工矿企业存在着很深的封建生产关系,与农村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官办的、外资办的、民营的企业,都采取野蛮的管理制度。解放后,虽然接管了官僚资本企业,但对它们执行了“不打烂旧机构”及“保持原职、原薪、原制度”的政策,对分散的私营工业、交通企业更是一时来不及改造,除曾宣布废除纱厂对女工的搜身制度外,其他旧制度基本均未触及。据调查,当时在搬运行业中,封建把头对工人的剥削量达到50%以上。川江运输业的木船25000余支(不包括短航船只及渡船)、船工及船民30

余万人,均被封建帮会把持,下游有“红旗子”等8帮,上游有盐帮、杂帮等,嘉陵江有遂帮、渠帮等约30个帮会。大批国民党特务在解放前后陆续渗入企业,与封建帮会把头相互勾结,形成压榨工人、阻碍生产的恶势力。1951年4月,中共中央西南局召开的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强调:“根据最近几个月的经验,所有厂矿,无例外的都要经过充分的民主改革阶段,才称得上完成了接管,才能正式进入生产管理的阶段”。邓小平指出,要把这些企业“改变为人民的适应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新企业,其先决条件即在于实行工矿企业以至行业的民主改革。”

工矿企业民主改革最先在重庆市起步。1950年底先在码头试点,然后逐步推开。接着各地选择天府煤矿、威远煤矿、二十和二十九兵工厂、大溪沟电站、豫丰纱厂等重点企业进行试点。1951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厂矿交通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这些企业中开展民主改革的指示》后,1952年全省普遍在国营、私营工交企业开展民主改革。民主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实行企业管理的民主化和生产的合理化,以建筑业、搬运业和水上运输业为重点,把锋芒首先指向企业中的封建把头、恶霸分子和暗藏的土匪头子、特务分子、反动会道门头

子,与当时正在进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相结合。工作中坚持依靠工人阶级,发动职工群众揭发检举各种反动分子,控诉他们的罪行。重庆市2万多名搬运业职工中,揭露出封建把头及反革命分子1190余人,其中特务分子占11%,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占20%。成都市22个工厂中,清理出封建把头和反革命分子98人,连同其他运动中清查出的,共占职工总数的36%。全省54个县、市的搬运业中,共清理封建把头3004人,分别情况进行了不同的处理。在清理的基础上,各地建立了有利于生产和民主管理的新制度,成立了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提拔了一批工人和低级职员到领导岗位上来。在私营企业中建立了劳资协商会议,订立了劳资集体合同。到1952年底,全省共签订劳资集体合同1030份,保证了劳资两利,保障了工人的利益。

通过民主改革,企业面貌焕然一新,职工精神振奋,初步建立了民主管理的制度,促进了生产发展。1951年全省开展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爱国主义竞赛热潮,有681个企业参加竞赛,推广先进经验60多种。1953年后,又发展为技术革新运动、先进生产者运动。重庆钢铁公司木工黄荣昌,创造、改造成功50多部机械,使木工作业实现机

械化,成为省内首批涌现的劳动模范之一。

3 肃毒禁娼 树立新的社会风气 鸦片自清代传入四川以后,自东向西迅速蔓延,至1949年底鸦片种植尤以西康的宁、雅两属,川西北的松、理、茂、汶一带,川南的雷、马、屏、峨一带最为严重。西康宁、雅两属种烟面积即在60万亩以上。雷、马、屏、峨4县鸦片年产量达到400多万两,至于制毒、贩毒活动则遍及全省。重庆市从事制造吗啡、砵子的有600余处,成都市有367处,雅安城内有公开制毒的“砵子大王”等10多家。许多县城、场镇烟馆林立。吸食鸦片在各阶层中都有。估计四川省瘾民有200万人以上,西康省除藏族地区外,吸食鸦片者有48万余人,所占比重更大。许多人因吸毒而倾家荡产,或铤而走险成为盗贼,或沦为娼妓。一百多年来,四川历届地方政府,明禁实纵,实行“寓禁于征”的政策,把鸦片税作为重要的财政来源,使烟毒屡“禁”不绝,危害极大。

解放后,各地结合农村、城市开展的各项民主改革,广泛发动群众,采取坚决措施从各个环节禁烟肃毒。首先,自1950年春耕开始时,即明令禁止种植鸦片。为解决部分农民的困难,政府无偿发放种子和款项,帮助他们改种粮食。西康省1950年即发出种子50余万斤和部分款项,使汉族地区的烟田全都改种,当年粮食量即

较1949年增产30%以上。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种烟问题,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主要通过宣传教育,启发他们自觉地缩小种植面积,最后达到不种。雷波、马边、峨边、屏山等县的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都订立了“禁烟公约”。对制毒、贩毒的首犯,各地进行了严厉打击,公开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砵子大王”,当众焚销烟土。全省在一年左右取缔2万余家烟馆。对吸食烟毒者实行“劝戒与勒戒相结合”的办法,号召他们自觉戒烟,发动家属规劝,群众监督,在城市和集镇进行瘾民登记,限期戒除烟毒。各地还设置了各种形式的戒烟所和劳动习艺所,进行集中勒戒。卫生部门制出戒烟丸,免费发给瘾民服用。对戒毒后无正当职业的,由政府帮助解决生活出路。据不完全统计,由政府集中在戒烟所的瘾民有65万余人。仅重庆市就设有戒烟所729所,戒毒后由民政部门帮助谋得正当职业者有61755人。綦江县戒烟所收容瘾民401人,脱瘾后他们集体上街游行,欢呼脱离苦海,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至1951年,四川除少数民族地区外的烟毒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少数毒犯仍不悔改,他们转入地下,以各种行业为掩护,继续进行制毒、贩毒。1952年8月,全川六个省级行政区统一行动,出动大批公安干警缉毒破案,广大群众热烈拥护,向政府递交检举

揭发材料 20 余万件,使 19748 名毒犯落网,并收缴大批毒品、毒具及部分枪支弹药和毒资。少数民族地区的禁毒工作也取得重大进展。至 1953 年,长期危害四川的烟毒终于禁绝。

卖淫嫖娼,是旧社会的又一丑恶现象。在人口约 60 万的成都市,仅警方发给执照的妓女就有 1 3 万人。解放后,政府明令禁止卖淫嫖娼,查封了仍在营业的妓院,对妓院老鸨进行审查,分别情况处理;收容妓女并组织劳动教养院进行改造,帮助他们改造思想,控诉揭发老鸨的罪行,有性病的给予医治,并成立识字班,组织她们学习文化和技术,然后分批安置工作,使之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对赌徒、乞丐等游民,也建立了游离子收容所进行教养。至 1952 年,全省收容改造妓女、赌徒、乞丐等共 11 5 万余人,使他们获得新生。与此同时,1950 年 10 月后,抗美援朝运动在全省掀起。11 月 9 日,报纸上公布了志愿军入朝参战的消息,到第二天,重庆《新华日报》就收到成千上万封读者来信,在信中要求参加志愿军者有 3119 人。全省有 8 万余名青年学生报考各类军事学校。农村大批青年报名赴朝参战,仅南充、遂宁报名参军的即有 3 万余人。在抗美援朝战斗中涌现了黄继光、邱少云、柴云振等特级战斗英雄。各地人民积极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订立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以支持中国人

民志愿军。至 1952 年元旦,全省捐款即达 3350 多万元。人们纷纷起来批判亲美、崇美、恐美的民族自卑思想,使自尊、自强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神大大发扬。

1950 年夏季,在县级以上行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中开展了整风运动,反对入城以后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和蜕化腐朽思想。接着,1951 年底开始,又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中共中央西南局提出“三反”运动应当充分发动群众,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这个意见为毛泽东所采纳,成为指导全国运动的方针。中共川北区委和中共西康军区委员会关于“三反”运动的部署,都得到毛泽东的肯定,认为“说得中肯”、“雷厉风行,没有拖泥带水”。“三反”运动在全省大张旗鼓地展开。重庆市在一次公审大会上,宣布将西南钢铁工业管理局采购股长张云书等 4 名大贪污犯处以死刑,起到了很大震慑作用。通过“三反”运动,国家工作人员中廉洁奉公、艰苦朴素、联系群众的作风得到发扬,与旧社会的官场恶习形成鲜明的对比,使人民群众受到很大鼓舞。

1950 年 5 月 1 日,新中国的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后,全省各地掀起了贯彻婚姻法的热潮,成千上万干部在农村和城市广为宣讲,纳妾、重婚、养童养媳及买卖

婚姻被法律禁止,妇女的正当权益受到法律保护,对封建婚姻制度和传统封建思想形成了强大的冲击。

4 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民主改革 四川的各少数民族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至解放时,除川东南及其他地区的土家族、苗族,川西北部分羌族等,已进入封建与半封建社会(但还存在封建农奴制的某些残余)外,在大、小凉山的彝族聚居区,还停滞于奴隶制社会,等级森严,家支林立,依血缘组成的少数奴隶主掌握着对奴隶群众生杀予夺的权利,奴隶毫无人身自由;在甘孜、阿坝地区及西昌专区的木里县等广大藏族地区,则处于封建农奴制社会,由土司、头人和寺庙上层构成的农奴主阶级,几乎占有全部土地、牧场、森林等基本生产资料,依仗封建特权和神权,残酷地统治着农奴和其他劳动群众。

藏、彝族聚居区的民主改革,解放以后并未立即进行。这是因为少数民族内部的社会改革,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与民族领袖人物及各阶层人士协商同意,并主要依靠本民族自身的力量来进行。而在解放初期,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还严重存在,匪特尚未肃清,各级政权未普遍建立,少数民族干部还未大量成长的情况下,这些条件是不具备的。基于这种情况,上述地区的党组织和政府本着“慎重稳进”的方针,以团结

上层为主,以团结建政、团结治安、团结生产为中心,耐心地进行各项工作。这些工作主要是:肃清匪特,团结上层,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建立各级政权,增进各民族间及民族内部的团结;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帮助少数民族人民发展农牧业生产,改善生活等。

经过5年多艰苦细致的工作,虽然这些地区原有的社会制度尚未根本触动,但整个社会状况已发生显著变化。至1955年,内地广大汉族及其他民族地区的各项民主改革业已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蓬勃展开,给予了少数民族人民,包括部分进步上层人士以极大的推动,使他们产生了愈来愈强烈的愿望,希望从根本上改变本民族状况,迅速赶上先进民族的水平。在此前后,藏、彝族地区已发生数百起奴隶和农奴群众自发进行的集体抗粮、抗差、抗债的斗争。仅1955年下半年,凉山州几个彝族聚居县逃跑的奴隶就达4000多人,他们纷纷到人民政府请求保护,控诉奴隶主迫害。许多奴隶和农奴群众还以集体写血书、按手印的方式,要求政府迅速实行改革。民主改革已呈大势所趋,势在必行。1955年9月,中共四川省委和中共西康省委联合制定了关于在藏族地区和彝族地区实行民主改革的方案。当年12月,四川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根据甘孜、阿

坝、凉山等州代表的提案,通过了3州实行民主改革的决议。于是,以废除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改革,在上述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展开了。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四川藏、彝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十分关怀,曾多次对民改的方针、政策、步骤和作法给予重要指示。根据指示精神,民主改革采取和平协商的方针,本着从宽的精神制订政策,采取和缓的方式逐步进行。对奴隶主和封建主,除没收其耕地进行分配,解放奴隶,废除封建特权和高利贷外,对其多余的耕畜、农具、粮食等不予征收,不算老账,不挖底财,其房屋、牛羊及其他生活资料一律不动,并在改革后予以安置,使其生活有保障。改革中,对上层“保护过关”。对寺庙的封建特权及封建财产采取了更为宽大的方针,不动其占有的耕地、枪支和高利贷,政府不干涉群众对寺庙的差役负担,只要他们不凭借这些枪支和特权去为非作歹。西昌专区各县的87个彝族聚居乡及乐山、雅安专区的马边、石棉等县,也大体上采用凉山的办法进行改革。

民主改革毕竟是一场消灭剥削制度的严重阶级斗争,尽管政策放得很宽,仍然遭到了少数反动上层的拼死抗拒。民主改革开始不久,少数顽固上层即在台湾国民党当局的煽动和空投特务的支持下,在西藏反动上层

的策划下,凭借他们掌握的枪支和特权,蛊惑和胁迫群众,打起“民族”、“宗教”的旗帜,在藏彝族地区发动了武装叛乱。1955年12月24日,凉山州普雄县申果庄地区的少数奴隶主,打响了叛乱的第一枪。1956年,甘孜、阿坝州少数反动上层也发动了武装叛乱。叛乱迅速在藏彝族地区蔓延。叛乱分子到处围攻城镇区乡,袭击军政人员,残害军政干部、农牧民积极分子及其家属,手段十分残暴。凉山普雄地区在叛乱开始的第一个月内,群众全家遭到杀害的即有五、六十户之多。甘孜州新龙县的劳动群众,被叛匪挖眼、割鼻、抽筋、剥皮者有138人。有些叛乱分子甚至打出国民党党旗及“雪山狮子旗”,叫嚷“永不进行改革”。

武装叛乱的发生,打乱了原来“力争和平改革”的部署,使党和政府被迫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平息叛乱的斗争。1956年6月和1957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两次召开会议,研究解决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平息武装叛乱和民主改革的问题,肯定“改革是完全必要的”、“平息叛乱是解放战争”,指示要“边平叛边改革”,平叛要采取以“政治争取为主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方针,除对最顽固之敌以军事打击外,主要采取开展停战和谈、进行规劝、组织军民联防等活动。各地坚持与叛乱首领进行和平谈判,允许他们来去自由,一次不成,再谈第二次、第

三次……,并晓以大义,只要放下武器,一律宽大处理,一个不杀。3个州40余万农牧民参加了劳动人民协会,农(牧)民协会;20余万名青年参加武装自卫队,与人民解放军一道开展联防,村村订立联防公约,使叛匪愈来愈陷入孤立的境地。凉山州在1956年3、4月的20天内,即有5000余名匪众经规劝后脱离叛匪。至1956年12月,各地股匪有四分之三以上与政府达成和谈协议。凉山州至1957年10月底,甘孜、阿坝州至1958年,叛乱均告基本平息,民主改革也基本完成。在平叛中,共解除叛乱武装近7万人,缴获各种枪支64万余支。1958年冬至1959年上半年,甘孜、阿坝两州还开展了以废除喇嘛寺庙封建剥削压迫制度为中心的反叛乱、反违法、反特权、反剥削的“四反”斗争,巩固了民主改革的成果。

民主改革的胜利,摧毁了延续逾千年的奴隶制度和封建农奴制度,彝、藏族地区100万以上的奴隶和农奴群众被解放了出来,基本生产资料回到了劳动人民手里,建立不久的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在严峻考验中得到巩固和发展,大批劳动人民出身的少数民族干部成长起来,社会主义道路在各族人民面前展示了广阔的前景。

3州民主改革是在激烈的阶级对抗中进行的,运动中也出现过一些问题,对党的宗教政策贯彻不全而,少数

农区剥削阶级的成份比例偏高等等。这些问题在以后逐步得到解决。

(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

各项民主改革的完成,为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1953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基本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四川各地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学习总路线、贯彻总路线的高潮,推动了各项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事实上,解放后,国家在建立各种国营经济和计划体制的同时,就已经在上述各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改造。因此,这些工作在时间上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内容上又是相互联系的。

1 农业合作化的实现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四川牵涉面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项社会主义改造。土地改革的完成,实现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激发了农民群众巨大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发挥互助合作的优越性,引导农民改变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用集体的力量解决缺少耕牛、农具,缺乏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等问题。引导农民走“组织起来”、共同富裕的道路,以适应当时农业生产的需要和国家工业化的需要。

农业合作化,是经由组织临时性、季节性互助组,到常年性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合作社,再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合作社几个阶段来完成的。历时约5年多。四川的互助合作运动,在最初几个阶段,总的来说,较好地执行了自愿互利,重点示范,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虽然其间也出现一些曲折,但运动的发展基本是健康的,因而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但在后阶段,即由初级社向高级性转变的阶段,变革过于迅猛,发展过于仓促,因而出现了一些问题。

各地在1951年秋后土改陆续完成,紧接着开展了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的前途教育,引导农民不要满足于现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教育。《川北日报》开辟“鄧思云思想”讨论专栏,扭转基层干部“换班退坡”思想。9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通过《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草案)》,发各级党委试行。四川省开始试点组建临时性互助组。到1952年秋后,四川省(不包括西康和重庆)已有互助组53万个,大部分是由农民自发起来组建的,其中有常年性互助组约9万个,参加互助组的农业劳动力约占总劳动力的30%。这些互助组不改变所有制,只是进行简单的生产协作,但对解决个体农民在劳力、工具、技术方面的困难大有补益,在农忙、抗灾中作用更大。据对分布在13

个县的85个互助组的典型调查,临时性互助组比单干农民增产8%,常年性互助组又比临时的增产15%,金堂县秀川村还创造了互助联组的形式,即以一个较稳定的常年互助组为核心,在自愿的基础上,由几个互助组联合进行互助合作,定期交流生产经验,在劳力、畜力和农具上互相帮助,调剂余缺。这种形式很受农民欢迎,以后在全省发展到4万多个,并为省外一些农村所仿效。

1952年10月,中共四川省委制订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5年发展计划,提出以5年时间:即到1957年使全省农业劳动力组织起来,其中常年互助组要达到70%。计划提出了试办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初级社,但规定所有试办的社都要由中共地、县委亲自掌握,并报上一级党委的批准,对互助合作运动持积极慎重的态度。1953年2月,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发展农业生产的10项政策,包括强调在互助合作中贯彻自愿互利的原则、允许自由雇工、自由借贷等,着重解决农民怕“冒尖”的思想。接着,各地开展了整组整社工作,纠正部分地区侵犯中农利益、歧视单干户、盲目追求互助合作的数量和速度等思想。各地还举办互助合作训练班,训练互助合作骨干,由领导干部亲自抓试点,总结推广经验,使互助合作运动健康地发展。到秋后,除互助组外,四川省

试办的初级社有 46 个(西康省 3 个)。这些初级社由于集体经营,田地统一使用,劳力统一调配,并进行了一些个体户难于进行的农业基本建设,推广了先进耕作技术,总收入较上年增加了 30.5%;在单位面积产量上,水稻增产 18.6%,玉米增产 43.6%,棉花增产 45.7%,显示了合作社的优越性,使农民群众受到很大鼓舞。

1953 年 11 月,粮食统购统销在全省农村广泛施行,同时关于总路线的宣传教育也在农村深入开展,这种情况促使互助合作运动加快了步伐。在原有几十个初级社的基础上,1954 年秋即发展到 8666 个,到 1955 年春发展到 3 万个(西康省建起 893 个)。在快速发展中,部分地区发生违反自愿互利原则及违犯政策的作法,致使部分社出现宰杀牲畜、乱砍林木、社员收入下降、情绪不稳的现象。针对这些问题,中共四川省委接连发出指示纠正,并于 1955 年春决定暂缓发展,压缩了原定计划,组织力量对农业社进行整顿。经过整顿,问题得到解决,农民生产情绪趋于稳定。直到这时,互助合作运动仍基本上保持着发展、巩固、再发展、再巩固的势头,进行得比较正常。

1955 年 7 月,中共中央下发了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后,互助合作运动便以超乎异常的速度发展

了。8 月,中共四川省委召开第十次扩大会议,认为合作化高潮在四川即将兴起,局部地区已经到来,批判了所谓右倾保守思想,决定到 1956 年春耕前将农业社发展到 10 万个,入社农户达到总户数的 27%。这个计划较历次所订计划都大大加快了速度,但实际发展更快,大大突破了这个计划。在全国上下反“右倾”,反“保守”,批“小脚女人”的浪潮下,1956 年 1 月,初级社就已发展到 20 万个以上。1956 年 1 月 1 日,四川第一个以取消土地入股分红、耕畜和大型农具折价入社为特征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新繁县禾登乡高级社成立。自此,高级社迅猛发展,仅 1 年时间,全省建起 17.5 万个高级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 88.3%,高于全国 87.3% 的水平,使四川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比原来预计短得多的时间就基本完成。

农业合作化的实现是一件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但合作化后期不顾条件的高速发展,也带来了不少问题:相当一批初级社刚建立不久,干部和群众尚未取得经验,初级社的优越性还未得到发挥,就匆忙转为高级社;一些地方盲目联社,扩社、并社,把条件悬殊的小社合在一起,妨碍了贯彻承认差别的原则;建社后,在经营管理上也过于强求划一,江津县龙门区推行“包产到户”的作法,还曾受到过公开的批判,不利于探索合理的责任制度。

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农民积极性的进一步发挥。

2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体上经过了3个阶段,通过实行初级形式的和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完成。

四川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基础较为薄弱。据统计,1949年全省有私营工商业企业9100多家,但大都规模很小,设备陈旧,相当部分还是工场式手工业,私营商业更为零星分散。至解放时这些私营工商企业都面临着资金、市场的重重困难,许多难于继续经营。国家实行保护工商业的方针和对它们利用、限制的政策,即利用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方面,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方面。在初步建立起国营经济后,人民政府对私营工业实行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对私营商业实行了经销代销。这些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一方面使私营工业度过了难关,很快恢复了元气,另一方面也把它们逐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促进了市场繁荣,因而很受私营工商业者的欢迎。1951年私营工业的总产值较1950年增长了21%,私营商业的营业额较1950年增长了27%。至1952年,私营工业接受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产值已达10092万元,占私营工业总产值的34.66%。

随着经济的逐步复苏,部分私营

工商业者出于牟取暴利,产生了严重违法和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据揭发,仅重庆市不法资本家采取各种方式盗窃的国家资产即达亿元之巨。该市冶金机械业少数不法资本家还组织起“星四聚餐会”,在国家机关内部布置“坐探网”,里应外合,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有的不法资本家在接受抗美援朝军用物资的加工订货中,通过偷工减料牟取暴利,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引起群众公愤。针对这种情况,1952年2至6月,全省在私营工商业户500户以上的63个城镇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工商户很少的城镇未开展“五反”)。“五反”运动发动广大工人群众,揭发了私营工商业户中的违法行为,查处了一批严重违法的资本家。重庆市在37115户私营工商户中,被查处的严重违法户有556户,占1.4%,完全违法户有137户,占0.37%。成都市31609户私营工商户中,被查处的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共占2.32%。运动还有力地配合了在国家机关内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反腐败斗争,使国家工作人员和民族资产阶级双方都受到深刻的教育。“五反”运动后,国家随即调整了工商业政策,重点县、市建立了加工订货委员会,对私营工业扩大加工订货,调整上缴利润,增加银行贷款和降

低贷款利率 ;对私营商业放宽批零差价 ,调整批发起点 ,并发放贷款扶持。1953 年 上半年对私营商业贷款共 4616 万元 ,超过其全部资本总额 ,当年私商盈余占其资本总额的 12 %。私营工业接受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产值达 21541 万元 ,比 1952 年增长 113 % ,占私营工业总产值的 63 . 39 %。到这个时候 ,私营企业的大多数都以不同的方式同社会主义经济发生了联系和合作 ,成为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同社会主义经济相联系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

对私改造的第二阶段是在 1954 年和 1955 年夏季以前 ,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国家资本主义从初级向高级发展 ,实行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经过前几年的经验 ,国家肯定了经由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道路 ,并确定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总方针。1953 年下半年 ,贯彻总路线的高潮在四川掀起 ,接着实施的粮油统购统销 ,又在原料、市场等方面对若干私营工商行业产生制约。这些情况都推动着对私改造向前发展。1954 年 1 月 ,中共四川省委召开扩大会议 ,确定扩展公私合营工业企业 ,首先选择钢铁、纺织、食品等

行业的 29 户大型私营工业企业进行。这 29 户企业虽然只占大型私营企业总数的 3 . 9 % ,但其资产却占总资产的 40 %。扩展工作中 ,各地在广泛宣传政策的基础上 ,组织公私双方协商进行清产核资、定股分红、人事安排等工作 ,尤其对公私股权的确定和利润的分配做得很仔细 ,规定了若干标准。经过充分准备 ,然后签订协议书 ,呈报上级机关批准。政府还注入大批资金 ,对这些企业进行技术改造。1955 年又扩展一批企业 ,使公私合营工业企业达到 275 户。这些都是较为大型的企业 ,至于其余为数很多、规模很小、设备很差、工序不全的小型私营企业 ,由于不可能按照大型企业那样逐个合营 ,这时按行业进行合营的问题已经提出来了 ,只是准备逐步采取多种方式进行。

1955 年夏季以后发生了变化。农业合作化高潮蓬勃兴起。10 月 29 日 ,毛泽东邀集工商界人士座谈 ,提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要走上一个新的阶段 。十一月中央政治局召集大中城市党委负责人会议 ,讨论《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 ,提出分别在各地区实行全部或大部分公私合营 ,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 。12 月 ,中共四川省委

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经过两年时间,完成全省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实际情况的发展又超出了计划。1956年1月10日,北京市宣布全部实现公私合营,在各地引起很大反响,工商业者和工人纷纷要求批准合营。1月16日,成都、重庆、自贡3市批准全市私营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重庆市30万人集会游行,欢呼社会主义改造提前一年半到两年胜利完成。仅仅1个月后,即到2月底,全省其他105个市、县(城关)和125个集镇也宣布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由于进展过于迅猛,本来应该在合营前进行的清产核资、定股分红、人事安排等工作也未来得及做,而在宣布合营以后才逐步补课,而且做得比较粗糙。

由于最后一阶段的对私改造,是在各行业一轰而起的情况下展开的,形式过于划一,使一些企业打乱了原有的供销渠道和协作关系,甚至把相距很远的企业合并在一起,使一些产品质量有所下降,商业网点撤销过多,也给人民生活带来不便。

3 手工业合作化 四川手工业有悠久的历史,解放后迅速恢复与发展,1950年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42.2%。但传统的手工业分散封闭,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不适于社会化的生产,部分手工业组织还存在封建的家长制的生产关系。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本着自愿、平等、互利的原

则,把手工业个体劳动者组织起来,走现代化生产的道路。在步骤上从供销入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从组织供销生产小组、供销生产合作社,到组织生产合作社。

四川的手工业改造,从1951年起步,1951年6月全国第一次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草拟了手工业合作社章程准则草案,交各地试行。到1952年,通过典型示范,在成都、重庆、泸州等重点城市的铁、竹、木行业,试办了170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逐步积累了经验,然后向其他方面推广。1954年,四川手工业合作化进入全面发展阶段。经过总路线的宣传学习,各地普遍召开了手工业劳动者代表会议,成都、重庆、遂宁等40多个市、县成立了手工业劳动者协会。到年底,全省共建起生产合作社643个、供销生产社38个、供销生产小组2617个,其生产总值共3382万元。接着,各地成立各级手工业联社,建立手工业管理局(科),以加强对手工业的管理。1955年秋后,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手工业合作化也加快了步伐,改变了过去按行业分期分批、分片改造的办法,采取了全行业一起合作化的作法。到1956年底,全省手工业合作组织达到12万余个,有职工40万人,95%以上的城镇手工业者参加了按行业组织起来的合作组织,其总产值达到6.2亿余元。

社会主义改造使手工业生产面貌一新,产量、产值均大幅度增加,向现代化生产迈出了一步。但后期发展过急,盲目追求办大社,忽视了手工业劳动的特点,致使一些传统产品质量下降,并造成部分产品一度欠缺。

4 粮食统购统销 1953年11月,中央的决定,实施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销)以后,又接着对食油(包括油料)、棉花、棉布实行了同一政策。对这些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是推行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的重大举措,推动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性的一步,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

1953年前后,国家开始进行全面经济建设,工业和城镇人口增加,对粮食的需求量骤增,土地改革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虽然大大提高,但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生产水平仍然很低,粮食的商品率更低,这样便在供需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而在当时的自由市场条件下,与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有关的私营工商业者抬价抢购,操纵市场,有余粮的农民待价惜售,又加剧了这种矛盾。四川在1952年粮食产量较1949年增产9.9%,即增加了14.8亿公斤粮食,但土改后农民生活有所改善,自身就消费了大量粮食。同时,作为主要农业省份的四川,开展经济

建设所需的大量资金,当时还得主要依赖以粮食为主的农副产品去交换。粮食供需的矛盾,严重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建设的开展。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53年10月作出决策,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中共四川省委在10月底至11月初召开扩大会议,决定自11月份起,除16个少数民族县份和边沿县外,在全省151个县实施粮食统购统销(西康先在雅安地区的4个县和雅安市实施,次年在汉族地区全面推开。)

由于粮食统购统销关系到农村、城镇的每一个人,中共四川省委把它作为极端紧迫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来实施,全省组织了150万余名干部和积极分子投入这一工作,全党动手,大张旗鼓地进行。实施统购统销,首要的一环是向农民征购粮食。为此,各地广泛向农民群众宣传总路线和统购统销政策,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各行各业均进行配合。文化部门把有关内容制成幻灯片,出动了82个电影放映队走乡串户放映,各地编印了数百万册宣传材料广为散发,大批戏剧工作者、音乐工作者及民间艺人以各种文艺表演形式,深入田间地头进行宣传。在宣传教育的基础上,通过农民自报、公议,逐户评定余额或缺粮数字,由党员、干部、积极分子带头,动员农民交售余粮,组织入库。至1954年4月,全省共收购粮食34.18

亿公斤,较原计划超过3.08亿公斤。农村人平留粮216公斤。

这种自报公议的征购方法,弹性较大,不易准确,加以自上而下地按地、县分配购粮任务,有的地方任务偏重,致使部分农民卖了“过头粮”,也有的农民该卖的未卖足,供应缺粮户也有偏多偏少现象,造成一些农民不满,有的地方还发生过闹粮事件。以后对征购办法逐步进行改进。1955年起实施“三定”的办法,即以乡为单位,定产、定购、定销,落实到户,3年不变,增产不增购,并以法令的形式颁布执行,使粮食统销逐步形成制度。

至于城市的供应,自1953年实施粮食统购统销后不久,即对大中城市及交通沿线实行了凭证供应。1955年8月起,对城镇居民的口粮实行了分工种分等级定量供应,市镇熟食业出售的米饭、面食和粮食制品等也凭票购买。11月,全国通用粮票和四川省地方粮票在全省范围内同时使用,从此,一切流动人口和临时外出的城乡居民,均实行凭粮票购粮。在粮食统购统销不久,即对食油、油料也实行了统购统销,1954年9月又对棉花、棉布实行了统购统销,这些产品也均实行凭票证定量供应。

起初的粮食征购,是在对农民逐户进行评议的基础上进行的,其工作极其浩繁,容易产生畸轻畸重,而且实施的难度也大,这就产生了“把太多的

小辫子梳成较少的大辫子”的想法。同时,解放粮食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生产,而当时认为只有在实现合作化后的大生产才能办到,由此便加快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进程。1955年粮食征购实行“三定”,就是在建起许多合作社的基础上进行的。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私商一律不许自由经营粮食,只能做国家销售粮食的代销店;私营加工厂只能接受国家的委托加工,不能自购原料,自销产品。

按照当时的规定,收购的粮食由中央统一集中管理,省际间的余缺调剂由中央调拨。1953年至1957年间,四川共上调中央粮食81.36亿公斤,1957年,外调粮食达29.22亿公斤,外调数量达到最高峰,占全国调粮总量的34.7%。四川农村留粮水平和城市口粮定量水平都低于全国,这是全省人民在节衣缩食下对国家作出的重要贡献。

统购统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保证粮食及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供应,稳定经济形势,支援经济建设,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这一制度也留下了深远的弊端,这就是它排斥了市场调剂,限制了价值规律在农业经营中的作用,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特别是在以后,随着统购、派购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国家计划收购的农副产品占到这类商品总量的90%,这些弊端

就更加突出了。统购统销制度自1953年起施行,延续32年之久,至1985年取消。

(四)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四川的社会经济历来较为封闭、落后,至解放前夕更是日渐衰微。1949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才43.5亿元(按1952年不变价计算,下同),按当时人口计算,人均产值才70多元。其中,农业产值占到83.2%,工业产值只占16.8%。作为农业省份,差不多主要农作物的产量都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1949年全省粮食总产量149.45亿公斤,较1938年还减少30.32亿公斤;油菜籽产量309.9万担,仅为1940年的28%;甘蔗产量1138万担,较1940年下降53.2%;棉花产量30.7万担,较1947年下降34.8%;烟叶产量93.7万担,较1935年下降67.6%;麻类产量21.5万担,较1948年下降60.7%。在工商业方面,许多工厂停工停产,商店停店歇业。全省工业总产值仅7.31亿元。当年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是:钢,9000吨;原煤201万吨;发电量,1.47亿度;棉纱,6.68万件;水泥,8000吨;金属切削机床,7台。全省没有一条正式运营的铁路。公路通车里程为8581公里,其中晴雨能通的仅4846公里,60%的县不通公路。每万人口在校学

生为26人。每3万人只有一张病床。四川解放后的社会经济发展,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起步的。

从1950年到1957年,是四川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前3年主要是恢复和改善国民经济状况,从1953年起,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全面建设,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1 恢复和改善经济状况 四川解放后,工作千头万绪,任务繁多,但各地遵照中共中央关于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指示,进行了大量工作。

首先是正确贯彻各项政策,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发挥各种经济成分的作用,以恢复与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解放后,各地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初步建立了国营工业企业。在金融方面,没收了国民党在四川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和中央合作金库,及其他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建立人民银行,从而掌握了金融命脉。还本着金融业“先走一步”的原则,对聚兴诚、和成等11家私营银行、钱庄实行了公私合营。有的官僚资本企业(如豫丰纺织公司)中有部分私股成分,按照对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区别

对待的政策,实行了公私合营。在商业方面,建立了国营商业机构,并赎买了少数民族资本主义商业。如影响较大的宝元通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在1949年8月即派人至北京向中财委提出转为国营的申请,1950年1月经西南财委批准,以赎买的方式,将其国内贸易部分,包括在重庆、成都、宜宾、泸州的分支机构转为国营企业。此外,还建立了一些合作经济组织。这样,便有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但这时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比重仍然很大。据重庆市1950年4月工商登记统计,全市工商业共24000多家中,有私营工业6958家,私营商业17100余家,国营及公私合营业只有71家。各地在保护私营工商业的方针下,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除对私营工商企业实行加工订货、统销包销、经销代销外,还发放大量贷款扶持它们恢复生产。重庆市至1950年5月底前,即通过订购产品向私营企业投放现金1280万元,在人民银行发行的425万元贷款中,90%以上贷给了私营企业。成都私营申新、裕华等纱厂原料奇缺难于开工,政府便与它们签订原棉交换纱布的合同,从陕西等省采购原棉供应,并收购它们的产品。重庆市原来处境最为困难的400多家冶金、机械等重工业企业,在国家帮助解决了原料、资金、销路等问题后,至1950年6月纷

纷复工。国家还帮助调解劳资纠纷,即保障工人的基本福利,又使资方有利可图。在这些措施的启动下,至1951年工商业出现了初步繁荣的景象。各地还采取措施医治战争创伤。重庆市在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的破厂行动中,损失各类机器570余部、动力14500多千瓦,解放后不久即迅速修复。长寿县龙溪河下洞电站和桃花溪电站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炸毁厂房。长寿解放后的第二天,工人们便自动组织起来检查抢修,至1950年7月桃花溪电站全部修复,下洞电站在废墟上重建厂房到年底工程竣工,恢复了对重庆的电力供应。此外,各地还普遍登记农业人员,发放救济粮,举办职业技术培训班,组织失业人员以工代赈,生产自救,先后安排了22万失业人员就业,既解决了这一社会问题,又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人民政府还拨出款项,兴建和扩建为国计民生所急需的重点项目。据1951年和1952年统计,两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共3.93亿元。投资主要集中用于农田水利、交通运输和能源、冶金工业等方面。

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首先应提到的是都江堰整个工程。灌溉一百多万亩农田的都江堰,是川西农业的命脉,可是至解放时已有十余年没有大修。1949年的岁修工程至年底也未动工,致使坝埂垮塌,滩口淤塞,灌区

日益缩小,历来“水旱从人”的成都平原1949年竟先生旱情,又发洪水。进军四川的人民解放军,在听取中共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等人的汇报后,行至广元,贺龙司令员指出紧急抢修都江堰,力争春耕前岁修工程完成。解放军进入成都的第二天,就立即进行部署,解放军184师1500名官兵及当地大量民工,展开抢修都江堰的工程。由于当时尚无财政收入,使把部队从西北带来的银元作为拨款。时值匪特骚乱,成灌路经常受阻,工地也常遭袭击,筑堰军民一边战斗,一边施工,使历来都要费时5个月的工程,在两个多月内便告完工。都江堰的整修,适时保证了成都平原的春耕,使人民群众受到很大鼓舞。以后又对都江堰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造。同时,各地在大力恢复旧有水利工程的基础上,发动群众兴建塘堰。川西、川北相继举办了水利干部训练班,川北成立了水利技术干部学校。省及16个专区都分别建立了农田水利工作队。县组成小型水利督导队。梁平县张星桥水库,在解放前就议论多年,但一直未动工。解放不久,人民政府就立即组织修建,仅1年时间便完成了这座坝高17.4米、库容686万方的水库。这是四川解放后修建的第一座水库。至1952年,全省已实有水利工程塘堰54.2万处,渠堰7.58万处,有效灌溉面积较1949年增加447万余亩,达到

1553万亩,占水田总面积的27.6%。粮食总产量达到164.3亿公斤,较1949年增加9.9%,平均年递增3.2%,油菜籽增产24.2%。

在交通运输方面,首推“新中国第一路”——成渝铁路的修建。从清代末年以来,四川人民盼望成渝铁路已有整整40年,但始终未见一根钢轨。解放伊始,西南军政委员会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修筑成渝铁路,1950年1月开始筹备,当年6月15日正式动工,邓小平亲自在开工典礼上作了动员。四川各界人民对修筑成渝铁路表现了高度的热情,数万名人民解放军和10多万民工参加了修建,重庆钢铁公司修复陈旧的机器轧制出了钢轨,沿线人民踊跃献售材料,有的农民将自家准备多年的寿木也献售出来,很快备起140多万根枕木及其他材料,没有机械设备,人们就肩挑手挖进行施工。经过两年努力,这条全长505公里的铁路即告竣工。1952年7月1日,举行成渝铁路全线通车典礼。成渝铁路的建成,沟通了成渝2市间的盆地腹心地带,当年就担负了全省旅客运输量的30%,对发展经济作出了贡献。就在成渝铁路通车内第二天,四川的第一条出省铁路——天成铁路,又宣告正式动工(后因部分改线,改称宝成铁路)。

这一时期修筑的主要运输线,还有跨越世界屋脊的川藏公路。川藏公

路经过二郎山、折多山、雀儿山等 14 座海拔 3000 至 5000 米的大山,越过 大渡河,金沙江、怒江等 10 余条凶险的江河和 8 条地质断裂带,地理条件十分复杂。筑路军民在恶劣的气候条件和简陋的设施下,克服重重困难,艰苦施工。1952 年 11 月,雅安至昌都段 1216 公里建成通车(1954 年 12 月全线通车)。这是当时全国难度最大的公路建设。同时施工的主要公路还有康滇公路、成阿公路等。四川主要的出川航道—川江航道,在重庆市组织力量修复破损船舶及码头,并拨款扶助民生轮船公司后,也于 1950 年上半年恢复航运。至 1952 年,四川省公路通车里程达 9259 公里,西康省公路通车里程达 1805 公里。全省内河通航里程较 1949 年增加 41.4%。

与此同时,各地还兴建了一些电站,为工业生产提供动力。长寿县上洞电站和雅安县陇西河电站,就是四川兴建的第一批水电站。成渝铁路的动工,带动了重庆市及沿线的冶金、机械制造和建材工业的发展。在国家大批订货的启动下,重庆市 1000 多家私营铁厂、机械厂和铁工作坊纷纷复工,开足马力生产。重庆市至 1952 年工业产值较 1949 年增长 87.7%,年均递增 23.3%,钢产量增加 4.4 倍,钢材产量增加近 15 倍。自贡盐业生产历来对四川关系重大,是重要的税源,至解放时已几乎全部停产,存盐严重积压。

解放后,对存盐实行政府收购,组织力量,打开销路,并发放大批贷款扶持盐业,削减盐商旧欠公款,帮助调解劳资纠纷,改进生产技术,井灶迅速恢复生产,1952 年原盐产量较 1949 年增加 1.2 倍。1952 年全省工业总产值也较 1949 年增长 1.2 倍,3 年年均递增率为 30%,主要产品的产量已经超过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

经过 3 年努力,四川的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并有所发展。1952 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达到 59.08 亿元,比 1949 年增长 35.8%,年平均递增 10.73%。工业产值所占比重由 16.8% 上升到 27.2%。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在工业中占到 47.9%,在商业批发总额中占到 60.4%。其他社会事业也有较大发展,在校学生人数由 1949 年的 151 万余人增加到 554 万余人,卫生机构由 1949 年的 195 个增加到 2953 个。有计划地开展全面建设的条件逐渐具备。

2 “一五”计划的实施 自 1953 年起,四川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从而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四川“一五”计划的主要任务是,除从各方面保证国家重点建设,大力配合国家资源普查勘探工作,准备和创造进一步发展工业的条件外,积极发展农业生产,积极发展地方工业和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卫

生事业,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一五”期间四川的主要建设项目,有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6个,限额以上的项目16个,再加上其他重要工业、交通建设项目,共计93个,投资的重点是能源工业和交通事业。

能源工业主要包括电力工业和煤炭工业。在电力工业方面,实行“水火并举”的方针。列入重点建设项目的重庆电厂和成都热电厂,就是当时兴建的最大火力发电厂。重庆电厂于1952年11月动工,1954年7月竣工,总装机容量24万千瓦,1957年又进行了扩建,是西南地区第一座具有先进技术设备的火力发电厂。成都热电厂于1953年开始兴建,到1958年两期工程先后建成投产,总装机容量55万千瓦,是西南地区第一座高温高压电子自动控制的中型热电厂。最大的水电工程是重庆长寿龙溪河梯级开发工程,由4座梯级电站组成,总装机容量1045万千瓦,其龙头水库狮子滩大坝,坝高52米,蓄水10亿立方米,是当时最大的水电工程,1957年3月建成。这几座电站的投产,使1957年全省发电量较1952年增长了17倍,保证了成渝工业区的电力供应。这期间全省还建成144座小型水电站,揭开了小水电建设的序幕。煤炭工业基本建设的投资为115亿元。一方面对南桐、天府、嘉阳等老矿进行

了技术改造和扩建。一方面新建了鱼田堡和中梁山煤矿,使煤炭产量大为增加。

在交通事业方面,1952年7月动工的宝成铁路,经过几年极为艰苦的施工,1956年6月全线贯通。办理临时运营,接着又进行了全面整治,于1957年底正式交付营运。这条全长668.2公里的第一条出川铁路,初步改变了历史上“蜀道难”的状况。为带动四川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接着,又开始了对内昆铁路的内宜段及川黔铁路的建设。出川的水上通道一千里川江,这一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治,通过治理险滩,炸除礁石,清除碛坝。使航行条件逐步改善,为运输船舶扩大拖载量和日夜航行创造了条件。在公路建设方面,1954年12月川藏公路全线建成通车,同时建成了成都至阿坝的成阿公路,宜宾至西昌的宜西公路,沟通了与少数民族地区的联系,改变了四川的公路布局。至1957年,全省公路通车里程已达到149万公里,较1952年增长61.2%。

这一期间,省内还兴建了一批机械、电子、冶金、化工、建材等工业企业,如西南无线电器材厂(后名宏明无线电器材料厂)、锦江电机厂、四川化肥厂、乐山磷肥厂、成都机车厂、江油水泥厂、重庆特殊钢厂、重庆水泥厂、重庆机床厂、重庆电机厂、綦江齿轮厂等,增加了四川的工业生产能力。

作为省及省以下政府部门管理的地方工业,虽规模不大,但为数较多,担负着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及供应人民生活用品的任务。这些地方工业在“一五”期间基本建设投资比重不大,但通过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挖掘设备潜力,改善企业经营管理等,也取得较大发展。1957年地方工业总产值达到33.86亿元,肥料、农药、农机等产品的产量成倍增加。

发展农业生产,支援国家重点建设,是四川“一五”建设的重要任务。这一期间,四川农业在投资很少的情况下,主要依靠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通过扩大农田水利建设、改进耕作技术等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农田水利建设这一时期由重点除害转为全面兴利,由整治原有工程转为兴修永久性工程,由局部恢复转为总体规划。全省按地域分为9个大区进行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灌区。首先,重点解决成都平原地区的灌溉保证问题。1953年1月,西南地区最大的水利工程官渠堰(后改称人民渠)施工,1956年2月,这条主干渠总长88公里、总灌溉面积130万亩的工程完工放水。同时还修建了东山灌溉工程、西河引灌工程、牧马山引水干渠。这四大干渠的完工,使都江堰灌区向东北、西南方向扩展,从而保证了整个

成都平原的农田灌溉。在丘陵地区,创造了“山湾塘”这一费省效宏的工程模式,经过示范、推广,5年间全省共建山湾塘5万多口、小型水库309座及一批提灌工程。1957年全省有效灌溉面积达到3200万亩,较1952年增加一倍。在改进耕作技术方面,主要是在长江沿岸推广双季稻,在一些地区推广增种晚秋作物,以提高复种指数。通过这些措施,1957年粮食播种面积较1952年增加2230余万亩,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增加了269万亩。此外,各地还培育和推广了水稻、小麦、油菜等优良品种,化肥、农药开始在一些地方施用,农业机具及改良农具数量增加。这些措施都有效提高了农业生产。1957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2130.5万吨,比1952年增长29.7%。同期主要经济作物的增产幅度是:棉花41.8%,油菜45.8%,甘蔗36.8%,水果177.3%。但是,在这一时期的后半期,随着合作化运动的迅速发展和统购统销的实施,存在着把农村家庭经济当作资本主义因素,限制过死的偏向,致使农村副业生产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部分地区一度家畜家禽减产,一些经济作物也还未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

“一五”时期,四川农业投资在基本建设总投资中仅占1.8%,而同期全国农业投资所占比重为7.1%

“一五”期间,四川累计完成的基本建设投资共 26 77 亿元,建成了一批现代化的工厂、矿山、铁路及其他交通、农田水利设施,其规模和成效超过从 19 世纪末叶至解放时几十年的总和。1957 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达到 108 19 亿元,比 1952 年增长 83 1%,平均年递增率为 12 80%。工农业的比重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业总产值已上升到占 43 9%。各项社会事业也有较大发展。与 1952 年相比,高等学校在校学生由 1 55 万人发展到 3 48 万人,普通中学生校学生由 21 98 万人发展到 49 72 万人,中等师范在校学生由 2 07 万人发展到 3 2 万人,小学在校学生由 526 万人发展到 648 万人。卫生机构达到 9101 个,增长 2 08 倍。文艺、文物事业机构 1180 个,增长 1 45 倍。

城乡人民生活有了改善。“一五”期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 41 1%,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年工资增加 36 3%。城乡人民棉布消费量由每人平均 3 4 米增加到 5 7 米,猪肉由每人平均 6 6 公斤增加到 8 公斤。

(五) 思想、文化建设及反右派斗争扩大化

1950 年到 1957 年间,四川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这种情况必然在思想、文化领域同样引起深刻的变化。

大体上来说,1956 年前思想、文

化领域的变化,是适应于当时的政治变革和经济建设的,并推动了政治、经济的发展,虽然其间也有过一些偏差;但发生在 1957 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则造成了不良的后果,并成为导致以后“大跃进”挫折的直接思想动因。

1 教育、文化体制的建立 解放以后,百业待兴,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教育、文化事业需要进行一番改造。

解放初期,四川有 36 所高等学校、58 所中等学校(包括中等专业学校)和 2 4 万多所小学。这些学校有公立的,有私立的,还有各类教会举办的。人民政府发布了《保护学校的通告》,本着“维持现状,继续开学”、“宁慢勿乱,稳步前进”的方针,接办了所有的公立学校,组织临时校务委员会或管理委员会;对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则分别不同情况,查封了少数政治情况复杂,社会影响恶劣的学校,收回了一批外国教会办的学校;其余学校则重新备案,然后分批逐步改为公立学校。同时,在学校建立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基层组织,废除反动的训导制,停止设置“公民”、“国民党义”等课程,开设马列主义政治课,开展时事政治教育,从而加强了党和政府对学校的领导。在此前提下,着重进行了两方面的改革,一是贯彻向工农群众打开大门的方针,一是对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1950 年重庆率先成立西南实验工农速成中学,接着各地纷纷举

办工农速成中学、工农干部文化补习班、技术进修班等,吸收较为年青的工农干部系统学习文化知识。解放军也配备了许多文化教员。掀起了文化学习的热潮。为方便工农子弟入学,各校实行优先录取的方针,推行人民助学金制度,减免学杂费。自1953年起,各类学校招生人数逐年增长,工农学生所占比重大增。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是为适应当时经济建设的需要而进行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四川在1950年至1951年间和1955年进行过两次较大规模的调整,合并了几所高等学校,新建了几所高等学校,对重点院系充实了师资和设备,突出加强了高等工业教育和师范教育。西南师范学院、四川师范学院及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南充师范专科学校、成都工学院、四川化工学院、重庆土木建筑工程学院等,就是在这时期经过调整后建立起来的。此外还结合学习苏联教育经验,进行了教学改革,对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进行了专业调整,修订了教育计划和教学大纲,使旧教育管理制度和教学内容得到了初步改造。

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初创工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团结队伍,创建组织。在解放初期西南、川西、川北文联筹委会及文协(后改为作协)、

音协、美协、剧协筹委会相继建立后,1958年1月,四川召开了首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成立了四川省第一届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选举沙汀为主席,李劫人、陈翔鹤、段可情、常苏民为副主席,把从老解放区来的及新解放区的老、中、青作家、艺术家联合、组织了起来。在此以前,四川没有文学艺术界的联合组织。其二,大力宣传介绍老解放区的文艺作品。解放后,各地文工团、队广泛演出了老解放区著名的歌剧《白毛女》、《血泪仇》、《刘胡兰》,话剧《思想问题》、《红旗歌》,新编京剧《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北京四十天》等,成渝等地还举办了老区书籍刊物展览、美术名作展览及音乐会等。这些作品令四川的群众耳目一新,使青年人受到很大感染,并对四川的文艺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三,是动员、组织作家、艺术家,紧密围绕当时的中心工作,大力进行文艺宣传和文艺创作。在各地文联举办的刊物上,都大量刊载了以剧本、鼓词、金钱板、诗歌、通讯、特写等为形式,以反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农村互助合作等为内容的作品。这些通俗文艺作品大都以作者自己的亲身体验,满腔热情地讴歌了新社会,表达了由衷、真挚的情感。在文联的组织下,作家、艺术家还以极大的热忱投身于文艺普及工作,积极培养工农作者,刊物以很大的篇幅刊载了这些人的作

品,并热情给予辅导和鼓励。在这种情况下,一批工农作者开始涉足文坛,并逐步成熟起来。到1956年,在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四川的文艺创作逐步走向活跃,无论新、老作家都各有收获。在老作家方面,有艾芜的长篇小说《百炼成钢》,沙汀的短篇小说《卢家秀》、《过渡》,李劫人在修改旧著《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后,又开始重写《大波》。崭露头角年轻作家和诗人的作品,有雁翼的诗集《大巴山的早晨》、孙静轩的诗集《海洋抒情曲》、傅仇的诗集《森林之歌》、流沙河的诗集《农村夜曲》、克非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等。话剧《四十年的愿望》、《一个木工》在1956年举行的全国第一届话剧观摩演出中分别获奖。发掘、整理民族民间文艺的工作也初见成效。

在艺术改革方面,川剧改革尤为瞩目。刚解放不久,重庆、成都就成立了戏曲改进会。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下达《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后,各行署区相继成立戏曲改进会。由于川剧是四川影响最大的剧种,戏曲改革理所当然地以川剧为重点进行。改革的内容是“改人、改制、改戏”。所谓“改人”,即是组织川剧艺人学习政治理论,参加社会活动,以启发他们提高觉悟,树立起川剧艺人的主人翁感。各地特别注意尊重和依靠老艺人,动员他们参加川剧改革,

带头净化舞台,并大力培养青少年演员。为此,相继成立了四川省川剧院和重庆市川剧院、成都市川剧院,继而建立了四川省川剧学校。一批著名的老艺人担任了剧院和学校的领导职务,并被选为各级人代会代表和政协委员,提高了川剧的社会地位。“改制”主要是将川剧艺人的“共和班”改组为国营剧团,进行剧团组织建设,建立起导演制度,改变过去川剧条纲戏的老套,并加强川剧的音乐工作。“改戏”是剧改的中心。各地依靠川剧艺人,广泛发掘、整理优秀传统剧目,至1955年搜集起2000多个传统剧目剧本。川剧过去文字资料甚少,主要是依靠老艺人口传身授,发掘整理工作抢救了一大批可能淹没散失的宝贵资料。在此基础上,成立起四川省戏曲研究所进行系统研究,并组织专家成立川剧传统剧目鉴定委员会,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精神,进行加工整理。至1957年鉴定整理出321个剧目,编辑《川剧剧目鉴定演出剧本选》正式出版,以后又陆续出版一些优秀剧目的单行本及《川剧》系列专辑共88辑。1952年10月在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中,川剧《柳荫记》获剧本奖,《秋江》、《评雪辨踪》、《五台会兄》获演出二等奖,周企何、陈书舫12位演员分别获奖。《川剧集锦》、《杜十娘》、《柳荫记》等拍成电影在全国放映。这一段时间,川剧面貌一新,剧目

丰富,人才辈出,上座率高,被称为川剧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

此外,在新闻事业方面,成渝两地原有的40余家报纸中,解放后除7家继续出版外,其余均陆续停刊。1949年12月10日,《新华日报》率先在重庆出版,接着中共各省、区的机关报及党委直接领导下的报纸陆续出版。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在被国民党炸毁的国际广播电台的基础上建立,首先于1950年元旦开播。成都在接管国民政府及国防部的4座广播电台后也于1950年1月5日以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的呼号开始播音。接着,其他省、区、市人民广播电台纷纷建立,广播网逐步形成,覆盖率大为提高。出版界紧密配合当时的中心工作,至1956年共编辑出版各类书籍2621种,印发42亿余册。体育工作着重贯彻发展群众体育的方针,1952年成立省体育工作队,赴各地巡回宣传辅导。1953年初举行四川省首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至1956年已有38万多人参加劳卫制锻炼。竞技水平也有提高。女篮获1955年全国联赛冠军,男女排球也逐步进入全国前列,改变了解放前四川主要体育项目在全国名落孙山的局面。

2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贯穿于教育、文艺、科技等

方面的各项工作之中,是当时思想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毛泽东认为,这“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主要内容是,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知识分子的头脑,批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动员知识分子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来,为人民服务,最终树立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传播,有着光荣的传统。解放以后,四川知识分子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空气日浓,许多知识分子迫切要求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要求学习党的理论基础。解放不久,各地就组织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中的高级知识分子座谈和学习,阐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意义,继而在大、中学校师生及其他知识分子中广泛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宣传教育,组织他们学习《社会发展简史》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一些党委的高级干部亲自到场讲课,组织知识分子就一些重大问题展开讨论,辩明是非。成、渝两市及其他许多城镇办起了青年学园,各省、行署区相继举办了革命大学和军政干部学校。为配合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话剧《思想问题》在

各地广泛演出,引起强烈反响。各地还组织高级知识分子参加抗美援朝、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等中心工作,让他们直接接触工农群众,从实践中促进思想转变。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大批知识分子陆续参加革命工作,投身群众运动的洪流。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全省8万多名知识青年报考各种军事干校。195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及《毛泽东选集》的开始出版,更推动了学习党的历史和理论的热潮。

为整顿和改造教育体制,四川还于1952年起有计划地进行了教师队伍的思想改造。这一工作首先于当年6月在四川大学和华西协合大学进行试点,由中共川西区委书记李井泉、宣传部长杜心源直接领导,继而全省分期分批开展。中学教师按中共四川省委指示由各地进行集训,小学由各地掌握召开代表会议进行。大学和部分中学的教师思想改造还吸收了一些学生代表参加。为指导为数甚多的小学教师的思想改造,还于当年12月召开了全省首届小学教师代表会议。教师队伍的思想改造于1953年陆续结束,全部大、中学教师及13万余名小学教师参加了学习,并结合学习进行了组织清理。思想改造对于提高教师队伍的思想觉悟,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更好地贯彻教育方针,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文艺工作方面,为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解放伊始,各地文联及其筹备组织就组织文艺工作者进行学习改造,批判旧的文艺观点,并动员他们深入工农兵进行创作。不少老文艺工作者带头下乡下厂,体验生活;至于新涌现出的青年文艺工作者,则大多本身就是战斗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者。他们以亲身体会创作的作品,大都具有质朴的感染力,对新生活充满由衷的热爱,塑造的新人亲切、朴实,很少出现以后常见的那种拔高人物、制造“高大全”典型的现象。不过这段时间对文艺为政治任务服务有过一些偏狭的理解和过急的要求,有的刊物甚至提出“文艺不但要赶任务,而且要赶具体的任务”,忽视了文艺创作自身的规律,致使一些作品较为粗糙,缺乏长久的生命力。

这段时间,在毛泽东的亲自支持和领导下,全国范围开展了多次思想批判。自1951年底开始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接着提出了研究自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中国近代史的问题,以及以马克思主义观点重新评价一些历史人物的问题。1954年开展的对《红楼梦》研究中唯心主义观点的批判,继而发展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广泛批判。这些批判都对四川的知识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知识分子重新思考和探索一些问题,从中受到重要的启迪。但是这些批判都

有着把学术思想同政治思想相混淆的偏向。在刊物、报纸上点名批判的人逐渐增多,公开作检讨、检查的人和刊物也逐渐增多,使知识界产生一些紧张感。重庆市在1951年后就对作家刘盛亚的小说《再生记》作了不适当的批判。在科技界,对生物学、遗传学的学派争论,也被当作政治思想对待。

1955年3月开始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很快发展为“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四川各地也同样展开了这场斗争,不适当地伤害了一些与胡风等作家及其作品有牵连的人。接着,又在机关及企事业单位普遍开展了内部肃反运动和审干工作。全省参加运动的职工共有440余万人,清查出发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3.8万余人,理清了部分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但对“胡风集团”的斗争,存在着把文艺思想与政治斗争相混淆的偏向,造成了一些冤案。重庆《西南文艺》1955年在《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栏目下发表的文章就达89篇,超过同期各种文艺作品的总量。省内一些人被作为“受胡风思想严重影响的人”受到不适当的批判,其中一些仅与胡风或其朋友有过一般联系的人,被作为“胡风分子”,蒙受了政治上的冤屈。这些人虽然为数不多,但所造成的影响不小。80年代这些冤案才得到平反。

总的来说,四川知识界这段时间是在充满胜利后的喜悦、兴奋、忙碌地

工作和学习,以及面对着频繁的变革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惶惑感中度过的。思想领域中“左”的倾向这段时间已初露端倪。但是除了“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外,其他思想批判还是作为学术、政治思想的批判进行的,受到批判的人在工作以及政治、生活待遇等方面并未改变,同以后的政治运动还是有所区别的。

3 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的一场斗争。这场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和后果。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出现了一些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初,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接着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基本性、长期性的方针。4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采取动员党内外群众“鸣”、“放”,揭露人民内部矛盾,帮助党整风的办法进行。但是,在整风过程中,出现了复杂的情况。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民主”,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5月中

旬,中共中央发出准备反击右派的党内指示。四川在此前后开始召集民主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座谈,提出批评意见。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揭开反右斗争的序幕。四川继续在省级机关、大专院校和重要企业动员“鸣放”,接着开展反右斗争。8月,中共四川省委发出在中等学校开展整风反右斗争的意见,各地、县机关和中学教师旋即从动员“鸣放”入手开展反右,一些地方甚至将反右对象扩大到部分中学生。年底,省委相继发出《关于寒假期间集中小学教师进行整风、反右斗争的计划》、《关于专县属工交财贸企业开展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具体部署的意见》、《关于专区新公私合营厂矿开展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见》、《关于手工业合作社开展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见》、《关于公私合营商业、小商业、小贩中开展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见》,当年底至1958年初,反右斗争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随即在这些方面展开,实际上整风反右已具有全民开展的规模和性质。

反右斗争刚开始不久,就成为群众性的急风暴雨式的斗争,运动中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进行,更加剧了政治空气的紧张,导致斗争逐步升级。运动中把许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错认为敌我矛

盾,把纯属工作上的意见,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从而导致扩大化。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复查,全省在反右派运动中受到处分的有6.4万余人,其中划为“右派分子”的有5.02万人,除21人情况不明外,其余全属错案,均进行了改正。著名的民主人士潘大逵、黄宪章等,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文澄、成都市委宣传部长叶石、四川大学副校长谢文炳、共青团四川省委副书记贺惠君等,都被划成“右派分子”。重庆市著名人士刘兰畦、潘大逵、高兴亚、李紫翔、郭仲衡、康心如等,因被划为“右派”,均被撤销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市人委委员的资格。在文艺界,青年诗人流沙河的诗作《草木篇》受到全国范围的批判,发表这篇作品的《星星》诗刊,7个编辑中有4人被划成“右派分子”,省作家协会会有30%的会员被定为“右派分子”或“反革命分子”。重庆市文联及各协会的不少作家、艺术家也被划为“右派分子”。此外,在基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40余万群众被戴上“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政治帽子。1962年7月以后,根据中共四川省委的决定,这些人有的被宣布“取消”帽子,有的被“摘掉”帽子,有的“不再称”反社会主义分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进一步作了清理和改正。

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使大批忠

实于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党内和党外人士蒙受冤屈,受到长期的委屈和压抑,打击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对党的信任,并破坏了党内和社

会上的正常民主生活,堵塞了干部和群众的言路,这也是“大跃进”失误之所以产生,错误又不能及时得到纠正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大跃进”和国民经济的调整

(1958 ~ 1965 年)

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从 1958 年开始连续 3 年的“大跃进”运动,使刚刚兴起的生产建设的热潮陷入严重的左倾错误,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实力急剧衰落,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受到很大挫伤,人民生活一度非常困苦。根据中央的部署,四川于 1961 年起开始对国民经济作局部的调整。1962 年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以后,经济调整以很快的速度全面进行,并在极短的时间内收到成效,经济恢复相当迅速。1963 年以后,恢复了元气的四川经济又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左倾和纠“左”交替出现、互相消长,构成这一时期极为复杂的历史画面。

(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 “大跃进”的发动 1957 年秋,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确认的在经济建设上既

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指责 1956 年的反冒进来了一个右倾,给右派以进攻的口实。会议公布了 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农业四十条”)的修正草案,确定以讨论纲要为中心,在农村开展大辩论,以推动农业的迅速发展。接着《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求在生产基础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11 月,毛泽东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提出中国将在 15 年使钢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次月召开的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宣布了 15 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口号。1958 年 1 月在杭州、南宁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更进一步严厉地批判“反冒进”。3 月在成都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成都会议”),在继续批评反冒进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建设高速度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思想。全国规模的“大跃进”运动随即开展起来。

中共中央对于“反冒进”的一再批判,使四川在制订“二五”期间经济发展战略任务时,自1957年底就染上冒进的色彩。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四川省委于11月召开第一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四川省1956年至1967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简要规划(修正稿)》,动员全省农民讨论。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这次“讨论”实际上成为批判农村基层干部的“右倾保守思想”的“大辩论”,使制订发展规划特别是当年生产计划开始脱离实际。南宁会议结束前一天,省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会议后期传达南宁会议精神,并据以检查首届党代会以来省委的工作。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在会议的讲话中,否定了1956年第一届一次党代会上对于当时工作曾经出现“急躁冒进情绪”的正确判断,认为它“反映了党内少数同志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他们“否定成绩,不要集中”,是对省委的“冲击”。于是,在此后的相当时期内,只能反右,不能反“左”,成为指导四川工作的一项不成文的准则。成都会议以后,四川制订计划指标和反对“右倾保守”进一步升级。4月16日,中共四川省第一届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通过了《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和地方工

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而奋斗》的决议和《四川省实现1956到1967年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简要规划(修正稿)》。大会贯彻中央成都会议的精神,集中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要求争取提前8年或更早一点时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争取5年内地方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要求5~7年内,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3900万吨,农副业总产值达到97~103亿元,地方工业总产值达到127~145亿元。以后的实践证明,这些指标已经远远脱离了现实的可能。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后,四川省于6月26日召开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更进一步号召全省人民在更短期内把四川建设成中国工业基地之一,建成中国的农业高产区之一。这一个要求,一时成为动员全省人民的响亮口号。这次会后制定的《关于一九五九年和第二个五年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计划的初步意见》要求,到1962年全省主要重工业产品赶上或超过全国1957年的产量;其中产钢800万吨,发电220亿度,生产机床5万台,分别约为1957年全国总产量的

四川的粮食产量、农业总产值和工业(包括中央部属工业)总产值实际达到这些指标的时间,分别为1983年、1971年和1975年。

1.5、1.1 和 1.8 倍；工业总产值达到 460 亿元至 500 亿元。比起两个月以前制订的指标，这次的目标更加远离实际了。

在全省农村讨论制订农业发展纲要时，开展按照极高的指标安排当年计划并付诸实施。1957 年 10 月 31 日，四川报纸首次出现实现“农业生产的大跃进”的动员口号，这一口号首先推动了 1957 年冬到 1958 年春的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各合作社掀起了兴修水利和广积农肥的高潮。为了兴修水利，出现了打破社界、乡界的“大兵团作战”，全省每天出工最多时 2500 万人。到 1958 年春，取得很大成绩，仅扩大水田面积就为 1949 年全省农田灌溉面积的 1.3 倍。夏收小春粮食比上年增产 10%，大春作物长势喜人。为了实现“地方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的目标，各专区、县、区、乡、社办的农具厂、化肥厂、小煤窑等先后兴办起来。据当时统计，到 1958 年 5 月底兴办企业 14.8 万个，6 月底发展到 29.2 万个，到 7 月底就超过了 42 万个。四川工业生产的触角伸及前所未有的地域，形成了广大但脆弱的网络。由于各地的县乡小工业企业的纷纷崛起，表面上增加了工业总产值，改变了各地工农生产总值的比例，但除少数基础较好、原料和技术条件比较具备

的企业外，大多数这个时期兴办的小工业由于仓促上马，受资金、原料、能源、技术条件等方面的限制，后来都以种种原因相继下马，未能继续发展。

为了保证生产建设高指标的顺利推行，四川省在 1958 年初发起了“反浪费、反保守”运动。2 月 26 日，中共四川省委召开省级机关科、处长以上干部和部分地（市）委书记及工业、交通部长会议，布置在全省厂矿企业中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次日，省委通知要求各条战线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开展这一运动。3 月 8 日，中央成都会议召开的当天，四川省、成都市在成都体育场召开“反浪费、反保守，促生产大跃进誓师大会”，有 7 万多名职工参加。成都会议期间，成都街头每天游行队伍不断，纷纷向领导机关报喜、表决心，新指标、高指标层出不穷，据当时报纸报道，有一大型工厂的代表在会上提出的生产指标：“比这个厂在一天以前制订的指标，又向前跃进了五年。”跃进目标的脱离实际，于此征兆已显。

2 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建立 在农业战线，农业生产指标节节上升。中央南宁会议以后，四川于 2 月要求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 12%。成都会议以后，于 4 月提出争取 3 年或更早一点时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

纲要》,全省亩产粮食超过 400 公斤。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又于 6 月要求到 1959 年即实现平均亩产粮食 550 公斤。到了 7 月,省委又发出了紧急指示,要求在当年即实现亩产 400 公斤的任务。省委规定的这些任务又层层以“第二本账”的形式加码下达。在高指标的压力下,全省上下普遍出现了瞎指挥和浮夸风。1958 年秋,农村中瞎指挥盛行,传统的耕作制度被随意改变,“深耕”、“密植”等措施在很多地区划一地推行。耕作制度和耕作方法的重大改变,首先加大了农业的劳动投入,加之大批农民转向各种“大办”事业,使本来就紧张的劳动力就更觉窘迫。“夜战”场面开始出现。农作物不按客观规律栽培而与土壤、水、肥等条件的矛盾日益尖锐。特别是由于片面追求扩大复种指数而在广大盆中丘陵地区划一地要求“放冬水田”增种小春作物,使很多地方由于秋涝,当年和来年的两季作物都大受影响。农副产品产量急剧下降,蔬菜供应出现紧张状况,生猪收购量自 5 月份起逐月下降,成、渝两市在产蛋旺季的鸡蛋收购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减少 74.5% 和 46.6%。但是,出现在流通领域内的这些危险信号,却被一片虚报“高产”的报喜声掩盖了。在全国各地竞相争放“高产”卫星之际,四川的报纸也于 7 月初陆续报导早稻亩产破千斤、双千斤的社、队、县,宣传“早稻

跨过千斤点,中稻力争翻一翻,晚稻亩产赶早稻,晚秋增产十倍半”等竞赛口号;“卫星”越放越大。9 月 29 日,《四川日报》报导郫县友爱乡第九农业社中稻并秧移栽亩产 82525 斤(41262.5 公斤),是为当时四川所放的最大“卫星”。在上下一片浮夸风的影响下,中共四川省委在 7 月 22 日发出《关于争取实现全省粮食平均亩产八百斤的紧急通知》说:“根据各地委预计,今后全省粮食作物可能比去年增产 320 多亿斤,这样,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所规定的粮食亩产 800 斤的指标,我省今年就可能实现。”而实际上当年产粮数还不到该通知估计的总产量的 60%,实产粮食 2245.5 万吨,比 1957 年的实际产粮仅增长 5.4%。这种对粮食状况的错误估计,对于以后四川建设的全局,带来极为严重的影响。

1958 年 8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定》后,人民公社即在四川广大农村一哄而起。9 月举行省委八次全会规定立即在农村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月搭好人民公社的架子,10 月 1 日全省统一宣布实现人民公社化。半月左右,这一任务在全省完成。到 9 月 30 日,全省建立人民公社 4821 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 96.69%,基本实现了公社化。到 10 月中旬,各公社实现了“公共食堂化”,共建立了 61 万多个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不定量,

95 % 以上的社员已到食堂吃饭 ,粮食浪费很大。

农村经济生活的这一巨大变动 ,实际上正是从合作化后期以来指导思想盲目求大求纯的产物。早在 1955 年 12 月 ,四川即在简阳县射洪乡办起了“乡社合一”的大社 ,统一支配全乡人力、物力和财力。到 1957 年冬季 ,出于大规模调动劳力进行农田水利建设的需要 ,一些地方即陆续并社 ,约有 1/3 的合作社还办起了公共食堂 ,其中一些社已将生猪收归集体饲养 ,大部分自留地归社统一经营。公社化以后 ,各方面大力宣传强调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 ,使“一平(平均主义)二调(无偿调拨集体财物 ,无偿调拨社员个人财物)”的“共产风”在广大农村刮起来。大批农村青壮劳力按班排连营组织起来上山大办钢铁 ,自带口粮 ,在社里参加分配 ,农村劳动尽是老人、妇女、儿童 ,收割粗糙 ,一些地方是丰产不丰收 ,而且愈刮愈烈。相当于一乡或数乡规模人民公社成为基本核算单位以后 ,尽管宣布当年大春分配仍以高级社为单位进行 ,但是大炼钢无偿砍伐集体和社员的林木 ,搞集体饲养场无偿用社员的木料、牵走社员私养的家畜 ,搞“大协作”无

偿调用人力、口粮、农具和车辆 ,搞公共食堂无偿调用家俱、厨具和餐具等 ,事实上形成土地、粮食、资金、劳动统一拉平 ,按人口平分 ,抽多补少 ,从而否定了社会主义阶段按劳分配的原则 ,最终导致了窒息生产力发展的恶果。

在四川西部 3 个少数民族自治州 ,合作化运动刚刚起步 ,凉山、甘孜两州内反对民主改革的武装叛乱尚未彻底平息 ,此时也受到公社化运动的强烈冲击。西昌、泸定等汉族聚居区 ,迅即建立了公社 ;少数民族聚居的农业地区 ,初级社很快转为高级社 ,高级社又纷纷并社变大社 ,并且建立了近百个公社 ,办起了公共食堂。牧区个体牧民有的办起“直升(高级)社” ,有的也办人民公社。

3.“大办钢铁”运动 中共中央“成都会议”制订了当年产钢 800 万吨的“第二本账”以后 ,四川随即计划加速发展钢铁生产。加以在农业的“大跃进”中 ,各地纷纷提出“耕作机械化”、“运输车子化”等目标 ,要求“土法上马” ,限期实现 ;有的县要求实现的“化”竟有 19 个之多。一时动员了大量的人力财力 ,搞出一些“土火车”、“土索道”以及各种“土”机械 ,大都因

简阳县射洪乡 ,1953 年建 ,1958 年合并于解放公社 ,80 年代为解放乡 ,现并于石盘镇。

参见李井泉 :《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载《红旗》杂志 1959 年第 20 期。

出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情况各异 ,各州最终实现“公社化”的时间 ,则有很大不同。阿坝州在 1960 年 ,凉山州在 1961 年 ,而甘孜州则退至 1972 年。

为缺乏科学设计和脱离本地实际“发明”出来就被弃置不用了。但是,大量小型工业企业出现,大规模改良农具的运动,却极大地增加了对于钢铁的需要,各地纷纷向省工业厅要设备、要材料,钢铁供应骤然紧张。于是,四川自当年初夏起就着手扩大冶金工业的建设。

四川的钢铁生产,主要依靠重庆钢铁公司和重庆特殊钢厂两个老企业和 20 余个地方小铁厂,1957 年产钢 35.4 万吨,产铁 28.4 万吨。而 1958 年的计划指标,6 月规定为 60 万吨和 70 万吨;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半月以后又加码为 85 万吨和 120 万吨,比上年分别增长 1.4 倍和 3.2 倍。实现这样超高速的发展,显然大大超过现实的可能。于是决定加速重庆、江油、达县、宜宾、乐山、西昌 6 个钢铁基地的建设和筹建,在专区(州)再建立一批基地,构成全省钢铁工业网。并于当年 5 月召开全省地方铁业会议,提出增产钢铁的两条具体措施:一是开展技术革新,大量增产;二是用最快速度建成一批 15 立方米以下的小高炉。8 月,根据中央指示,成立西昌工业建设委员会,调集温江、内江两专区数万民工,着手建设一个以钢铁工

业为主包括煤炭、建材、电力综合发展的西昌工业基地。与此同时,决定在成都新建成都钢铁厂,并要求当年出钢。对原料矿山也采取一边勘探,一边建设,一边开采的“三边”方针。当时四川最大的钢铁企业重庆钢铁公司,也于同时由冶金部批准用三年时间建成年产钢、铁各 120 万吨的现代化的钢铁联合企业,提出打破先作计划、布置,再开工建设的常规,边设计、边施工、边建厂、边生产。由于基建准备工作不足,实际工期拖得很长,两座 620 立米炉中有一座直到 1970 年才投产。为了筹集地方办钢铁的资金,当时还出现了省、地共同出资合办企业的新形式。7 月在江油成立钢铁生产指挥部,建设江油钢铁基地。6 月 16 日,地方企业威远钢铁厂依靠几台机床,自行设计、自制设备,建成了 0.5 吨侧吹转炉,炼出第一炉钢,结束了四川地方企业不能炼钢的历史。7 月 7 日,省委即在这个工厂召开现场会,决定全省建立 32 处炼钢车间,采取“由小到大、由土到洋,先求有、再求全”的方针,很快炼出钢来。

1958 年 8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北戴河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

同年 9 月,冶金部呈报国务院批准,下达了西昌钢铁厂设计任务书,设计规模为年产生铁 400 万吨、钢 350 万吨,计划分两期建成。西钢的建设于 1962 年 6 月因国民经济的调整而中止,但它在建设准备期中所作的工作,对以后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积累了经验,特别是当时建成的四二零厂,成为冶炼钒钛磁铁矿的中试基地。

江油钢铁基地的建设于 1962 年因国民经济的调整而中止。但其所建江油钢铁厂和后坝钢铁厂成为以后兴建的长城钢厂的厂址,它的 1200 余名技术人员和工人也参加了长城钢厂的建设。

生产 1070 万吨钢而奋斗。在会议前夕和会议中间,省委连续 3 次召开电话会议,检查钢铁生产情况。在第三次电话会议上,要求各地立即动员,象 1956 年领导合作化那样,全力以赴生产钢铁。地、市、州委书记要亲自挂帅,着重抓“土高炉”的建设和炼铁出铁。于是,全省在已建土高炉 1300 座的基础上,发动了“万座土高炉”运动,参加炼铁、建炉和筑路民工逾 100 万人。

中央北戴河会议结束 1 周以后,省委于 9 月 7 日在重庆召开第八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 1958 年钢铁生产的紧急指示》和《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定》的决定》。关于钢铁生产的紧急指示,把完成钢铁生产指标规定为“全党当前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要求有铁矿的县区以上机关、工厂等单位都要搞钢铁试验田;原有高炉区应在高炉周围加建一批小高炉,土高炉较多的地区应增加一些有机机械的高炉,作为骨干,组织无数的高炉群;争取到年底建成 1000 到 1500 个有机机械的高炉。在省委的一再严令督促下,四川全省兴起大建土高炉、小高炉之风,全民炼钢炼铁运动达到新的高潮。省委紧急指示下达后不到半个月,土高炉数量猛增十几倍,从 9 月中旬的 1.5 万多座上升到 7 万座以上。全省动员 800 万钢铁大军到大巴山、华蓥山、邛崃山、峨眉山和大江两岸的

崇山峻岭之中,报纸上出现了“不见铁水不离炉,不获全胜不下山”等宣传口号。9 月 29 日夜,据各地上报当天产量的总计,加上“预借”次日的部分产量,凑成日产铁 1.02 万吨,产钢 5500 吨的“新纪录”。新华社于次日报道说,四川已成为全国第九个日产生铁“万吨省”。到 12 月 12 日,四川即宣布钢铁生产提前完成全年计划。据 1959 年初公布的全年产量:钢 70.29 万吨,铁 88.88 万吨。按国家下达的计划检查,分别超额 4% 和 23.4%。后经核实,当年实产钢 47 万吨,铁 56 万吨,虽未完成计划,但比 1957 年分别增长 32.8% 和 97.2%。

炼钢铁运动虽然使 1958 年的工业总产值大幅度上升,但在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一味追求高速度、高产量,带来的后果极其严重。土法炼铁的成本极高,质量极次,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质资源,并且由于砍树太多造成严重生态破坏,许多地方由当年大炼钢铁造成的荒山秃岭至今还难以恢复;由于各行各业“为钢铁元帅让路”,全社会人力物力大量超常规投入冶金矿业部门,使直接为人民群众生活服务的日用品工业部门发展受阻,食盐、食糖、肥皂和乳制品的产量相继下降,群众生活直接受到影响;同时,大量农民转为工人,城镇人口剧增 100 万,全民所有制职工增加 280 多万,工业劳动生产率则下降 1/4 以上。

国民经济已经步入畸形发展的歧路。

4 基本建设急剧膨胀 在“全民炼钢”运动开始前后,全省基本建设也全面铺开。成昆铁路、川黔铁路和川豫铁路同时动工兴建,当年全省先后上马的铁路干线和地方铁路支线共达100多条。9月,东水轮发电设备制造厂(后改名东方电机厂)第二重型机械厂在德阳动工,东风电机厂在乐山动工,飞机制造企业新都机械厂和峨眉机械厂在成都动工。由于大炼钢铁,当年全省的大小冶金企业由139个猛增到689个。在交通、邮电、水利、电力、商业等行业也掀起了“全民大办”的浪潮,全省共有5600余个建设项目陆续上马,基建投资规模急剧增大,积累率急剧上升。全年基建投资总额达到14.13亿元,比1957年增长1.06倍,其中冶金部门的投资就达2.63亿元,比上年增长8.97倍,占全省投资总额的18.6%。全省基本建设投资在国民收入使用额中的比重由上年的9.6%提高到17.3%。积累率由上年的17.7%上升到23.7%。1958年的大规模基本建设,确为四川以后的建设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仅全年修建的公路就超过了四川解放时全省通车里程。水利工程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在1958年12月召开的全省水利会议,提出了“大干一冬春,全省基本实现水利化”的口号,主管部门要求做到全省农村沟湾有水库,溪河有坝堰,

山腰有塘井,山坡有水凼。全省同时施工的小水库达上千处,中型水利工程也安排了126处。但由于资金、物资严重不足,126处工程只有24处坚持完工。其它建设项目也因摊子过大,资金投入高度分散,以及工程地质和资源不清、布局不当,结果质量低劣,很多项目都中途下马甚至彻底报废了。

5 1959年初的纠“左” 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不久,到1958年末,四川农村的经济颓势已经显现。1958年,由于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到钢铁战线和城市人口的增加,粮食销售量比上年激增42.8%,大大超过粮食实际增产5.4%的幅度。至10月间,重庆以下沿江地区和省内铁路沿线的国家粮仓已基本无粮,其他交通沿线的粮库存粮锐减,有10个专区要求减免粮食外调任务。但与此同时,上缴中央的粮食仍按计划源源外调,调出数量比省内当年购销余额多出15.5万吨。为钢铁和粮食奋战了一年的农民并没有从当年的增产中得到实惠,他们的生产热情受到“共产风”、“浮夸风”的挫伤。加之大炼钢铁中从邻省学到直接使用木柴煅烧矿石的“经验”,大量砍伐森林,61万个公共食堂也把周围林木用作薪材,全省林木资源锐减,农业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破坏。农业生产的全面衰退已势在难免了。

1958年11月至1959年4月期间,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多次会议,对当时已觉察到的左倾错误进行纠正。1958年12月到1959年1月,中共四川省委先后召开四级干部会和第一届第九次全体会议,贯彻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纠正急于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鉴于四川在公社化的过程中,不仅把原合作社的财产和社员自留地、私有屋基、牲畜、林木等收归公社所有,贫富拉平,“不算旧账”,而且在全省农村用“鸣放辩论”的方法开展过一场声势浩大的“共产主义教育运动”,造成群众思想上的极大混乱,有的地方甚至已经提出苦战三、四年实现共产主义的口号和具体规划。全会决定用5个月的时间,对人民公社进行一次整顿,对干部群众普遍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宣传教育,澄清错误思想,明确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并且针对公社化后社员害怕“共产”的心理,规定社员个人生活资料包括房屋、衣服、家俱等,以及银行存款,永归社员所有,任何单位不得侵占。同年3月,中共四川省委召开六级干部会议,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规定的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省委据此作出了《关于人民公

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修正草案)》,规定农村人民公社一般实行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以管理区(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要求公社坚持按劳分配,承认队与队、社员与社员收入的合理差别,强调物资、劳动力要等价交换,不能无偿调拨。4月,省委又根据中央指示作出《关于人民公社算账退赔的指示》,规定对公社建立以来的旧账,原则上都要算,平调社员的财物要退赔。6月,又作出《关于人民公社必须认真把几项权力下放到生产队的规定》,要求把大部分猪只由公社下放到生产队饲养,归生产队所有,把经营农副业产品和经营不属于国家统一收购的三类产品的权力,下放到生产队,允许社员私有自养羊、鸡、鸭、鹅、兔等小家禽畜,允许社员耕种屋旁、村旁、水旁、路旁的零星闲散土地,谁种谁收。由于这些规定的执行,农村中“共产风”受到一定遏制。但是,为了维护公社的“一大二公”,纠“左”并不得力,纠正的范围和程度也很有限。特别是在退赔“共产风”平调农民的财物中,算账不清、退赔不彻底的情况相当普遍。同年5月和6月,中共中央分别发出紧急指示和通知,规定恢复社员自留地。省委认为本省已给公共食堂和专业养猪基地留一定数量的菜地和饲料

即“十六字方针”,其内容是:“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负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地,如果恢复自留地,会影响公共食堂的巩固,因而未予执行。

在农业生产上,四川仍然坚持高产指标和密植规定。当时错误地估计,四川粮食在1958年获得了特大丰收,并以此为基础增加50%作为1959年的产粮指标。1959年3月20日起,用3天时间召开了有1万多名干部参加的农业生产动员大会,号召群众为实现农业“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胜利而奋斗”。随即在全省广泛发动“亩产万斤”的高产运动。4月19日,省委又发布农业生产八项规定,严格规定了为确保实现当年农业指标的各类作物播种面积、施肥数量和密植规格,要求各地“抓思想、抓典型、抓小运动,自始至终都抓紧”,把亩产万斤粮食的竞赛推向高潮,于是从上到下的“瞎指挥”之风更加盛行。这个文件一度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中央于4月26日把它批转给各省、市、自治区,并在批语中说:在农业生产问题上,有些地方存在着松劲现象,在克服浮夸虚报倾向后又出现了一种指标订得越低越好的倾向。这种倾向也应该注意克服,应象四川省委一样,作出一些必要的规定,把生产运动搞起来。

不过,就在中央批转四川省委关于农业生产的八条规定3天以后,即4月29日,毛泽东即给省、地、县、社、

队、小队干部写信(即《党内通信》)指出:“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上面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这些意见,显然是对“八条规定”所体现的高指标、瞎指挥等错误倾向的尖锐批评。5月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将此信电话传达到中共四川省委。4日,四川省委在重庆召开了7个地、市委书记座谈会,讨论《党内通信》;9日又在成都召开其他地、市委书记的同样内容的座谈会。在这两次会议期间,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对于传达《党内通信》问题指示说:“主席六条指示,可以发到县委,口头传达到公社,经过酝酿后再传达到生产队中去,不要转变太急,防止消极情绪”。嗣后,省委于5月16日把两次座谈会的记录稿印发各地。其中说,四川省1959年农业生产的八条规定中规定的密植规格不拟再改,《党内通信》中指出的主观主义,强迫命令当然要反对;“但是保守主义,尾巴主义也要反对。我省今年1260亿斤粮食的计划指标不能动摇”。

尽管如此,毛泽东的这份极为重要的纠“左”文件,对四川干部和群众的影响仍是深远的。它不仅为以后四川总结经验教训,纠正左倾错误,迅速

恢复经济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而且在当时即受到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带领中央工作组在新繁县(现属新都县)大丰公社驻点调查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将毛泽东的这封信在公社社员大会上念了3遍,又让广播室连续播放。当地农民在插秧时就不顾上面的密植规定,自行决定如何栽插。大丰公社在密植问题上“另搞一套”的消息不胫而走,立即引起各方关注,中共四川省委随即通知说:“大丰有田主任,他在搞试点,应当例外”。就这样,除大丰公社“试点”以外,其他地区的大面积密植仍按规定推行。

局部纠“左”和总体上继续推行“左”的方针同时并存的局面,反映了当时领导思想上既要坚持严重脱离实际的“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又必须面对四川的现实状况这样一种矛盾处境。但是,对于不少地县级和基层的党组织以及广大干部群众,严重的经济困难已经迫使他们必须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努力从困境中探索恢复经济的道路。在泸州专区,中共泸州地委书记邓自力主动实行了旨在重新激发农民积极性的重大措施。他在调查中发现公共食堂和当时实行的“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严重影响群众生活和挫伤生产热情,从中得出“供给制出懒汉”的重要结论。因而先在富顺县,后在全专区,支持了

农民的要求,同意停办了食堂,实际上也就取消了供给制,并把牲口一律退给私人喂养,把食堂的蔬菜地、饲料地下放给社员作自留地。在农业生产上,他们降低了不切实际的包产指标,划小承包单位,在生产队下设固定性的生产小队,每队一般8至10户,有的3至5户,实际上成了核算单位。同时在纳溪县还进行了包产到户的试点。这种改革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重大尝试,在其他地方也先后出现。1959年4月,中共江津地委书记张凤伍批准颁发了一份推行两个县关于规定生产小队职权范围的文件,把生产队下面的临时作业组固定为一级,形成了公社体制的“四级所有”。全专区8个县都不同程度地推行了这种改革,在实施中把这种作业组从生产任务承包单位发展为对土地、劳力、耕牛、农具实行“两固定”、“三固定”、“四固定”的核算单位。四川各地出现的这类“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试验,是一次具有改革意义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探索。但其包含的重大意义被多数人所理解,却是以后很长时间的事了。而在当时,由于接踵而至的“反右倾”运动,不仅使四川干部和群众纠正左倾错误的种种努力和尝试都被迫中断,而且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不过,江津的改革试验在“反右倾”中竟未被发现,直到1960年12月才被中共四川省委制止,前后延

续 20 个月。

6.“反右倾”运动及其后果 按照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四川开展“反右倾”运动开始于 1959 年 8 月下旬,中共四川省委在成都举行第十一届第十一次全体会议,9 月 13 日会议移至重庆继续召开,9 月 26 日结束。会议对邓自力、张戟(省计委副主任)等 50 多名领导干部进行了揭发批判,并通过了《关于贯彻执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 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 的决议》、《关于泸州地委以邓自力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的决议》等文件。会后,“反右倾”运动在全省普遍展开,各专区和县市层层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斗争范围扩大到公社生产队长一级约 16 万多名干部。11 月,四川省委又召开地、市、州委书记会议并连续发出指示,进一步扩大了“反右倾”运动的范围。12 月,省委决定在全省农村中开展以两条道路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纲的群众运动,要求召开社员大会,对“农业是否增产”、“公共食堂好不好”和养猪、自留地等问题,组织讨论和辩论,并确定对重点对象进行揭发批判。同一天,省委又发出《关于在工矿交通企业继续深入开展反右倾斗争、准备迎接 1960 年工业生产大跃进的指示》,指出在一些工交部门和企业中,反右倾不得力、不彻底,生产、工作没

起色,因此必须把所有工矿企业和大企业的车间以上的领导班子中的右倾思想活动,彻底进行揭露和批判。在工交企业的一般干部和职工中,则开展以总路线和两条道路为纲的社教运动。在贯彻执行四川省委上述指示的过程中,很多干部、群众受到冲击,特别是很多基层干部群众遭到不公正的批判、斗争。全省在这次“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地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严重右倾”的县以上干部就有 102 人。中共四川省委于 1959 年 11 月 12 日给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四川反右倾情况说:“这次运动斗争十分激烈,各级领导骨干受到不同程度批判人数之多,批判的深透,是解放以来历次运动所没有的。”

在这次“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和冲击的干部、群众,大多是在纠“左”过程中勇于反映四川经济困难的真实情况,勇于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工作的人,他们对脱离实际的浮夸风、高指标有较清醒的认识。但当时他们的这种态度和言论,却被指责为“否定成绩”、“涣散军心”、“反对群众运动”和“反对一大二公”,从而受到粗暴的打击。而且,在“反右倾”运动开始时,四川还把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信不加说明地发给一些领导干部,要求他们表态;“考”出了一批对信件内容表示基本同意或同情的“右倾

机会主义分子”。四川从反右派运动以来已经很不正常的民主生活由此进一步恶化,领导决策机关的信息反馈途径受到严重阻塞,无数干部群众的工作热情受到挫折,其后果是严重的。而“反右倾”运动的直接结果,则是纠“左”过程的中断和盲目冒进的进一步加剧。

随着“反右倾”运动的开展,1959年初的一些纠左措施也受到否定和批判。刚刚开始恢复的按劳分配、承认差别,被当作反对“大、公、共”的“右倾倒退活动”;泸州等地一度划给农民的自留地,被强令收回。而且,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活动”中,按照对粮食“高产”的主观估计,很多地方开展了“反瞒产”的斗争。这场斗争不仅以“瞒产私分”为由撤换了大批坚持实报粮食产量的干部,而且由于经过斗争“查”出大量并不存在的粮食,使当年产粮数量达到1528万吨,仍然比1958年下降约30%。但是,竟公布为3500万吨,夸大了1.2倍。按照夸大了的产量征购的结果,使当年征购数量占实际产量的48.9%,比1953年至1958年平均征购率高出18个百分点。粮食供应的极度紧张,造成全省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上升,达到46.9‰,人

口大量减少,自然增长率为-30.26‰。川东的涪陵、石柱、秀山和川西的荥经,人口自然减员100‰以上,其中石柱县高达167.82‰。

纠左的中断和“高指标”的势头不衰,使基本建设再度膨胀。一度压缩的基建投资到1959年末达到20.64亿元,比上年又增长46%;施工项目多达6000余个,曾经有所收缩的城镇人口再度上升。重工业生产继续以高速度上升,它在工农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扩大。按1957年不变价计算,全年重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48.2%。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工业建设的膨胀和农村经济的凋敝,都以恶性积累的方式不断加剧。

7 1960年的“继续大跃进” 1960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在当年继续“大跃进”的精神,中共四川省委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提出了“全党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为实现1960年的大跃进而奋斗”的口号,要求全省所有的县和所有的生产单位迅速赶上“先进县”和“先进单位”的生产水平,实现“生产建设的持续跃进”。“持续跃进”的主要目标,是到1962年钢的年产量达到230~250万吨。这就要求每年的钢铁产量,都保持在1958

有的地方还把庐山会议后期印发的《李云仲的意见书》印给一般干部讨论,这份意见书对“大跃进”的错误同样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毛泽东为批发此信写了近3000字的批示,说“李云仲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了一切”。四川印发此件时没有印发毛泽东的批语。

指“一大二公”的“共产主义方向”。

年、1959 年的上升水平上。在大办钢铁已使四川全省国民经济遭到严重损害,处处捉襟见肘的情况作出这样的决定,一方面表明省委领导对于全省的经济形势估计错误,另一方面也出于中央当时对四川的过高要求。年初四川决定当年产钢 150~160 万吨,对外公布的“第一本账”为 125~135 万吨,这已经是上年实际产量的大约两倍。但是,当李井泉将这个方案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却回答说:少了。要实现如此高的要求,现有的设施及人们的思想准备都严重不足。经过一个多月的酝酿,中共四川省委于 4 月中旬在重庆召开了约 1 万人规模的全省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六级干部大会,布置当年产钢 150 万吨的任务,紧急动员准备再一次开展 1958 年那样的全民大办钢铁运动。要求年内全省 100 多个有煤、铁资源的县都建起小高炉和小煤窑,没有资源的则采取划“飞地”的办法,跨县办钢铁。5 月间,又向全省正式动员“继续开展钢、铁、煤炭、交通运输小洋(土)群的群众运动”,还要求包括轻工业在内的各行各业都要办煤矿、办铁厂。当年初,全省尚有百万大军在山上搞“小洋(土)群”,当时希望由这些小企业开展“技术革新运动”,节约出劳动力开辟新的战场。虽然“技术革新运动”也确实加

强了一些小型钢铁厂的生产能力,但未能节约什么劳动力。加之几年来冶金工业的投资重冶炼、轻采掘,而采掘工业又重采矿、轻掘进,形成畸形生产结构,采矿能力只能满足炼铁能力的一半,而运输能力又大大小于采掘能力。上述薄弱环节均需投入大量劳动力去弥补。于是,在劳动力已经严重不足的农村,年中又紧急抽调 30 万人搞煤铁和短途运输。

在工交战线,一些骨干企业例如重庆钢铁公司、永荣矿务局等,由于受到高指标和各种“大办”的双重压力,已经不堪重负,进一步“跃进”后继无力,出现生产疲软。省委又在全省工交企业继续“反右倾”。当时认为,大企业之所以不如小企业,是那里的“反右倾”不彻底;“资产阶级制度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分子”没有得到改造,遗留下了“阶级问题”。在 4 月的六级干部会上,就批判了一批对钢铁生产“吹冷风”的企业干部,后来又在生产第一线开展“火线整风”。10 月 4 日,四川省委还发出文件,推广鱼田堡煤矿“火线整风”的经验,哪里生产上不去,就在哪里“反右倾”,撤干部,有的干部甚至在电话会议上就被宣布撤职。由于采取了如此严厉的措施,并且再次大规模地投入了人、财、物力于重工业战线,这一年勉强使钢产量达到 68 万

参见《李井泉同志在第二次地委书记会(南充)上的讲话》,1960 年 3 月 26 日

吨,工业总产值达到 96.2 亿元,基本建设投资 22.5 亿元,登上四川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峰。

与此同时,四川经济中存在的危险因素也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到 1960 年底“大跃进”期间积累的种种矛盾,已经非常尖锐。当年冶金工业和机械工业总产值较 1957 年分别增长 2.8 倍和 2.6 倍,食品工业则下降 2.5%,日常生活必需品灯泡、火柴、肥皂、保温瓶产量更是大幅度下降。由于几年来宏观管理失衡,企业盲目追求产值,计划与市场脱节,设备超负荷运转,管理制度废弛,大批小企业设备陈旧、工艺落后,造成大量工业品质下降、滞销积压。3 年来滞留在工商环节,最后不得不降价或报废,所造成的损失达 16 亿元。钢铁工业经营亏损达 15 亿元。基本建设由于布点设计失误和施工的错误而停建或废弃的工程损失达 12 亿元。上述损失占 3 年积累资金的 59%,占财政收入的 58.6%。同时市场供应极度紧张,1961 年市场零售物价上涨 23.7%,而唯一能够支持工业经济摆脱困境的四川农业,此时自身也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

8 农业陷入严重困境 四川的农业生产,从 1959 年起连续 3 年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受灾范围最大时达到 80 个县,连续受灾时间最长的达 5 个月。而公社化以来农村政策的失误和

生产上的高指标瞎指挥,以及高估产、高征购更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由于不科学地强调“一亩田当两亩田用”,盆地内大量冬水田在秋收以后改种旱作,来年春旱无水插秧,连年的粮食高征购,使不少农民无心种田,又加之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使成片农田抛荒。而且,在“反右倾”运动以后,急于向“高级”所有制过渡的思想又于 1960 年初重新抬头,共产风再度刮起,强迫命令风和浮夸风更加剧烈。各地以扩大公社经济和坚持管理区(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为名,无偿地从管理区(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抽调猪只、劳动力、土地和建筑材料。“共产风”引起了农民的惶惶不安。社员说,除了老婆娃娃以外,都是公家的。生产队长说,除了吹哨子喊出工的权以外,再没有权了。从 4 月份起,省委着手纠正急于过渡的作法,不再强调壮大公社一级经济实力;“共产风”才有所收敛,但它已造成巨大损失,而且“越大越公越好”的思想并未澄清,高指标仍然存在。连续几年人为和自然灾害造成的巨大困难面前,农民群众已经毫无抵御能力。1959~1961 年 3 年间,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减 12.9%,粮食产量递减 19.9%,1961 年农村人均口粮只有 129 公斤。但是,当时对于农村经济的危机程度估计不足,并且错误地认为那些问题严重的地区“落后”的原因,多数是搞

“右倾倒退”或“坏分子”、“暗害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结合起来进行破坏的结果。于是在当年春冬两季又在农村两次进行“改造落后”的斗争,要求在那些“坏人当权”的单位,揭开盖子,夺回政权。同时,全省农村又开展了对粮食的“一查、二定、三补”运动。为此组织了一支庞大的工作队,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实际上是更大规模的“反瞒产私分”运动,批判和处分了大批农村基层干部。这些作法都使党在农民群众中的威信受到严重影响。

虽然四川连续3年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1960年和1961年的产量仅相当于1949年的89.6%和77.3%,而1959~1961年3年间国家征购占产量的比重反而由1958年前的30%左右提高到48.9%、46.2%和38.8%。3年间农村人均留粮分别为139公斤、130公斤和129公斤。粮食征购率之高和农村人均留粮水平之低为全国所仅见。城市人口的口粮定量标准也一再降低。

但是,1960年夏收以后,由于全国粮食紧张状况已经发展到十分尖锐的程度,中央于5月份起就一再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包括四川在内的粮食调出省抓紧突击抢运,确保主要城市

的供应。四川为此千方百计筹集粮食,并于9月1日突然宣布废除旧的省地方粮票。通过这一措施,虽然从群众手中筹集到4800万公斤粮食,但却在实际上否定了粮食“节余归己”的政策,失信于民,也更加削弱了人民群众特别是城市居民的自救能力。不过,从1958年至1960年3月中,四川仍向中央上交粮食587万吨,而同期省内购销余额仅有353.4万吨,因而动用了“一五”期间的全部余粮和国家库存周转粮。到1960年冬季,全省约有30%的地区,缺粮面达40%~80%,7个月间人均留粮最多40公斤。从1958年入冬以来,就有局部地区发生人口非正常死亡,而自此开始到1961年,全省人口连续4年出现负增长。人口死亡率到1960年升至最高峰,竟达53.97‰,为正常年景的5倍多。当年全省有65个县人口负增长超过50‰,17个县超过80‰,7个县超过100‰。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中共四川省委从1960年初开始采取紧急措施,抢救大量出现的“肿病”病人。但是由于粮食产量连年锐减和必须保证粮食上调,这些措施甚少实效。为了维护国家大局,度过困难时期,四川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向上海等

查,即查面积、比总产,查苗稼、比亩产,查入库、比落实;定,即按查出的存粮数字落实征购任务后,定口粮、饲料粮和种子粮;补,即发动群众搞代食品等弥补不足。

1959~1961年的粮食征购率,全国平均为41.7%、35.5%和29.6%,分别比四川低9.2、10.7和9.2个百分点;同期农村人均留粮数量,全国平均为188公斤、176公斤和184公斤,分别比四川高35.3%、35.4%和42.0%。

大城市和各地灾区供应了大量的粮食,功不可没。到1961年,四川粮食产量降至最低点,在勉强凑出27.9万吨调出后,粮源即告枯竭,无力再外调了。1962年,以“天府之国”著称并为国家传统粮食生产基地的四川,反而首次由中央调给15.4万吨粮食。四川由国家重要的粮食基地沦入如此困难的境地,教训是深刻的。早在国家准备制订“二五”计划时,中央有关部门就曾指出:“四川支援内地的负担过于沉重”;“这个地区必须慎重地加以培植和保护。”以后的事实却是,在支援国家建设时未能兼顾人民生活;在发挥国家粮食基地作用的同时,未能积极保护和发展这个基地,结果不仅严重损伤了本省的元气,而且不利于国家的全局。这是四川经济建设中应该永远记取的一条沉痛教训。

由于农业生产连年衰退,依靠农业的支持一时迅速增长的工业也达到了高潮的尽头。到1961年,四川工业生产全面下降,工业总产值由上年的96.2亿元猛跌至52.37亿元,下降趋势还在发展。四川经济已经无力在原有的轨道上继续运行,全面调整经济已经迫不容缓了。

(二) 国民经济的调整

1. 1961年的初步调整 “大跃进”坚持到1960年,四川的经济形势已经十

分严峻。省内严酷的现实和中央政策的开始转变,使得正视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失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从而正确认识当前的经济形势的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960年11月下旬至12月初,中共四川省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学习贯彻中央于当月初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十二条”)。会议根据中央指示,尖锐地批评了“公社化初期所产生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1959年冬到1960年春“部分地区在生猪等问题上再度刮起的‘共产风’”,指出它是“农民小生产者、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思想的反映”。会后发出的关于贯彻执行“十二条”的部署,要求在农村“坚决反对、彻底纠正‘共产风’”;“使全体干部真正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怎样才能到共产主义,真正了解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结合、政治挂帅和物质保证相结合的道理,真正分清共产主义和平均主义的区别,等价交换和一平二调的区别,大集体下的小自由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区别”。这次会议在实际上承认了多年来领导思想上一再追求的“一大二公”不仅并不正确,而且是造成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但是,当时的批评所针对的对象,主要是基层干部,而且

会议在提出反对“共产风”的同时,依然提出反对“右倾倒退活动”,并且在随即开展的农村整风整社运动中继续不适当地处分了大批干部。这说明,以阶级斗争的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的习惯思维方式,仍然在起作用,对于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当时经济困难,这无疑是一个潜在的消极因素。

这种消极因素的影响,甚至延续到1961年初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以后,本来,八届九中全会正是为了解决“大跃进”造成的困难而召开的。会议正式通过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且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因而对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传统作风、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成为一个转折的关键。中共四川省委为传达贯彻这次会议而召开的第十四次全会,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给农民划自留地和大幅度压缩基建规模,同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实际、调整研究,但又认为过去调查研究不够的主要表现是,把造成落后社的原因归结于作风问题、人民内部问题,而真正的问题却是阶级敌人篡夺了社队领导权。这种认识使农村整风整社运动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继续发展。直到3月中下旬中央广州会议制订《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六十条”)以后,总结教训的着

眼点才开始转到指导思想上来。3月底至4月上旬为传达贯彻广州会议而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着重讨论了人民公社的性质问题。在关于这次会议向中央的报告中,省委承认对于人民公社“过去只看到它是政社合一的组织,而没有明确认识到它又是各生产大队的联合组织,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就往往以对待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办法来对待集体所有制,例如硬性向生产队下达生产计划、技术措施,强制执行,管得过多过死,任意平调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物资和劳力等”。报告说,1959年“因为反右倾,妨碍了郑州会议精神的贯彻”,因而“从1959年秋季起,在农村方面就比较突出暴露了高估产、高征购和对严重旱灾估计不足的缺点,在一般地区反右后则再度刮起了‘共产风’”,认为这是“付出了代价的教训”。在这次会议以后,农村工作的重点迅即转向“退赔”,即解决公社化运动以来无偿平调农民和生产队的财物的问题。

1961年四川农村的“退赔”是纠正公社化以来“共产风”的一次艰难的赔偿活动。由于指导思想上总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四川农村先后于1958年和1959年秋冬至1960年两度遭到“共产风”的破坏,全民共集体的产,大集体共小集体的产,集体共农民

的产。据 1961 年计算,被平调的财物金额约 13 亿元,其中各级政府调用的占 7 亿元。全省被无偿占用的农田达 400 余万亩,农民私有房屋被无偿占用或拆毁的,仅据资中县一个县的调查,即有 27 万多间,占原有房屋 40% 以上。向农民退赔平调财物,实际上是党和政府纠正“公社化”的错误的第一步实际行动,但对于几年来在左的方针影响下的很多干部,却是很难转过的险拐急弯。尽管省委自年初起就先后根据“十二条”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六十条(草案)”的规定,多次作出彻底退赔平调财物的指示,并拨出 2 亿元专款补助部分公社和水利、交通等部门退赔,但是直到年中,进展极为迟缓。因此,在 6 至 7 月为传达中央制订“农村人民公社工作六十条(修正草案)”而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用了将近一半的时间来反复讨论彻底退赔问题。省委在会后向中央报告说,这次会上反映出干部对于退赔的错误认识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思想,认为搞社会主义就要搞全民所有制,要扩大全民所有制,就可以侵犯集体所有制和社员个人所有制,认为彻底退赔就是损害全民所有制;第二种是片面的以工业为主导的思想,认为退赔就是损害工业利益;第

三种是把对共产党员的要求标准,用来要求普通农民,要求农民也不要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要求农民也不计报酬地劳动。同时,退赔工作还遇到资金和物资两方面的巨大困难。过去无偿调用的资金,早已被大炼钢铁耗用殆尽,物资也大多消耗和损毁。中央于年初拨给四川补助退赔的款项共有 2.5 亿元,仅占平调金额的 1/5 弱。省委决定把中央的补助款用于帮助“三类社”退赔,补助水利、交通和财贸等部门退赔,并且规定,只有把本部门、本单位可以退赔的财物全部退完、赔完以后,才能动用国家补助款,这就是当地所说的“破产还债”。即使如此,由于资金不足,也由于避免大量现金投放增加已经不堪重负的市场压力,还首次在四川农村发放了 2.69 亿元的“期票”。由于省委领导的坚决态度,基本上排除了层层思想障碍,退赔工作在下半年取得较大进展。到年底,共退赔农民 6.2 亿元,约占平调金额的一半。实现彻底退赔的地方,基层干部和农民都受到很大震动。有的公社召开社员代表大会,拿出平调的原物,腾出公房,抬出办公桌椅和日用家具,摆出现金,让群众自报平调财物,核实一个,兑现一个。于是群众纷纷自报,半夜还在找见证。没

参见《中共四川省委关于三级干部会议讨论整风社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61 年 7 月 18 日。

自 1990 年 3 月四川农村开展“整顿落后”以来,人民公社按其生产状况、社员生活和领导状况被划分为三类,“三类社”即落后社。

有被平调的群众也扶老携幼来开会，说“来看一看党的政策”，看了以后，说“比土改分果实还热闹！”退赔以后，干部说：“这下退苦了！”农民说：“政策对头了！”

在实行退赔的同时，省委各主要领导人到农村调查研究。“共产风”在各地损伤农民生产积极性、破坏农民生活的实际情况，使自“大跃进”以来步步远离现实经济生活的领导思想，重新变得比较实际起来。

在当时的四川，困扰农村经济的严重问题，是长期坚持大办公共食堂。公共食堂被当成“人民公社的心脏”，办不办食堂被提到搞不搞社会主义的高度，大批干部因此在“反右倾”运动中遭到严重打击。对食堂制度如此坚决地维护，其原因固然在于当时存在“越大越公越好”的思想，把食堂制度当作维护集体投劳、集体出工、集体生活，消除“私有制影响”的有力武器，而在实际运作中，它还起到禁止农户分散掌握粮食以维护“高征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到了1960年秋后，全省农村大片地区饥馑的形势日趋严重，很多食堂已经无力开伙，继续维持“高征购”也毫不可能。在中央“十二条”指示彻底纠正“五风”、“六十条”规定对食堂“积极办好，自愿参加，有利生产，便利群众，按照条件，多种多样”

的方针下达以后，省委对食堂性质的判断有所松动，并于3月下旬派出工作组到彭县大宝山公社的四、十两个管区进行调整食堂的试点，划小了食堂，并允许一些社员（约占10%）“领米退堂”。即使如此，对食堂问题讨论的结果仍然是“目前暂不宜作大的变动”。省委领导人在农村调查的重点，正是食堂问题，调查过程中重大的认识转变，也在食堂问题上。

4月中旬，省委在南充火花公社和内江交通公社的各一个生产队内，再次就食堂问题进行试点。4月29日，两队同时向社员宣布：一、办不办和参加不参加公共食堂完全按照群众的意见办事；二、如果群众要求不办或退出公共食堂，可以允许。在分析了立即垮掉和尚未垮台的食堂情况以后，李井泉于5月8日和5月11日两次给毛泽东写信，主张应当把粮食分配到食堂的办法改为分期分配到户；“对于那些妨碍生产的官办食堂来说，实行粮食分配到户的办法，促使它垮台也是应该的”；“群众要求散伙的，应该坚决帮助他们散好”。尽管他同时根据多数社员当时尚未表示退出食堂的情况，还主张“对于办得好，群众真正坚持继续要办的，应该帮助他们办好”，但这毕竟是领导思想在食堂问题

指土地改革中向农民分配没收地主的财产，当时叫做“分配胜利果实”。

《中共四川省委关于贯彻“六十条”（草案）“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初稿）》，1961年4月8日。

上的一大转变。5天以后,省委又召集各市、地委负责食堂工作的干部,继续讨论食堂问题。这次讨论的一大突破,就是在会议形成的纪要里,专门提出了“对食堂的认识问题”,指出:“食堂是群众生活消费的一种形式。生活消费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自由选择。办不办食堂,办什么形式的食堂,应当完全按照社员的意见和是否有利生产、便利群众来决定。”这样,多年来对食堂的性质设置的政治界定被取消,领导和群众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旬日之间,全省公共食堂几乎全部解体,极度影响群众生活、削弱生产积极性的这一人为的桎梏,很快就彻底消失了。

在食堂问题上所经历的曲折认识过程,同样也反映在公社管理体制的问题上。阻碍农民群众生产积极性的“共产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公社体制的“一大二公”,具体表现为基本核算单位规模过大,核算单位内部的分配基本上队队拉平,人人拉平,不利于调动群众从个人物质利益上关心生产的积极性。

早在1959年2月中共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了公社的核算单位问题;到了1961年,他更多次明确建议把基本核算单位从生产大队下放到生产队。当年10月7日,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发出了《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要求各地认真研究基本核算单位以生产大队好还是以生产队好的问题。四川从当年11月起在533个公社、2889个大队作了调查和试点,李井泉和省委书记处的领导干部也分别在南充等地作调查研究。在这次调查中,省委提出了“一包两定,余粮余钱归生产队”的“大包干”办法,让群众讨论究竟是这个办法好,还是小队核算的办法好。“大包干”的办法,是生产队向大队承包粮、棉、油料等主要作物的种植面积、总产量、总收入和主要副业产品收入,在农产品方面定国家对粮、棉、油的征购任务,定大队提留的机动粮,在总收入方面定农业税和上缴大队的公积金、公益金、生产费、行政管理费,在完成这些定包任务后,剩下的粮食和现金归生产队支配。按照这个办法,生产队的分配权力比过去的确有所扩大,但依然不足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之间贫富拉平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权力也不在生产队手里。但是,两种办法在试点社队讨论的结果,竟有96.22%的大队赞成实行“一包两定、余粮余钱归生产队”的核算办法。出现这样结果,和当时各地主持调查的人员表现对“大包干”办法

的明显倾向有极大关系。据李井泉后来说,在南充调查时:“当你说改变核算单位时,没有一个不赞成小队核算的”,只是在要“群众反复讨论和考虑”以后,情况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要求群众“讨论和考虑”的问题,主要就是照顾穷队。为了照顾穷队又不致过于背离按劳分配的原则,当时选择的出路就是坚持“大包干”,这一政策曾被形象地称为核算单位既不放在脚上,也不放在腰上,而是“放在膝盖上”。“放在膝盖上”的政策,生动地说明了当时既希望尽快摆脱经济困境,又不能坚持按劳分配的调和态度。

事实上,在领导上正考虑核算单位放在哪一级合适的时候,四川各地不少农民却已私下实行在现有条件下最能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体制:包产到户。比起1959年春夏一度出现于泸州、江津等地,得到地方领导人的首肯或默许的包产到户或变相包产到户,这次包产到户,是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为了摆脱饥馑、恢复生产而逼出来的权宜之计,形式更隐蔽,范围却更广。据后来估计,各地搞包产到户的社队,少则百分之一二十,多则百分之七八十;李井泉在一次会上说:“包产到户几乎到处都有……西南局有个工作组去到岳池,上面说没有包产到户,到群众中一座谈生产经验,都讲(了)

出来。”可以说,包产到户也是一种总结经验的成果,是群众自发地总结公社化运动失败教训的产物。

与农业政策的调整相比,城镇经济的调整,在范围和内容上都更为有限。由于粮食的严重短缺是当时困扰全省经济的首要问题,因此城市经济的调整首先是压缩吃商品粮的城市人口和工业人口。从1958年以来,四川的城市人口和职工人数连年急剧增长,到1960年达到最高峰,城镇人口达到843.9万人,全民所有制职工有486万,分别比1957年增长25.8%和1.6倍;而粮食产量到1961年下降到解放以来的最低点,仅为1958年的54.1%,到秋收以前,国家已经没有任何存粮。所以省委自年初起就决定压缩城镇人口和工业人口,压缩的重点是全民所有制的县属工业、公社社办工业和中学生。基本建设战线也因资金、物资和粮食的重重困难而于本年度起大大收缩,投资额仅为1960年的37%。1958年动工的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东方电机厂等大型基建工程也于本年停工缓建,大批建筑工人回到农村。但是,由于压缩的对象主要是农村的工业和学校,所以尽管全年压缩了职工101万、停办学校4万多所、减少学生473万多人,城镇人口实际

李井泉同志在省委三级干部会上的总结,1961年11月14日。

《李井泉同志在地书会议上的插语》,1962年5月27日。

只减少了 66 万多人,年末人数仍比 1957 年多 16%。特别是学校的大量压缩,不仅关闭了“大跃进”期间建立的几乎全部学校,而且涉及不少老学校,1961 年全省在校学生人数,仅略高于 1955 年,比 1957 年下降 12.3%。教育事业的大起大落导致以后四川教育事业长期相对落后,则是“大跃进”失误所造成的一个重大隐患。

至于工业本身的调整,则开始得更迟,步子也小。由于八届九中全会对 1961 年工业生产指标的安排基本上仍维护在 1960 年的水平上,四川于当年年初安排工业生产计划时,钢产量计划与上年实绩持平,煤产量增加 20%,但与以后核实的 1960 年实际产量相比,钢、煤指标分别增加了约 80% 和 30%。重工业指标的居高不下,使得整个局面依然相当紧张。本来希望在年内加速发展的轻工业,却因受农业减产、原料短缺以及燃料紧张等条件的制约,到三季度不得不安排 20% 的工人停工、半停工或转产,当年总产值较上年下降 40% 以上。尽管 1961 年工业生产全面下降,工业内部结构基本没有改善。在企业内部关系的调整方面,1961 年则作

了一些较有成效的工作。当年 5 月,在全省推广了重庆市鱼田堡煤矿等企业实行计时工资加奖励和包产相结合的工资制度,使企业内部“吃大锅饭”的弊病受到一定抑制。以后又根据中共中央《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工业七十条”)的精神,决定以“五定”为中心,开展“工业整风运动”,开始恢复被“大跃进”打乱的生产秩序。同时,由于原材料和资金的极度短缺,不少企业被迫面向市场,“找米下锅”,其中出现大量商品、物资“走后门”的现象,即企业间越过国家计划进行的相互交换。在当时,这种作法被认为是“冲击”国家计划,在一定程度上也的确增加了国家统一用稀缺资源的困难,但在另一方面,它又相当准确地反映了市场的真正需求,事实上挽救了一批濒临倒闭的企业。

1961 年四川经济的初步调整,是在领导思想上对于“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尚缺乏充分认识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认为,在农村中实行“一包两定”以后,可以解决公社体制的弊端;工业方面压一批人、关一批厂、降一些指标,到三季度就已退到“谷底”,因而在 10 月召开的三干会上,反而提出了

1961 年年初省委第 14 次全会安排的全年钢、煤生产指标分别为 122 万吨和 4450~4500 万吨,7 月才调整为 70 万吨和 3200 万吨,11 月再调整为 55 万吨和 2300 万吨,全年钢、煤实际产量分别为 35.3 万吨和 2600 万吨。

在 1961 年全省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从 1960 年的 62.7% 略降为 58.9%,而冶金工业所占份额却从 11.6% 上升为 12.3%。

即“工业七十条”所规定的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定人员和机构,定主要的原料、材料、燃料、动力、工具的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产流动资金,定协作关系。

“组织前进”的任务。事实上,当年农业进一步衰退,农业总产值连续第三年下降,比上年又低 16.6%,粮食产量在全国开始回升的情况下,还下降 13.3%。到 1962 年初,全省还有 25 个县、1000 万人口的地区,粮食问题相当严重,非正常死亡继续发生,纳溪、宜宾、芦山 3 县市的人口负增长比上年还有所发展。工业总产值则比畸高的上一年下降约一半,市场商品奇缺,零售物价总指数上升 30.1,为解放以来所仅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跃进”3 年中处分了大批坚持实事求是的干部,批判了他们的正确主张。维持这种错误的处分和批判,极不利于发动干部和群众进行经济调整。四川经济发展的客观过程,迫切要求对“大跃进”以来一再左倾的教训进行认真的总结,对四川经济的现实作出如实的评价,从而在这个基础上实行全面调整的方针。中共中央于 1962 年 1 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为实现这个要求提供了机会。

2 全面调整国民经济 四川参加 1962 年 1 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的人员,有省、地、县及一些重要企业的领导干部 500 多人,大会的目的是进一步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增强团结,动员全党坚决地执行调整

方针,为战胜困难而奋斗。由于大会突出地提出了总结经验教训和健全民主生活的问题,很多干部多年来首次敢于反映一些真实情况并对主要领导人提出批评意见;由于中央在会议报告中比较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又首先承担了责任,也给四川党政领导人提供了总结失败教训、实行自我批评的前提条件和宽松环境。中共中央西南局主要领导人李井泉、李大章、陈刚都在四川组的会议上作了检讨,并于会议结束以后,立即于 3 月下旬召开扩大的省委工作会议,全面总结“大跃进”时期经验教训。会议的主题是“健全党的生活,增强党的团结”,着重检查和纠正几年来党内斗争的缺点和错误。从“大跃进”开始的几年间,由于强制推行“左”的政策,四川连续打击了一大批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各级干部,据当时统计,受到打击应予甄别的干部全省约 38 万人。所以,解决这一大批人的问题,对于健全的党内民主生活,调整大政方针、取得群众信赖、形成一支坚定执行调整的工作骨干队伍至关重要。会议否定了在“反右倾”和两次“改造落后”运动中对各级干部的错误批判,重申否定“火线整风”。在为这批干部甄别平反的同时,也提

“火线整风”已在 1961 年 6~7 月中共四川省委三级干部会上正式被否定。

出了为何在经济政策上犯错误就会在政治上错误地打击这么多干部的问题。李井泉在他向会议的报告中说：“问题是我们在整风整社中把敌情估计过大了，把敌我矛盾扩大化了”；“在反右倾中没有将阶级矛盾和先进落后的矛盾分清楚。对于那些在建设速度、指标高低、具体政策规定等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与反对三面红旗联系起来，戴了右倾帽子，这是错误的。”如何区分这两类性质的矛盾，的确是个大问题，往往因为阶级矛盾与主观客观、先进落后矛盾纠缠在一起，把阶级矛盾扩大化了”。

在这次会上，省委把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经验教训概括为：“一、在一个时期对工作的成绩有自满情绪，对自然灾害带来的破坏性和严重后果，以及工作中的错误所造成的困难，估计不足”；“二、在大跃进中确有生产指标过高，粮食征购过多，基本建设战线过长，运动要求过急，党内斗争过火等方面的错误”；“三、对一些问题，认识迟，转得慢，例如高指标和公共食堂问题”；“四、党内斗争有扩大化和过火的偏向，其原因除了为了完成高指标、高征购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外，还有对两类矛盾缺乏严格的区分。在纠‘左’的斗争中，对落后地区被敌人篡夺的面

估计偏大，在反右的斗争中，对于当时在形势估计和对具体政策问题上具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及处分，受到错误批评、处分的面，反右又比纠‘左’更大一些。”这是省委领导自大跃进以来从政治、经济、党内、党外各方面的工作所作的第一个全面的自我批评。一个多月以后，省委于5月26～31日再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省委书记、省长李大章在讲话中，进一步从理论上对上述检查作了说明。他认为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要多长时间，搞什么事”，我们并未搞清楚，实际上“在一定的时间个体是消灭不了的”；“这几年正是由于生产关系出了问题，所有制影响了生产，破坏了生产力。”省委领导人的上述认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从“大跃进”失败的教训中所取得的重要精神成果，表明领导四川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四川实际出发这一根本原则，在认识上有了长足的进步。

随着总结经验的深入，经济调整的步伐和规模也逐步加大。省委于3月召开压缩城市人口和精简职工工作会议，决定再精简全民所有制职工85万，其中50万至60万回到农村。5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会议通

《李井泉同志在扩大的省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4月5日。

《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召开扩大的省委工作会议情况的简报》，1962年4月18日。

《李大章同志在地书会上的讲话》，1962年5月31日。

过中央财经小组关于 1962 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以后,省委在当月召开的常委扩大会上,着重分析了经济形势,认为过去对困难的估计仍然不足,四川在全国已属处境很困难的少数地区之一。会议估计,全省农业的恢复,大约需要 5 年;工业由于原料、燃料缺乏,内部关系严重失调,还需关闭或合并大批企业,继续降低发展速度;根据当时农业的承受能力,城镇人口和职工人数还须大量压缩,直到低于 1957 年的水平。

和 1957 年相比,1961 年的城镇人口和全民所有制职工,虽然大量压缩,仍然分别多出 106 万和 194 万,而粮食产量则减少 975.5 万吨,油料减少 3.9 万吨,棉花减少 4.4 万吨,猪肉减少 46.6 万吨,供需矛盾极为突出。为了把吃商品粮的人数压缩到农业能够承受的程度,当时规定,对于 1958 年以后来自农村的新职工,除重点煤矿的井下工种、重点企业的主要工种和一般企业的关键工种可以保留少数骨干以外,其余一律动员返回农村,随同他们进城的家属也都动员回乡。到年底,城镇人口比上年减少 116.8 万,比最高峰的 1960 年减少 21.7%。

与压缩大批人口到农村同步,基本建设和工业的收缩力度也大为增

强。全年基本建设投资仅为 1960 年的 14.8%,工业企业压缩的重点也从县、社工业扩大到专、县工业和钢铁、机械工业。全省约 3000 个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和手工业企业,当年压缩了 1200 余个。已经形成的生产能力,钢从 88 万吨压缩到 40 万吨,铁从 160 万吨压缩到 20 万吨,钢铁企业除重庆钢铁公司和重庆特殊钢厂以外,只剩下 3 个地方企业炼铁。其中威远钢铁厂因为只剩炼铁车间,两座炼铁高炉开一停一,当时习称“半个厂”或“半个高炉”,因此全省地方冶金企业只剩下“两个半厂”或“两个半高炉”,年产生铁 2 万多吨,退到了 1951 年的水平。有色金属矿产本在四川具有很大潜在优势,“大跃进”中曾动员 6 万人上山采矿,就地用木柴冶炼,成本极高,地方财政耗资 5000 多万元,炼出的铜、铝、铅锌不到 5000 吨,190 多个小企业只好于 1962 年全部撤消。500 千瓦以上的电厂,发电设备容量从 1961 年底的 57.4 万千瓦下降到 47.6 万千瓦,8 个水泥厂保留了 1 个,14 个肥皂厂保留了 3 个。通过这些调整,原燃材料的使用开始集中,煤、电供应情况显著好转,交通运输条件也有很大改善,为保留企业的正常生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支援农业的主要生产资料和以工

中共四川省委 1962 年 6 月 1 日制订的精简方案规定,除重点工业部门和骨干工业较多的地区以外,全民所有制职工一般应当精简到低于 1957 年的水平,城镇人口一般地应压缩到接近 1957 年的水平,常年吃商品粮的人数一般地区减少到低于 1957 年的水平。

业品为原料的一些轻化工产品的生产,都有所加强。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厂,原料安排也比较落实,生产走向稳定。工业和农业以及工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都在较低的水平上趋向协调。工业总产值和农业总产值之比,从1960年、1961年的10.53、10.81变为1962年的11.25;轻、重工业之比,也从前两年的11.68、11.43变为11.12。

由于关停并转工厂企业的原则是坚决压缩原材料消耗高、产品成本高、质量低、劳动生产率低的企业,因此迫使许多企业为了图存而改善内部管理,注重经济效益。前述保留“半个高炉”的威远钢铁厂,是四川最老的钢铁企业,始建于1932年。1962年4月省委扩大会议期间,厂里接到冶金厅副厅长曹刚和内江地委书记李轩在会上打来的电话,知道省委决定工厂停办,厂里干部难过得声泪俱下,党委书记刘和地当晚就赶到成都,代表2000多工人要求保留企业;“自己养活自己”。他们争取了保留“半个高炉”以后,立即根据市场需要,转产当时由于公共食堂解体而市场缺口极大的饭锅,以及铁铲、钳、刀、钩等小五金产品,实行“前门开店,后门办厂,薄利多销,够本就卖”的经营方针。工厂站住脚以后,又于9月恢复炼钢,经过500多次试

验,成功地炼出新产品农具用钢“毛板铁”,工厂领导、科室干部和技术工人背着产品遍走省内和陕西汉中100余县的公社,送货上门,当场锻打。产品顿时打开销路,“威远毛板铁”成为饮誉农村、保厂支农的畅销产品。当年保留下来的1000多个工厂,几乎都有一段艰苦奋斗、自立图存的历史。

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所有制结构也进行重大调整。1962年4~6月,省委先后同意有关主管厅局的报告,决定凡是1958年以后由集体和个体所有制上升为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一般都改为集体和个体经营。大批手工业者、木船运输人员、小商小贩、医生和家庭手工业者,纷纷恢复为集体企业或由个人开业。全民所有制的手工业从1961年的7.2万个,下降为1962年的1.7万个,1963年再降到3400个。这些失掉了“大锅饭”、“铁饭碗”的生产者和经营者,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经济活力大为增强,1962年全省手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30%,企业亏损面降到10%以下。

在农村,1962年2月间,省委根据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把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不再坚持核算单位只放到“膝盖上”的主张。随着

公共食堂的解体和基本核算单位的下放,四川农村从1962年的春耕起,重新出现生机。基本核算单位的下放,使不少悄悄搞“包产到户”的农民找到了一条“合法”的途径,就是把生产队尽量划小,当年3月到5月之间,全省生产队从48.7万个增加到54.7万个。与此同时,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继续出现。对于这些问题,省委仍然如何过去多次出现的情况一样,把它看成是从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倒退而加以制止。1962年4月,省委批转省委工作组关于璧山县一个公社包产到户情况的调查的报告,指示各地采取措施,对包产到户进行纠正,同时又发出紧急通知禁止把生产队的规模划小。不过,鉴于几年来反“右”失误的教训,这次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方式,而把主要的力量放在缩小公社和大队两级的经济权力方面,使生产队真正拥有分配实权。当时规定,在一个时期以内,公社一级不办工业,一般也不办企业;大队一级不管钱粮,不直接经营副业,在生产恢复到1957年水平以前,公社一般不提积累,大队不再提公积金、公益金和机动粮;公社、大队占用的劳动力、土地和资金全部退回生产队使用。按当时的说法,这个措施是“一把钥匙开六把锁”、“过一关斩六将”。即把干部、劳力、土地、机动粮、资金和副业都放到了生产队,生产队

成了名副其实的基本核算单位。农村基层原来由国家经营的手工业,除了酒坊以外,这时也转给生产队经营,以增强它的实力。除了分配权的问题以外,生产队还遇到一个干部短缺的问题。“大跃进”期间,抽调了大批农民骨干去搞各种“大办”,加以连年运动不断,留在队上的干部先后受到批判下台,有的生产队一年之内就换了9个队长。为了迅速充实生产队的骨干,从1962年6月份起,即对公社和生产队的机构精简压缩,并规定凡是原来高级社的干部(正副社长、社委、生产队长等),原则上一律调回本生产队工作,使1958年以后从生产队调出的大批有经验的干部得以回队领导生产。同时,对“大跃进”以来受到错误批判的数十万农村干部进行甄别平反,其中很多人重新担起了领导社、队的担子。由于生产队骨干的加强,合作社时期行之有效的一套经营管理制度,如评工记分制度、生产责任制等,也逐步恢复。农民说,加强生产队的这些措施,是抓住了“好钥匙(政策)、好规矩(经营管理制度)、好管家(干部)”;“这么子搞,虽说条件不如1957年,但是两三年就可以赶上1957年。”事实上,就在当年,农业生产就开始回升,粮食产量增加24%,农业总产值增加3%。同期的粮食征购率和征购

量则降至 1953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秋收以后,市场农产品显著增多,物价狂涨的势头被扼制,全年职工生活费用指数仅上升 0.3,与 1961 年上涨 30.3 相比,已是另一景象了。

经过 1962 年的大步调整,到 1963 年 8 月,四川省第三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省长李大章在会上宣布,四川经济开始全面好转,当前任务就是继续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准备迎接国民经济的新高涨。从这年开始,四川经济已在节节后退中站稳脚跟,开始从被动转入主动,重新走上比较顺利的发展道路。经济调整的任务也从各条战线的急剧收缩转向巩固、充实、提高的方向。

几年的曲折经历证明,在四川这样一个农业大省建立和发展现代工业,必须以稳步地发展农业为前提。在 1959 年毛泽东首次提出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以后,四川一些负责经济工作的干部鉴于四川农业已经出现衰退的征候,多次建议加强农业。但在当时,这些意见或者没有引起重视,或者被当作“右倾”倾向而遭到批判。经过几年曲折,农业问题终于引起了极大的注意。1962 年 11 月,省委专门发出指示,强

调工业部门要坚决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大力支援农业,推进农业的技术改革。年底,又召开计划、工业、交通工作会议,提出“坚决把工业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的任务,随即在全省职工中开展了以支援农业技术改革、增产日用工业品和加强工业薄弱环节为目标的增产节约运动。工业“转轨”和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使企业的经济效益大有提高,1963 年和 1964 年两年,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 16.1%,而工业上缴利润却递增 4.4 倍。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结束了从 1958 年起 5 年间连年递减 9.3% 的局面,从 1963 年起开始回升,到 1965 年 3 年平均递增 33.1%。基本建设在投资大大压缩以后,直接用于农林水利的资金比重直线上升,1963、1964 年两年平均占总投资的 17.1%,大大超过“二五”期间 2.5% 的水平。

依靠政策调整、资金投入和工业支援逐步复苏过来的四川农业,此时开始通过技术改革以进一步提高生产力。1963 年 1 月,中共四川省委在批转一个关于农业技术改革的文件时,提出了“开展以水、土、肥为中心的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任务。由于 1959~1961 年 3 年连续自然灾害的教

四川的粮食征购量自 1953 年以来节节上升,当年征购原粮 529.98 万吨,占产量的 29.6%,到 1959 年的 773.598 万吨和 48.9% 达最高峰,1%1 年降为 448.14 万吨和 38.8%,1%2 年则再降为 419.02 万吨和 29.2%。

训,过去认为四川年年风调雨顺的一些领导人此时大大改变了看法,水利问题被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早在“大跃进”的“大办水利”运动中,全省投入 28 亿个劳动日,修建了近 4000 座水库。折毁房屋 8 万多间,淹没耕地 8 万多亩,但是由于许多工程未作地形测量和地质勘探,结果未能完工或遗留病害,不得不于 1962 年将不该建的或质量差的水库扒坝放水,退耕还田。与此同时,各地运用机械提灌抗旱,积累了一些经验,受到省委领导的重视。1963 年 1 月,省委在一个文件中说:“电力和机械化提水灌溉是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代表着多数丘陵地区实现农业水利化的方向”,因而要求“实行以电力和机械化提水灌溉为主,提蓄并举的方针”,于是发展提灌机械,建立电力提灌站,成为当时水利建设的中心。一些机械、冶金企业也随之调整了产品方向和协作关系,专门为农村生产机电提灌和农产品加工的设备和材料。到 1965 年,全省拥有机电提灌设备 15 万多台、35.5 万多马力。为了给提灌设备提供动力,一批地方电站陆续兴建,到 1966 年办起装机 4000~7000 千瓦的重点电站 43 座。地方电站的建设,实行国家投资、地方投资和社队投劳相结合的“三三制”,一般都收到费省效

宏的结果。水利建设的成就使耕地有效灌溉面积连年增加,1965 年比 1962 年增加 16.7%,比 1957 年增加 50%。

不过,“以机电提灌为主”也有很大局限性,因为大量丘陵旱地距离大江大河甚远,一有旱情发生,大河缺水小河干,提灌机械无水可提。即使靠近旱季不干的小河,也因电灌站要从遥远的电站架设输电线路,机灌站要从远处购买柴油,都使用水成本大大提高,不易普遍推广。当水电部门的一些负责人指出这个方针的局限,主张同时也要发展水库建设和引水工程时,却被指责为“水库派”,甚至扣上“反对省委”的大帽子;并且轻率地断言:“电力提水,多快好省,迷信水库,少慢差费”,又一次地把建设方法问题、工程技术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上升为政治问题。这种轻视蓄水引水工程建设的指导思想,直到 60 年代后期,才开始有所转变。

和水利方针的处理相类似,还有一个棉花生产的问题。“大跃进”后由于粮食极度短缺,粮价直线上升,到 1961 年黑市粮价高达每公斤 10 元以上,直接影响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连年下降,而以棉花的下降幅度最大。与 1959 年相比,1962 年播种面积下降 38.5%,产量下降 73%。由于棉花大减产,同期纱、布产量分别下降

63.8%和60.7%。因此,在调整期中,省委用了很大力量恢复棉花生产。但是,在落实这项本来十分必要的任务时,却使用了习惯性的全省“一个样”的作法,对在气候条件不宜种植棉花的地区也要求扩大棉田。生产成本高,经济效益差。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80代初期。

不过,这些问题究竟是省委在领导经济恢复工作中的局部失误,而从总体上看,四川各级领导干部在这一时期里的工作作风,都有很大转变。1964年2月,省委根据中共眉山县委的经验,要求地、县及以下的农村各级领导干部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种“试验田”,实行每周两天处理机关事务、5天蹲点劳动的“二五”工作制。3月,又推广重庆水轮机厂和永川煤矿干部的“三定一顶”劳动制度,即企业干部和技术人员下去劳动固定时间、固定岗位、固定职责,在能够独立操作以后顶替班组定员。这些制度尽管未必都能办到,但是它的广泛推行,毕竟使各级干部经常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实行比较正确的决策和指挥。“大跃进”以来由于强迫命令和瞎指挥而一度相当紧张的干群关系,大为改善了。

3 四川经济全面展开 到了1964年底,四川经济开始全面回升。从1962年到1964年,工农业总产值年递

增4.6%,1964年重新超过了1957年,1965年又比上年增长17%;特别是“大跃进”中投入的巨额基建资金,除掉浪费损失以外,经过调整也已形成生产能力,若干重要的基本建设工程如德阳第二重机厂等重新上马,增强四川经济的综合实力。

与1958年以前相比,四川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1958年到1965年的8年中,四川大量基本建设投资,约有87%投放在工业、交通部门,新增的65.85亿固定资产。加以1962年以后工业劳动生产最大幅度提高,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1958年到1961年的4年间,由于工业的“大办”和农业的衰退,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曾经由1957年的41.7%连年上升,最高达到65.4%,但迅即于1952年和1963年回落到45.8%和44.4%。从1963年起的3年间,农业以年递增8.4%的速度回升,工业回升速度则达到年均20.7%。到1965年,工业总产值再度超过农业,其比重达到53.8%。从此以后,四川的工业总产值稳定地超过了农业总产值,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愈益增大的主导地位。千年来四川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从此发生了重大

仅有的一个例外是,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受全省武斗的影响,大量工厂被迫停工,当年的工业总产值低于农业总产值。

的转折。

工业内部结构也发生转折。1958年至1965年的67.7亿元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中,有62.1亿元投入了重工业部门,使全省重工业实力剧增。在四川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但远离沿海工业发达地区的内陆省分,建立强大的重工业部门,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必需,是改变四川经济落后面貌的重大步骤。与此同时,忽视轻工业的发展,也给国民经济带来不利影响。

重工业部门的建设,8年间以投资多少为序,依次是机械工业、冶金工业、煤炭工业、电力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工业和建材工业。由于各自基础差别较大,在“大跃进”时期受到的挫折也不尽相同,以及基本建设周期不同等因素的影响,1965年和1957年相比,发展最快的是石油工业,总产值增长4.1倍,以下依次为化学工业(2.8倍)、电力工业(2.5倍)、机械工业(2.1倍)、建材工业(1倍)、冶金工业(88%)和煤炭工业(79%)。这几大工业部门的总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7年的29.8%上升到1965年的52.8%。交通和通信事业也有很大进展。8年间投资14亿元,奠定了全省公路网络的基础,整治了川江和嘉陵江航道,渠化了渠江支流上千公里,修筑铁路400多公里,为以后四川交通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川工业的布局也有初步改善。全省工业集中于以重庆为中心的盆地东部沿江地带的格局,让位于以川东重庆为中心的重工业基地、以盆西成都为中心的加工工业基地和以川南自贡、泸州为中心的化学工业基地三足鼎立的工业布局。它们和以后出现的攀枝花冶金工业基地,同为支持四川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

(三)四川的“四清”运动

1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四川城市“五反”和“农村社教”正当四川集中力量调整经济、医治“大跃进”带来的创伤的时候,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又一次发生阶级斗争的警告,使四川在总结教训中刚刚开始扭转的左倾指导思想在政治领域内再度抬头。从1962年起对左倾指导思想的批评,本来就在肯定作为当时左倾错误的标志的“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所以批评并不彻底。省委主要领导人对于几年来的错误指导及其所造成的严重损失,特别是对于党内民主的破坏,并未吸取深刻教训。以至就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以后,重庆市委有干部写信和口头向中央反映四川经济困难的实际情况,并向中央派往四川调查情况的干部提供省委几年间指导工作的文件,却被加上“进行反党活动”的罪名,受到严厉处理。主要当事人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萧泽宽被调离工作岗位,市委候补委员、副秘书长李止舟和

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团市委书记廖伯康被撤消一切职务。这一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对于左倾错误认识的局限性。

政治领域内左倾指导思想的再度出现,又是与对待调整期中若干重大变化的错误判断相联系的。这些变化中间,主要的又是经济体制的变动和市场机制的引入两点,最使省委领导人员担心。本来,调整的进程曾使四川经济出现了多年未有的活跃局面。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逐步下放,社员自留地的恢复,包产到户、包产到组的经营形式的出现,以及农村集市贸易的重新开放,强化了农业生产对市场调节的依赖,而使一些违背农民经济利益的种植计划和收购任务难以落实。城镇中恢复了大批集体所有制企业,出现了相当数量的个体劳动者,他们按照市场需要自产自销,自负盈亏。不少全民所有制企业由于任务不足,也纷纷求助于市场,开展计划外的经营活动。与此同时,贪污盗窃、行贿受贿的案件显著上升,封建迷信活动再度抬头。这些纷繁复杂的情况,在当时都被笼统地认作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背离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早在1961年底,省委即计划开展一次“反对分散主义、反对投机倒把、反对贪污盗窃”的“三反”运动,旋因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和随后繁重的调整任务而暂时搁置下来。到了1962年9月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以后,省委立即布置开展运动。

1962年10月,省委召开工作会议,分别就农业、工业、商业方面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通过了3个文件,决定在全省城乡开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开展了“以阶级教育为纲,打击地富反坏分子的破坏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有的县,省委还派工作组搞了“重新登记党员”的试点,把党员参加集市贸易、发展家庭副业、热心经营自留地等等表现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加以批判。

在城市,省委于12月召开的计划、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决定在职工中开展“以巩固全民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次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城市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运动”(“五反”运动)以后,城市和县以上机关以及县属区、乡财贸单位的“社教”运动即转为“五反”运动,主要的城市并在一些企业搞试点。在自贡大安盐场试点前,工作组对全厂5000余职工的思想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是:有20%的人“同情、支持或主张农村搞单干”;有35%的人羡慕自由市场,支持家属作生意;有20%的人“片面认为形势好的原因是划了自留地,开放了自由市场”。其它城市的调查结

果也与大安盐场相似。在当时,有这样多的工人公开发表与十中全会精神抵触的意见,被认为是阶级斗争形势严峻的标志,更加印证了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所以,1963年3月召开的省委第十八次全会指出:“五反”运动“是巩固全民所有制同破坏全民所有制的斗争,是巩固集体经济和破坏集体经济的斗争,是坚持统一计划和破坏统一计划的斗争,是坚持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和计划价格同破坏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和计划价格的斗争”,“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批判斗争的锋芒显然针对改变生产体制的探索和市场机制的引入。从4月至8月,开展“五反”的单位达到9244个,占同类单位总数的71.4%;参加运动的职工人数达到102.7万,占67.8%。这场运动,把企业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面向市场谋求出路的某些措施,包括一些曾经受到上级支持和鼓励的自救措施,和确实存在的违法行为,归结为非计划生产、销售、交换,变相提价加价,以及实行包产到组、包工到人和“小包工”、单干活动等问题,当成动摇全民所有制和计划经济的“资本主义倾向”加以批判。同时,在运动中,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作出规定,严格管理大中城市的集市贸易,要求成都、重庆两市

的集市贸易成交额不得超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2%。四川城乡的集市贸易,自1961年重新开放以来,生气勃勃。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于当年春来四川调查,曾经写信给毛泽东,称赞四川的“集市贸易很热闹,农民很高兴”。开展“五反”以后,它的发展再度受到重重限制。

2.“四清”运动逐步开展 1963年2月,毛泽东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著名论断;5月,中共中央又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此后,四川农村的“社教”即以“四清”的形式逐步开展。就在“前十条”制定的当月,省委即派工作团到郫县试点,同时训练大批“四清”干部。9月,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的规定(草案)》(“后十条”)下达以后,“四清”即在农村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全省从省、地、县级机关抽调干部6.6万多名下去领导运动,李井泉还亲自带领工作团选定南充市火花公社搞试点。到1964年夏季,全省开展运动的公社达到总数的一半以上。

“四清”运动是在更加夸大阶级斗争严峻形势的基础上进行的。1963年11月,省委在部署社教运动的一个文件里说,目前全省农村中大约有10%~20%的生产队,15%左右的党支部,

已被阶级敌对分子操纵和篡夺了领导权”；在人民内部，有百分之几的人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他们中有些发展成为敌我性质的矛盾，实质上就是社会上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到了1964年9月以后，由于“后十条”修正草案（“第二个后十条”）的发布，对于形势的估计又升一级，认为四川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单位，多数农村超过1/3，工厂也超过或接近1/3。因而在越来越多的单位中，运动发展成为“夺权”斗争，矛头开始指向社、区以至县以上的领导干部。南充火花公社在贯彻“后十条”前对全公社12个党支部“摸底排队”以后，认为其中11个都是好的或比较好的；101个生产队中，有16个生产队“生产、工作搞得不好”。经过运动，全公社逮捕法办1人，开除公职和党、团籍20人，撤换39人。但是到了1964年4月，又搞“四清复查”。“复查”的结果是有22个生产队“敌我界线不清”，9个生产队被敌人操纵篡夺了领导权”。同时还有“小集团”3个，“反革命集团”3个，“漏划”地主48户、富农22户。于是又清洗开除15人，撤职11人，降级1人，“内部选掉”50人，开除、劝退和“准退”出党25人，受到其它党纪处分的16人；戴上“地主”、“富农”等帽子的100余

人，小学教师被开除的约占教师总数的1/10。省委工作团在郫县领导的“四清”，也是一浪高过一浪，1963年贯彻“前十条”的试点，就错定了一个以公社书记为首的“盗窃集团”，公社书记被逮捕判刑，多数党委成员被当做“骨干”受到打击。1964年“后十条”下达前后，又搞一次“试点”，把大批干部划为“三、四类”进行“查、批、斗”。温江地委副书记兼郫县县委书记刘致台，对于处理干部表示了不同意见，被定为“反社教运动、反省省委工作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受到反复批判。第二个“后十条”下达以后，工作团对形势的看法更为悲观，认为郫县的敌情就像“白区”；“县委机关基本烂掉”，于是从全省各地抽调4000名干部到郫县“打歼灭战”，全面铺开搞运动。在全省，于当年10月起在已经开展过“四清”运动的数千个公社搞“复查”，并且要求工作团“在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以前，不要先强调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政策”，在城乡普遍查阶级、查来历、查去向，更多的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受到了打击，而且层层向上查“根子”，打击锋芒逐步指向乡、区、县的干部。南充、郫县、三台3县县委书记因“反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受到严厉处分，广

《廖志高同志在重庆省委三千人会上的总结报告》，1964年9月29日。

《李井泉同志6月2日关于四清五反问题的电话》

安县甚至被定为被敌人和平演变过去的“两面政权”。

城市的“五反”进行到1964年,在第二个“后十条”下达后与农村“四清”统一安排,名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按照省委部署,于当年11月以后,在大型企事业单位为骨干,点、片、线结合进行。当时估计“混入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不纯分子,约占职工总数的6%~7%,达二三十万之多。据试点调查,成都无缝钢管厂30个中层单位就有11个“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成都红旗机器厂15个单位有6个不同程度地“变了”。10月召开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38人的大会发言就揭发了48个基层工会组织的“严重阶级斗争问题”。运动中通过整顿工会组织,重新登记会员,调整或改组了工会领导班子,有些“问题严重”的工会还被指定的“临时委员会”所取代;“不纯分子”逐个被清洗或劝退。

1964年底,召开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于次年初发布会议讨论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1965年1月20日,李井泉在南充召开从专区到生产队干部2万人参加的五级干部会议,宣讲“二十三条”。这个讲话的录音旋即在全省城乡播放。20日至29日,中共四川省委又召开工作会议,学习和贯彻“二十三条”。此后,“二十三条”所规定的比过去较为宽松的政策

相当迅速地在省内贯彻,一些遭到错误打击的干部和群众得以解脱。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对“四清”运动“左”的势头的抑制,范围和深度都极为有限。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查实,全省在“四清”运动中仍有62万人受到各种处分,错案率高达66.5%。不过,在“四清”的进程中,特别是贯彻“二十三条”以后,执行把“四清”落实在建设上面,把增产作为搞好“四清”的标准之一,所以经济调整和生产恢复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加以四川在1964年下半年开展的三线建设,1965年进入大规模建设阶段,领导人员的注意力更加侧重于经济建设,从而在客观上限制了“四清”的消极影响。

“二十三条”下达以后四川农村的“四清”运动,先在约400个公社中进行,至1965年5月结束,是为运动的第一期。同年4月底至5月初,省委连续召开工作会议和全会,规划全省运动于1967年分批搞完;8月上旬的工作会议又决定把这个期限推迟到1968年上半年。从5月到11月,第二期运动在约730个公社中结束,旋即在约1300个公社中开展第三期运动,计划在1966年5月中下旬结束并在1200多个公社中开展第四期运动。由于1966年中“文化大革命”的开始,第三期运动在很多公社并未完成,第四期则有的刚开了头,有的根本未能开展。

总计一至三期运动涉及 2300 余个公社，占当时全省公社数的 32%。

历时两年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打击和遏制了经济调整时期出现的一些社会消极现象，整顿了基层干部的作风，改善了一些基层单位的财务、保管制度，也打击了确实出现的一些反革命活动。但是，由于运动是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指导之下进行的，不仅对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伤害过多，而且由于把经济调整期间很多有利于发展生产的积极探索当作“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进行批判，再一次地造成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混乱，也为“文化大革命”极端行为的蔓延种下了祸根。

（四）“大跃进”和调整时期四川的文化事业

1 文化战线的“大跃进” 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一方面对于全省的文化、教育和科学事业，既是一次有力的推动和促进，另一方面和经济领域一样，受到左倾错误的严重影响。首当其冲的是教育战线。

1958 年初，在各行各业竞相“跃进”的局面下，就在大学中动员知名教授写“社会主义竞赛决心书”，提出“做政治上的左派，学术上的革新派”的口号。同年 4 月，各高等学校在“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中，开始在师生中进行“自觉革命”、“向党交心”、“拔白旗、插红旗”、“红专大辩论”、“教育方针大

辩论”和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等一系列“兴无灭资”的思想斗争，其重点是批判教育战线上的“右倾思想”。当时认为，教育战线上的右倾思想主要集中反映在教育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政治，脱离生产劳动的倾向。于是在学校中开展了“教育革命”运动。大学各文科专业动员师生“大胆”改革教材，剔除被认为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烙印”或由“右派分子”编写的内容。工科专业的师生则更强调教学直接为生产建设实践服务。他们走进企业，参与解决厂矿的生产技术问题，有的直接将厂里的生产关键问题作为学校的科研课题。重庆大学在 1958 年制订的 116 个科研课题，结合当时生产任务的就达 86 个。与此同时，各院校掀起了勤工俭学的热潮，并制定了学生定期参加体力劳动的制度。这些改革，加强了理论和实际的联系，是兴办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一次大胆的探索。但是在当时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下，违反教育的客观规律，师生参加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过多，忽视课堂教学和教师主导作用，降低了教学质量。特别是运动中，又一批知名专家、教授和教师以及少数学生被作为“白旗”或“走白专道路”典型，受到不公正的批判，造成反右派运动扩大化以来对知识分子的再一次冲击。

为了加快教育文化的普及，四川

省还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争取在15年时间内,基本上作到使全国青年和成年,凡是有条件的和自愿的,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的指示,在全省范围内兴起大办高等学校的热潮。仅在1958年,全省即新建高等学校40所,其中规模在200人以上的15所,不少是专区、厂矿和医院等单位兴办的;部分中等专业学校也举办大专班,以后又升格为专科学校。同时,大搞“文化县”,实行“公办、民办同时并举”的两条腿走路办学方针,兴办各类学校,甚至高等学校。什邡县1958年全县人口总数仅为29万余人,在“文化跃进”中竟办了红专大学33所、红专中学73所、红专学校221所。兴办学校的势头到1960年达到高峰,与1957年相比,全省小学数增加51.8%,中学增加1.1倍,中等专业学校增加3倍,高等学校增加2.7倍。但是,在学校和学生剧增的同时,教育经费却大量减少。1958年,普通教育经费减少1300万元,到1960年,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在财政支出中的份额从1957年的29.5%下降到9.7%。

在教育跃进的同时,还用“大跃进”的方法大力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四川日报》于1958年5月19日发表题为《开展群众文化活动,促进文化大普及》的社论,指出:文化革命已经到

来,当前的迫切任务是促进文化大普及,提倡生产到哪里,文化到哪里;中心工作做什么,文化工作就宣传什么;生产越紧张文化越活跃。在此前后,城乡文化活动空前活跃。各种“赛诗会”、“赛歌会”层出不穷,新“诗人”、“作家”不断涌现,从事民歌和诗歌创作。从1957年冬天到次年春天,仅叙永县群众就创作民歌1万首,而古蔺县竟达10万首之多。这种直接产生于跃进年代而又直接服务于政治的文学创作,自然谈不上多强的文学性、艺术性,但多少有利于调剂群众过于的单调而紧张的生活;它们中也确有少数构思精巧、想像大胆且有一定技巧的作品,说明了人民群众的智慧 and 才能,但绝大多数作品只是以文艺形式出现的、反映左倾指导思想的政治宣传品,生命极其短暂。

在新闻和出版事业方面,1958年开始建设、1960年建成的成都电视台,是这一时期的一项重要成就。成都电视台是四川第一家电视台,是以以后的四川电视台的前身。1958年全省出版新书500余种,大大超过1950年至1957年的平均出版量,但是由于片面追求品种数量。很多书籍质量低劣,因而出现图书“又滥又缺”的境况。

卫生事业的“大跃进”,则是从1958年“除四害”的群众运动开始

当时指蝇、蚊、鼠、麻雀“四害”,后来麻雀改为蟑螂。

的。这次运动深入千家万户,动员男女老幼,使城乡卫生面貌大为改观。但是,由于不断要求提前实现“农业四十条”,在卫生领域提出了“提前实现、‘四无省’”(全省基本消灭“四害”)的不切实际的目标,甚至机关停止办公、学校停止上课,以“人海战术”轰打麻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有的地区还失实地宣传基本消灭血吸虫病,浮夸风随之蔓延。随后几年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群众普遍发生“水肿病”,卫生部门派出大量人力调查疫情,判断为“营养不良性水肿”,并向领导机关如实反映,同时把工作重点转为治疗水肿病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四川人口不正常死亡的势头,但除害灭病工作被迫停顿,血吸虫病等流行病的发病率回升。

四川的科研机构,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科学研究、科研管理、科研服务的体系。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于1958年成立,建立了冶金、机械动力、农业生物、化学化工、水工电力、地质、石油、林业、数学、物理、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中医中药、哲学社会科学、民族共16个研究所(到1960年发展为24个);四川省科学工作委员会于1958年成立(1959年更名为科学技术委员会),为科技服务的省科技情报研究所、省科学器材公司、中国科技情报所重庆分所也次第成立。省内地县级科技行政管理机构和科研机构也大多

始建于1958年前后,四川历史上空前数量的科研机构的建立,使四川的科学事业进入新的阶段,为以后的大发展开拓了初始的基地。不过,由于“大跃进”中提出“全党办科学,全民办科学”的口号,在实践中又违反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使当时掀起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等等群众运动,大都流于失败。加以在科技人员中一再批判“右倾保守”、“白专道路”,对科研工作干扰很大。

2 文化事业的调整和波折 1961年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立即影响到由国家财政支持的各项事业,首先是教育事业。在“大跃进”中超高速发展起来的四川教育事业,由于师资不济,经费支绌,特别是大量学生的口粮供应发生困难。从1960年末开始,即先于其它领导开始调整,用撤销学校、清理“超龄生”、停课“放假”、减少招生人数等办法,大量压缩学校和学生。到1962年,小学在校生压减了41.9%,中等学校在校生压减了52.9%,其中农业职业中学学生由9万余人减到1000人。“大跃进”以来新建的高等学校绝大多数撤销,“业余红专大学”和其他职工业余学校、技工学校、农民学校也相继停办。教育事业的大收缩,是当时客观形势下不得不为的举措,但是它的超常大起大落,导致大批学生辍学,教师转业,学校场地设施减少,对以后四川教育的振兴,留下了不

可忽视的隐患。到1963年,在校学生人数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并重新逐年发展。同时,各级各类学校贯彻执行中央制订的高校、中学和小学工作条例,整顿教学秩序,教育事业得以走上正轨。

在文艺领域,则由于文艺政策的调整,很快产生了积极的效果。1961年下半年中央《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下达,特别是1962年3月周恩来在广州戏剧创作等会议上的讲话在四川传达以后,四川文艺界一度出现重新繁荣的局面。由罗广斌、杨益言创作长篇小说《红岩》,在全国青年中反响强烈,被誉为“震撼人心的共产主义教科书”,并被译成多国文字,受到外国读者的欢迎。长篇小说《大波》(李劫人著)、《清江壮歌》(马识途著)、短篇小说《南行记续篇》(艾芜著)、《师道》(李伏珈著),以及川剧现代剧《夫妻桥》、《许云峰》等受到广泛欢迎的作品纷纷问世,盛极一时。电影、戏剧也有重大发展。成立于1958年的峨眉电影制片厂,于1960年与长春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了根据高缨同名小说改编的故事片《达吉和她的父亲》,引起全国广泛的注意。川剧剧目由于实行传统剧、新编历史剧和现代剧三并举的方针,舞

台空前活跃。以《激浪丹心》、《许云峰》为代表的优秀现代剧目,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

但是,文艺领域里的兴旺局面很快又受到“四清”运动的影响。自反右派和“大跃进”运动以来,多次批判过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在“四清”运动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受到更加严厉的对待。早在1960年,在四川文艺界就搞过一次对“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批判,一批作品被扣上“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帽子。到了1962年秋后,政治领域里重新掀起的阶级斗争浪潮,迅速波及文艺界。1962年9月,文学刊物《四川文学》刊载了一篇论文《漫谈文学作品中的声音描写》,文中引用了一段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的著作,当即被批评为“汉奸文学”,刊物被令停刊检查。一度活跃的川剧舞台,由于批判“死人统治舞台”,禁锢一切传统戏,而重新冷落起来。“四清”运动开展前后,文艺界开始整风,在文联内清查“反党集团”,一些文艺工作者受到批判或被调离文艺岗位。1964年夏季开始的全国范围内对文艺界、学术界的大规模政治批判,迅即波及四川,于1966年再次形成对四川一些作家和作品的错误批判。事实上,这已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红岩》于1961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时署名作者为罗广斌、杨益言,实际参加创作的还有刘德斌。

不过,四川的雕塑艺术却在这一时期勃兴起来。1965年在北京举办的“四川雕塑展览”汇集了这一时期四川雕塑艺术家的力作,大型群雕《收租院》受到国内外的高度评价。

了。

不过,从1961年开始的调整,到1963年以后,终究使全省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走出了畸高畸低的失常状态,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发展基础。到1965年,全省有艺术表演团242个,较1957年增加24%,电影放映单位1445个,较1957年增加92%。全省有高等学校32所,中等专业学校162所,普通中学5328所,小学148539所,分别比1957年增长46%、26%、6倍和1.3

倍;各类学校在校学生1214万人,较1957年增长71%;与1957年相比,每万人口中在校学生数,大学生从5.01人增至6.62人,中学生从83人增至161人,小学生从933人增至1592人。全省卫生机构达14650个,医院床位7.08万张,分别比1957年增长59%和2倍;卫生技术人员从1957年的7.32万人上升到12.35万人。文教卫生方面的实力,比过去大大地加强了。

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1966~1976年)

从1966年到1976年,是10年“文化大革命”阶段。

四川在这10年中,以动乱时间长、武斗严重、反复次数多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而闻名于全国;同时,由于四川是国家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国家在10年间投资数额大,重点建设项目多、工农业总产值还是增加的。到70年代,大部分项目陆续投产,因而从经济建设方面看,10年间四川经济建设的布局进一步展开,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为尔后四川的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

(一)十年间的多次反复

10年“文革”期间,四川的形势多次出现反复,再加上大规模武斗,使全

省人民深受其害,而且在四川以后的历史上,也产生了重要的消极影响。

1.动乱的发生发展和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建立 1965年的四川,尽管指导思想上受“左”的错误影响,政治形势比较紧张,但是,经济形势,由于贯彻“八字方针”,还是向好的方面发展的。从这一年的年底一直到1966年上半年,因“文革”的逐步发动,四川社会生活中更进一步出现紧张情况;到1966年下半年,出现了“红卫兵”造反、“大串连”,社会发生动乱;到1967年1月“造反派”夺权。2月中旬开始,成都军区又搞“镇压反革命”,拘捕了十万现行反革命(包括各地造反派头目),4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四川

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5月下达《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宣布李井泉、廖志高、黄新廷(成都军区司令员)、郭林祥(成都军区政委)是“四川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还煽动极左思潮和群众性武斗。直至1968年秋,四川处于动乱之中。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是“文化大革命”即将在全国开始的信号。姚文发表后,当时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李井泉,急令《四川日报》于12月18日转载,同时也十分注意“文化革命”的发展。1966年中央批准的“二月提纲”下达后,省委开始派工作组到四川大学、成都晚报社、省文联等单位摸底排队,搜集准备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对象的材料。4月26日《四川日报》开始了对乐山专区文教局副局长、中学教师李伏伽的点名批判。5月下旬,中共中央正式下发《五一六通知》,5月30日到6月10日,省委举行全体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贯彻中共中央下发的《五一六通知》,部署全省的“文化大革命”。6月1日至5日,省委陆续发出了批判张黎群(中共绵阳地委副书记,原西南局办公厅副主任)的通知,李亚群(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伯林(成都晚报社总编辑)的通知,并印发了他们的所谓“反动”言论的材料,

同时在西南局机关组织开展了对马识途(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作家)的批判。随后,批判逐步升级,直到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各大专院校,根据省委的布置,宣布一律停课参加运动,并在全校范围内公开批判校内所谓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6月1日《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发表以后,省级大部分部、委、厅局陆续都有所谓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内部被点名批判。各大专院校到处都挖“黑线”、斗“黑帮”。成、渝两市学校、机关大字报铺天盖地,出现了“文革”初期的混乱。6月上中旬,为了控制局势,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批发的北京大学派工作组领导运动的简报,陆续向各大专院校派出了工作组。

8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6条,四川同全国一样,动乱也逐步升级。先是各学校出现了赶工作组的斗争,接着“红卫兵”组织陆续出现,再往后是“红卫兵”“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8月15日,重庆市部分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在重庆师范专科学校集会,要求市委派人解决他们的问题。次日,又到市委机关请愿,贴批判市委主要负责人的大字报。这就是后来被称为“8.15”造反。8月26日,由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主持,在锦江大礼堂召开了四川大学师生员工大

会检讨省委向川大派遣文革工作组的错误。川大部分师生不同意省委的检讨,要求工作组回校接受群众批判,使会议陷入僵局。此事件,被称为8·26事件,四川大学9月份成立造反组织亦以此为名。8月31日,成都市部分学校学生和“红卫兵”数千人,围困和冲击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办公大楼达3天3夜,并一度冲入办公大楼。8月下旬和11月中旬,“红卫兵”两次冲击省委召开的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和10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使会议无法按原定计划进行。在“红卫兵”把矛头指向首脑机关的同时,党政机关、工矿事业单位的群众也陆续成立“造反团”、“战斗队”,加入“造反”的行列。9月上旬,在北京串连学生的影响下,四川掀起了所谓“破四旧”的恶浪,一时间,抄家、打人、砸文物成风。优秀的传统文化,遭到了一场严重的浩劫。

在大破“四旧”的同时,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了有关“大串连”的通知。“大串连”实际上是全国学生的一次免费大旅行。9、10两月,据当时铁路运输部门统计,四川开运送学生上北京的专列,即达400余列;公路方面,每天运送“串连”学生的车辆达600多辆,共运送去北京“串连”的学生达100万人之多;与此同时,外地学生来川“串连”者也日益增多。到11月份,据重庆市的材料,到

重庆“串连”者也有上100万人之多。“大串连”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大动乱,使无政府状态进一步发展。

1966年11月份召开的全国工交企业座谈会和12月9日毛泽东主席批准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简称“工业十条”的下达,使动乱进一步向工矿企业发展。由于“工业十条”肯定了“踢开党委闹革命”和在工人中可以建立“革命组织”,自此,大批工厂被搞乱,工人被卷进“造反”洪流,工厂企业的领导骨干纷纷受到冲击,工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到1967年1月,在上海一月夺权的影响下,到处掀起了“夺权”恶浪。1967年1月9日,毛泽东批准上海“夺权”的消息正式披露,1月19日,成都的“造反派”宣布夺了中共四川省委的权,封了省委的印,省委的工作自此完全陷于瘫痪状态。

省委被夺权后,为了解决四川省因“造反派”夺权而出现的权力真空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军队支左的指示,从1月底开始介入地方工作。最初是协助成都市公安局从冲击市公安局的“造反派”手中要回了被抢走的文件、枪支,接着又协助公安局逮捕了冲击公安局的为首分子,逮捕了军内支持冲击市公安局的少数人。由此引发了从2月11日到17日的“造反派”聚众围

堵成都军区营门口长达6天7夜的事件。2月17日,中央军委发出了“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四川大学“8·26”战斗团的信件之后,经过几天的工作,才解除了对军区领导机关的围困。成都军区领导人介入四川地方工作后,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同意于3月4日正式成立了四川省生产委员会;军区党委直接领导召开了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2月28日,与省公安厅联合发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布告”;2、3月间,全省逮捕、扣押了8万余人。

1967年4月初,中共中央召开解决宜宾问题的会议,4月中央发出《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区刘结挺等平反的通知》,5月7日中央作出《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中央决定,改组成都军区的领导班子,调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担任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梁兴初担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决定建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简称省革筹),由张国华任组长,梁兴初、刘结挺担任副组长,张西挺(刘结挺之妻,刘结挺、张西挺以下简称刘、张)担任筹备小组成员。这是“文革”中共中央第一次解决四川问题。

2 刘、张上台,全省武斗和省革委的建立 中共中央关于四川问题的决定,

实践证明,有若干重要的错误。第一,决定宣布李井泉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给予撤销职务,事实证明是没有根据的。第二,决定实际上表明成都军区前一段工作大方向错了,并且实际改组了军区领导班子,由此,四川又“翻了一次烧饼”;第三,决定把一部分“造反”组织说成是革命组织,并暗示另外的群众组织是“走资派操纵的保守组织”,从而加剧了群众组织之间“革”与“保”的争斗。5月上旬,成都出现砸抄“保守”组织的热潮,就是划分“革”与“保”带来的严重后果,也是四川最初出现武斗的根源。

中央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刘、张进入了四川省革筹的领导班子。刘、张在担任中共宜宾地委书记、中共宜宾市委书记期间因严重违法乱纪、打击陷害干部,经中共四川省委审查,“文革”前报中央监委批准,已作出开除党籍的处理。“文革”开始后,2人通过北京“红卫兵”,先是同王力,以后同江青、康生挂上了钩,成为他们插手四川“文革”的工具,其直接后果是刘、张得以进入四川省一级的核心领导,以后,刘、张为了攫取更大权力,不惜打击、压制不同意见的干部群众,直至制造大规模武斗,把四川人民推入灾难的

1979年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给李井泉等平了反。
王力,当时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深渊。

四川发生武斗时间最早。1967年5月初,四川第一棉纺织厂、成都峨眉机械厂相继发生两派群众武斗,仅5月6日,峨眉机械厂即死亡48人,伤600多人。中央处理四川问题决定下达后,5月13日到7月中旬,宜宾的一派先武装消灭了另一派,接着又搞所谓的“第一次武装支泸”,于是,7月20日,泸州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武斗,9月初,又搞了“第二次武装支泸”,泸州再次发生大规模武斗;到1968年7月,组织“第三次武装支泸”,有上万名武斗人员攻打泸州,还动用了电台、炮艇、非法抓捕、关押、揪斗群众数以万计。继宜宾武斗之后,省会成都市、西南重镇重庆市都先后发生了大规模武斗。5~8月,重庆武斗不断,规模最大时有上万人参加,枪支、火炮、坦克、炮艇、高射机枪等常规武器都用来搞武斗。四川武斗出现的规模也最大。在全省范围内,北至绵阳、达县、广元,东至涪陵、万县,南为宜宾、泸州,西至西昌,川中的内江、中江、南充,从大城市到边远地区,东南西北中,全省大部分县市均发生过规模不等的武斗,特别是一些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都是武斗较严重的地区。四川武斗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持续的时间长。全国不少省市到革委成立后武斗渐趋平息,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全国大部分省、市已无大

规模武斗;而四川直到1969年底,达县、永川、西昌等地武斗仍未完全平息。在四川武斗高潮期间,成渝铁路火车只能通到内江,内江以下列车完全停驶,重庆至涪陵、万县,重庆至泸州、宜宾、长江航运全部中断,川北门户广元因受武斗影响,物资不能出入四川,宝成、成渝铁路线上的重要车站物资大量积压;公路,由于缺少汽油,大部分客货运汽车停驶。全省省属以上重点煤矿,绝大部分陷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原煤日产水平“文革”前为3万多吨,武斗期间最低时下降为6000吨左右,而且,1968年、1969年两年一直徘徊在2万吨左右。煤炭供应紧张,使许多企业长期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到1970年,许多三线重点建设单位,不得不靠地方小煤窑勉强供煤维持。武斗造成人民生命财产严重损失。不少干部、工人因躲避武斗长期离乡背井;全省死于武斗的人达数万之多。这是四川人民的一场浩劫。

就在武斗处于高潮的1968年上半年,中共中央第二次召开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主要是解决建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简称省革委)的问题。

从1968年3月开始,中共中央在北京举办解决四川问题的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有四川省革筹和在川支左的驻军负责人以及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等1000多人。从3月中旬到5月下旬,参加学习班学习的人员不断增

加,最后到达5000多人。经过两个月的学习,统一思想,最后于5月26日,以省革筹的名义写出了《关于建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5月28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了这一报告。这是中共中央第二次解决四川问题。

1968年5月31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的当天,在成都市召开省革委成立的庆祝大会。6月6日至17日。省革委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通过了告全省人民书和有关的决议。

3“12·25”批示 下达刘、张下台 省革委成立四川形势并没有好转。1968年5月,四川省革委成立后面临的形势是:(1)武斗仍未停止。1968年4至7月,正是重庆第二次大规模武斗的高峰时期;接着又是所谓的第三次“武装支泸”,泸州发生了大规模武斗,以后又是涪陵、万县、达县、西昌等地的大规模武斗。上述一些地方,武斗一直持续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前后。(2)开展了所谓斗、批、改,使“左”的思想更加泛滥。“斗、批、改”的内容,主要包括“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在省革委成立之前,四川已有成都、自贡、宜宾等7个专、市,

盐亭、茂汶等34个县和一大批厂矿、企事业单位、人民公社以及部分机关、学校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省革委成立后,6月2日,重庆市革委宣告成立。到1968年底,全省19个市、地、州有16个成立了革委会;成立革委会的县已达一半以上;厂矿企业70%以上成立了革委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等工作,自1968年5月毛泽东主席批发北京新华印刷厂的“清队”经验后,省革委成立了大批判班子,专门发出关于做好“清队”的意见;“清理阶级队伍”把大批干部和群众当作“阶级敌人”来对待。到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错误作出处理刘少奇的决议之后,批判刘少奇、李井泉在四川形成了高潮。下放干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1968年第4季度到1969年1季度也开始进入高潮。原省级机关9000多名干部下放到西昌地区米易区的湾丘“五·七”干校(由劳改农场改办)等地劳动,全省绝大多数县、都办起了“五·七”干校,作为下放干部的场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1969年3月开始行动,到年底,知青下乡人数已有16万人,到1979年,累计上山下乡知青人数共有135.58万人。从1969年起省革委还多次布置所谓的“整党建党”;“12·25”批示后,虽然纠正了依靠“造反派”整党的错误,但

1969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对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党委《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

仍然是用“左”的指导思想搞“整党建党”。上述一系列“斗、批、改”的措施，起到了把“左”的指导思想更加具体贯彻到各个方面的作用。(3)发动了所谓的“反复旧”。从1968年10月开始长达8个月的“反复旧”运动，使四川形势更加动乱。早在发动“反复旧”运动之前，刘、张就利用传达贯彻“3·15”指示的机会，把反对刘、张的人说成是“右倾翻案风”，在全省掀起过一阵大抓“小爬虫”、“变色龙”的恶浪。以后，又以“反复旧”为名，策划过一些地方武装夺权的武斗。1968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这次会议提出了批判所谓“二月逆流”的问题。会后，四川以批判所谓的“二月逆流”、批判所谓“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1968年底在全省发动了所谓的“反复旧”运动，矛头指向革委会结合进来的领导干部。这一运动于1969年2月4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后达到高潮。到6月，在毛泽东主席批评“反复旧”之后，才逐步收场。这次“反复旧”运动，使全省特别是西昌、达县、江津地区和成昆铁路(北段)和宜珙铁路以及永荣、广旺、芙蓉等煤矿，还有电力系统等出现了严重的反复。有些成立了革委会的单位，革委会再次被搞垮；两派联合了的单位，再度陷于分裂。8个月的

“反复旧”，使四川的工农业生产再次遭到破坏。成都市是受“反复旧”破坏最严重的地区之一。1969年这个市的工业总产值第二季度比第一季度下降了11.2%。四川第一棉纺厂的棉纱日产量由原来的251件，下降到20件，棉布日产量由21万米，降到8000米。四川制药厂一季度生产出有国际水平的庆大霉素，但在“反复旧”运动中，受到了干扰破坏，制药发酵时连续报废18罐，浪费粮食10余万公斤。成都无缝钢管厂“216工程”，原定1969年5月1日以前建成投产。由于“反复旧”，工程投产日期推迟了半年多。

在这种情况下，1969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决定，第三次召开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

会议于1969年11月5日至12月27日在北京举行，历时53天。会议分两段进行。第一阶段10天，参加的有省革委领导人加上驻川部队的主要领导人共9人。第二阶段，会议扩大到143人，包括军队的师以上的干部、地区革委会主任和一部分群众组织的代表。会议取得了积极成果，12月25日产生了《中共中央对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党委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即“12·

“3·15”指示，是指1968年3月15日，中央和中央文革负责人接见四川省革筹负责人的一次讲话，讲话中有关于批评四川一些人要打倒刘、张的内容。

25”批示。12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领导人接见省革委和成都军区赴京参加会议的领导干部,并就四川贯彻“12·25”批示问题讲了话。

这次会议指出,四川的革命和生产落后了,落后的原因不在群众,而在省革委领导。为此,中共中央决定:(1)由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等15人组成中共四川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张国华为组长、梁兴初、李大章为副组长。(2)增补谢家祥、谢正荣为省革委副主任,增补胡炳云、胡继成等4人为省革委常委。(3)“三支两军”工作仍交回成都军区领导,成立成都军区支左领导小组,梁兴初为组长,王诚汉、谢家祥为副组长。(4)成立由17人组成的四川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张国华为组长,梁兴初、李大章、徐驰、胡炳云为副组长。

中央领导人在27日关于贯彻“12·25”批示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刘结挺、张西挺头脑膨胀,居功骄傲,争权夺位,是个人野心家。同时指出,省革委的几个领导人对刘、张的问题没有严肃的斗争,而是各行其是。为进一步解决四川问题,同意由中央再为四川举办一期5000人左右的学习班。

中央在北京为四川举办的5000人(后来扩大到6000人)的学习班,从1970年2月22日到9月24日,历时7

个月。由于刘、张拒不认罪,8月11日,在成都正式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把刘、张“挂起来,靠边站”的决定;16日又按照中央的决定,将他们送北京学习班学习。实际上,刘、张在“12·25”批示后就已经下台了。

中共四川省革委核心小组成立,实际履行省委的职能,否定了“以人划线”的“整党建党”,在全省重新开展整党,恢复了各级党组织领导和党员的组织生活。

4 第二届中共四川省委成立和全省的几次反复 1969年中央“12·25”批示,从解决四川的领导班子问题入手,抓住了四川问题的关键,接着又于1970年2月10日对四川如何传达贯彻“12·25”批示,其主要内容是:要求省革委核心小组坚决执行依靠军队,加强团结的方针,认真抓好调整、充实和加强各级革委的领导班子;坚决不准重拉山头;要求慎重对待革委的补台工作,原来革委会成员没有重大问题的,一般不要轻易撤换;会议越往下传达,越要加强领导,严密组织,要过细地做工作等等。由于这次贯彻“12·25”批示的工作安排比较得当,四川通过贯彻批示,出现了几年相对稳定的局面。

在这样的情况下,1971年8月12~1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成都召

由于刘、张擅权,成都军区“三支两军”办公室曾被并到省革委政工组、办事组。

开。这次大会,是在“文革”动乱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召开的。出席大会的代表共 1477 名,大会选出了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二届委员会委员 106 名,省委候补委员 44 名,经中共四川省第二届第一次全体委员会选举并经中共中央批准,本届省委常委 19 名,张国华为第一书记,梁兴初为第二书记,李大章、谢家祥、段君毅、谢正荣、徐驰、何云峰为书记。在 8 位书记中,除李大章、段君毅、徐驰 3 人为地方干部外,其余 5 人(包括第一、第二书记)均为军队干部。

在中共四川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全省绝大多数地区、市、州和一半以上的县也相继召开了新的地、市、州和县的中共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委员会。自此,从省到县又有了党的领导核心。

第二届中共四川省委和各地新的党的委员会建立后,相当一段时间工作重点仍然摆在实现安定团结、做好群众工作,同时突出地抓了解放和使用干部、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工作。到 1972 年底,全省绝大多数地区 and 县的党委以及 96.5% 的支部已经建立起来;省管干部 9100 多人,其中 96% 已获得解放,绝大多数重新担任了领导职务。党组织的恢复和一大批有实践经验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

为 70 年代和以后四川的工作发展准备了较好的条件。

随着工作的发展,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群众组织也陆续重新建立起来。1973 年 6 月 27 日至 7 月 4 日,召开了共青团四川省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共青团第五届省委;7 月 23 日至 29 日,召开省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产生了省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8 月 6 日~12 日省第四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产生了省妇女联合会第四届委员会。重建的群团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其作为党组织的助手,联系群众的纽带和桥梁作用。这一段时间,四川工作中出现的曲折,主要是 1971 年 2 月到 9 月,省革委领导核心中的个别人以“批清”代替“批陈”,在“批清”中又搞了扩大化,打击持有不同意见的干部、群众,致使当时的生产建设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1970 年 8 月 23~9 月 6 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会上林彪集团的成员,陈伯达在几个小组会上同时宣讲了名为歌颂毛泽东“称天才”的材料,实为替林彪抢班夺权造舆论。二中全会后,全党开展了以批判陈伯达为重点的“批陈整风”运动。运动持续到 1971 年“九一三”事件林彪自我爆炸。在这长达一

“批陈”是 1970 年 9 月以后,中共中央决定开展的批判陈伯达的斗争。

年的时间里,四川省革委根据1971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和中央当时提出的批判极左思潮的口号,把两者联在一起,再加上清查所谓的“三老会”,在四川掀起了长达7、8个月的所谓的“批清”运动,(又称“一批双清”,即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三老会”)。

“批清”运动的实质,正如后来周恩来总理指出的那样,是当时省革委中个别领导人利用搞“批清”转移“批陈”整风的斗争大方向,打击反对自己的那一派干部、群众。据后来不完全统计,在“批清”运动中,全省涉及的干部、群众,在10万人以上,其中仅成都市就达2万多人。一时间,全省不少单位都办起了所谓的“批清”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人一般都被限制人身自由,遭到批判和斗争,有的甚至株连家属,在全省又一次造成恐怖气氛,影响了群众之间的团结,影响了各方面的建设。

1971年11月,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中共四川省委和成都军区的领导人,对于四川在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时如何联系四川实际作了指示。1972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又通知刘兴元(省委第一书记)、李大章(省委书记)和成都军区的负责人等7人到北京。3月23日,中共中央批发了上述7人向中央的报告,(即中发

[1972]14号文件),对纠正“批清”运动的错误作了明确的政策规定,对揭发批判省革委中个别领导人追随林彪集团的错误也作了具体指示。从4月到7月,四川认真传达贯彻了14号文件,取得了一定成效。可是,到7月中旬至8月上旬,在中共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联合召开扩大会议,在关于如何看待四川形势和省革委中个别领导人的错误性质,对“批清”的看法、以及刘、张问题等这样几个大的问题上,又发生了分歧。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又通知四川省委和成都军区党委的主要领导人刘兴元、李大章、严政(军区政治委员)等10人于1972年8月9日、10日分别到北京并帮助制订了《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总结提纲》,并以中发[1972]31号文件的形式正式批准下达。文件肯定了省委和军区党委贯彻执行中央14号文件态度认真、步骤积极,四川总的形势是好的,局势是稳定的,进一步明确了省革委中个别领导人所犯错误的性质;要求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继续纠正“批清”扩大化的错误,正确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对刘、张问题,明确指出中央“12·25”批示已经作了结论,1971年8月,中央又对他们作了组织处理,要求四川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排除资产阶级派性干扰,把各项工作做好。中央31号文件对当时四川有争

论的问题作了明确的结论,这就使得1972年下半年到1973年上半年,四川有了相对稳定的局面,为经济建设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可是,稳定的时间不长,1973年上半年到1974年3季度以前,由于“批林批孔”的开展,四川同全国一样,又发生了比较严重的动乱。

“批林批孔”开始酝酿,是1973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同年8月中旬,全国包括北京、上海有10多家报纸陆续发表了一批“批孔”的文章,8月24日,当时“四人帮”控制的国务院科教组通知包括四川在内的全国12个省、市的一些文科大学有关负责人到北京参加“批孔座谈会”,同时要四川大学在文科各系开展批孔。9月8日至10日,国务院科教组召开的“批孔座谈会”在北京正式举行。按照迟群的说法,这是一个部署性的会议,吹风性的会议。9月25日,省里召开批孔座谈会,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刘兴元在会上讲话,强调批孔先从大学文科搞起,布置报刊搞批孔文章,体现批孔结合批林。1973年11月,中共四川省委召开地、市、州第一书记会议,提出批林要很好地批孔,首先在学校、工矿企业批林联系孔子搞复古、开倒车,联系检查我们自己

有没有守旧的东西,包括对新东西看不惯的问题。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正式下发了中发[1974]1号文件,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正式布置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1月25日,中共中央又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了中直机关、国家机关深入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至此,这一运动被迅速推向全国。

四川的批林批孔,1974年1至3月处于发动阶段;4至8月是最动乱的时期;10月以后,由于传达了毛泽东要安定、团结的指示,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变化。到1975年上半年,由于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大力抓整顿,形势才明显好转。

“批林批孔”在四川开展后,林彪、江青一伙在四川培植起来的帮派迅速闻风而动,他们在全省大造反动舆论,恶毒攻击各级党组织“儒家班子”、“复辟班子”,狂叫要“搞垮”“砸烂”,而且给反对他们的干部、群众扣上“复辟势力”、“走资派”、“投降派”、“儒家”等帽子。在成都,他们发动了冲击中共四川省委、成都市委机关的所谓的“4·2造反”、“4·6造反”,掀起层层“揪孔老二的徒子徒孙”的恶浪,妄图搞垮省、市委和各级党组织,实现他们夺权的野心;在重庆,出现了所谓的“民办十大宣传队”,搞串连,发展组织,诬蔑四

迟群,“四人帮”的骨干分子,当时国务院科教组的负责人。

川是“林彪的根据地”，胡说“四川从上到下都是宗派班子”，宣称“现在是夺权的最好时机”，煽动层层夺权。广元县帮派头目刘发林，拉起了一帮人成立了所谓的“河街政府”，与县委、县政府分庭抗礼；合川县帮派头目王治金（人称“王大爷”），拉起了一帮人篡夺了县委和部分单位的领导权；在教育战线，批教师、砍学校、停课搞批判，破坏了学校刚刚建立起来的秩序，特别是林彪、江青一伙散布的“读书无用论”，极大地摧残了党的文化教育事业。

第二届中共四川省委成立后，遇到的最后一次反复也是10年“文革”中仅次于运动初期“夺权”的反复，是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党和国家3位伟大领导人的逝世使四川人民长期沉浸在悲痛之中，对3位领导人的逝世后，全省各地都举行隆重的悼念活动（包括冲破周恩来逝世后“四人帮”所下的不开追悼会的禁令）表达深切的哀悼之情。1976年又是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引起严重反复的一年。四川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从1976年2月底，中共四川省委贯彻中央召开的“转弯子”会议精神开始的。在中央开会期间江青、张春桥窜到四川小组会上，点名批评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并施加压力，

要省委发展四川的一个帮派头目入党。消息传来，四川的几个主要帮派头目受到很大“鼓舞”，他们赌咒发誓要“好好干”；“要为首长（四人帮）争气”。他们多次密谋策划，要以他们为核心，“解决省、市委的问题”。他们狂叫“走资派是一层人”、“走资派各级都有”。“要揪出还乡团长”和“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为了搞乱成都以至整个四川形势，他们经过密谋策划，确定采取大闹中共四川省委召开的会议和在社会上大造舆论“双管齐下”的办法。在2月底3月初，省委召开的一次有各地、市、州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上，帮派头目纠合一伙人大闹省委，搅乱会议，接着于3月5日，又利用成都市街头有人贴出反对张春桥的大字报的机会，在市区盐市口大打出手，制造流血事件，这就是震惊全市、轰动全省的“三·五”事件。“三·五”事件后，四川的帮派头目又接二连三地制造事端，扩大事态。3月10日，他们聚众冲击中共成都市委，接着又大闹四川省委，“进驻”省委机关达两天两夜之久。随即于3月12日，又策动所谓的“150人上京告状”事件，挟持省委书记段君毅、许梦侠到了北京。到北京后，他们通过“四人帮”在清华大学的黑据点，直接同“四人帮”挂钩，要求中共中央表态，改组四川省委领导班子，同时，提出要中央派1969年“12·25”批示后就已下台“靠边站”的刘结挺、

张西挺主持四川工作。与此同时,他们还确定了“川东、川西互相配合”的策略,在全省层层揪“正在走的走资派”。在这一系列事件发生后,全省形势迅速恶化。4月,处理“天安门事件”的决定公布后,四川的帮派进一步受到“鼓舞”。帮派头目加快了在四川搞动乱、夺权的步伐。不少单位的帮派公开亮出要“官票”、“党票”的旗号,围攻领导,破坏生产。7月,河北的唐山发生地震之后,8月中旬四川的平武、松潘发生了大地震,帮派势力攻击抓抗震救灾是“以地震压革命”。由于帮派势力的猖狂活动,成都市的不少工厂因动乱而完全陷入瘫痪状态。直到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之后,四川才结束了10年动乱的历史。

(二)动乱中的国民经济

10年“文革”给四川的国民经济破坏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由于干部群众的努力,在困难条件下坚持生产工作,因而经济建设仍然取得可喜进展,特别是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从历史发展的具体进程看,10年间,不同阶段又有其不同的特点,即:先是1967年到1969年3月的混乱、瘫痪、倒退;1970年以后,三线建设又继续进行,但在“左”的思想领导下,又过急、过热,经过压缩、调整则有所好转;1974年“批林反孔”开始后再次出现回落;1975年贯彻中央抓整顿的方针后有

好转;“批邓、反击后右倾翻案风”一来,第三次出现了大幅度下滑。概括起来,10年间四川经济,可以说是经历了滑落、好转、再回落、再好转;最后大幅度下滑的过程。

1. 层层“夺权”和全面内战,造成了国民经济3年大倒退 1966年8月开始,由于“红卫兵”运动、以及接着开始的“大串连”,层层揪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加上1966年12月间下达的两个关于在工厂和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和1967年1月夺权,使四川省、地、县各级领导陷于瘫痪,绝大部分工厂企业的生产秩序,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在农村,也开始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1967年、1968年直到1969年,是10年“文革”中四川国民经济遭受破坏最严重的3年。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1967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为134.67亿元,比上年下降11%,其中,工业总产值71.34亿元,下降17.8%,农业总产值63.33亿元,下降2%;1968年,工农业总产值为102.56亿元,又比上年下降23.98%,其中工业总产值44.88亿元,下降37.1%,农业总产值57.68亿元,下降8.9%;到1969年,全省仍然处于动乱之中,但到8月以后,由于武斗有所减少,政治局势暂时相对稳定,经济有了初步的恢复,但仍低于1966年。全年工农业总产值129.57亿元,比上年增长26.3%为1966年的

85.6% ,其中工业总产值 70.60 亿元 ,比上年增长 57.3% ,为 1966 年的 81.4% ,农业总产值 58.97 亿元 ,比上年增长 2.2% ,为 1966 年的 91.3% 。

从 1966 年到 1969 年 ,全省国民经济基本失控 ,经济秩序混乱 ,严重影响了生产和人民的生活。

(1) 经济管理机关瘫痪 ,人员大量外出 ,经济工作基本上是无政府状态

1967 年“一月夺权” ,全省县以上党政机关在 1 月份基本上都被“造反派”夺了权 ,封了印 ,不能行使职权 ;2 月份全省基本上处于“权力真空”阶段 ;3 月份军队介入地方工作后虽然也成立了管生产的班子 ,召开了一些部署工农业生产的会议 ,均因局势动乱 ,无法认真贯彻。5 月份 ,中央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下达 ,成立了省革筹小组 ,下设生产指挥部统管全省生产建设 ,但因夺权斗争从党政机关扩展到工矿企业等生产基层单位 ,原来管生产的领导干部或者被“打倒”或者“靠边站” ,生产指挥系统基本上已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无法指挥生产 ;接踵而来的又是大规模的武斗逐步蔓延到全省 ,不少企业的职工因躲避武斗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 ,以至离家避难。到 1967 年 8 月 ,在重庆武斗达到高峰期间 ,据省革筹调查组当时的调查材料 ,在全市 165 个大中型企业中停产和半停产的 ,即有 157 个企业 ,占 95% ,其中 ,完全停产的即达 109 个 ,占 66% ;据 116

个单位统计 ,在 16 万名职工中 ,即有 6 万人离厂外出。成都市的大中型工厂企业 ,几乎全部停产或半停产。到 1968 年 ,厂矿虽然逐步建立了革委会 ,但是各个企业包括全省重点企业的职工几乎无例外地长期分裂为两派 ,争斗不息。这种状况 ,一直持续到 1970 年初 ,有的甚至延续到 70 年代中期 ,中央召开重点企业汇报会议之后 ,才逐步改变。

(2) 煤炭、电力生产大幅度下降 ,交通运输严重受阻 煤炭。全省省属以上 3 个矿务局 ,8 个煤矿 ,按当时矿井生产能力和条件 ,原煤平均日产水平应为 1.9~2 万吨 (加上地方煤矿应为 3.2 万吨左右) ,1967 年武斗开始后 ,原煤生产大幅度下降 ,到 1968 年 1 月至 4 月生产水平更是逐月下降。1 月份为 11570 吨 ,2 月份为 9325 吨 ,3 月份为 9362 吨 ,四月份为 8000 吨左右。到 5 月份 ,全省有半数煤矿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原煤平均日产量 ,6 月份下降到 6000 吨左右。以后 ,略有回升 ,到 1970 年初 ,仍只有 1.5 万吨。重庆是全省重点产煤区 ,1967 年 3 月 ,重庆市爆发第一次大规模武斗后 ,煤炭平均日产量由 4 月份的 9800 吨到 8 月份锐减为 1600 多吨 ;1968 年 3 至 7 月 ,重庆第二次爆发大规模武斗后 ,南桐、天府、中梁山等煤矿再度持续减产。全市煤炭平均日产量 ,1968 年 1 月份曾回升到 6272 吨 ,2 月

份降至 4797 吨,3 月份降至 4706 吨,4 月份再降至 3451 吨,5 月份 2904 吨,7 月份 2692 吨,8 月份降至最低点为 2149 吨。其中,南桐煤矿平均日产煤 382 吨,只够煤矿自用。煤炭生产大幅度下降,影响所及又造成大批企业停工停产,影响到城乡人民生活用煤。

电力生产。从 1967 年开始逐步下降,1968 年 1 月至 4 月再次连续下降。全省发电量 1 月份为 1.88 亿度,4 月份下降到 0.99 亿度,低于 1967 年第 4 季度水平;到 1968 年中旬,成都市限电占三分之一;到 3 季度全省发电量又才回升到 1.5 亿度。

交通运输。1966 年底,全省的车站、港口码头即因“红卫兵”大串连抢火车而造成堵塞和物资积压。1967 年 6 月,广元站因一派群众组织“万人上京告状”而造成严重阻塞。与此同时,成渝铁路火车只能开到内江,内江以下因武斗而停开。宝成铁路,进川火车,因广元武斗,宝鸡、西安、略阳一带停有 1000 多辆重车被阻,其中,装汽油的车皮就有 200 多个,武斗人员抢劫火车的事件也时有发生。1968 年 5 月初,为准备成立省革委运输物资的 3 列火车,在阳平关附近被抢;7 月 15 日,1 列载运援外物资的列车在隆昌石燕桥火车站被武斗人员抢劫,经周恩来总理亲自处理,严令追回。水路运输,从 3 月起重庆港基本停航,到 5 月初,有 29 艘货轮因沿途武斗无

法进川。云阳一带因发生武斗,上下轮船过此遭到阻击,船只不敢通过。泸州水路,因武斗被切断达半年之久,上下船只均不能通航。汽车运输,全省因无汽油供应,绝大部分汽车已基本停驶。到 6 月中旬,全省钢材订货,到货仅 50%,二类机电产品到货仅 30%~40%,大量在省外物资运不进来,由武汉供应重钢的生铁,积压达 1 万吨运不进来。省内 30 多个化肥厂矿石供应时断时续,1967 年 4 季度到 1968 年 1 季度,全省少供应化肥几十万吨(当时全省年产生化肥不到 100 万吨)。机械行业的配套协作件,有些因道路中断,供应不上。一方面四川以产井盐著称,到 1967 年,全省有 30 多个县食盐脱销,另一方面,自贡几个盐厂又存盐 11 万吨,运不出来。

2 形势相对稳定,经济开始显著回升
1969 年 4 季度,四川武斗基本停止,特别是 12 月底,中共中央发出“12·25”批示,第三次解决四川问题之后,省革委抓住揭发批判刘、张的严重错误,认真贯彻“依靠军队,加强团结”的方针,全省形势日趋稳定,从 1970 年到 1973 年,这 3 年四川的经济显著回升。

首先,是大三线建设得以继续进行。国家在四川进行大三线建设。开始于 1964 年 5 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60 年代初,美国出兵侵略越南、苏联对中国施加压力,中印两国的边境冲

突也逐步升级。中国面临各方面的战争威胁,备战提上了党和政府紧迫的议事日程。1964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作出了调正工业布局,加强内地建设的重大决策。1964年6月22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派出,由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程子华率领的联合工作组抵达成都。6月26日,联合工作组从成都出发,对乐山、西昌和攀枝花地区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实地踏勘,主要是为建设以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工业基地选址。8月中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1964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设筹备小组,负责人由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和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程子华担任,立即着手进行建设的规划部署。1965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西南三线建委)主任由李井泉、副主任由程子华、阎秀峰担任,同年下半年又增调彭德怀、钱敏为副主任。按照当时西南三线指挥机构提出的、经过中共中央正式批准的西南三线建设的规划,主要内容是,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工业基地、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和成昆铁路。川黔铁路贵昆铁路,1964年到1967年这段时间四川也是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重点。从1964年下半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

命”开始前3年时间,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已破坏土动工;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原定从1965年3年建成,其主体部分,到1966年底已提前一年基本建成;成昆铁路也于1964年8月拉开大会战的序幕,到1966年底,北段已铺轨到甘洛(距成都316公里),南段已铺轨到广通(距昆明145公里),主体工程累计完成的工作量已超过50%;川黔铁路1965年全线通车,其他非军工的项目和为军工服务的项目,绝大部分均已开工建设。“文革”开始前在四川的三线建设,已呈全面开展、蓬勃发展之势、并已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可是,“文革”动乱,特别是1967年的“一月夺权”和随之而来的全省大武斗,使三线建设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到1968年初,绝大多数工程基本停工,三线建设呈停顿、半停顿状态。

1969年“12·25”批示,决定成立四川三线建设领导小组。1970年4月10日至12日由省革委、成都军区主持召开了四川地区三线建设工作会议(简称“704会议”)。会议根据1970年全国计划会议和中共中央批转四川三线建设的报告精神,对四川1970年三线建设的任务作了具体部署和安排。“704会议”后,三线建设再次在四川掀起高潮。主要内容包括:襄渝铁路、核工业、航天、航空工业、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等兴建和原来已经开工尚未

竣工的一大批重要建设项目的续建、收尾、配套等等。

“704会议”之后,同年“七一”,前得首战告捷:成昆铁路于6月29日全线接轨通车;攀枝花钢铁厂一号高炉系统已于6月29日顺利出铁;峨眉水泥厂第一台旋窑(年产50万吨)已于6月30日建成投产;宜宾电厂第一台机组(5万千瓦)已于6月12日一次启动成功;“七一”投产;南桐矿务局松藻矿区打通一号矿井,设备全部安装就绪,已经试运转,情况良好;“七一”投入生产;芙蓉矿区白皎矿井已于6月15日正式投产,芙蓉矿井3个平洞“七一”全面投产;重庆铝加工厂(后改名西南铝加工厂)已于6月25日生产出合格厚板材;重钢四号高炉“七一”投产,重轨全长淬火车间已于6月29日投产;襄渝铁路四川境内本年计划铺轨170公里,重庆至北碚的60公里已于6月26日完成铺轨,达到正式通车标准;自贡硬质合金厂一个主要车间“七一”建成投产。除了上述项目外,还有一些工程也已经按计划或提前完成。如四川染料厂染料系统6个产品的生产设备全部建成投产;成都唱片厂6月27日已经投产;东河印制公司印制分厂“七一”正式投产;西南合成制药厂的两个车间“七一”建成投产,在此之前5月份还有内江白马电厂、晨光化工厂二分厂、宜珙铁路支线、成昆铁路渡口支线等4项工程建

成投产或部分投产;1970年12月29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开始建设。

到1971年底,建成或基本建成的重要工程,又有西南铝加工厂第一期工程,国营乐山造纸厂(605厂),江油电厂,攀钢炼钢厂一号转炉,第二重型机器厂、东方锅炉厂,龚咀水电站一号机组等。

到1972年底,建成或基本建成的项目有:襄渝铁路四川境内460公里的铺轨任务;攀钢二号转炉三号烧结机;重钢三江薄板厂两台热轧板机;长城钢厂200吨快锻;映秀湾发电站、渔子溪一号机组、豆渝输电线路、重庆兰家沱码头,等等。

据1973年4月统计,国家安排在四川的三线建设项目共158项,计划在1972年以前建成的127项,实际上主体工程基本建成的已有112项,占88%。

1973年以后,国家在四川的三线建设继续进行,特别是核工业、航空、航天、国防科研基地等方面建设的任务,仍然相当繁重。三线建设一直持续到80年代,经中共中央决定,进入调整改造的新阶段。

经过十多年的三线建设,四川的工业基础大大增强。分行业来看,在国防工业方面,在全国已占据重要地位;在发展国防科技工业的同时,与之服务和配套的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和交通建设也相应地得到了发展。

冶金工业方面,建起了以攀枝花钢铁基地为中心,包括重庆钢铁公司、重庆特殊钢厂、江油长城钢铁公司和成都无缝钢管厂等在内,年产钢 265 万吨,铁 210 万吨,钢材 210 万吨的冶金工业基地。燃料工业方面,建成了包括川南的芙蓉煤矿、松藻煤矿、攀枝花的宝顶山煤矿和华蓃山煤矿等年产原煤约 1000 多万吨的燃料工业基地。电力工业方面,建成了以龚咀电站为主,包括映秀湾、渔子溪、南桡河、磨房沟水电站和五通桥 511 火电工程在内的年发电量 400 万千瓦(包括原有能力 120 万千瓦)的电力系统。机械工业方面,建成了包括德阳第二重型机器厂、东方电机厂、东方锅炉厂、东方汽轮机厂、东风电机厂和长江起重机厂、挖掘机厂等一大批重型机械骨干工业和动力机械工业。车辆制造工业方面,建成了以四川汽车制造厂资阳内燃机车厂在内的汽车、内燃机车制造工业。化学工业方面,建成了以晨光、川化、泸天化为主的化工骨干企业。电子工业方面,原来成都、重庆的电子工业得到充实和加强,绵阳、广元等地新建了一批电子工业企业。新建、扩建的企业和科研单位,沿铁路线分别层次幅射布点,初步形成了以成都为中心,绵阳、广元、重庆 4 个各有所长的电子工业区。此外,还建设了重庆川东一带的造船工业;以及江油、峨眉水泥厂年产 200 万吨水泥和四川石棉

矿西南玻璃厂等建筑材料工业;航空、航天工业、核工业均有发展。1970 年到 1985 年期间建成了西昌卫星发射基地;铁路建设方面,建成了成昆、襄渝两条铁路干线,它们与成渝、川黔、宝成铁路、长江航道共同成为四川的交通运输网的骨干而发挥其日益重要的用途。在长达十多年的三线建设中,全省通过新建、改建、扩建和迁建,共建成工厂企事业单位 350 个,其中大中型企业 248 个,占 1985 年统计的全省大中型企业的 42.2%,在全省工业固定资产原产值中,三线建设时期形成的占 40% 以上。与此同时,各个方面的地方工业也有很大发展。工业企业单位,1965 年只有 1.7 万多个,1976 年达 3.1 万多个,到 1980 年达 4.7 万多个。四川的工业基础,主要是通过三线建设奠定的。三线建设也带动和促进了四川各行各业的发展。

第二,农业和轻工业生产建设有了恢复和发展

三线建设以来,四川的工业,主要重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农业和轻工业比较落后,远不能适应三线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据 1970 年统计,按 1957 年不变价格计算,全省工业总产值 107.96 亿元(其中重工业产值 63.50 亿元),比 1964 年的 52.44 亿元(其中重工业产值 27.84 亿元)增长 51.42%;而 1970 年农业产值为 64.53 亿元,比 1964 年的

56 11 亿元增长 15 %。1970 年全省粮食产量为 2320 5 万吨 ,比 1965 年的 2055 5 万吨增长 13 %。如按人口平均 ,1970 年为 278 公斤 ,比 1965 年还低 10 公斤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11 公斤。主要经济作物的产量仍未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在改变农业生产条件方面 ,尽管作了很大努力 ,但总的说来 ,落后面貌尚未根本改变。全省保灌面积仅占耕地面积的 25 % ,全省尚有 333 万顷以上的耕地 ,约占总耕面积的 48 % ,尚未进行土壤改造 ,单产很低 (每公顷约 2250 公斤) ,机耕面积还不到耕面积的 6 %。肥料、农药也严重不足 (平均每公顷只有氮肥 6765 公斤、化学农药 0 75 公斤)。轻工业也较落后 ,1970 年全省轻工业产值按人口平均 ,低于全国水平 60 % 左右。大量日用工业品靠外省调入。

为了抓好农业 ,省革委于“ 704 ”会议结束后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 ,于同年 7 月 6 日至 23 日 ,召开了全省农业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四川省 1971 年到 1975 年农业发展规划要点 (征求意见稿)》 ,组织与会代表现场参观了省内农业生产搞得比较好的大队、生产队。会议还对 1971 年粮、棉、油、猪的生产提出了具体要求 ,对兴修水利、改田改土、发展“ 五小 ”工业、推广良种等 ,作了具体安排 ,对“ 四五 ”期间 (1970 年到 1975 年) 农业发展的主要目标也提出了初步规划。此后 ,1970

年 8 月 ,国务院召开了北方地区农业会议 ;1970 年 12 月 16 日到翌年 2 月 19 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 ,会上写出了《当前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一些问题》简报。这两个会议对农业方面发生的一些“ 左 ”的倾向提出批评 ,并作了一些政策规定。1971 年 12 月 ,中共中央又正式下达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这些会议、文件 ,都强调了坚持“ 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 ” ,强调了按劳分配 ,反对平均主义 等等 ,省革委贯彻了这些精神 ,对于稳定当时的生产关系 ,发展四川农业 ,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改善生产条件 ,发展农业生产动力方面 ,从“ 704 ”会议以后 ,首先抓了全省的水利建设工作。“ 704 ”会议前 ,已开始酝酿 ,会后 ,7 月 22 日 ,在《四川省“ 四五 ”水利规划的意见》中强调在抓好中小型水利工程配套的同时 ,再兴建一批必要的骨干工程 ,如玉溪河引水工程 ,东风渠简阳扩灌工程 ,仁寿扩灌工程、人民渠七期工程等。1970 年 ,玉溪引水工程、龙泉山隧洞引水工程、仁寿黑龙滩大型水库、人民渠七期工程均已破土动工。从 1979 年开始的“ 四五 ”时期 ,全省水利基本建设投资 6 55 亿元 ,比“ 三五 ”时期增加 74 %。上述 4 大工程建成后 ,将灌溉邛崃、蒲江、名山、仁寿、简阳、资阳、中江、三台、射洪等 11 个县的 30 万公顷耕地。到 1973 年底 ,大型水库黑龙滩

水库枢纽工程已基本建成开始部分受益。1970年到1973年间,全省尚有100多个中、小型扫尾、续建、配套项目正在建设。从1970年8月到1972年,都江堰灌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渠系改造。由于上述大、中、小型水利工程项目的建设,全省灌溉面积的比重,1965年为22.6%,1970年达26.9%,1973年上升到31.9%。1971到1973年间,全省还加快了改田改土进度。从1970年开始,全省每年要求改土500万亩左右,凡有改土任务的生产队,要求改土0.7到1公顷。据有关材料,从1971年到1975年,全省改土面积每年都在6万公顷左右。

“四五”期间,四川引进3套化肥、化纤成套设备的建设。1972年5月,省计委就正式向中共四川省委写报告,对于在四川建设维尼纶合成纤维厂有关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1973年7月,省委决定成立“三化”(两套年产30万吨合成氨、48万吨尿素的生产装置和一套年产4.5万吨维尼纶纤维的生产设备)及其配套办公室。1974年上述“三化”建设相继开始动工,到70年代末,先后投产。“三化”建设的成功,大大增强四川化学工业的生产能力,为支援农业、发展轻化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0年7月下旬到8月,全国轻工业座谈会提出“四五”期间全国轻工产品翻一番,一般轻工业品实现省、自

治区自给。1971年4月,轻工部派出工作组来川调查了解四川轻工业的状况,7月,省轻工业局召开了全省轻工系统学大庆的现场会议,检查了当年生产情况,提出分四步实现轻工产品基本自给的规划;1972年3月28日,省委、省革委决定成立轻工领导小组,并要各市、地、州相应地成立轻工领导小组,县要指定一位负责人兼管此项工作,提出要狠抓政策、计划、措施的落实,狠抓原料和产品销路,力争在“四五”期间,使省内的主要轻工业品达到基本自给。1973年1月召开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和4月召开的全省计划工作会议都对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和更加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问题,作了专题讨论,9月中旬省革委又专门召开了轻工业会议,会议传达了周恩来总理对四川轻工落后的尖锐批评和李先念副总理关于三线地区发展轻工业的指示,通过总结检查工作,研究讨论影响轻工业发展的主要政策问题,拟订了今后两年轻工业的规划和措施。会议针对当时全省轻工产品自给水平只有60%,轻工产品产值人均仅有62元(全国人均130元),轻工产品数量少、不少人民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而且质量差,花色品种少,设备利用率不高,劳动生产率低(多数行业比全国低30%~60%)等状况,提出要充分发掘现有企业的潜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省、地、县都要立足

本地资源因地制宜办轻工,努力解决轻工所需原材料,做好产供销衔接,尽快实现省内轻工业品的基本自给。经过1971年到1973年3年努力,四川轻工开始回升,全省轻工业产值,按1957年不变价格,1970年为34.46亿元,1971年上升到55.36亿元,上升60.65%。以后几年,除1974年“批林批孔”,1976年因搞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造成生产下降外,全省轻工生产一直是持续上升的。10年“文革”期间,因大量印刷出版毛泽东著作的需要,四川的造纸、印刷行业有了较大发展;70年代制盐业也有发展,日用轻工产品和轻工机械制造等均比60年代前进了一步。

第三,地方工业,主要是“五小”工业有较快的发展。

“704会议”明确提出要发展“五小”工业,大力兴办地、县、社、队工业,兴办更多的小铁厂、小煤矿、小化肥、小机械、小水电、小水泥、小气井、小盐井、小林区等小型企业,逐步形成为农业服务的成龙配套的地方工业体系。1970年,全省计划建设地、县煤矿77对(投产36对),安排制造小氮肥设备35套(包括上年未完成的5套),保证安装投产17套;安排新建小水电机组862台,发电能力达到3.3万千瓦。到1971年4月,全省计划会议期间又专门召开了“五小”专业座谈会,根据会

议的有关材料:全省小钢铁已有31个;小化肥已建成9套;小煤窑已开工建设84对矿井;小水泥已开工68个,投产58个;小水电已开工建设6401处,装机21万千瓦;小农机,除甘孜地区的两个县尚未建立外,其余县、市(区)都建起了农机厂,有的县还建起2至3个。到1972年,全省小铁矿已发展到80多个,小高炉70多座,产铁能力在30万吨以上;地县煤井发展到235对,生产能力达1000万吨以上(地方小煤窑生产原煤已占全省原煤产量的一半以上);小氮肥厂52个,生产合成氨能力达17.6万吨;小水泥厂133个,生产能力达80万吨;小水电站3000多座,装机容量达14.5万千瓦;全省农机修造厂拥有机床(含简易机床)达4000多台。从1970年到1972年3年间“五小”工业的发展,对全省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到1973年2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计划会议期间,提出“五小”工业要整顿,要搞与农业有利的;小化肥厂也不要每个县都有,破坏计划的不能搞。自此,“五小”工业发展的势头才开始减退。

从1970年到1973年间,由于当时国家制订的“四五”计划,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之下,计划的规模过大,指标要求过高,1971年执行计划的结

果,出现了“三个突破”。对此,1970年底,周恩来总理就明确指出,要求有关部门注意在工作中加以解决。可是,实际上1971、1972年两年,四川同全国一样,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要求过急的问题,并未真正解决,而且又有发展。职工人数,1969年为471.06万人,1970年增加到489.74万人,1971年增加到526.70万人,3年合计净增82.49万人,减去调出省外职工14万人,3年累计仍增加68.49万人。粮食销量,1969年为249.2万吨,1970年为253.8万吨,1971年为272.2万吨,1972年为283.0万吨。职工工资总额,1969年为19.07亿元,1970年为20.49亿元,1971年为21.04亿元,1972年为24.48亿元。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增加职工过多,粮食销量过大,各方面出现了紧张状况。从1972年7月份开始,由于基本建设规模大,资金有缺口,物资设备供应严重不足,再加上运力同运量的矛盾十分突出,运输紧张,农机、食盐、钢材、水泥、化工产品和其它重要物资在车站、码头大量积压,不少工厂原料进不了厂,产品出不了厂,再加上当时一些单位派性严重、在纠正“批清”错误方面,政策得不到落实等原因,1972年下半年到1973年一季度,全省钢、铁、煤、焦生产均呈下降趋势,特别是重庆地区和

永荣矿务局、重钢等几个关键厂矿生产下降,全省整个工业生产受到了严重影响。

197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周恩来总理主持工作的情况下,下决心解决“三个突破”问题,坚决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精减职工,压缩粮食销售,同时大力加强农业,发展基础工业、缓解交通运输的紧张状况。这一年,四川坚决贯彻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压缩为23.68亿元,比上年的28.43亿元减少4.75亿元,全省已开工的100多个大中型项目中,要求集中力量抓好40个重点项目,大力精减职工队伍,压缩粮食销量,使“三个突破”势头得到了遏制;在处理农、轻、重关系方面,增加农业投入,全年用于农业和支援农业的投资共安排2.10亿元,占当年基建投资总额10.60%(高于当年全国占8%的比例);同时努力抓好轻工生产,力争几年内实现轻工产品基本自给。经过这些努力,1973年全省经济仍然保持了发展势头。工业总产值完成123.46亿元,与上年基本持平,农业产值100.72亿元,增长4.4%。从1970年到1973年,四川的经济建设仍然是在“文革”动乱尚未结束、“左”倾指导思想仍处于支配地位的条件下进行的。但是,由于中央有周恩来等一批老一

辈革命家努力排除干扰,四川人民迫切要求搞好生产,1971年8月以后新成立的中共四川省委和各级党委也为恢复发展生产作出了努力,因此,从1970年到1973年,四川省的工农业生产基本上是逐步上升的。全省工农业总产值,1970年达到了172.5亿元,比1969年增长33.1%;1971年达到206.8亿元,比1970年增长19.9%;1972年在自然灾害严重的情况下,工农业总产值仍达到220.03亿元(按1970年不变价格),比1971年增长0.2%;1973年达到41.8亿元,比1972年增长6.6%,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幅度较大。1970年增长2.9%,1971年增长30.1%,主要是因为基本建设进度加快,部分重点建设项目建成投产,新增加了一批生产能力。农业总产值,1970年为64.53亿元,1973年为100.72亿元,平均每年增长4.7%。1973年粮食产量达到2570.5万吨,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比1970年增长10.8%;棉花产量15.2万吨,增长16%;油料产量45.4万吨,增长22%;生猪3887万头,增长31%。应当说,1970年至1973年,是10年动乱期间四川形势发展较好的一段时间。

3 1974年以后的“两落一起” 1974年到1976年3年间,四川经济经历了“两落一起”,即1974年“批林批孔”。全省经济急剧下降;1975年贯彻中央抓整顿的方针,国民经济显著回升;

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经济再次大幅度滑落。

1974年初,由于开展“批林批孔”,成、渝两市和全省部分地方极少数资产阶级帮派头目又开始了拉山头、搞“串联”的活动。4、5、6月全省政治局势动荡不安,不少地方层层揪“孔老二的徒子徒孙”、砸烂“儒家”领导班子;许多工厂企业内部再次出现“造反”组织,领导干部被说成是“儒家班子”,抓管理被说成是“修正主义路线回潮”搞“右倾复辟”。经济工作中无政府主义再次泛滥,国民经济急剧下降。再加上当时基本建设战线仍然过长,基本建设投资削减,但建设项目减得不多,投资缺口大,物资供应紧张(钢材、木材、水泥供应均有较大缺口)特别是煤炭、电力、钢铁和交通运输成为制约生产发展突出的薄弱环节。从4月份起,全省重点煤矿生产逐月下降,全省煤炭平均日产量由3万吨左右,下降到1.9万吨,到7月份进一步下降到1.3万吨。特别是全省的几个大矿,如永荣、芙蓉、南桐、中梁山等下降幅度更大,上半年全省共欠产煤炭200多万吨,仅上述几个煤矿就欠产158万吨。煤炭生产下降,严重影响全省钢铁、水泥、电力、军工、轻纺、化工的生产和人民生活。钢铁生产大幅度下降,全省钢产量由一般日产0.4万吨下降到1800多吨,上半年欠产40多万吨,铁由日产4500吨左

右,下降到 2000 吨左右,上半年钢和生铁仅完成计划的 26%,钢材完成 24%。钢铁生产计划完不成,严重影响了省内机械制造和农业用铁。交通运输方面,铁路运输干线不畅,特别是成都、重庆交通枢纽严重阻塞,车辆大批积压。从 6 月份起,待卸车辆经常在 2000 辆以上,其中,仅重庆九龙坡和成都东站待卸车辆即达 600 辆以上。在全省,又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因动乱和煤、电、运输等原因而停工停产。原来形势刚有好转的一批重点企业,又有反复。峨眉机械厂、新都机械厂等这时又陷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全省上半年工业、交通生产计划仅完成全年计划的 12%。全省 19 个地、市、州,除西昌、阿坝、达县外,其余地、市、州工业生产普遍下降,特别是成都、重庆、自贡、江津、宜宾、万县等地下降幅度更大。8 月份,煤炭、钢铁生产继续下降,交通运输,由于进入雨季,塌方断道多,铁路运输情况未得到缓解,汽车运输也相当紧张,成渝线上简阳、石桥、资阳 3 个火车站积压待运物资达 2.7 万吨以上。从 4 季度开始略有好转,但终因“批林批孔”运动的冲击,全年计划完成得很差。1974 年是四川出现较大反复的一年。这一年全省工农业生产大体上又退到 1970 年前大动乱期间的水平。全省工农业总产值

从去年的 224.18 亿元降到 216.68 亿元,下降 3.3%。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多数未完成计划,而且比 1973 年的产量减少。其中钢、钢材、生铁、水泥、硫酸、纯碱、农用化肥、化学农药、金属切削机床、棉纺、机制纸及纸板等下降的百分点均为两位数。主要农产品产量,除油料略有增长外,粮食、棉花、甘蔗、茶叶、生猪存栏等,都没有达到计划指标,而且都比 1973 年的产量减少。基本建设进度缓慢。51 个重点项目有一半左右未能按计划建成投产,新增固定资产比 1973 年下降 10%。财政收入 16.21 亿元,只及年计划的 70%,比 1973 年的 20.11 亿元下降 19.4%;财政支出 21.26 亿元,比上年增加 2.2%,收不抵支,赤字 5.05 亿元。企业流动资金增加,企业亏损面扩大。全省机动财力全部用光,还向中央借款 1.8 亿元。

1975 年,贯彻中央抓整顿的方针,四川国民经济又有了明显的转机。年初,全国第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实现中国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中共四川省委、省革委根据会议精神,提出了“奋战三年,大干快上,拿下两个 100 亿”的奋斗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工业交通方面,首先抓了“老大

难”的重点企业的整顿。这一年的2月下旬到4月初,由国务院、中央军委直接抓,在北京举行了第二次重点企业汇报会。由于这次会议是在第一次重点企业汇报会的基础上,同时也是在全国抓全面整顿的形势下举行的。会议强调把解决思想问题与采取组织措施二者结合起来,四川认真贯彻了会议精神,重点企业的状况普遍有了较大的变化。这一年的2月底3月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业书记会议,3月初又发出了《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5月又召开了钢铁工业座谈会,这些会议有几个共同点:一是强调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二是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三是必须认真落实各项政策,四是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四川认真贯彻了上述会议和文件精神,一季度工业交通形势明显好转,工业生产比上年同期增长13.5%。交通运输状况,主要是3月份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后,四川也配合铁道部对铁路进行整顿,铁路运输状况经过整顿工作开始改善,铁路运输的好转,对整个工业战线形势进一步向好的方面发展起了重要作用。9月,中共四川省委又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布置整顿企业秩序的工作。经过整顿,加强了工矿企业的领导班子,恢复了

一些必要的规章制度,职工的劳动纪律也有所增强。与此同时,省委还注意了抓支农产品和轻工业产品的生产,抓基础工业。通过贯彻中央抓整顿的方针,四川工业生产,一季度小上,二季度大上,全年提前24天完成了国家计划,1975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53.68亿元,创造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四川历史的最高记录。其中全省工业总产值,计划135亿元,实际完成147.9亿元,超过计划9.6%,比1974年增长29.4%,全省19个市、地、州中有17个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全年国家计划,工业产值均比1974年上升,其中重庆、成都、自贡、渡口、江津、宜宾、甘孜等7个市、地、州增长幅度都在20%以上。

在抓农业方面,1975年1月13日,省委召开农田基本建设电话会议,对兴修水利、搞好农田基本建设作了部署;3月17日,又专门作出了关于加强农村工作的决定;从二季开始,省委、省革委又先后批发了省农业局、水利局、化工局的一些有关发展农业的文件。7月,邓小平接见中共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着重强调了四川要树立“农业第一”的思想,指出四川没有肉吃,没有菜吃,到很远地方去拉菜,就不安定。还说,根据国家计委6月

第一次重点企业汇报会,是1973年9月至12月,由国务院、中央军委直接领导召开的。因受“批林批孔”影响,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份的统计,四川农业增产比例全国倒数第一,农民分配水平倒数第二,农业机械化倒数第三,1974年全省人均农业产值倒数第二。四川管农业的班子要加强。要研究农业方面的政策,包括养猪政策,政策不能随便改,改了群众不信任。四川要在几年内把农业搞上去。邓小平关于四川要树立“农业第一”的重要讲话,对于当时推动全省各级干部抓经济工作,特别是抓农业,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1975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调赵紫阳担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1975年,中共四川省委突出抓了调整和加强各级管农业的领导班子,抓化肥、加快农业机械化步伐,改田改土、兴修水利、植树造林,以及积极办好“五小”工业,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等方面的工作。8月2日到8日,中共四川省委召开了地、市、州、县委书记会议,传达贯彻了邓小平关于四川要树立“农业第一”的思想的重要讲话精神。1976年冬,省委提出组织1200万劳动力(内含专业队300万人)大打治山治水的“人民战争”,在大力建设小氮肥厂的同时,抓紧养猪积肥。通过这些工作,1975年扭转了1974年农业生产下降的局面。全省农业总产值达到105.81亿元,比上年的105.36亿元增加0.4%;全省粮食产量达到2580.5万吨,比上年的2561.5万吨增加0.7%;生猪达到3868万头比上年

的3778万头增长2.4%;棉花、麻类、烟叶、茶叶等经济作物,均比1974年有所增长,达到或超过1973年的水平。

在基本建设方面,全年计划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全部开工,一批重点项目,包括攀钢一期工程、宝鼎矿区、渔子溪一级水电站、宝成铁路电气化、中国空气动力研究院、长征机械厂、四川柴油机厂、四川空气分离设备厂等建成投产,全年新增固定资产23.48亿元,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达83.4%,是“四五”时期最高的一年。

1976年因受“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影响。工业方面,全省企业的领导班子再次陷入瘫痪,工作无法开展。全省工业交通战线从4月份开始,生产月月下降。全省工业总产值原计划为165亿元,实际下达170亿元,上半年只完成67.9亿元,为年计划数的39.9%。到7、8月份,成都、重庆等工业集中的城市,有半数以上的军工和民用企业陷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全省全年工业总产值只完成年计划的82.1%,85种主要工业产品有76种未完成年度计划。不少工业企业严重亏损。到下半年,工业企业亏损面高达58%;企业收入,原计划4.6亿元,实际只完成0.8亿元,短收3.8亿元。在农业方面,因受“层层揪邓小平的代理人”的影响,全年粮食减产15亿斤,生猪存栏数下降近200万头,还

不及 1966 年的水平。在商业财贸方面,农副产品收购显著下降,除有受灾因素外,主要是县以上领导机关受到冲击无法正常工作。其中,尤以粮食收购下降最突出,上半年全省只收购粮食 6.8 亿斤,比 1975 年同期下降 57.9%;另一方面,因粮食管理工作放松,农村返销量大幅度增加。1976 年上半年全省即多销售粮食 7 亿斤。收购少,销售多,使粮食库存大幅度下降,不得不从东北等几个省调进 51 万吨粮食,安排人民生活。1976 年,是 10 年“文革”动乱中四川粮食库存最低的一年。1976 年,也是“文革”中 1970 年以后反复最大的一年。到年底,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又跌落到 1970 年前的水平。由于工农业生产萎缩,城乡人民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城市各种供应几乎都要凭票,而且有票还买不到,连蔬菜也要凭票供应。农村外流人口增加,有些人外出逃荒要饭,成渝线上常有不少爬火车涌入城市的农民。从 1966 年“文革”开始,到 1976 年 10 月,中共中央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文革”结束,在 10 年“文革”大动乱期间,从经济发展总的方面来看,10 年间,横向比较:全国除 1967 年、1968 年两年工农业全面减产外,其余 8 年尽管增产幅度大大低于“一五”时期,但各年仍有不同程度

的增产。而四川受破坏的情况更为严重。全国减产这两年,四川同样是减产,而且减产幅度大于全国。1967 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 9.6%,四川则下降 11%;1968 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 4.2%,四川则下降 23.8%。其余 8 个年头,四川除 1969 年、1971 年增产幅度略大于全国外,有 6 年经济发展速度均低于全国。10 年动乱,从总体上看,使四川同全国发展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

再从四川自身 10 年纵向比较,除前面已经记述的 1967 年、1968 年两年全面减产之外,10 年间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1976 年与 1965 年比,工农业总产值由 1965 年的 126.95 亿元上升到 1976 年的 236.96 亿元,增加 110.01 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 1965 年为 68.27 亿元,1976 年为 139.53 亿元,增加 71.26 亿元;农业总产值 1965 年为 58.68 亿元,1976 年为 97.43 亿元,增加 38.75 亿元。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 1965 年为 2055.5 万吨,1976 年为 2542 万吨,增长 23.66%;棉花 1965 年为 10.99 万吨,1976 年为 8.45 万吨,减少 23.11%;油料 1965 年为 39.29 万吨,1976 年为 35.58 万吨,减少 9.44%;生猪年末存栏数 1965 年为 2500 万头,1976 年为 3670 万头,增长 46.8%;钢 1965 年为 49.5 万吨,

1976 年为 108 万吨,增长 118.1%;生铁 1965 年为 28.2 万吨,1976 年为 84 万吨,增长 198.7%;原煤 1965 年为 1134 万吨,1976 年为 2895 万吨,增长 155.29%;发电量 1965 年为 28.94 亿度,1976 年为 102.76 亿度,增长 255.07%;原木 1965 年为 182.34 万立方米,1976 年为 285.16 万立方米,增长 56.38%;水泥 1965 年为 78.8 万吨,1976 年为 262.2 万吨,增长 232.7%;金属切削机床 1965 年为 1229 台,1976 年为 6957 台,增长 466.06%;化肥 1965 年为 12.11 万吨,1976 年为 43.59 万吨,增长 259.95%;棉纱 1965 年为 4.82 万吨,1976 年为 6.92 万吨,增长 43.56%;布 1965 年为 2.38 亿米,1976 年为 3.51 亿米,增长 47.47%。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各方面增长的幅度肯定比上面记述的更大。

(三)“文革”中的教育、科学、技术、卫生、文化事业

10 年“文革”期间,四川的教育、科学、技术、卫生、文化以及报纸、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事业都备受摧残,呈现出一片万马齐喑、百花凋零的景况。

1 教育事业 在 10 年时间里,四川教育战线的情况大致可以分为 3 个阶段,即“文革”初期的停课闹革命”,和从 1969 年开始的“教育革命”,以及 1972 年以后的整顿与反整顿斗争。

1966 年“五·一六通知”下发后,中共四川省委于 6 月初作出决定:先是大专院校的文科,组织师生参加“文化大革命”,接着又决定全省所有大专院校一律停课,组织师生参加“文化大革命”,批判本校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8 月,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后,全省中学师生以至小学教师也陆续卷入“文化大革命”,自此,学生开始介入社会。9 月以后,学校师生绝大多数参加全国性的“大串连”,成立群众组织,不少人到工厂、农村“煽风点火”,甚至参加武斗。1967 年春,按照中共中央通知,小学陆续开学,但学校中对“走资派”和“牛鬼蛇神”的斗争,要求继续进行;对中学,要求在“大联合”的基础上选举产生临时领导班子,“复课闹革命”;对大专院校虽然也要求“复课闹革命”,要求斗“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着手搞“教育革命”。1967 年 10 月 14 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通知,要求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此后,全省中学陆续复课招生,而绝大多数大专院校师生和相当一部分师生仍继续参加社会上的斗争,中央要求的大学复课未能实现。1968 年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工人宣传队陆续进驻各类学校。1970 年 4 月,省革委又决定将全省 30 余所高等

院校的36万名学生和教职员工全部组织去解放军农场或工地劳动锻炼,学生介入社会的状态才基本结束。大学从1966年开始到1970年5年末招生,1971年也只招生260人(“文革”最高年招生24万人)。

第二阶段,是重点进行所谓“教育革命”的阶段。从1969年2月下旬到3月中旬省革委召开的“教育革命”座谈会开始,四川对教育管理体制作了较大的改变。座谈会后,省革委批发的会议纪要,全省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去办,实行民办公助,农村公办小学教员原则上就地下放,插队落户,实行评工记分和补助的办法;城市中小学试行厂办或工厂、街道、社队联合办校,原来办在县区的中学(包括师范学校)大部分教职员下放到社队去,接受“再教育”,要求把中学办到社队去,城市中学也要下放一部分到农村去。“纪要”下达后,各地相继贯彻执行,这就搞乱了原来的管理体制。1971年8月13日中共中央批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是全面反映“文革”期间进行所谓的“教育革命”的基本内容的一个文件。文件中所谓的“两个估计”,即:解放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两个估计”,是“文革”以来打击迫害

教育战线广大教职员工的基本依据。四川10年“文革”中,据不完全统计,全省中小学干部、教师被立案审查的达31万人之多,其中被迫害致死的有1800余人,被开除公职的4800余人。高等学校大批干部和知名教授被批斗、体罚、抄家,有的甚至被残酷迫害致死。在重点进行所谓的“教育革命”阶段,从1972年春季开始,四川有19所高等院校的117个专业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不进行文化考试的办法,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首批招收7850人。自此,开始了“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阶段。每年招收近万名“工农兵学员”入学,到1977年停止,总计招生达4万人左右。1975年,全国学“朝农”(辽宁朝阳农学院)实行“社来社去”。四川有27个专业招收“社来社去”学生,其中,西南农学院和四川农学院全部实行“社来社去”,9所医学、师范学院部分实行“社来社去”,工科院校和综合大学个别专业进行“社来社去”试点。在进行“教育革命”中,四川还错误的批判过“智育第一”、“师道尊严”等等,造成很大的混乱。

第三阶段,是1972年以后,特别是1972年到1974年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期间,在教育战线上采取一系列整顿措施,各类学校的秩序有明显好转,但是,1974年批林批孔和1976年“批邓、

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江青集团把两次抓整顿说成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成都市在1974年江青抓的“马振扶公社”事件的压力下,还发生过错误处理“田秀豪事件”,在全省造成了恶劣影响。

10年“文革”不仅教职员工备受摧残,学校的教学设施也遭到严重毁坏,不少校舍被毁被占,仪器设备、图书资料损失惨重。据26所高等学校的不完全统计,10年“文革”毁坏房屋48万平方米,损失图书717万多册,损失物资价值1825万元以上。

“文革”期间随意改变管理体制,造成了全省教育结构严重失调。1968年至1971年,由于大搞小学“戴帽”办中学,小学大幅度缩减,中学畸形发展。全省1968年共有小学1130万多所,到1971年已减至998万所(1969年减为93万所);普通中学,1968年为5346所,1971年达到5533所,学生由7416人上升到21571万人。由于师范教育一度停办,合格师资来源严重不足。中等技术教育也停顿数年,半数以上的学校被撤销或改办工厂。高等学校从1966年起停止招收本、专科生6年,停止招收研究生12年;1971年还撤销、合并了部分院

校。10年“文革”期间,四川少为国家培养各类本、专科生7万人以上。

2 科学技术和卫生事业 “文革”开始后,林彪、江青一伙,诬蔑科技战线执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并散布种种反动言论肆意破坏共产党对科技事业的领导及各项方针、政策,打击迫害科技人员。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到1967年上半年,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以及四川省科委、科协均陷于瘫痪,以后又被造反派“夺权”,人员大部分下放“五七”干校劳动。1970年7月,省革委决定重建四川省科技局,同时撤销了西南科分院。1973年4月,省科技局又改为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并陆续建立各市、地、州和部分县的科技行政管理机构。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抓整顿,科技工作刚有转机,196年9月“四人帮”又搞所谓“批判三株大毒草”(其中包括邓小平主持工作期间形成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讨论稿)。在上述反复折腾的背景下,四川的科技工作很难有所作为。但是,由于国家在四川进行三线建设,使与建设三线有关的科技事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1965年,国家在四川建设战略后方基地的工作开始以后,按照中共中

指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一女生英语考试交白卷受到班主任批评,该女生一时想不通而跳水自杀,江青把这件事说成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

指1974年3月,中共成都市委错误处理省建三公司子弟教师田秀豪,因学生王小林违犯校规推了王一把,以致于骨折致死,市委错误决定将田逮捕法办。

央、国务院的部署,国家在四川开展了冶金、机械、化工、兵器、航天、船舶工业和国防科技试验基地的建设。从1965年到1980年的16年中,先后新建、迁建数百个重点项目;与此同时,内迁、新建和进一步充实的科研机构近80个,大批科技人员调到四川工作,使四川科技实力大大增强。科技人员由1965年前的3万多人,1978激增到35万多人,其中近一半是工程技术人员;与此同时,四川的各高等院校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既是教学基地又是科研基地的方针,也纷纷建立科研机构,充实科研人员,成为科研队伍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军”。三线建设,为四川科研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这段时间,四川省的科技工作,围绕三线建设,在把四川建设成为国家可靠的战略后方基地的目标下,在资源开发、工业技术改造、交通建设、国防科技、农业科技技术的研究推广,沼气技术、节制生育、以及地震预测预报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其中,主要包括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冶炼技术的突破和国防科技的研究应用有很大进展。桥梁、隧道、地质等科学技术问题的解决,使四川交通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农业方面完成了水稻高秆换矮秆、油菜白菜型换甘兰型。普通玉米换杂交玉米、棉花品种换代等科技攻关任务,提高了各种作物产量。四川猪的营养需要研究课题的完成,

对生猪发展有重大意义。此外,松潘、平武、盐源、黑水等地地震预报成功,土壤热力学理论和大熊猫及其主食研究,均受到国内外的重视。

“文化大革命”期间,四川卫生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在城市医疗卫生工作遭受严重冲击,一大批专业医疗工作者被错误地当作“资产阶级权威”、“横遭迫害的情况下,全省医院床位和专业工作人员人数,10年间几乎没有多少增加。到1976年,均只相当于1959年的水平。在此期间,按照毛泽东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转到农村去的指示,农村的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却有了较大的发展。从1969年召开四川省的第九届卫生工作会议确定发展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之后到第二年,即1970年,全省实行合作医疗的生产大队即达51万多个,占全省生产大队总数的71.2%,“赤脚医生”人数达12.9万多人;以后,逐年有所发展,到1976年“文革”结束前,实行合作医疗的大队占全省大队总数的90.1%。“赤脚医生”人数达到19.1万多人。与此同时,城市的医务人员几乎每年都要组医疗队巡回下乡为农民防病治病,常年下乡的人数一般达4000人左右,省、地、县三级卫生机构还有一批卫生人员下放区、乡工作,大、中专医学院的毕业生也几乎全部分配到农村。实行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的结果,对开展

农村防病治疗,方便群众就医、保护劳动力起了积极的作用。

3 文化艺术、报纸、广播 “文革”期间的文化艺术以及报纸广播和电视事业同样倍受摧残。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川剧艺术,由于1963年后批判“死人统治舞台”,对传统戏一律禁锢;“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实际被否定,戏曲舞台出现冷落局面。1966年下半年的“四旧”,大批传统戏服装、道具被视为“四旧”,遭到焚毁;艺术家、名演员被视为“反动权威”、“文艺黑线人物”、“戏霸”等而惨遭折磨,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残致死。1971年,又大砍川剧团,幸存的也多数被改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的改为京剧团,上演“样板戏”。

报纸、广播、电影、电视事业也遭受严重摧残。“文革”开始后原来报纸的一些负责人即横遭批判。1966年12月31日,《四川日报》被当地“造反”的群众封闭,一段时间只能出“电讯版”,没有地方新闻;其余有的报纸一度停刊;成都电视台停播;省、市广播电台和县广播站均一度停办自办节目。后来虽然恢复刊登地方新闻,电台可以自办节目,但因强调舆论阵地是所谓“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工具”,“假、大、空”现象比比皆是。一段时间,由于特别是突出强调宣传、普及毛泽东思想的任务,使全省广播和电视得到较大的发展。各地掀起了“大办”

广播的热潮。在一个时期内,农村广播网的建设规模和发展速度都是空前的。到1975年底,全省县建立了广播站,百分之九十的生产队通了有线广播,安装在农民家中的喇叭已超过800万只,大约两户农民家中有一只喇叭,基本上普及了农村广播网,其后,转入整顿、巩固和提高。与此同时,电视、调频广播的许多建设项目,如设在龙泉山、峨眉山、剑门关、华蓥山等地的高山骨干台等陆续上马。1969年10月,成都电视台恢复播出,1971年7月,省革委决定,成都电视台归四川省广播事业局领导。1978年7月,成都电视台更名为四川电视台。

“文化大革命”中出版事业遭到严重破坏。“文革”前17年的出版工作,被诬为“反革命黑线专政”;出版社被当作“反革命黑店”;出版队伍被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大批编辑、干部成为改造对象或专政对象,大批图书资料被毁。在四川解放初期接管保藏的木刻雕板,是清同治、光绪及以后较有名的“渭南严氏”(严谷声)、“尊经书院”等所刊刻,内容丰富、刻工、版式精美,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共约56万多块,也被当作“四旧”付之一炬。具有近300年历史的甘孜德格印经院收藏的20多万块藏文木刻雕板,也遭到不少破坏。

10年“文革”期间,除了印毛泽东著作,中小学课本、“样板戏”和一些按

当时口径的形势宣传材料之外,几乎没有出什么图书。

四、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1977~1985年)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粉碎了“四人帮”,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意愿。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终告结束。从此,四川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从1977年至1985年的9年中,四川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体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头两年,着重清除“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粉碎“四人帮”在四川的帮派体系,恢复国民经济,并且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后,从1979年到1984年,贯彻三中全会精神,进行拨乱反正,调整国民经济,进一步扩大和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遵循《决定》的精神,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经过全省各族人民9年的努力,实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超额完成了“六五”计划,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初步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一)政治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1 揭发批判“四人帮”粉碎帮派体系

粉碎“四人帮”后,四川就开始了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揭发批判。1976年10月21日、12月2日,中共四川省委和成都市委先后联合召开揭发批判大会,号召全省各族人民打一场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的“人民战争”。1976年12月10日起,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的3批材料,按照中央的部署,揭发批判分3个战役进行,第一个战役,主要是揭批“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第二个战役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第三个战役,揭批“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全省各地区、各部门的群众和干部,密切联系实际,针对在各地区、各部门流毒最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问题,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开批判会,写批判文章。揭发批判逐步深入到“四人帮”在四川的帮派骨干分子。1977年9月6日,中共四川省委召开揭发批判“四人帮”在四川的帮派头子和亲信刘结挺、张西挺罪行大会。揭发批判刘、张投靠“四人帮”,并在“四人帮”直接指

挥下,鼓吹“文攻武卫”,煽动“全面内战”,大搞派性武斗等破坏活动,以及他们上靠“四人帮”,下结帮兄弟,阴谋在四川篡党夺权的罪行。这次批判大会。主会场设在成都,全省各地、市、州、县共设分会场641个,参加大会的达1000多万人。批判大会把揭批“四人帮”、粉碎“四人帮”帮派体系的斗争推向了高潮。大会以后,全省各地区、各部门继续对“四人帮”及其在四川的帮派骨干分子,进行了深入地揭发批判,并一直延续到1978年。

在揭批“四人帮”及其在四川的帮派骨干分子的同时,全省各地区、各部门普遍清查了他们的帮派体系,以及与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到1977年10月,全省初步查出有不同性质问题的近1800人。按照政策,区分两类性质的矛盾,分别作了严肃处理。对一些混进各级领导班子的帮派分子,一律清除;对一些既在政治上搞打、砸、抢,又在经济上投倒把、贪污盗窃触犯了刑律的帮派骨干分子,进行了打击。1978年上半年,在逐个查清楚罪行之后,依法逮捕、法办了30人,其中包括“四人帮”在四川培植的亲信、反革命分子刘结挺、张西挺。1982年3月6日至20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公开审判刘结挺、张西挺反革命案。3月24日,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依法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

刘结挺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处张西挺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2 清除“左”倾错误思想影响,进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教育 1978年5月《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这篇文章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打破“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的迫切愿望,它一发表,在全省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普遍的赞同和拥护。省委中心学习组、省级机关和市、地州委中心学习组,及时组织了学习和讨论。社会科学界先后召开了3次全省性的理论讨论会进行学习、讨论。11月2日,省委宣传部又召开了市、地、州委宣传部长参加的理论工作座谈会,要求各地认真组织学习这篇文章,进一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最高真理论”、“句句照办论”。11月20日,省委向全省各市、地、州及省级各部门转发了这次座谈会的报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在全省各地普遍开展起来。到1979年底,各地先后举办了短期离职轮训班5570期,参加学习的干部42万多人,还用“以会代训”的方式培训干部7000多次,54万多人。经过学习、讨论,引导人们冲破“两个凡是”的禁区,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端正思想路线,具有积极的实

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979年2月,省委在贯彻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扩大会期间,召开了部分市、地、县委领导干部,对“恐‘右’症”问题进行了几次座谈讨论。在过去,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一些干部在日常工作中老是怕犯“右”的错误,因而“凡事‘左’三分”,宁“左”勿右,人们把这种心态叫做“恐‘右’症”。“恐‘右’症”问题的讨论,联系实际,生动深刻,收效很好。与会干部都普遍认识到,右倾错误当然是应当防范的。如果人们所防范的是真正的右倾,那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从这些年来实际情况看,人们所怕的,往往并非真的右倾,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被他们当作“右”倾来批判和攻击的东西,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是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座谈会上列举“恐‘右’症”的种种表现,分析了“恐‘右’症”的产生的复杂原因。大家认为,中国共产党历来是讲两条战线的斗争。是右倾就反右倾,有“左”倾就要反“左”倾。不能以右反“左”,也不能以“左”反右。无论是反右反“左”,都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医治“恐‘右’症”,首先要纠正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左”

比右好”的错误理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体系;要继续深入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真总结历史经验,要坚决果断地落实党的政策,调整好社会关系,彻底清除“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关于“恐‘右’症”问题的讨论是在一部分领导干部中进行的。而且,报纸上对这一讨论及时进行了公开的宣传报道,在全省干部中产生了积极影响。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讨论,广大干部、群众思想逐渐解放,党内外思想开始活跃。1979年2月,当经济学的传统观点还严重地束缚人们的头脑的时候,四川社会科学界召开的第一次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突破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相对立、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存在竞争等传统的理论观点。提出了要高度重视价值规律作用,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新观点。1979年10月,在温江召开的四川省机电产品1980年订货会,通过市场形式使产销直接见面,敞开定货,开展竞争,开创了生产资料进入市场的先例。从全省干部思想状况来看,思想比较解放,勇于实践、工作搞得很有起色的,是少数。还有一部分干部思想不解放,他们对否定“文化大革命”是赞成的,一触及到“包产到组”责任制、平反冤假错案等重大问题,就思想不通。有极少数干部受“左”倾错误思想影响较

深,错误地认为,解放思想、发扬民主“搞偏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在“纠偏”。这是一种“左”的思潮。与此同时,社会上特别是在一些青年人中出现了一股右的思潮,有些人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灵了,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优越性了”,认为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就不该有正确的界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要“收”。这两种思潮的存在不仅直接干扰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而且还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

1979年5月召开的省委第三届第二次全会和11月召开的市、地、州、县委书记会,针对两种思潮,提出要把全省人民的思想进一步统一到三中全会精神上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排除“左”右干扰,进一步解放思想,维护安定团结。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在总结讲话中指出,这两种思潮,都是背离三中全会方针的,是对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干扰。坚持三中全会精神,一方面要坚持不懈地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肃清流毒;另一方面要同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斗争。当前既要着重纠正打着“高举”的旗号,反对三中全会方针的错误思潮;同时也要警惕打着“民主”的旗号,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要因为主要是批判极“左”路线,就不注意同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种右的东西划清界限,也不要等到这种错误的东西发

展成为严重倾向再去纠正。那样就不利于安定团结,不利于党的路线的正确贯彻执行。沾染错误思潮的人,绝大多数是认识问题,是加强教育和引导的问题。省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继续认真组织学习三中全会文件,密切联系实际,提高人们的认识,振奋人们的革命精神,为四个现代化的事业贡献力量。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半年全省即开展了《决议》的学习。经过深入学习,在许多重大问题,特别是在对毛泽东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的问题上,分清了是非,纠正了当时存在的“左”的和右的错误观点,进一步统一了认识,使全省干部和党员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激发出自觉执行党的路线的积极性。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后,全省进行了广泛的学习宣传。1983年5月,在深入学习党的十二大文件过程中,省委批转了省委宣传部《关于广泛深入地宣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请示报告》,决定参照50年代初期进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教育成功经验,开展一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活动。首先选择了成都机车车辆厂和新都县作为在工厂、农村进行宣传教育的试

点 然后 ,由点到面 ,由干部到群众逐步展开。全省参加宣讲的县以上领导干部 2650 多人 ,培训宣讲骨干 47 万多人。有 100 多万干部和群众 2500 多万人受到了教育。全省各地召开的专题理论讨论会 548 次 ,12000 多人参加 ,共撰写论文 1397 篇。经过宣传学习 ,初步消除了疑虑 ,提高了认识 ,明确了方向 ,增强了信心。

3 平反冤假错案 调整社会关系 粉碎“四人帮”以后 ,四川就开始了初步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三中全会以后 ,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加快。1979 年 1 月 ,省委决定 ,对“文化大革命”的冤假错案 ,包括四川地下党问题、“二月兵变”问题、“三老会”问题等 ,以及公开在报上点名批判的和“文化大革命”初期被错划为三、四类的干部 ,一律平反。同时 ,经中共中央批准 ,给李井泉、廖志高、黄新廷、郭林祥等被错误地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强加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予以平反。还给许多部门和地方领导干部都平了反。并对“文化大革命”中 12 3 万多户被抄家的财物作了清退补偿。全省先后为 9 7 万多名干部进行了平反或昭雪。

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工作告一段落后 ,紧接着 ,对“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几次政治运动中的案件进行了甄别。对 1955 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 225 人全部平反。对 1957

年错划为右派分子 64724 人 ,除 21 人的情况不明外 ,其余全部作了改正 ;1959 年“反右倾”运动中错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除早在 1962 年已经甄别外 ,对当时留有“尾巴”的 ,也作了彻底纠正。在“四清运动”中受处分的 62530 人中 ,错案率高达 66 5 % ,对这部分错案也都作了纠正。

到 1982 年底 ,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结束。大批干部的冤假错案 ,得了到平反 ,伸张了正义 ,顺了党心 ,舒了民气 ,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得到安置 ,积极性大大地调动起来 ,被迫害致死的干部 ,也得到昭雪。

按照中央的部署 ,又进一步解决历史上遗留的问题 ,调整各个方面的社会关系。

对土改时划定为地主、富农分子成份的人 ,由于情况变化 ,必要改变他们的成份。从 1979 年 1 月起 ,开始摘掉他们的地主、富农分子的帽子 ,给予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 ,其子女的个人成份一律定为社员。还对 5 5 万名错划、错戴“四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帽子的人进行了改错、纠正。

由于四川是全国最后解放地区 ,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数量甚大。1979 年开始 ,根据中央的政策 ,进行了逐个人的清理、查证 ,为 104145 人颁发了《起义人员证书》,为 16575 人复查并落实了有关政策 ,其中 ,有相当

一部分人重新安置了工作,享受离退休待遇和国家定期给予的生活补助。1982年3月,按照中央的决定,宽大释放了全部在押的国民党县团以下的党政军特人员。对46名特赦的原国民党将级军官、官吏、特务以及在这以前特赦和刑满释放的33名战犯,均安排在省级和省辖市及有关县人民政协、政府参事室、文史馆任职;宽大释放在押的和刑满在劳改单位就业按转业安置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1212人,本着“有工作能力的安置工作,没有工作能力的养起来”的精神,给予分别对待。对原国民党县团以下的4237名党政军特人员按“转业安置”的精神作了妥善安置。

从1979年起,落实居住在四川的台湾同胞和去台人员的亲属的政策。到1983年,他们中的3775件冤假案已平反纠正,17645件政策问题得到落实。并且从各方面大力扶持他们发展生产,勤劳致富。对他们的子女在招工、提干、参军、升学等方面的问题,也给予了关心和照顾。

在1956年按行业实行公私合营时,很多的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都被带进了公私合营企业,同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一起被称为“私方人员”,受到同样的对待。从1979年11月起,根据中央的指示,全省57万多人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恢复劳动者身份。

在少数民族地区,彻底平反了“文化大革命”和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1979年初,全部宽大释放了过去参加武装叛乱的在押人员,摘掉所有的原地主、封建主、农奴主、奴隶主的帽子,一律享受公民权。1983年又根据中央有关批示,在充分肯定民主改革和平判成绩的前提下,对1958年藏、彝地区平息叛乱中误伤和错整的群众进行妥善处理。1981年,旅居加拿大的原黑水藏族头人苏永和要求回国定居,政府对他不咎既往,热忱欢迎,并推荐他为四川省政协常委,在成都安家落户。

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切实解决知识分子的具体问题。解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专业不对口、夫妻两地分居、住房困难问题。组织科技人员“归队”。恢复和重新开始评定专业技术职称。

关于这次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工作,省委组织部在向中央和省委的报告中指出:“这次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时间之长,内容之广,任务之重,规模之大,投入力量之多,解决问题之彻底,是我省历史上罕见的。”党的各项政策的落实,涉及几十万人的历史遗留问题得到妥善处理和合理解决,深得民心。对于发展全省的安定团结,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充分调动各方面人士的积极性,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推进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具有重大的作用和深远影响。

4 恢复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 在“文化大革命”期中,四川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未进行过选举和召开会议。从1968年起建立的各级革命委员会代替了各级政权机关。1977年12月召开了四川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省革命委员会。新的革委会改变了上届由群众派别协商产生的“三结合”革委会临时权力机构的性质。1979年12月召开的四川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根据全国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选举产生了第五届四川省人民代表常务委员会和省人民政府。选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根据1979年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通过的《选举法》,把直接选举扩大到县一级。1980年省人大常委会制订并通过了《四川省县、社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全省组织70多万人的宣传队伍,普遍深入地宣传《宪法》、《选举法》、《地方组织法》。1981年的普选,全省参加投票人数占选民总数的97.2%,进一步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全省212个县(市、区),选举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各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成立以后,开展了经常性工作。按照宪法和法律所赋予

的职权。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推行“全面专政”的反动纲领,社会主义法制受到践踏,公、检、法机关被砸烂。“四人帮”垮台后,除省人大常委会加强立法工作外,加强了公、检、法队伍建设和恢复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到1985年,全省各地、市、州、县都恢复或设置了公、检、法、司和民政机关,区、乡、镇也都配有专职或兼职公安和司法助理员;人民法庭基本达到一区一庭;干警力量也逐步有所充实和发展,创办了政法、公安等干部院校,举办了各类专业培训班,政法干警的素质有所提高。各级政法部门集中了大量人力,具体进行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1983年根据中央的部署严厉打击严重的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活动,全省政法部门先后进行了8次集中行动,查获7个方面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7.77万多人,区别不同罪行,依法分别作了处理。同时,办理了各类经济犯罪案件2.22万多件,其中,重大案件有1万多件,依法惩罚了严重经济犯罪分子6300多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达2648万元。

人民调解是中国司法工作的创举。粉碎“四人帮”后,随着人民法院工作及司法行政机关的恢复和加强,人民调解组织也恢复和发展起来。到

1985年,全省城乡和厂矿等基层调解组织达10万多个,调解人员102万多人,调解了民间纠纷618万多件,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团结。

1978年11月,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全国率先组建了经济审判庭,开展对经济纠纷案件的审理。1978年至1985年,各级人民法院共审判财产权益案10万多件,赡养、抚养案件2万多件。

1980年起,重建律师制度和公证机构,到1985年,全省有法律顾问处242个,有律师2587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十万分之二点六;有市、县(区)公证机构217个。律师和公证制度恢复以来,在加强四川的法制建设、维护国家和公民的合法利益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5 恢复和加强爱国统一战线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不少爱国人士受到残酷的打击迫害,人民政协、民主党派、工商联与宗教被迫停止,统战机构被取消,统一战线工作遭到最严重的破坏。粉碎“四人帮”后,恢复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落实各项统战政策。

1977年2月,省委召开各界爱国人士座谈会,诚恳地提出要尽快结束过去那种“爱国有心,报国无途”的局面,进一步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从1979年开始大规模地落实各项统战政策的工作。到1985年底,平反纠正了各界爱国人士在“文化大革命”中的

冤假错案和其他历史错案1万余人(件);复查改正和安置错划“右派分子”5万余人、“中右分子”6万余人。对于原工商业者,肯定他们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者,其个人成分一律改为干部或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扣发的定息和扣减的工资已基本上补发;被赶出企业和60年代被精简下放的原私方人员,重新作了安置。

1977年12月,政协四川省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共有委员820人,恢复了政协工作。全省各级政协也相继恢复工作。到1985年10月,全省已建立市、州、县(区)各级政协组织223个,占县以上行政区划总数的97.8%,其中91个是1978年以后建立的。各级政协委员总人数(包括省政协)达37282人,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2万多人,扩大了两倍多。其中,属于统战对象的人士有19万多人,占政协委员总数的53%以上。各级政协开展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活动。采取多种形式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地方重要事务、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等进行协商讨论,对中共组织和政府的工作,也通过多种渠道提出建议和批评,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省政协从1977年以来,委员提案达1400多件,涉及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群众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分期分批交由有关部门作了处理。各级政协协助有

关部门落实各项统战政策,作了大量的工作;经常组织专题调查、座谈,对当地经济、文化、教育等工作提出建议;开展海外联谊和人民外交活动,组织各界爱国人士学习等等,促进了四川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与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巩固和发展。

“文化大革命”中,四川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各级组织被迫停止活动。据统计,1966年5月,全省民革、民盟、民建、九三、民进、农工六个民主党派有基层组织399个,成员5868人。1978年夏季开始恢复组织机构时,只有基层组织211个,成员共5028人。四川省工商联在“文化大革命”前有地方机构176个;“文化大革命”中被全部解散。从1978年夏季开始,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的省级组织和重庆、成都市组织相继建立起临时领导班子。1979年2月,四川省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民主农民党和工商联分别在成都召开代表大会,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九三学社于1982年3月筹组省工作委员会,1984年2月成立省委会。1984年4月,中国致公党四川省工作委员会成立。各民主党派的地方组织机构也陆续恢复。组织机构和成员也得到较快的发展。民革从1980年到1985年底,共吸收新成员1372人,全省成员总数达到2087人,全省市、县级委员会(筹备组)增加为

13个,基层支部由33个增加为114个;到1985年底民盟有盟员4496人,其中新发展2560人,有市、县委员会16个,基层组织增加到266个;民进会员总数达1921人,在14个市建立了地方组织,辖支部129个;民进有会员1620人,8个市级组织,151个基层组织;农工民主党成员由1978年的380人,发展到1985年底的1642人;致公党共有成员225人;九三学社有社员1716人,1983年以后,陆续新建立5个市委员会和3个市委筹备组,基层组织有107个。

1979年以后,中共四川省委采取了多种形式、定期或不定期举行座谈会、协商会,与民主党派、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协商省的重大问题,通报有关情况。各民主党派与工商联发挥自身的有利条件,参加国家大政方针的协商,广开渠道,主动地开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工作和海外联谊活动。各民主党派与工商联都在落实各项统战政策的工作中,协助中共各级组织和政府,进行调查研究,解决遗留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各级工商联协助清理和发还了原工商业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冻结的银行存款、被查抄的财物和被强占的房屋,补发了被扣减的工资,协助清理和区划带进公私合营的小商、小贩、小手工业等。各民主党派积极参政议政,对国家政治生活和四化建设的重大问题

进行调整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各民主党派都有一定数量的成员当选各级人民代表,担任省、市、县人大常委会人民政府的领导职务,担任各级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就四川的经济社会发展许多问题,进行专题调查研究,献计献策。如民盟对智力开发、教育改革、能源开发和利用、农业发展战略等问题、农工民主党对改革医院管理、推行计划生育、贯彻食品卫生法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可贵的意见和建议。各民主党派为社会提供智力服务,兴办各类学校和培训班,据不完全统计,有500多所(班),学生达20.3万多人。如民盟1984年,在省有关部门和凉山州委与政府的支持下,办起了凉山大学,成为全国唯一的在少数民族地区创办的一所民办公助大学;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咨询服务机构,面向中小企业、乡镇企业、提供了经济、技术咨询服务,据不完统计有385项;向少数民族地区、老革命根据地和边远山区开展多种形式的“智力支边”活动,据不完统计有350项。一些民主党派为促进祖国统一和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开展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国外侨胞以及外籍华人和国外客商、友好人士的联络工作。如致公党先后介绍外国专家学者来川讲学7人次,进行技术交流600多人次,接待11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旅行探亲121人次,介绍引进资金、技

术、设备及洽谈贸易52项,等等。

四川是一个多宗教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各宗教历史悠久,都拥有一定的宗教职业人员和信教群众。四川的宗教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破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落实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政策,进行拨乱反正,清退了宗教团体房产,平反了冤假错案,团结教育宗教职业人员和信教群众爱国、爱教,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1979年和1980年先后开放教堂寺观59座。政府拨经费对一部分重点教堂寺观进行了维修。以后,又逐步恢复各种宗教活动场所。宗教职业人员中的代表人物作全国政协委员的有3人、省人民代表9人、省政协委员22人、全省各市、州、县人民代表、政协委员400多人;在甘孜、阿坝两州还有10多名宗教界人士担任了副州长、副县长等政府领导职务。先后开办了四川省天主教神哲学院、四川基督教神学院、四川尼众佛学院、四川藏语佛学院等4所宗教院校,专门培养宗教职业人员。

(二)国民经济的恢复与调整

1 工农业生产的恢复 “文化大革命”对四川工、农业生产的破坏十分严重。“四人帮”垮台后,经济工作中紧迫的任务,是尽快地恢复工、农业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

为尽快恢复农业生产,首先,在农村实行了“休养生息”的方针,放宽政策。一方面,减少征购粮食,稳定负担。1976年对川东、川北地区部分贫困县减少征购粮食25万吨。1977年,又规定了各地区粮食征购起点,对稻谷生产区人均留粮在260公斤以下、杂粮生产区人均留粮210公斤以下的生产队,一律免征。另一方面,在分配上保证社员得到实惠。要求各个社队认真清理财务,制止乱开支,作到增产增收,多劳多得,分配兑现。在粮食分配上继续采取压缩社、队集体提留和储备粮,使分配给社员的口粮有较多的增加。1977年,社员人均口粮由1976年的246公斤增加到328公斤。1979年,又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对粮食、棉花、油料、生猪、鸡蛋、甘蔗、桑蚕茧、苧麻、晒烟、木材、桐油、生漆、松香、楠竹、牛皮、山羊板皮、兔皮、虫草、贝母、天麻、党参、红花等22个点收购额80%左右的重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综合提价幅度达28%。这是四川解放以来,提价幅度最高的一年。当年全省商业部门农副产品采购总值为49.72亿元,比1978年增加11.57亿元,其中属于提价因素的为8.5亿元,占增加额的73.5%,使全省农民每人平均增加收入10元左右。

其次,因地制宜地改革了农业耕作制度和生产技术。“文化大革命”以

来,在农业生产上一个突出问题,是不顾各地农村生产的具体条件,普遍地强迫推广双季稻的种植,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严重地影响了生产积极性。由于普遍地强迫种植,许多地方收成甚少,甚至减产,浪费劳力、财力,得不偿失。省委、省革委负责人在许多地方亲自调查双季种植情况,充分听取了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意见,决定纠正强迫种植双季稻的作法。1977年2月,在部署农业生产时,提出在水稻生产上,要主攻中稻,大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同时积极创造条件,发展双季稻。1977年在水稻生产上收到了显著成效。主攻中稻成了当年全省水稻大幅度增产的一个主要因素。双季稻问题的解决,也开始了在指导农业生产上,恢复和发扬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接着,在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采取多种办法,因地制宜,发挥优势,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改革耕作制度和生产技术。根据四川盆地冬暖春早和肥料、水利条件,确定四川的基本耕作制度是稻麦两熟制。在丘陵地区,总结推广南充地区“水路不通走旱路”的经验,在水源无可靠保证种植水稻的地方,改种旱粮;在川东和部分山区,总结推广“先发制旱”经验,玉米、红苕采取早种、厚土,套种小麦,避开夏季伏天的干旱。农田水利建设“分两步走”,第一步,在两三年内主攻小型水利和喷灌,抗御普

通干旱,第二步,兴建大型骨干工程,抗御较大的旱灾。1977年,全省喷灌快速发展。在发展喷灌中,由于要求过急,脱离实际,全面铺开,一哄而起,出现了一刀切、瞎指挥等形式主义的倾向,使许多地方投入不少物力、财力,但成效不大,造成浪费。1978年10月,又调整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方针,决定在宜牧地区实行以牧为主,多种经营;宜林地区实行以林为主,农林牧副全面发展的方针,以充分发挥民族地区的优势。

第三、恢复行之有效的农村经济政策。“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搞“批唯生产力论”、“割资本主义尾巴”,严重破坏了农村中许多行之有效的政策,经营管理十分混乱。1978年,对“文化大革命”前农村各项经济政策,进行了全面清理。对那些经过实践检验,确实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为广大群众欢迎的政策,都予以肯定和恢复;对一些不符合这个原则的,加以改正。在这个基础上,确定了12项具体政策,主要的是加强劳动管理,严格财务管理制度,保证社员分配兑现,减轻生产队和社员负担,发展养猪事业,兴办社队企业,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正当的家庭副业,等等。这些政策尽管多是旧令重申,但是在当时条件下,从实际出发,恢复和坚持这些政策,对于解决农业生产上迫切需要解

决的问题,初步理顺各方面的经济关系,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尽快地恢复农业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工业生产上,继续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重点是整顿企业。企业的整顿,又突出地整顿了领导班子,建立健全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管理制度,实行奖金制度,挖掘生产潜力,开展技术革新,逐步改善职工生活。大多数企业逐步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企业面貌逐步改观。到1978年,整个工业生产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产值大幅度上升。工业总产值与1976年相比,增长65.6%。

继续发展支农工业。一方面继续组织大型工业企业发展支农产品,扩建了宜宾化工厂,新建了树脂厂,扶持一批配套的小电石厂和塑料助剂厂,生产农用塑料产品;另一方面,兴办县、社工业,因地制宜地继续发展小化肥、小钢铁、小煤炭、小水泥和农机等“五小”工业。为鼓励“五小”工业的发展,采取了特殊的政策,把“五小”工业的利润分成,由对半分改为二八分,只上交二成。“五小”工业的发展,支援了农业生产,也促进了社队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到1978年,全省大型骨干化肥企业加上小化肥厂共生产化肥331.4万吨,使全省每公顷耕地的化肥施用量由1976年的300公斤,提高到1977年的405公斤和1978年的570公斤,均高于当时全国每公顷的化肥

施用量。1978 年底,全省小水电站达到 9700 座,装机总容量 61.2 万千瓦。社队企业中的工业企业占 62%,成为支农工业的一支新兴力量。

经过 1977、1978 年两年的努力,全省粮食增产 654.5 万吨(其中,1977 年增产 381 万吨,1978 年又增产 273.5 万吨),大大超过了历史的最好水平。林、牧、副业和棉、麻、丝、茶、糖等项,项项增产。农副业总收入 1977 年比 1976 年增加 12 亿元,1978 年又增加了 11.5 亿元。两年内全省工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分别是 34.7% 和 22.9%,均高于全国工业增长率 14.3% 和 13.5% 的幅度,1978 年达到 213 亿元。与 1976 年相比,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钢、生铁、钢材、农用化肥、汽车、拖拉机、塑料、合成橡胶等均增长一倍以上。两年的时间扭转了经济上的困难局面。

但是,这两年工农业生产的增长,对于整个经济发展来说,还是属于恢复性的增长。与此同时,在当时全国的“左”倾指导思想和“洋冒进”的影响下,四川也发生了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的急躁冒进的问题。1977 年底制定全省发展规划时,比照中央的规划要求,提出过一些不切实际的发展指标。例如提出了到 1983 年农业达到“三个九”(粮食 900 亿斤、化肥 900 万吨、灌溉面积 9000 万亩);工业要建成一个“大庆”、一个“鞍钢”、

“两个开滦”;3 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等等。为了追求这些目标,短时间内又上了一些项目,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和浪费。

2 国民经济的调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之后,为使国民经济发展有一个更好的条件,1979 年 4 月中央制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这个方针完全适合四川的情况。四川在 1977 年和 1978 年,工农业生产以及其他各个方面都有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的问题却相当突出。农业腿短,轻工业太轻,基本建设战线过长,人民生活上积累的矛盾很多。从 1979 年下半年开始,四川进行了国民经济调整工作。调整的具体任务是,大力发展农业,积极发展轻纺工业,压缩基本建设,改变重工业的服务方向,适当解决人民生活的某些实际问题。

农业在四川全省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历来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在四川的基础作用十分显著。解放以来,四川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还比较差,抗灾能力弱,农业基础仍然很脆弱。重视农业,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是四川经济工作中的艰巨的长期任务。四川经济调整中,把发展农业放在了首位。1979 年底,为

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发展生产,重新制定了若干具体政策,切实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扩大自留地和增划少量包产地;发展社队企业;因地制宜逐步调整农作物布局;实行生产责任制,等等,及时地解决了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问题,受到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1980年,决定拿出18万吨粮食,适当减轻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和其他一些长期低产、缺粮队的粮食负担,使这些地方的农民进一步得到休养生息。1981年,又决定在少数民族地区下放大牲畜给个人饲养。在水利建设上,认真总结了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该蓄的蓄,该引的引,该提的提,蓄、引、提相互配套结合的指导方针,坚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讲求经济效益的指导原则。同时,大力进行了整顿工作。针对以往基建工程中忽视渠道配套、盲目追求水库规模大、工程压低预算而年年追加投资等问题,分别采取了不同措施,予以解决。并且全面开展了整治病险工程的工作,使503座重要的水库大部分得到治理,一大批已成工程的渠系配套建设有了很大的进展,一些大型工程相继建成。1977年12月动工的、四川最大的调蓄径流水库—南部县升钟水库,总库容13.39亿立方米,到1984年7月完成左右干渠进口及溢洪道工程,并开闸放水。1977年1月开工的人民渠第七期工程中的大型囤蓄水库

—三台县鲁班水库,总库容2.73亿立方米,1980年6月建成。全省水利系统先后改革了管理体制,推行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水利建设走上了提高经济效益、稳步前进的发展道路。1979年以后,在中共中央提出的“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方针指导下,在粮食生产上,着重推广杂交良种、地膜覆盖、水稻半旱式栽培和科学用肥等措施,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同时,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发展经济作物,发展林业、畜牧业和乡镇企业的政策;1983年以后,又提出了重点发展一个基础(种植业)、两大支柱(畜牧业和乡镇企业)的思路,使四川农村开始向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方向迈进。为使轻纺工业有较快发展,在计划安排上,增加了轻纺工业的投资。轻纺工业基本建设投资逐年增加。其占全省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由1978年的12.2%,逐步提高到1985年的15.1%,达到11.96亿元,占四川解放以来36年轻纺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30.4%。全省轻纺工业总产值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的位次,由1968年的第十三位升到1985年的第六位。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对轻纺工业实行了“六个优先”的政策,即:原材料和能源供应优先、银行贷款优先、技术改造优先、基本建设优先、利用外汇和引进技术优先、交通运输优先,为轻纺工业发展提供了

有利条件。同时提出了充分发挥现有轻纺工业的潜力,积极增产质量好、有销路、原材料供应有保证的产品;因地制宜地发挥四川的资源优势,积极发展丝绸、皮革、食品加工、造纸等;要求有关部门搞好工商衔接,扶持城乡集体所有制企业,支持轻纺工业的发展。1980年前后的两、三年内,四川新建和扩建缫丝厂100家,丝织能力也有一定增长。1982年,全省缫丝能力达到35.99万绪,占全国的33%,绢纺锭1.45万锭,占全国12%,轻织机5638台,占全国的77%。1982年成立农、工、商、贸结合的四川省丝绸公司,以后经过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技术改造,四川丝绸工业开始由典型的原料型逐步向原料与成品结合型的方向发展。食品工业采取新建企业和利用原有基础进行挖潜、技术改造或扩建、改建,增加生产能力,获得较快发展。先后新建和改建了遂宁、绵阳、苍溪、泸州、合川、江津、涪陵、蓬溪、蒲江等21个罐头厂,罐头产量由1977年的3.06万吨,到1980年增加到5.56万吨,1985年增加到18.03万吨。制糖工业创建糖料基地,到1980年初步建成内江、资阳、简阳、攀西地区50多个甘蔗基地县,同时先后在德阳、大邑、铜梁、丰都、云阳、南充、遂宁、大足等地新建了9个日榨500吨机制糖厂,于1980年先后投产,共计新增日榨能力4500吨。从1978年到1984年,全省共新

建糖厂10个,扩建糖厂6个,共计增加日榨甘蔗能力9000吨。这是解放以来,四川建设机制糖厂最多的时期。川酒是四川食品工业中的一大优势产品。1979年以后,酿酒工业发展很快,饮料酒产量在1978年的基础上翻了两番多。到1985年,四川有酿酒工业企业4694个,产值达11.12亿元,生产饮料酒85.7万吨,比1949年增长12.4倍。1984年,川酒获国家金质、银质奖,部优、省优产品奖的产品有55个。其中,宜宾的“五粮液”、泸州的“老窖特曲”、绵竹的“剑南春”、成都的“全兴大曲”、古蔺的“郎酒”等5个产品,被誉为“五朵金花”。

为协调轻重工业的发展,调整了重工业的投资。重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在工业投资总额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86.3%,逐步下降以1982年的81.3%。1981年,四川确定重工业要围绕农业、消费品工业、国民经济技术改造、出口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等5个方面,转变服务方向。冶金工业以提高企业素质、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进行整顿,加强企业管理,进行技术改造,节约能源,降低消耗,提高产品质量,调整产品结构。同时,续建了攀枝花朱家包包铁矿,加快开发凉山小富矿。对重庆钢铁公司、攀枝花钢铁公司、长城钢厂、重庆特殊钢厂、成都无缝钢管厂等重点企业,进行了配套和技术改造,完善工艺,形成综合生产能

力。机械工业调整了服务方向,扩大了服务领域,到1985年,共开发新产品2510种,除了保证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需要外,为纺织、食品、包装等轻工业和农村多种经营服务的新产品有800多种。同时,为轻工、市场提供了20个大类、230多项轻工机械装备和10大类、160多种日用机械产品。国防科技工业实行“军民结合”的方针,从单一研制生产军品转向军品民品结合研制生产,产品结构有了较大的调整。到1985年,开发生产了500多种重要民品,有200多种形成了批量生产能力。在这个期间,在军品生产任务大量减少的情况下,由于发展了民品生产,国防科技工业总产值仍以年平均15.2%的速度持续增长。整个国防科技工业企业民品产值占该系统的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80年的13.4%上升到1985年的44.3%。电子工业从以生产军品为主逐步转轨,为国民经济各部门和人民生活服务的民用产品大幅度增长,到1985年,民品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0%。民品产值占整个电子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23%上升到1987年的72.8%。化学工业也开发了不少适应市场需要的新产品,如纺织印染助剂、纸张增强剂、多种粘结剂、感光材料、录音录像磁带、保鲜剂等。在此期间,开始了对三线企事业的调整改造。

从1979年开始,四川在清理基本

建设在建项目的基础上,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对不具备条件或暂时不具备建设条件、不属于当前经济建设急需的222个项目,决定停建或缓建。1980年,根据国家计划安排,又停、缓建一批建设项目。1979年到1981年,全省停缓项目共403个,其中停建136个。同时,压缩在建工程投资11.78亿元。基本建设拨款占全省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31.2%,下降到1982年的12.2%。控制基本建设规模后,加快了在建项目的建设速度。这个期间,有两个大型矿井建成投产,有10个大中型项目相继建成。在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的同时,还调整了投资方向。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加强了对现有企业的改建、扩建和企业的技术改造,支持大中型骨干企业的新工艺、新技术和节能项目。还适当增加了对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和市政建设等方面的投资。

四川从1979年至1982年对国民经济的集中调整,取得一定成绩。特别是根据过去经济调整的经验,在调整经济比例、控制投资规模中,根据不同情况,逐步压缩,使经济发展没有大的起落,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但是,一次性的集中调整毕竟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而且,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不平衡总是难以避免的。以后,又对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不协调问题进行了再调整。

(三)经济体制改革从试点到全面展开

1978年第四季度,四川在国民经济基本恢复的基础上,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改革与经济调整同步进行,相互促进。

四川解放以后,同全国一样实行了高度集中的、以行政管理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解放后恢复国民经济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的具体条件下,是必要的,起过积极的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体制不适应生产力发展客观要求的不少缺陷和弊端逐渐显露出来,生产队和工商企业没有自主权和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宏观和微观经济效益都很低等等,严重阻碍生产力的继续发展。从1978年第四季度开始,四川率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改革先在农村开展,接着在城市进行。以后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改革逐步深入、全面展开。

1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四川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组到包产到户)开始,相应地进行了人民公社体制的改革、县级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和市带县体制的建立。1984年起,按照中央的部署,进行了农村第二步改革。

从1978年冬到1982年底是以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农村第一步改革。四川最早实行联产承包

责任制的是广汉县。1977年秋,广汉县委发现西高公社的一个生产队暗地里实行“包产到组”,社员生产积极性很高,粮食连年增产。1977年底,广汉县委决定在金鱼公社试行“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办法收到很好的效果。当年全公社粮食增产20.6%,亩产增加150斤,搞的好的队亩产增加250斤。1978年11月,省委在全省推广金鱼公社的经验,“包产到组”责任制在全省农村迅速推开。在农村多种经营和工副业生产上,总结推广了新都县实行的包产包工包成本到专业队、专业组、专业户、专业工的“四专一包”责任制,这就为后来农村专业户的出现和发展打下了基础。“包产到组”在过去曾经多次出现,又多次受到批判,实际上成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个“禁区”。在全省普遍推广“包产到组”,突破了“禁区”,在农村改革中跨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但是,这个突破,并没有从思想认识上完全突破责任制同所有制是相联系的传统观点,仍然害怕“滑到包产到户”上去。在1979年初,允许在一部分山区的“吊脚户”(居住极为分散的农户)实行包产到户,但为数不多。1980年下半年,省委提出了全省分三类地区建立和稳定生产责任制:在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实行包产到户;丘陵地区实行包产到组,定额计酬;平坝和城市郊区在生产队统一经营的前提下,实

行分项专业承包。

“包产到户”比较适合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它在农村星星点点出现后,就为农民群众所接受,受到欢迎,并且逐渐发展开来,形成了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1980年,蓬溪县县委推广该县群利公社8个生产队1978年种小春把土地包到户、大旱之年增产24.9%的经验,在一个县公开实行了包产到户。包产到户责任制又进一步发展为“包干到户”,比包产到户更直捷简便。农民群众称它是“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转弯;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个人的”。

1981年2月3日,赵紫阳到四川视察工作时,针对他在1980年2月离开成都时的讲话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包产到户只是一种责任制形式,不涉及所有制问题。我在离开四川时曾经说“大田作业包产到组作业,多种经营实行四专一包,都边到了,到此为止。可能束缚了你们,现在不要受这个束缚了”。他还指出,四川在建立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问题上落后了,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迎头赶上去。从四川全省的情况看,过去这一年里,基本上实行是大田生产包产到组,水(田)统旱(地)包,小段包工等形式的生产责任制。1981年省委作出决定,在实行责任制问题上,各个生产队采取什么办法,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由群众民主讨论决定。此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

的生产责任制在全省迅猛发展。到1981年底,全省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46.4%,包干到户的占31.4%。此外,包产到组的占7.2%,水统旱包占8.6%,还有五定小包工、包口粮田、专业承包等形式。1983年春,全省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迅速发展,占到生产队总数的94.3%,成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主要形式。由此形成了有统有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村合作经济体制。从这以后,围绕着处理统与分的关系、解决土地承包与转包、建立健全承包合同等方面的问题,采取一系列措施,逐步完善和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土地分户经营,农民有了生产上的自主权,在客观上提出了要彻底变革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实行“政经公开”。1980年,广汉县向阳公社在全省和全国率先进行了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改革的试验。向阳公社改革的内容是:改“政社合一”为党政分设、政企分开。改公社为乡,成立中共乡委员会、乡人民政府和乡合作经济组织;改生产大队为村,改生产队为农业生产合作社;改干部任命制为选聘制,改工人推荐制为招考制;改革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大队合作医疗站改为村卫生所,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社员看病吃药,根据各队经济能力,由群众讨论决定,分

别实行全报销、半报销或全部自费的办法。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收到良好的效果。1981年省委决定在新都县石板滩公社、新民公社、邛崃县桑园公社继续进行试点。1982年,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每个地、市、州都在一个县选择两三个公社进行试点。到1984年底,全省8559个公社实现了体制改革、建立了乡人民政府8548个、镇人民政府18个;75923个生产大队改为村,选举村民委员会75479个。

为适应人民公社体制的改革,加快县级经济的发展,改革县级经济管理体制也势在必行。1979年起,广汉、邛崃、新都3个县在省委的支持和指导下,先后进行县级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到1981年春,省委正式决定上述3个县为综合改革的试点县。1982年1月,又扩大到28个县,即每个地、市都各选一个县试点,进行多点、多模式的试验和对比。1983年4月,在总结各试点县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县工作要点》,进一步指明了改革的方向。《要点》把综合改革的内容归纳为稳定、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工商企业的经营管理形式;全面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逐步改革干部管理制度和劳动人事制度;逐步改革工资奖励制度;进一步改革流通体制;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发挥各种经济杠杆的作用;建立健全农村科学技术工作

体系和培养农村建设人材的教育体系;依靠群众力量,全面搞好农村建设;搞好整党,加强社会主义思想建设等10个方面。要求“要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总目标,抓紧农村的经济结构改革、体制改革和技术改革,破除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破除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在改革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切实可行的制度、章法。”由此,试点县进一步扩大,到1985年底已有35个县。试点县的经济搞活了,生产发展速度加快,经济效益提高,群众生活也有显著改善。

为促进县级体制改革,加快城乡经济的发展,从1983年开始逐步实行市领导县(市带县)的新体制。经国务院批判,于1983年3月,撤销了永川地区,地区所属县划归重庆市管辖,撤销温江地区,其所属各县划归成都市管辖,原泸州市改为地区级市,从宜宾地区划出5个县由泸州市管辖;1983年8月,设立地区级德阳市,成都市、绵阳地区所属5个县划归德阳市管辖;1985年,撤销绵阳、乐山、内江地区,设立5个地区级市,即绵阳市、乐山市、内江市、广元市、遂宁市。全省实行市带县体制的县达到总县数的47.6%。各市都从本地区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多种措施,扩大各县经济管理权限,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和农副产品

流通,推进农村全面改革,加强科技支农,增强县级财政活力。德阳市从1984年起,作出了3条决定:市级各部门集中精力搞好城市工作,为各县提供各方面的服务。市级各部对各县的有关部门,只从业务上进行指导,县里的事情让县里自己去办;逐步下放权力。先后把计划审批、税收减免等属于市的权力下放到县;除中央和省已规定的负担之外,市里不开任何口子,不把市上的负担转嫁给县上。

实行市带县体制是改革城乡分割、工农分离的城市经济体制,探索发挥城乡优势,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尝试。这种体制实施以来,在城乡沟通,发挥城市优势,发展横向经济联系,推动城镇基础设施的建设,城乡经济共同发展等方面,已经取得显著的成效。全省市带县的城市,普遍建立了农贸中心、农副产品和工业品批发市场,实行产销联营,为县(区)提供“窗口”、科技、信息和服务设施等。到1985年底,仅成都市在各县建立的科技咨询服务的分支机构有84个,科技应用技术协作网达200多个,组建企业联合体352个。据11个市的统计,1985年工农业总产值达548.28亿元,比1984年增长14.94%,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1.74%,财政收入占全省财政收入的80%。乡镇企业658210个,比1984年增长51.4%。工业总产值106.4亿元,比1984年增长62.18%,

总收入95.24亿元,比1984年增长73.92%。市带县体制实施不久,在理顺市与县的关系等方面尚还存一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1984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部署,四川开始进行农村第二步改革。

农村第二步改革是以取消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为主要内容,目的是处理好农民同国家的关系,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调整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方面,对粮食,取消了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的办法。四川定购的基本作法是,根据全省粮食的产需情况,参照上年度的收购情况,同各地协商确定定购数量,与农民签订定购合同;农民完成定购数量多余的粮食,可以到市场销售。生猪取消派购后,适当提高了收购价和奖售饲料粮数量,实行合同订购和自由交易。棉花、油料除合同定购外,还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搞好购销。在农村产业结构方面,按照市场需求和当地资源优势、经济条件,开始进行了调整的初步工作。

2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四川在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进行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的工业体制改革开始,与此相联系地进行了中心城市综合改革和流通体制、财政

与金融体制、计划、基建和价格管理体制的改革。从 1983 年 7 月起,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进行了第一步和第二步利改税的税制改革。1985 年,按照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精神,进一步开展了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改革。

(1) 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的工业企业体制改革 1978 年 10 月,在重庆钢铁公司、成都无缝钢管厂、宁江机床厂、四川化工厂、新都县氮肥厂、南充织绸厂等 6 个企业开始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办法是:规定企业增产增收的目标,在年终实现目标后,企业可以提取少量利润,职工个人可以得到一定的奖金。办法简单,试行 3 个月,效果较好。

1978 年底,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于 1979 年 2 月,制定了《关于扩大企业权力,加快生产建设步伐的试点意见》(简称十四条),主要特点是:实行计划利润留成加超计划利润分成,或基数利润留成加增长利润分成。主要的内容是:规定企业必须承担的经济责任,规定了企业在生产、财务、供销、外贸、劳动工资和人事方面的自主权,企业折旧基金的留用比例,由原来的 40% 提到 60%。确定以这个办法在 100 个企业进行试点。1979 年试行的结果表明,这个办法的好处在于初步地把企业的责、权、利结合起来,把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这三者利益

结合起来了,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工业总产值、实现利润、上缴利润等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普遍高于非试点企业。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主要的是,扩大给企业的权力还比较小,实现计划利润留成加超计划利润分成办法,在确定企业的计划利润时“讨价还价”,计划迟迟定不下来。实行基数利润留成加增长利润分成办法,由于先进企业的利润增长潜力相对地比后进企业小,因而,留利的比例小,出现了“鞭打快牛”的弊病。

在调查研究、总结试点实践经验,充分肯定“十四条”的基本原则和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的基础上,1979 年 12 月,又制订了《关于进一步搞好地方工业企业扩大自主权试点工作的通知》(简称十二条)。“十二条”的主要特点是把“十四条”规定的计划(或基数)利润留成加超计划(或增长)利润分成,改为全额利润分成。分成比例核定后,原则上 3 年不变。新规定的主要办法有:规定企业利润留成资金建立 3 项基金,即生产发展基金、集体福利基金、职工奖励基金,企业能够用自己的力量解决的挖、革、改项目,以及危房改造、职工宿舍建设等,由企业自行决定,报主管部门备案,企业可以按照国家计划 and 市场需求确定生产计划和产品结构;在国家规定的价格浮动幅度内,企业有权决定产品价格。从 1980 年起,在已经按“十四条”进行试

点的 100 个企业中,选择 52 个企业试行,其余的企业加上新批准扩权的企业共 318 个,仍按“十四条”办法继续进行试点。经过 1980 年的试验表明:“十二条”比“十四条”使生产经营好的企业留利多一些,更有利于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但是,在制订计划时,仍然在分成比例多少上面争执,更为主要的问题,按照“十四条”或“十二条”执行,企业都不承担亏损责任,只负盈不负亏,在责、权、利结合上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从 1980 年起,又选择了 5 个企业,进行了新的试验,制定了《关于在五个工业企业中进行自负盈亏试点的通知》(简称二十条)。这 5 个企业是:四川第一棉纺织印染厂、成都电线厂、重庆钟表工业公司、重庆印制三厂、西南电工厂(简称老五户)。主要办法是,把上缴利润全部改为国家征税(工商税、固定资产税和所得税。其中所得税采取一户一率的办法),并且把职工工资总额从成本中挖出来,由企业在税后利润中开支,使职工的物质利益与企业经营好坏挂钩。这种办法在实施中又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由于客观原因造成了企业之间“苦乐不均”的问题;二是一户一率征收所得税,不利于税制改革。1980 年 8 月,在“老五户”试点的基础上,又选择了宁江机床厂、内江棉纺织厂、自贡铸钢厂、宜宾化工厂、南充绸厂等 5 个企业(简称新

五户),进行新的试验。“新五户”办法的特点是,所得税实行统一税率,征收调节税。同时,职工工资总额仍然进入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企业之间的“苦乐不均”问题。“老五户”与“新五户”的办法,同“十四条”与“十二条”比较,企业的自主权进一步扩大了,责任也更重一些。但是,企业的自负盈亏,也只是相对的。

1981 年 8 月,在成都、重庆两市选择了 10 户利润在 20 万元以下的国营小型企业,按照集体所有制办法试行自负盈亏。具体办法是:把国营小型企业的上缴利润,改为按照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八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所得税,加收固定资产和国拨流动资金占用费,同时,对新增长的税额减半征收,税后留成的增长部分也减半上交主管局。

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到实行利改税,都是在于改革国家对企业的管理体制。这些改革,牵动到了企业内部的管理体制。因此,在进行上述改革的同时,对企业内部的管理体制也进行了改革试验。首先,在一部分工业企业中推行了首都钢铁公司的“包、保、核经济责任制”,从车间、科室、班组到职工个人,自下而上,层层包指标、包任务;自上而下保证完成任务所需的必要条件,按照指标、任务进行考核。在实践中,不少企业又创造了许多适合自己企业特点的责任制形式。

例如,一些大中型企业在内部划小核算单位,向分厂或车间下放部分经营管理自主权,运用经济手段调动基层生产单位的积极性,增强了企业的活力,提高了经济效益。其次,在企业工资奖励制度方面进行了多种形式的试点。有的采取职工奖金与上缴税利挂钩的办法,有的实行自费浮动升级制或浮动工资制,有的把工资分成几个部分随企业经济效益好坏而浮动的动态性工资结构形式;有的(主要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和个别全民所有制企业)试行“除本分成制”。这些改革办法,虽然尚有某些缺陷,有待改进,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职工吃企业“大锅饭”问题,调动了积极性。再次,一些企业根据自己的特点,对企业内部的组织机构也进行了改革,实行了厂长、总工程师、总会计师、总经济师“一长三师”和分权管理制,加强了经营决策、市场购销、技术开发、人才开发和信息等机构。到1981年,各类扩权试点的企业达到447个,产值得占地方工业总产值的70%,实现利润占80%,上交利润占90%。

从1982年第四季度开始,为进一步改革工业企业的管理体制,在全国试行工业企业利润包干的情况下,四川普遍推行了以盈亏包干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责任制,企业在完成包干任务后,可获得大部分超收利润。

1983年7月起,按照国务院的统

一部署,国营工业企业实行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对国营企业实现的利润,按一定比例征收所得税,税后利润再通过多种办法在国家和企业之间分配。1984年10月起,又实行了利改税的第二步,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合理调整了产品税税率,增设了资源税、增值税和几种地方税,在征收所得税后,区别不同情况征收调节税或承包费等,征税后的利润全部留给企业。利改税办法改进了四川“老五户”“新五户”的以税代利的办法,把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用法令形式固定下来,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2)流通体制的改革 流通体制改革同改革工业管理体制一样,于1978年四季度,从扩大商业企业自主权入手,改革商品的计划管理和购销形式,调整购销政策,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比重,改革流通领域的所有制结构,逐步建立市场体系。

商业企业的扩权试验,于1978年11月,首先在重庆百货商店、重庆饭店、成都市人民商场等3个企业进行。1979年3月试点企业增加到40个。1980年试点企业扩大为141个,其中88个企业试行“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交所得税”办法。试点企业的营业额、利润和上缴税收均有较大幅度增长。

改革工业品统购包销体制,把工业消费品分为三类,一类是计划商品(包括统购包销商品)、二类是平衡商

品(对市场和人民生活影响较大的商品)、三类是选购商品(即一、二类商品以外的其他商品),从1980年3月起,实行新的购销办法。对计划商品缩小范围,由原来的135种缩减为42种;对平衡商品,划出86个品种,由国家下达参考性指标,工商企业协商衔接计划,签订订购合同;对选购商品,由商业部门与生产企业协商选购。生产企业在完成计划和合同之后的多余产品,可以自行销售。这样一来,工业消费品统购包销体制,由原来的按照国家指令性计划收购与调拨,改为了以指导性计划为主,多种计划形式与自由购销相结合的体制。以后,又继续缩小计划商品的范围,扩大选购商品的范围,放开价格。1984年,又把选购商品的价格全部放开。

物资统分统配体制的改革首先从机电产品开始。1979年10月,在温江县召开的“一九八一年四川省机电产品订货会”,通过市场形式使产销双方直接见面,敞开订货,开展竞争,在实践上突破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能进入流通领域的传统观念。1980年,四川改革了单一的指令性统分统配物资的办法,把原来计划分配的356种物资,划分为三类品种,采取不同的办法。其中56种品种,由指令性计划分配,255种属指导性计划品种,实行合同订购;其余的45种及其他品种,在市场自由购销。这种物资供销的多种

形式,初步地开放了生产资料市场。以后,又逐步缩小了指令性计划的品种。到1985年仅保留了45种。

从大竹县开始的恢复供销合作社集体性质的改革。供销合作社作为集体商业,是农村的主要流通渠道。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在“一大二公”的“左”倾思想指导下,供销合作社通通改为全民所有制国营经济,影响了商品流通。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和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需要,有必要恢复供销合作社的集体性质。这项工作,率先在大竹县展开了。1981年7月,大竹县恢复了供销合作社的“三性”(即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改为集体所有制,换发股证,补发股红,吸收了一批新股,建立了社员代表大会制度,并在基层供销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县联社。供销合作社恢复集体所有制性质,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社论《改革农村商业的尝试》。从1981年11月起,四川在全省扩大大竹县的经验,到1983年底,全省基本上完成了恢复供销合作社的“三性”和建立县联社。1984年2月,重建了四川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1979年开始,对流通领域所有制结构进行改革。为改革流通领域所有制结构,四川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扶持和发展集体商业和个体商业。在集体商业方面,采取了减税让利、调

减公积金和增大企业留利比例、放宽集体企业的经营权、放宽集体商业的贷款限额、实行民主管理、改革分配制度等一系列措施,集体商业企业有了很快发展,从1978年的146万个,发展到1985年的1014万个。在个体商业方面,采取了下放审批权限、简化审批手续、建立摊贩市场、改革价格管理体制、放宽货源限制、银行贷款扶持、保护合法权益、建立个体劳动者协会等一系列措施,促使个体商业发展很快,从业者由1978年的25万人,发展到1985年的8458万人。四川流通领域所有制结构经过几年的改革,基本上形成了以公有制商业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和经营形式。1985年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2743亿元,其中各种所有制经济所占的比重分别是:全民所有制经济为9712亿元,占35.4%;集体经济为119亿元,占4.3%;个体和其他经济为5815亿元,占21.2%。

为适应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四川加快了商业批发体制的改革。1983年开始,先后把原属省管的二级商业企业下放给企业所在城市管理,统一由城市组织商品流通;在一些中心城市陆续建立贸易中心,推动批发商业实行开放式经营。新建立的第一批贸易中心有,1983年7月开业的“重庆农副土特产品贸易中心”,1983年8月开始的成都市“红

旗农副土特产品联营中心”,1984年1月成立的“重庆工业品贸易中心”。“中心”冲破地区、行业 and 所有制界限,来者都是客,实行展销、代储、代运等多种服务,执行国家计划价格及其指导下的多种作价办法。此后,在各个商业系统相继建立了一批贸易中心,到1985年共有贸易中心308个。与此同时,在城市建立了以国营商业、工业自销和集体商业为主体的多家批发体系,以城市为中心,由大型综合批发市场、城市各类专业市场、农村专业市场组成了批发市场体系,发展了联营批发、联合采购、跨地区跨部门产销联合等多种批发形式。经过上述的改革,基本上打破了独家经营的封闭和分配型的批发体制,初步形成了以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的、平行的、开放的商业批发体制。

(3) 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的改革

财政体制改革是要改革统收统支的体制,处理好国家与企业、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以及地方各级财政之间的分配关系。

在国家与企业之间,1978年开始的企业扩权,实行多种形式的企业留利,开始打破了统收统支的状态。随后,又进一步试行的国家征税、自负盈亏的试点,实行“一厂一税”、“统一税率”等以税代利的办法。1983年4月,国务院决定国营企业统一实行第一步

利改税办法。1984年10月,又实行第二步利改税办法。到1985年,四川的工商税收、财政收入、地方国营工业企业留利,均比1984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在中央财政与地方(省)财政之间,四川于1979年向中央建议,改变原来的统收统支办法,实行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经中央批准,从1980年起,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划分收支”即按照当时的经济体制所规定的企事业隶属关系,划分中央和省级财政的收支范围。在收入方面,分为中央财政的固定收入、地方财政的固定收入、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和调剂收入4类;在支出方面,分为包干支出和中央对地方专项拨款支出两类。“分级包干”就是按照上述划分的收支范围,以1979年实际收支数作为计算基数,凡是地方收大于支的,多余部分按一定的比例上交;支大于收的,不足部分从工商税中按一定比例留给地方,作为调剂收入。如工商税收全部留给地方仍然支大于收,不足部分再由中央财政给予定额补助。分成比例或补助数额确定以后,原则上5年不变。地方多收了可以多支,少收了就少支,自求收支平衡。

中央批准的四川的财政包干的办法是,除了地方的固定收入和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全部留归四川以外,调剂收入上解中央28%。这个办法从

1980年实行,由于这段时间正处于国民经济调整,国家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对财政收支影响较大,原定的包干基数不适应经济情况的变化。因此,1982年又在“分级包干”不变的情况下,把划分固定收入和调剂收入的方法,改为中央与地方全额分成的办法,即“总额分成,分级包干”。以地方收入总额的15%上解中央。1983年,又把中央向地方借款改为固定比例上交,相应地调整了全额分成的比例。1985年,在总结上述财政体制的基础上,国务院决定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新体制,对划分收入的方法和范围作了部分修改。但是,它们的基本原则、基本比例关系大体上是一致的。

在中央对四川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后,省对各市、地(州)、县进行了多种形式的财政包干的试点。1980年起对阿坝、凉山、甘孜3州比照中央的办法实行了包干,一定5年不变,并且规定收入增长全部留给各州,定额补助每年递增;1981年,在新都、广汉、邛崃3县进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试点;1982年,在支大于收的万县、涪陵、雅安3个地区实行“财政包干、差额补助”的办法,对温江地区实行以1982年收支预算为基础的“全额分成”办法;对大多数市、地、县实行“收支挂钩,增长(超收)分成”办法。从1983年起,对全省各市、

地、县全面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划分各级收支范围,确定收支基数,收入大于支出的部分定额上交,实际收入比基数增长的部分,省与各地、市另定比例分成;支出大于收入的部分,由省财政包干补助,超收全部留归地方。从1985年起,对部分县也试行“递增包干”的办法。

从“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体制实施的情况,可以看出,这种体制在调动各级政府当家理财的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益,适当增加地、县两级机动财力,加快地方经济的发展等方面有着显著的作用,同时,也存一些缺陷。无论是划分收支、划分税种还是总额分成,都没有彻底打破按隶属关系划分收支范围,从而,加剧了某些经济割据与地区封锁,助长了盲目建设与重复建设。因此,改革还需进一步深入,新的财政体制还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财政体制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建立健全乡镇财政,完善乡镇财政体制。从1984年起,全省各乡镇开始建立乡镇财政,到1985年底,90%的乡镇成立了财政所,管理各乡镇预算内和预算外资金,以及自有资金和其他资金。在加强了农村财政收支的管理,利用自有资金,发展乡镇的各项事业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从1980年起,还对基本建设投资制度进行了改革,先后对30个基建项

目实行了由无偿拨款改为有偿贷款的试点,投资金额共6.4亿元,占同期国家预算内拨款总额的10%。1985年全省预算内的基建项目共有2406个,投资金额8.94亿元,全部实行贷款制。

四川金融体制改革是从银行体制改革入手,改变国家银行垄断金融业务,并逐步扩展到国家银行系统以外的社会经济领域。四川银行体制改革是适应企业扩权的需要,在全国率先进行的。企业扩权后在生产、销售方面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和一部分自有资金(利润留成),可以用于自我改造和发展,同时也需要银行在信贷上给予支持。这就必然要促使银行的资金供应体制进行改革,以适应工业体制改革的需要。1980年,经总行和省政府的批准,四川的银行体制开始进行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改革信贷发放范围,开办中短期设备贷款。由过去只对企业发放短期性的流动资金贷款,扩展到对工商企业发放中短期设备贷款,用于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同时,还对旅游、科技、文教、卫生事业发放贷款,以及对居民购买商品住宅等消费性贷款。中短期设备贷款的期限,一般是1至2年,最长的不超过3年。中短期设备贷款的开办,增强了银行对国民经济的调节作用,支持了经济的发

展。

改革信贷计划管理办法,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控制’的办法。由过去信贷资金统存统贷的办法,改变为在不突破上级下达的差额包干计划指标的前提下,多吸收存款可以多发放贷款,各项贷款指标之间可以按规定调剂使用。这样,不仅调动了银行大力吸收存款的积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企业发展生产的资金需要。

改革利率制度,改革过去利率水平低、差别小的状况。在贷款方面,实行了加息和有条件浮动的制度,扩大了利率差别;在存款方面,对企事业单位存款付给利息,并开办定期存款,扩大了计息范围。

改革银行内部管理制度。加强经济核算,规定各级银行在自有信贷基金之外向上级银行上存或供用资金,均要计息,实行利润留成,即在银行每年实现的利润中,以一定比例上交和补充信贷基金的同时,一定比例留给银行,作为业务发展基金、职工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建立职工奖励制度。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从1980年起,先后恢复了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保险公司,建设银行与省财政厅分设。1984年6月,从四川省人民银行内分设出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由此逐步形成了以人民银行为首的国家银行体系。

(4) 计划体制和价格体制的改革

四川的计划体制改革是在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的推动下开始起步,对计划管理方法和指标体系作了一些适应性的改革。主要的有:

减少指令性计划指标,增加指导性计划指标,下放产品计划管理权。农业生产计划指标由原来的指令性计划调整为指导性计划,省管指标由46个减少为19个;工业生产计划指标由184个减少为145个,其中指令性指标只保留43个;国内商品收购指标由86个减少为40个,其中指令性指标只有22个;外贸收购指令性指标由111个减少为28个。

扩大市、地、州和省级各部门的基建、技改、利用外资和技术引进项目的审批权。自筹生产性基建总投资在500万元以下的项目和自筹非生产性基建总投资在300万元以下的项目,下放给有关的省级部门和市、地、州审批;技改投资在1000万元以下的项目由省级部门审批。500万元以下的项目由市、地、州审批。

下放物资计划管理权。省保留20多种统配物资计划,其中,除钢材、木材、水泥、有色金属和少数化工产品由省统一平衡之外,其余的物资由省一次安排下达给各地区和部门。

下放省属企业管理权。除了国防军工企业和科研单位以及需要由省统

一平衡调度的企事业单位之外,所有的省属企业基本上都下放给中心城市和市、地、州管理。

简化对企业的指令性计划指标,放开对企业内部产、供、销的计划管理。

四川的物价管理体制,按照中央的‘调整价格、放开价格、改革价格管理体制三结合’的方针,在价格结构体系和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初步的改革。

价格结构的调整 and 改革。四川根据国家规定,1979年,先后提高了煤炭价格,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猪肉、牛肉、羊肉、禽、蛋、蔬菜、水产品、牛奶等8种主要副食品的销售价格;1981年降低涤棉布价格、提高烟酒价格,降低化学纤维织品价格、提高棉纺织品价格,提高铁路货运、水运客货价格。

在调整价格结构的同时,四川还根据国家的规定,放开了工业小商品价格。1981年开始下放453种小商品价格;1984年下放335种小商品价格,同时下放了部分小药品、医疗器械和全部化学试剂、玻璃仪器等456种的价格。小商品放开了,由企业定价,扩大了市场调节的范围,促进了小商品生产,改善了供求状况。

1984年起,四川对钢材、生铁等生产资料实行“双轨制”价格,计划内的部分执行国家牌价。计划外的部分

在国家牌价基础上加价20%以内浮动,由省物价部门制定指导价格,购销双方在指导价格的浮动幅度内,协商定价。

四川价格管理体制的改革,主要是改革价格管理权限,改革国家计划定价的格局。1980年以后,除了重要工业品和主要农产品的定价权仍由国家掌握之外,逐步把小商品和三类农副产品的价格管理权限,下放给市、地、县和企业;1985年,又把猪肉、蔬菜等鲜活产品价格放开。由于价格管理权限的改革和开放式流通体制的形成,出现了多种价格形式。相应的初步建立了多种价格管理形式,除了国家定价之外,还有指导价格和市场自由价格。到1985年,在全省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中,国家定价占34.6%,国家指导价占34.9%,市场调节价占30.5%。

3 重庆市的经济体制综合改革 企业扩权的逐步开展,推动着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向综合改革的发展。1983年2月,经中央批准,重庆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试点。把重庆视同省一级计划单位,在重庆市实行国民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规划,在国家计划中单列,直接纳入国家计划平衡,然后加到四川省的计划数中;并赋予相当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国家计划会议和全国性的经济会议,重庆市均视同省一级参加。在对外贸易、土地征

用、基本建设项目审批、出口商品检验等方面,重庆市均有相当省的权限。对引进外资给重庆市以比省大一些的审批权。

在试点中,重庆市以搞活流通为纽带,搞活企业为中心环节,发挥城市多功能作用为主导方向,开始打破了多年以来城市工作的沉闷局面,经济效益连年大幅度上升。试点的第一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比1982年增长11%,为计划的107%,地方财政收入增长84%,为预算数的106%。工业产值从1983年到1985年的3年间,年递增率超过14%,其中军工企业总产值年递增38%。1985年城乡集市贸易成交额达96亿元。全市有73个各类贸易中心,重庆工业品贸易中心的辐射面遍及24个省、市、自治区的3000多家企业,成交额72个亿元,有农副产品批发市场20个,贸易货栈26个,1985年收购地方产品164亿元,其中45%销往省内市外,15%销往省外。

从1984年4月起,四川因地制宜地推广重庆的改革经验,加快全省城市改革的步伐。在成都市,除计划单列一项以外,原则上把省所具的有经济决策权、经济管理权下放给市或由市代行。1984年执行的有:总投资在300万元以下、引进技术设备包括利用外资用汇在100万美元以下的技术项目审批权;设备贷款在50万元以下

的审批权;减免工商税的审批权;城市建设征用土地的审批权。同时,在其他省辖市,除计划单列和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两项外,试行重庆市的其他改革办法。

4 横向经济技术协作的发展 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过程中,一些企业打破部门、行业、地区和所有制界限,多渠道、多层次地发展横向经济技术协作,通过扩散零部件或产品生产、组织优势产品“一条龙”生产、引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合资开发和产品补偿、联购联销、农工商产供销联合等等多种形式组成了专业协作和经济联合体。1980年7月,国务院作出《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推动了四川工业企业经济技术联合的加快进行。到1981年底,全省成立的各种经济联合体有400个,参加的企业1500个。1982年5月,四川决定,发挥成立的各种经济联合体有400个,参加的企业1500个。1982年5月,四川决定,发挥工业城市的经济中心作用,推进经济技术联合,给各市、地较大的统筹协调权力,并以重庆、成都、自贡3个市为中心,逐步向外扩展。1984年6月,召开了四川省经济技术协作邀请会,会上签订了经济技术协作项目887项,总金额达5亿多元。以中心城市为主组建的经济联合体迅速发展。到1985年,成都市的企业联合体已达到352个,参加联合的企业有1000多家;

重庆市的企业联合体 267 个,参加的企业 3000 多家;自贡市有企业联合体 17 个,参加的企业 92 家。其他中小城市,也有了许多各种形式、各具特色的经济技术联合体。以联合体为主要形式的经济技术协作的发展,促进了资金、技术、物资和人才等要素的合理交流和优化组合。

横向的经济技术协作,不仅在省内,而且省际间展开。1984 年 2 月,四川与云南、贵州和重庆市三省四方第一次经济协调会,经过协议决定建立定期召开经济协调会的制度。1984 年 6 月召开的四川省经济技术协作邀请会,有 27 个省、市、自治区和深圳等经济特区的代表以及省内各方面的代表 1500 多人参加,初步达成协议 887 项。1985 年 4 月,四省(区)五方(新加进西藏)经济协调会第二次会议召开,制定了“自力更生,多方联合,国家支持,共谋振兴”的指导方针,商讨了“七五”期间共同关心的重大建设项目规划,洽谈了经济技术和物资协作,加强了四省(区)五方之间的经济合作。在四省(区)五方经协会的推动下,川滇毗邻地区的 11 个地、市、州建立了协作片,1985 年 7 月召开了首届年会,达成协作项目 202 项,成交金额 5000 多万元;川黔接壤的 11 个县也建立了协作网,进一步沟通了物资交流,发展边区协作。到 1985 年,四川与 28 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经济联系,达成经济

协作项目 2500 项,协进资金 5 亿元,协进协出各种物资总金额 13 亿元。并与上海、江苏、辽宁等省市签署了长期经济、技术、文化等多方面的合作协议。引进资金,建设资源开发性项目已有 40 多个。如什邡、绵竹、邛崃等 3 县的 3 个磷肥厂引进资金开发固体磷铵,凉山与上海合作开发小钢铁和小有色金属,乐山集资扩建大渡河钢厂,达县地区集资改造达县钢铁厂和万福铁厂,绵阳市集资改造涪江钢铁厂,宜宾、万县、涪陵地区集资改造小铁厂,雅安地区引进资金开发大理石,泸州、绵阳、宜宾等地市引进资金发展名优曲酒,等等。

为发展一线和三线地区的协作,1985 年 6 月,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在成都召开了一、三线结合洽谈筹备会。8 月在兰州召开正式洽谈会。四川为参加两次洽谈会,就资源开发、技术交流和军民结合等方面提出并汇编了四川与一、三线地区联合协作的项目 937 项,其中,经济协作项目 441 项,技术协作项目 496 项。在洽谈会上,介绍了四川与兄弟省、市、自治区开展横向联合协作的广阔前景,发布了 10 条优惠政策。经过洽谈,四川与一、三线地区签订正式协作项目 51 项,达成意向性协议 159 项,协进协出资金(主要是协进)2 亿元。这些联合协作,加快了四川地方工业和三线企业的发展。

5 三线企事业的调整与改造 四川的三线建设,意义重大,成就巨大。经过三线建设,国家在四川已经基本上建立起了门类比较齐全、生产和配套能力较强、实力较为雄厚的现代工业体系,奠定了四川的工业基础。三线建设建成的大中型企业占全省大中型企业的一半以上,成为四川工业发展中一支实力强大的骨干企业。到1976年,四川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总额已增加到三线建设前的4.43倍。从而使四川的经济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化。全省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由三线建设前的1963年的57.2:22.3改变为1976年的43.2:8.2:9。经过三线建设,既大大地改变四川省内的工业偏集于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南地区的布局,也调整和改善了的全国的工业绝大部分偏集于东北3省和沿海地区的布局。三线建设开始了全国工业生产力布局大规模地向内地一些地区纵深展开,在四川,开始了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由少数大城市向省内其他地区展开。三线建设遵循了新建生产企业靠近原材料产地、能源基地、消费市场,沿交通干线、依托城市合理布局的原则,形成了门类各别、各具特色、各有侧重、相互配套的工业基地,依托各中心城市,呈群落式、渐近式布局,散布于全省各地,充分发挥各地区的资源优势,提高经济效益,促进了全省经济的发展。

特别是对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和偏远山区的开发,打破这些地区的传统封闭状态,改变经济、技术和科学文化落后面貌,增强民族团结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促进了这些地区农村、商业和地方工业的发展。经过三线建设,在四川初步建成了国防科技工业门类比较齐全,人才、知识、技术密集,能够研制和生产多种军工产品和民用产品的综合科研与生产的战略后方基地。核工业从无到有,宇航等尖端科技工业飞速发展,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能够为国内外用户提供发射卫星的优势服务。三线企事业单位培养、造就和集中了一大批各专业的科研、生产技术人员,并取得了大量的科研成果。先后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块大规模集成电路、2048位线陆电耦合器件等,其中不少项目填补了国内空白,有的达到国际水平,受到国际上的重视。

三线建设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较短时间内,集中进行的大规模建设,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强调政治需要,加上其他原因,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失误,有的问题在发展建设过程中有所发现,有的问题则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变化逐渐显露出来。三线建设是以战备为目标,建设项目中国防科技工业项目及其配套协作的项目成为建设的中心和重点,从而决定了它的投资结构。三线建设时期的“三五”和“四五”计划,重工业投

资占工业投资比重分别达到 95.3% 和 90.1% ,在重工业内部 ,军工、机械和冶金 3 个部分的投资占重工业投资比重又分别 63.8% 和 57.2% 。由此 ,对农业、轻工业的投资相对较少。这种不合理的投资结构 ,造成了农业、轻工业长期落后 ,同重工业发展不相适应的局面。三线建设受“先生产、后生活”的影响 ,对城市公用设施和职工生活福利设施建设投资安排很不够 ,长期欠账很多 ,给职工生活、生产带来了很多困难 ,严重地影响了职工队伍的稳定和生产、工作积极性。三线建设项目的具体布局 ,为着适应现代战争的特点 ,执行了当时提出的“靠山、分散、隐蔽”方针 ,一部分项目布局过于分散 ,钻山太深 ,远离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 ,信息不灵 ,交通不便 ,给生产、科技协作和职工生活造成很大困难。还有些项目选址不按基建程序办事 ,质量差 ,这些项目建成后长时期内无法正常生产和工作。三线企事业单位在管理体制上 ,条块分割 ,企业封闭 ,大大影响了经济效益的发挥。

进入 80 年代以后 ,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实行改革、开放方针 ,1983 年 11 月 ,中央决定对三线企业事业进行调整改造 ,确定了“三线建设调整改造 ,发挥作用”的方针。对军工企业提出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方针。同

年 12 月 ,成立了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 ,办公地点设在成都。1984 年 2 月开始 ,对四川三线企业事业进行调查 ,拟定调整改造规划。1985 年 6 月 ,国家计委正式批准了四川省三线企业事业第一批调整方案 ,随即组织实施。第一批调整项目共 39 个 ,主要是一些钻山太深、布局过散、厂址存在严重问题 ,或至今无产品方向 ,生产无法维持下去的企业事业单位。对这些企业事业 ,按照专业化、社会化的原则 ,扬长避短 ,分别不同情况 ,采取不同办法 ,合理调整布局 ,以充分发挥企业事业的潜在优势 ,提高企业事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原地址无法生存的企业 ,采取迁并或迁建的办法 ,依托中心城市 ;地址偏僻、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科研院、所 ,到中心城市设立技术开发部 ;产品无方向的企业 ,就地改善条件 ,调整产品方向。国务院和四川省政府制定了特殊政策和措施 ,支持三线企业事业的调整。1985 年调整工作刚刚开始 ,调整中涉及的许多问题 ,诸如体制、生产力布局等等 ,还需在实践中继续研究解决。

四川三线企业中 ,重头的是军工企业。三线企业事业调整改造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调整产品结构。对于军工企业来讲 ,就是要形成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产品结构 ,面向四个现代化建设 ,既服务于国防的需要 ,又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1984 年 8 月 ,国务

院提出三线企业的很大一部分要搞成军民结合型的工厂,要选一批军工企业加以充实,承担“七五”、“八五”的建设任务。四川也提出要发挥军工在振兴四川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把发挥军工优势与研制国家急需的重大技术装备结合起来。1985年,四川军工企业开始参与研制了生产100万千瓦级核电站成套设备和60万千瓦级火力发电成套设备研制的前期准备工作,并将船舶工作的重庆重型铸锻厂改造转产铁路敞车。到1985年底,已有82.2%的军工企业拥有自己的“支柱”民品或稳定的配套产品,有61%的企业基本上转向了民品生产。四川军工企业共试制生产了汽车、摩托车、电冰箱、洗衣机、轻纺机械、民用船舶、仪器仪表等27个大类500多种主要民品,其中有112种获得国家金质银质奖、“金龙”奖或被评为省、部优质产品。军工企业为民用工业转让技术、技术改造、进行技术咨询服务、扶持地方企业和乡镇企业等方面都作出了贡献,取得很好的成效。中国四川省新光工业进出口公司,先后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家企业,建立了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关系,生产的机械、电子、化工等产品销往美、英、联邦德国及东南亚一些国家;从日本、南斯拉夫引进了摩托车、电冰箱生产技术,中外合资办起了出租汽车公司和羽绒制品厂。在三线企事业的调整改造中,四

川军工企业在军民结合的道路上,开始迈开了步伐。

(四)对外开放的逐步开展

四川的对外开放,主要包括对外经济贸易和旅游事业。在对外贸易方面,又包括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劳务输出等。

1 对外经济贸易

(1)对外贸易 建国以来,四川的对外贸易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1950年到1958年,四川外贸出口持续增长。1959年到1978年,外贸出口有时大起大落,基本上徘徊不前。1979年以后贯彻“对外开放”方针,外贸出口迅速增长,外贸工作有了较大的发展。

四川的对外贸易,重点是出口贸易,为使出口商品适合国际市场的需要,保证充足的货源,首要的是不断开发新商品,大力发展出口商品的生产。从60年代后期开始,陆续在一些地区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到1985年,全省已经建立起农副产品出口生产基地18个,部分出口工业品生产专门厂、专门车间22个。与此同时,采取了多种经济措施,扶持和促进出口商品的生产。这些措施有:提供出口工业品专项贷款、短期外汇贷款、扶持出口工业品生产专项外汇、出口商品生产周转资金、新产品试制费和引进良种、良畜、样品、技术培训费用等。由

此,增加了出口货源,逐步形成了一批优势出口商品,扩大了市场。1984年,现汇出口的国家 and 地区达到15个,外贸出口总额由1979年的2784万美元,增长到21674万美元。出口商品的门类已达20多种,特别是化工、机械、轻工、丝绸等几个大类产品出口,从无到有,改变了过去以农副产品及其初级加工品为主的出口商品构成的状况。为适应对外贸易的发展,1979年成立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四川省分会,主动邀请和接待了来自美国、日本、法国、联邦德国、加拿大等几十个国家和港澳地区的经济贸易界人士,组织了四川一些公司到美国、日本、法国、秘鲁等国家和港澳地区展出商品和接待大批外国厂商来四川展出商品、进行技术交流。据不完全统计,1984年和1985年,仅省外贸部门派往国外进行考察、洽谈贸易和举办展览的团、组就有72批共420人。

为发展对外贸易,1980年5月,海关总署设立重庆海关。1984年10月,成都分关成立,1985年3月改称成都海关。从此以后,四川进出口货物可在成都、重庆两地报关。

(2)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 四川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开始于50年代。按照中央的统一安排,四川接受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批援建项目及其派遣的专家传授技术、培训技术人

员。1960年以后,这些国家的援助中断,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停止。1973年以后,中共在四川安排了一些新的引进项目,主要是四川化工厂等3套化工设备。1979年以后,四川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有了较快发展。1979年开始实行“三来一补”,即来样、来料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1983年,开始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举办合资经营和合作经营企业。到1985年,通过“三来一补”利用外资6566万美元;举办合资经营和合作经营企业28家,利用外资735万美元;利用国外贷款8511万美元;引进技术、设备384项,其中建成投产的143项,占引进项目总数的37.2%。据对投产单位的典型调查,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的单位一般都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3)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劳务输出 四川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从70年代开始承担国家安排的一些技术对外援助项目,到80年代才逐步发展起来。四川于1980年成立了第一家对外承包工程的机构—中国四川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四川省的交通厅、农牧厅、建筑工程总公司等与国家的各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合作承担了一部分对外承担工程和劳务合作项目,业务范围和承包领域逐步扩大,开拓了国际市场。由于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对外承包要做到“守约、保质、薄利、重义”的基本方针,并且以自己的技术实

力、吃苦耐劳和顽强拼搏的精神,树立了良好的信誉。从1980年到1985年,四川与近30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项目的合同218个,合同总金额2.73亿美元,先后派出劳务技术人员10862人次。

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展,四川的对外交往多渠道、多层次、多领域地迅速发展,经济、科技、文化交流合作日益增多。从1979年到1985年,四川先后聘请外国文教专家166人,教师265人,短期讲学的专家、学者1132人,帮助大专院校开设新课题96门,建立新专业学科43个,新建实验室40个,合作科研项目18个。四川派出800多名留学生、进修生和研究生及300多名自费留学生。四川与外国一些城市发展友好关系,建立友好城市,到1985年底,先后有:四川省与美国华盛顿州、密执安州,与日本广岛县、山梨县,与朝鲜平安道建立了友好省州(道、县)关系;成都市与法国蒙彼利埃市,南斯拉夫卢布尔雅那市、奥地利林茨市、日本甲府市,重庆市与美国西雅图市、法国图鲁兹市,乐山市与日本市川市分别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友好城市的建立为经济、技术、文化交流与合作开辟了新的渠道。到1985年,对口友好州(县、道)市之间,先后签订了合作交流协议38项,其中已付诸实施的有21项。1985年10月,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成立。还有6个国家及

港、澳地区设立了驻成都的商社。

2 旅游事业 四川山川形胜,旅游资源十分丰富。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结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景区、景点,吸引着众多的游客。四川的旅游活动开始很早,但是,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旅游业,开展国际旅游,则是在四川解放以后才开始,特别是在贯彻对外开放方针以来才迅速发展起来的。

1978年下半年,成都、重庆开始接待国外旅游者。1979年,长江三峡、峨眉山两条旅游线路开放,对外开放的市、县增至13个。接待国外旅游者的人数逐年增加,1978年只有2500人,1979年增加到1.7万多人,1984年7.2万多人,到1985年增加到10.2万多人。

为发展旅游业,初步开发了旅游资源。1980年制定了开发峨眉山风景区的总体规划。1981年对全省风景名胜区开展了调查和评价,并上报国务院。1982年国务院颁布的首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44个,其中四川有6个。它们是: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峨眉山风景名胜区、黄龙—九寨沟风景名胜区、剑门蜀道风景名胜区、缙云山风景名胜区与长江三峡风景名胜区。1985年全省风景名胜资源汇报,全省148个县中有风景名胜区(片)119个、景点546个。主要的有:自贡恐龙群窟、兴文石林、蜀南竹海、西昌邛海、螺髻山与大足、安岳石

刻等,还有众多的宗教文化胜地与名人胜迹。各景区(片)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整修、维护和保养。

与此同时,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机构的建设也逐步开展。各地旅游部门先后新建了一批宾馆、饭店。到1985年,全省经营国际旅游业务的旅行社已有15家,设备较好的床位2000多张。开办了旅游学校和专业培训班,培养了一批业务人才,初步形成了一支从事旅游业的专业队伍,提高了服务质量。交通部门新修和改造了一些通往旅游区的公路,扩建了成都双流机场,成都和重庆增加了通往各口岸城市的航班,开办了成都—香港直航包机业务。旅游业的发展,还带动和促进了其他有关行业的发展。1985年,全省收入外汇人民币3475万元,比1980年增长3.2倍。四川的国际旅游业方兴未艾。

(五)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四川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破坏,蒙受很大损失。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得到较快地恢复和发展,进行了初步改革,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 教育事业 四川的教育事业,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主要是集

中批判“四人帮”否定解放17年来教育工作成绩的“两个估计”,清查他们在四川教育战线的帮派体系;整顿和加强各级学校的领导班子;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恢复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对历史的积案进行了清理,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和受到错误批判、审查的教职员工进行平反昭雪,为在反右派运动和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教职员工进行改正,恢复名誉,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妥善安排工作。各级各类学校克服困难,逐步改善教职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解决了一大批教师夫妻两地分居和子女就业问题;恢复和健全了学校的各项管理制度,制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改进教学方法,逐步恢复了学校教育秩序。

1980年,全省着手充实加强小学,整顿提高初中,调整改革高中,发展职业教育,对高等教育,扩大办学规模,改善办学条件,调整层次结构和专业设置,同时,发展成人高等教育,在小学教育方面,为落实中央提出的在80年代全国基本普及小学教育的任务,把全省按照不同类型的地区划分为4类,就基本普及小学教育的标准和时间,分别作出了规划。为保证普及任务的完成,采取多种形式培训提高小学教师、民办小学教师在进行全面考核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采取多种渠道筹集教育经费,改善办学条件。

到 1984 年,全省小学校达 97157 所,在校学生 1472 56 万人。在中等教育方面,从 1980 年起调整中等教育结构,试办职业中学。中等专业教育适应社会需要,发展较快。到 1984 年底,全省中等专业学校发展到 257 所。比 1976 年增长 10 3%,在校学生 10 41 万人,比 1976 年增长 35 3%,专任教师 1 27 万人,比 1976 年增长 64 9%。普通中学 5667 所,在校学生 378 15 万人,每万人口中在校人数为 398 人。为支持职业教育的发展,各级政府拨出专项经费,并从其他渠道筹集经费,从 1982 年到 1985 年,共计近 6000 万元(其中财政补助近 1700 万元)。还采取聘、借、派、调、兼等办法解决专业课教师不足的问题。在高等教育方面,1978 年以后,恢复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停办的政法、财经院校,陆续新建了一批师范、建筑、轻化工、纺织、气象等院校,与此同时,又恢复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砍掉的文科专业,扩大了薄弱学科,增设了短缺专业。到 1984 年,全省高等学校由 1966 年以前建立的 28 所增加为 56 所(其中专科学校 24 所)。除遂宁、广元两个新建市外,其余 18 个市、地、州均设有高等学校。增设了短缺专业 150 多个,全省高等学校专业设置达到 288 种、569 个。部分高等学校从 1978 年开始恢复招收研究生。到 1985 年,已有 14 所高等学校的 38 个专业招收攻

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有 24 所高等学校的 386 个专业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1984 年全省高等学校在校研究生 2849 人。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采取多种措施,培养和充实师资力量,特别是加强了对中青年教师的培养提高。从 1978 年到 1985 年,全省高等学校共补充教师 8800 多人,约占教师总数的 40%,同时,提升教授 1053 人、副教授 3651 人。各高等学校注重重点学科的建设,制定科研发展规划,把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结合起来,承担和参与了中央和省的一些重大科研项目,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1985 年,全省高等学校获国家的自然科学奖、发明奖、科技进步奖 27 项,获四川省自然科学奖 626 项,占全省授奖总数的 26 3%;1984 年四川举行首次哲学社会科学评奖,高等学校获奖成果有 364 项,占全省授奖总数的 48%。四川的成人高等教育和成人中等专业教育,在 1978 年后逐步恢复并有了较快发展。办学类型、办学层次和办学形式多种多样。到 1984 年,全省成人高等学校人数为 5 万人,成人中等专业学校在校生人数为 75 1 万人。

从 1979 年起,四川高等教育开始了改革的准备工作。1980 年确定各高等学校在确保完成国家下达的招生计划和科研计划的前提下,通过自力更生,挖掘潜力,建立院校基金,逐步

改善办学条件和集体福利设施。各院校开办了函授、夜大学和各种短期培训班,接受委托培训,招收部分专业的自费生。1984年,进一步从招生、毕业生分配、教育、科研、人事、经费等方面扩大了自主权;在7所高等学校开始试行校(院)长负责制,使学校行政领导进一步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教学和科研上来,学校党委主要抓大政方针、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1984年全省56所高校,设置专业454个,936万人。每万人口中在校学生人数为926人。1985年以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完善了扩权措施,改革向新的广度和深度发展。

2 科技事业 四川的科技事业,经过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在全国科学大会的推动下,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经过科技体制的初步改革,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1977年9月,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10月,四川为配合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尽快恢复和发展四川科学事业,作了部署,采取了积极措施。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之后,7月,四川召开了全省科学大会,传达贯彻全国科学大会精神,表彰了科技战线上的598个先进集体、807名先进个人、2261项优秀科技成果,确定了结合四川特点,充分利用本省的有利条件,与生产紧密结合,大力开展科学

技术研究工作,彻底改变生产技术落后状况的任务。大会之后,各地加快了恢复和建立科技事业与管理机构,四川省科协和约40个自然科学专门学会(协会)恢复了活动或新建成立;1978年6月,新建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各大专院校、省级各业务部门也陆续建立了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科技人员中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组织科技人员“归队”,解决用非所学、专业不对口的问题,从1978年5月到1979年2月,全省有17万多名已调离科技部门的人员,重新调回科技部门,占应“归队”人数的95.9%,恢复科技人员的专业技术职称,到1983年,已有36万名科技人员评定和授予了相应的专业技术职称。科技人员中发生的冤假错案,进一步得到平反、纠正。科技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

1982年,中央提出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科技发展方针。在贯彻这个方针中,四川进一步明确了以应用科学、技术科学研究为主,着重研究工农业生产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科学技术问题,推动生产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益。首先,组织协作攻关,解决具有重大经济效益的工农业生产中的关键性技术问题。从1981年冬到1983年,立项的工农业生产的11个方面的科技攻关项目,先后都取得了显著成绩。1984年立项的柑桔、丝绸等

9个系列产品的开发和浅层天然气等3个重点项目的开发,到1985年大部分已经完成,有的已收到明显的效益。其次,加快了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各厂矿企业兴办起来的研究所(室、组),在推广新技术、新工艺,开发新产品,开拓新的生产门路,提高技术水平等方面,都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全省广泛推行的工农业技术联产责任制也收到了成效。

1983年9月,组建了四川省科学技术顾问团,聘请了科技和管理方面的专家、学者541人担任顾问,在四川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等重大问题上,为省委、省政府决策作参谋。科技顾问团分17个专业,几年来,已提出建议、意见和专题研究报告300多件。另有17个地、市、州和7个县,也仿效成立了科技顾问团,聘请顾问2700多人。

四川的科技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起步较早。在1985年3月,中央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前,主要是进行扩大自主权的试验。1980年,全省科研单位普遍试行的扩大自主权的内容是:允许科研单位在保证完成上级下达的科研任务的前提下,利用自己的技术和条件,通过承接外单位委托的科研、试验、试制和技术加工任务、开展技术服务等办法,所得的纯收入,归本单位支配,用于建立本单位的发展基金、集体福利基金、奖励

基金;同时加强经济核算,建立岗位责任制和逐步推行所长负责制。1984年下半年开始,在全省自然科学研究单位中普遍实行以课题承包、课题核算和岗位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科研经济责任制。对技术开放和推广应用研究单位实行有偿合同制,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单位实行基金制,对农业和科技情报等服务性的科研单位实行经费包干制,逐步减少科技事业费的支出,使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研究单位逐步达到经济自主。到1984年底,全省已有23个技术开发科研单位第一批试行有偿合同制改革。

3 文化事业 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严重摧残的文化事业,粉碎“四人帮”后,经过揭发、批判“四人帮”,拨乱反正,彻底平反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和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各项事业迅速恢复,走上健康发展道路,出现了一片繁荣景象。

(1)文学艺术方面 1978年3月,重建省文联并陆续恢复和新建了各文艺协会的工作机构。各文艺协会会员人数比“文化大革命”前都有了成倍的增长。到1985年,省文联和省级各协会共有会员7665人,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的文艺骨干队伍。一批文艺刊物先后复刊,并创办了一些新的文艺期刊。

随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的进一步贯彻落实,文艺创作日益繁荣,原有的中、老年作家不断有新作问世,一大批文学新人登上文坛。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魏继新的《燕儿窝之夜》、藏族青年作家意西泽仁的小说、罗中立的油画《父亲》、藏画(唐卡)《格萨尔王》、舞剧《卓瓦桑姆》、歌剧《火把节》等一大批作品和剧目,以及峨眉电影制片厂1979年摄制的《神圣的使命》、1980年的《法庭内外》、1983年的《特急警报333》等影片,都获得了社会的好评和各种奖励。被封闭了15年的传统戏川剧,1978年在邓小平的鼓励下,领先开放。1982年7月,四川提出了“振兴川剧”的号召和“抢救、继承、改革、发展”的方针,成立了四川省振兴川剧领导小组,由领导、学者、专家、群众共商振兴川剧事业,录制了66名老艺人的优秀保留剧目114出,出版了部分老艺人的专著,并着手编写《川剧史》、《川剧艺术概论》等基础理论专著,上演了一批新编或整理的好剧目。魏明伦创作的荒诞川剧《潘金莲》,对川剧艺术改革作了可贵的尝试。群众文化组织蓬勃发展,活动内容丰富多采,形式多种多样。到1984年,全省县以上专业化表演团体有216个,剧场147座。

(2)在社会文化事业方面 1978年以后,群众文化活动和文化组织逐渐恢复、活跃,文化活动逐步纳入了宣传、科普、体育、卫生内容,初步形成了

“五位一体”的大文化轮廓,并在传统节日的群众性的狮灯、龙舟活动的基础上,自贡、成都等地举办了大型灯会,乐山、新津等地举办了龙舟大赛。每到彝族火把节、藏族望果节、苗族踩山节、回族开斋节等少数民族节日,各族人民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活动更是特色鲜明,绚丽多姿。文化组织由国家单一办发展为国家、集体、个体办的多层次、多体制的文化网络,逐步形成一些各具特色的集镇文化中心。1984年,全省有文化馆219个,文化站7080个,其中农村文化站有6950个,图书馆111个。这些文化组织及其开展的活动,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都起了积极的重要作用。

四川民间文化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独具特色的绵竹年画,为全国四大年画之一,在国内外均有重大影响。1980年以来,先后到日本、美国、法国、联邦德国等26个国家和地区展出,受到好评。

(3)在新闻事业方面 1978年以后,四川工人报等一些报纸复刊,一部分报纸新创刊,报纸种类、数量均有较大增加。除省委机关报和省级各部门的报纸之外,一部分地、市、州、县委也办起了机关报,除综合性报纸外,还有经济、科技、文教等专业报纸。在结构上从比较单一的状况,走向专业化、多

样化。各类报纸从内容、形式、文风等方面都有了显著变化。广播电视事业有了较大发展。以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和四川电视台为中心的、遍及全省的广播电视网也逐步形成,有省、市电台6座及县、乡广播台站8031个,有省、市、县电视台6座及发射台和转播台6座及县发射台和转播台1262座。广播电视的人口覆盖率均在50%以上。整个新闻事业坚持新闻必须真实的原则,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改革、开放,推进经济建设、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4)在出版事业方面 四川出版事业经过拨乱反正,迅速恢复、发展。出现部门提出并贯彻了“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出版方针,注重社会效益,出版了一批质量高、有特色的丛书和套书。从1979年到1985年全省有21家出版社,共出书7333种,比以前29年出书总和还多23.8%,川版图书在国内图书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影响也逐渐扩大。

(5)在文博事业方面 1978年以后,逐步恢复并加强了文物的保护管理与考古发掘工作。先后组织了13批(次)文物鉴定组,对全省164个县(市)的纪念馆、文管所等所保藏的文物,进行了全面鉴定,共鉴定文物52240件。新建和改建了博物馆24个。到1985年,全省有文博单位104个,其中,有博物馆31个,以及民族民

俗馆3个,历史文化名人纪念馆6个,革命纪念馆9个。全省进行考古发掘84项,其中,重要的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十二桥商周遗址、方池街巴蜀遗址和成汉墓、邛崃什邡堂、宝兴石棺墓、忠县三国崖墓等。在成都十二桥商周遗址发掘的商周时期的木结构建筑遗址,属全国的首次发现,极为珍贵。四川的文物汉代说唱俑、战国水陆攻战纹铜壶、涪陵小田溪出土的14件编钟等出国展出,以及四川省博物馆的文物精品200件在日本广岛展出,均获得成功。

4 卫生保健事业 1978年以后,四川卫生保健事业发展较快。到1984年,全省卫生机构发展到18675个,其中医院10448家,病床达183748张;专业卫生人员28.4多万人,其中,有高级卫生技术人员61338人;农村卫生院9515家;卫生防疫站237个;妇幼保健所、站223个;中等卫生学校36所。还有专科防治所、站51个,药品检验所、室47个,医学科研机构14个,卫生进修学校141所。93%的村设有医疗点。少数民族地区80%的乡和40%的村设有卫生院(站),卫生人员已达8200多人。全省已形成的城乡医疗卫生网点,医疗设施、设备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医疗技术逐步提高,农村缺医少药状况得到了根本改变。

四川的卫生事业,从50年代初开

始,以卫生防病工作作为中心任务,防治多种流行病,取得显著的成绩,卫生机构和专业工作人员均有较大增长。“文化大革命”中卫生事业受到严重损害,使传染病、地方病发病率回升。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防病工作全面展开,到1985年,急性传染病的总发病率、总死亡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9种地方病的防治也取得好的效果,在55个有血吸虫病的县(区)中,有32个县(区)分别达到消灭和基本消灭的标准。丝虫病于1985年基本消灭。有141个疟疾流行县(区),已基本得到控制,无暴发流行。钩虫病感染度有所下降。1980年度开始的卫生事业重点县建设在全省三分之一的县展开,由省、地(市、州)、县3级投资和受益单位集资,并得到了世界银行的贷款资助,引进设备、技术和培训人员。到1985年,已完成44个县的配套建设,逐步形成县的医疗卫生技术指导中心和培训基地。

四川中医事业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78年陆续调整、恢复和新建了一批中医机构,组织了一批离教的中医人员“归队”。1982年,县以上中医院发展到100所,中医学校7所,中医教研所3所。1984年,四川作出“振兴中医”的决定,中医事业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到1985年底,省和各地先后共拨给中医

事业专项补助经费3000多万元,重点扶持了36个县以上中医院的建设,中医院发展到164个,中医药研究所增加到6个,中医床位由8000多张增加到10600张。全省各地举办了各种类型的在职中医进修班300多期,开办了中医函授大学,四川自学考试委员会增设了中医专业。各地区为被确定的名老中医561人,配备了助手。全省近30个中医单位已将28名老中医的34个病种的诊疗用电脑编制程序,应用于临床。中医中药和中西医结合科研成果已通过鉴定的有27项。兴建四川中医药研究院的工程,正在筹备中。藏医有州医院1所、县医院7所,并在甘孜、阿坝两个州医院和23个县医院设立了藏医科。藏医药典籍的发掘整理工作有很大进展。甘孜州共清理出藏医药书籍57部,经翻译整理出《四部医典》、《晶珠本单》等重要著作31部。失传50多年的名贵丹药“佐塔”研制成功。“佐塔”及其配制的“仁青梦觉”、“佐珠黑塔”等8种名贵藏药治疗乳腺炎、肝炎、胃炎、胃十二指肠溃疡及腹部包块,均取得满意疗效。凉山州在发掘整理彝族医药方面也取得显著成效。编写了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彝族医药史》、《彝族动物药》、《彝族植物药》等。

四川的计划生育工作从1971年开展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本省实际出发,制定和逐步

完善了生育政策。1980 年开始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1984 年,继续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优育。在普遍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同时,照顾了少数有实际困难的群众生 2 个孩子和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生育 3 个孩子的要求。在城市,严禁生育计划外的 2 孩和多孩。广泛宣传计划生育的方针政策,避孕节育、优生优育和妇幼保健的科学知识,采取科学的、文明的、安全的节育措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提高。计划生育率和节育率提高,婴儿死亡率大大降低,全省总合生育率由 70 年代初的 4.3,降到 1985 年的 1.88。计划生育应用研究有较大进展,先后承担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下达的科研课题 25 项,与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协作课题 13 项。

5 体育事业 1978 年以后,体育事业正式纳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进一步受到全党全社会的重视和支持。四川体育以“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分类指导,择优扶持”为指导思想,从训练、竞赛入手,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推进体育社会化,在提高与普及两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运动员队伍不断扩大,素质逐步提高。1984 年有等级运动员 1205 人,其中健将 38 人,一级运动员 41 人;有等级裁判员 2277 人。新建各类体育场地 3394 个。为承办 1991 年在四川

举行的第七届全国运动会的三大主体工程万人体育馆、大型体育场和水上运动场等,均动工兴建。四川的运动员在参加国家比赛中,取得较好成绩。在 1978 年第八届亚运会上,四川 5 名运动员参赛,获得金牌 1 枚、银牌 3 枚;在 1982 年第九届亚运会上,四川 8 名运动员参赛,获金、银牌各 4 枚;在 1984 年第二十三届奥运会上,四川 8 名运动员参赛,3 人获金牌、1 人获银牌,总分列全国第九位。到 1984 年,四川运动员破(超)世界纪录的有 5 人 5 次项,破奥运会记录的有 1 人 5 次,破亚洲纪录的有 5 人 5 次 4 项。在国内比赛中,成绩逐步上升。1979 年第四届全运会,四川女排及 6 个单项夺得冠军;1983 年第五届全运会,四川女排、网球及射箭 3 项集体和 7 个单项夺得冠军。从 1981 年到 1984 年,在国内最高水平比赛中,四川运动员获前三名人数为 406 人,其中第一名为 117 人。建国以来,四川向国家队输送了运动员 231 人。

群众体育深入社会各个领域,学校体育、职工体育、民族体育、农村体育都有了新的发展,老年人和残疾人体育正在兴起。大竹中学被评为全国群众体育和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先进单位、仁寿县文林幼儿园被评为全省和全国的体育先进单位。全省各级工会普遍加强了体育工作,1984 年,全省厂矿企事业单位和县以上工会举办各类体

育比赛 11 万多次,有 285 万多人参赛,坚持经常活动的各种运动队和锻炼组约有 5 万多个。重庆市、乐山市五通桥区分别被评为全国田径之乡和游泳之乡。农村大多数文化站(中心)开展了体育活动,有近 100 个县举办了农民运动会。在少数民族地区,各具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十分活跃,建国以来,已举办全省少数民族地区运动会 7 次。四川老年网球队 1984

年获全国团体亚军。1983 年和 1984 年,四川残疾人运动员在全国残疾人体育比赛中夺取金、银牌各 10 枚,并有 2 人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残疾人奥运会。全省建立了产业系统体育协会 4 个,各运动项目协会 23 个。全省的 33 个重点业余体校(班)和 210 个一般业余体校,为培养体育后备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全省优秀运动队中有 87% 的新队员来自业余体校。

五、1985 年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1985 年是四川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面展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以价格和工资制度改革为重点,进行了全面配套改革。外贸体制改革继续深入。教育、科技体制改革有了新的进展。农村继续进行以调整产业结构为中心的第二步改革。各方面的改革都取得新的成绩,促进了经济社会的较快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加强。1985 年又是实施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四川“六五”计划规定的主要指标均已提前或超额完成,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全省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

(一)农村改革与农村经济的发展

1 调整产业结构的步伐加快 1985 年以前,在保证粮食增长的前提下,对农村产业结构进行过局部调整,但是步子迈得不大,多是在农业范围内进行,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农村产业结构变化不大。1985 年的调整,从全省各地的实际出发,发挥各自的优势,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在种植业、大农业以及整个农村经济结构 3 个层面,全面展开,步子迈得比较大,使农村产业结构逐步趋向合理,促进了农村经济的综合经营和协调发展。

在种植业内部,适当控制了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适当提高了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1985 年,全省粮食作物面积比 1984 年减少 614 万亩,经济

作物面积扩大 548 万亩,粮食作物占总播种面积的比重下降为 79.7%,经济作物上升到 12.9%。经济作物和其他作物的产值比重由 1984 年的 27.3% 上升到 1985 年的 31.5%,粮食作物产值所占比重下降。1985 年粮食作物由于播种面积减少,还有自然灾害的影响,粮食产量比上年度减少 6.1% (249 万吨),但仍然是四川历史上第四个高产年;经济作物有了大幅度增长,其中油料比 1984 年增长 28.1%,糖料增长 17.4%,黄红麻增长 84.9%,烤烟增长 50%。

在农业内部,调整了种植业与畜牧业、林业和渔业的比重,突出了畜牧业,加速发展林业、渔业。在平坝和丘陵地区,发挥粮多、秸秆多、食品加工下脚料多的优势,以主要发展养猪业,带动小家禽家畜的发展;在山区和高原,草场广阔,饲草丰富,着重发展牛、羊。充分利用宜林地和“四旁”,发展用材林、经济林和薪炭林。各地充分利用江、河、湖、库、塘发展水产业,推广稻田养鱼。1985 年调整的结果,林牧副渔的产值由 1984 年占农业总产值的 39.6% 上升到 45%。

在整个农村经济结构中,按照市场需求与当地的资源优势和经济条件,调整了第一、二、三产业的比重,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农村的工业、建筑建材业、商业、交通运输业以及各种服务行业迅速发

展。1985 年,第二、三产业的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由 1984 年的 26.7% 上升到 32.5%。全省劳务输出超过 100 万人,遍及全国 20 个省、市、自治区。发展乡镇企业是调整农村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环节。四川乡镇企业起步虽晚,但发展较快,呈现出一年比一年快的持续发展势头。1985 年,由于国家加强宏观控制,紧缩银根,乡镇企业遇到了资金、原材料紧缺的困难。乡镇企业贯彻了“紧中求活,少中求好,通力合作,渡过难关”的方针,广开渠道筹集资金,全省共自筹资金 5 亿元,缓解了资金紧缺的困难;注重开展横向经济技术协作,与省内外国有企业、科研单位的协作项目有 700 多项,协作资金 3.7 亿元;注意发展优势行业,在新建的 2221 个项目中,属于产品加工、建材等优势行业的约占 86%;发展农村户办、联户办、组办企业,乡镇企业不仅在城市郊区而且在部分丘陵和边远山区均有了较快发展。1985 年,全省乡镇企业达到 112.23 万个,职工达到 470.14 万人,分别比 1984 年增长 49.3% 和 36.8%,完成总产值 144.16 亿元,增长 62.4%,总收入 128.16 亿元,增长 74.8%。全省有 49 个县的乡镇企业产值超过亿元,比上年增加 25 个。1985 年,乡镇企业的经济效益也有较大提高,全年实现利润 8.23 亿元,比上年增长 54.7%,上缴税金 6 亿元,增

长 62 % ,乡村两级固定资产 43 64 亿元 ,增长 37 5 % ,付给务工农民劳动报酬 24 亿元 ,增长 49 7 % 。以工补农资金达 1 1 亿元。全省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 ,1984 年为 343 5 万人 ,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 8 3 % ,1985 年增长的 458 万人 ,占农村总劳动力的 10 7 % 。在乡镇工业企业中 ,逐步形成了食品、建材和能源矿产三大骨干行业。1985 年 ,三大行业的产值占全省乡镇工业产值的 57 4 % 。乡镇企业生产的一些重要产品 ,在全省同类产品中已占相当大的比重。其中 ,原煤占 43 7 % ,饮料酒占 39 8 % ,砖占 82 % ,瓦占 94 % ,水泥占 20 4 % ,中小农具占 92 5 % 。乡镇企业不仅在补贴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和促进小集镇建设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而且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开辟了一条重要的途径。

2 改革流通体制 ,农村市场活跃 农村供销社在恢复“三性”之后 ,1985 年 ,为扶持农业生产 ,供销社系统建立了多种经营和农业生产资料技术服务组织 5964 个 ,加上过去已建立的农具修理站、“庄稼医院”等 ,初步形成了一支近百万人的服务队伍 ,为农民解决信息、资金、技术、良种、推销农副产品等产前、产后的问题服务。1985 年同 1980 年相比 ,全省供销社为农民推销的农副产品增长 32 7 % 。全省供销社与农村专业户、乡镇企业及其他部

门 ,以加工农副产品为主 ,联办、自办工业企业 3000 多个 ,1985 年实现工业产值 2 7 亿元。

1985 年 ,在开辟新的流通渠道 ,发展新的商品流通形式方面 ,也有了新的进展。一些县新建了一批农副产品贸易市场、工业品贸易市场 ,建立了集体商业和按行业、产品或跨行业跨地区的产供销结合的新型企业 ,形成贸工农一条龙的产业体系。支持个体商业的发展 ,农村个体商业户 1985 年由 1983 年的 18 万户发展到 51 9 万户。经过改革 ,农村经济更加活跃。据统计 ,1985 年同 1984 年相比 ,全民所有制企业商品零售额增长 8 1 % ,集体所有制企业商品零售额增长 18 7 % ,个体商业户商品零售额增长 77 4 % ,集市贸易成交额达到 58 81 亿元 ,增长 26 3 % ,相当于社会商品零售额的 23 3 % 。

3 县级综合改革与集镇体制改革 从 1980 年开始实行的以财政、粮食和农副产品收购任务包干为主要内容的县级综合改革 ,到 1982 年发展到 22 个 ,到 1985 年发展到 35 个。各县全面推行经济责任制 ,较好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 ,使全县经济活跃起来 ,各项事业发展较快 ,群众生活水平也得到提高。改革较早起步的广汉、邛崃、新都 3 县 ,1985 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 1980 年分别增长 1 25 倍、1 69 倍、1 5 倍 ,财政收入分别增长 1 15 倍、

1.08倍、70%，农民人均收入分别增长1.16倍、2.86倍、2.25倍。

1983年开始集镇体制改革，试点实行“乡镇（或区）合并，撤乡（或区）建镇，以镇管村”的体制，1984年全省有150个镇，实行镇管村体制，1985年发展到453个，占全省建制镇总数的65.8%。集镇体制改革后，精简了机构，加强了集镇对农村经济工作的领导，推动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实行集镇统管后，集镇建设得到加强，集镇的功能得到更好地发挥。1985年，主要依靠集体和个人集资18亿元，建成公用建筑1100万平方米，住宅300万平方米，街道1500万平方米，市场50万平方米，自来水站829个。

4 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实行分类指导。针对不同地区经济的特点，1985年采取具体的政策措施，加快了地区的经济发展。

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城郊型”经济，打破城乡分割、地区封锁，利用城市生产力扩散和辐射的优势，兴办农村工业和商业、服务业，城乡互相支持，协调发展取得了初步成效。如成都市，1985年农村社会总产值比1984年增长30.5%，乡镇企业产值达到31.6亿元，比1984年增长57%。

在丘陵地区，除了发展种植业外，根据丘陵地区的特点和优势，加快发展以养猪为重点的畜牧业和林果业；

组织以建筑业为主的劳务输出；办好乡镇企业，着重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和第三产业；办好交通；发展能源；大力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促进了丘陵地区的经济全面发展。丘陵地区84个县（市、区）1985年与1984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增长8%，其中畜牧业产值增长15%，林业产值增长10%。

在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进一步放宽政策，大力扶持，使这些地区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1984年10月，成立了边远山区工作领导小组。1985年从省级机关抽调500名青年干部到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在调整产业结构中，扩大了适宜在山区发展的、市场适销对路的作物的种植面积。调整了农副土特产品的收购政策。从1984年起，对800米以上的高山地区免去粮食征购任务，扶持山区退耕还林还牧。据43个山区县统计，1985年已退耕124万亩。对人均收入在120元以下的地区减免农业税3年。为扶持山区乡镇企业发展，对新办的企业实行减免所得税1至3年、工商税1年，山区的资源开发业、农副土特产品加工业、建筑建材有了较快发展。据43个山区县统计，1985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到14亿多元，比1984年增长47%。采取“以工代赈”方式，发展交通和修建人畜饮水工程。从1984年起，每年拨出一定数量专款，委托大专院校向山区定向招生，培养人才，1984

年和 1985 年两年,已定向招生 1100 多人,同时,补助部分县的职工技术教育经费。据 43 个山区县的统计,1985 年工农业总产值比 1984 年增长 17.8%,超过全省平均增长水平。

5. 农村经济全面发展 农村经济综合指标比上年有较大幅度增长。全省农村社会经济总产值(包括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邮电业和商业)1985 年达 452.3 亿元,比 1984 年增长 19.9%;全省农村经济总收入(包括农、林、牧、副、渔、工、交通运输、建筑、商业饮食服务等业)1985 年为 390.35 亿元,比 1984 年增长 18.8%,扣除费用后的净收入为 239.3 亿元,比 1984 年增长 12.2%。

除粮食、棉花外,其他各业的产量均有较大幅度增产。1985 年粮食作物因调整产业结构、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以及部分地区工作有所放松等原因,全省粮食总产量 3830.7 万吨,比 1984 年减产 249 万吨,减少 6.1%,总产量仍然接近 1982 年的水平。农村和城市粮食供需仍然保持了平衡。1985 年油料作物总产量 151.23 万吨,比 1984 年增产 28.1%;糖料总产量 264.2 万吨,增产 17.4%。棉花因计划压缩面积和自然灾害,总产量 11.3 万吨,减产 28.3%。畜牧业发展较大,产值达 68 亿元,比 1984 年增加 8.78 亿元。全省出栏猪 4469 万头,比 1984 年增加 595 万头,年末存栏猪

5916.3 万头,比 1984 年增加 246 万头,生猪饲养量第一次突破 1 亿头。猪肉除了满足本省的需要,还大量进入了国内、国际市场。1985 年为 27 个省、市、自治区供应猪肉 33 万吨。1985 年全省造林面积 64.84 万公顷,比 1984 年减少 4.1%。“四旁”植树 38 亿株,森林火灾已降到总面积的万分之一,有 101 个县无火灾。全省水产品产量 12.9 万吨,比 1984 年增长 24%。

农民收入继续增加。据 55 个县 5500 户的抽样调查,1985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315.07 元,比 1984 年增加 28.31 元,增长 9.9%。人均拥有资金 45.75 元,比 1984 年增加 11.57 元,增长 33.9%。

(二)围绕增强企业活力,城市改革继续深入

1. 扩大企业权限,增强了企业活力 1985 年,继续下放企业到所在城市,省属企业 197 个,其中除中央规定不下放和不具备下放条件的少数企业外,已下放 152 个,并且把企业应该享有的权力,坚决放给企业。政府主管经济的部门逐步转变职能,为各行业搞好规划、协调、监督、服务。

进一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比例和管理范围,扩大了指导计划和市场调节范围,允许企业自销 5%~20% 的产品。

国营大中型企业建立以承包经营

为主的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小型企业实行集体或个人承包、租赁经营等办法。全省 90% 以上的工业企业建立了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

引导和鼓励企业发展多种形式的横向经济联合,诸如按专业化原则组建企业群体、工商、工工联销联合体、科研、生产联合体等。据重庆等 9 个地市的不完全统计,1985 年上半年就新建联合体 525 个,是 1984 年以前总和的 60%。

继续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从 1984 年 7 月开始在 10 个工交企业试行厂长(经理)负责制的工交企业已达 1038 户,其中,预算内大中型企业 110 个,占这类企业的 73.4%。

2 价格改革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四川的价格改革,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从价格体系和管理体系两个方面进行。

1985 年起,取消了粮食统购,建立了合同定购与市场议价相结合的新体制。合同定购实行“倒三七”比例价,即 30% 按统购价结算,70% 按超购价结算;合同数以外的收购部分,实行市场议价,自由浮动。城市粮食销售价(计划供应部分)保持不动;农村粮食销售价与“倒三七”比例折算的收购价持平,实行购销同价。从 1985 年 4 月 1 日起放开猪肉购销价格,实行议购议销。猪价放开后,采取了双重保护价格,对经营单位实行指导性价

格,对农民和消费者实行保护性价格。全省平均活猪议购价格水平每 100 斤在 69 元上下,比放开前的派购牌价 62 元上升 11% 左右,市场销售上升 15~20%。从 1985 年第一季度开始,逐步放开蔬菜等鲜活产品价格。菜价放开初期,由于主客观原因,特别是遇上蔬菜淡季,供应偏紧,蔬菜价格一段时间内普遍上涨较大。以后,改革了蔬菜生产和经营体制,发展了生产,增加了市场供应,到冬季,供求趋于平衡,价格逐步下降,在新的价格水平上稳定下来。此外,放开了集体林的木材价格,实行有指导的议价和市场调节,提高了森工木材的市场销售价,平衡每立方米由 127 元提到 177 元,提高了 39.4%;提高了铁路短途运价,调整了煤炭的煤种、品种比价和地区差价,改变了因价格偏低而形成的不合理的产品价格构成,对生产起到了促进作用。

1985 年,在改革价格体系的同时,改革了价格管理体制。在农产品价格管理体制方面,1 月扩大了基层供销社的价格管理权限;7 月,改变了中药材由国家统一定价,实行议购议销办法;同月,对生猪、大路蔬菜、重要药材(麝香、甘草、杜仲、厚朴)等 12 个主要品种,实行水平指导价格制度,各经营单位在议价控制幅度与具体的政策界限内,进行议购议销,撤销了农产品调拨作价制度,实行开放式议价购销体制。在工业品价格管理体制方

面,从1985年3月起,除了煤、电、气的超产部分,仍然实行省里规定的加价办法之外,对钢材、生铁实行价格定期挂牌,以协调指导市场价格,控制市场价格盲目上涨;对其他的属于企业自销和超产的工业生产资料,则由企业自定出厂价格。为了合理分配和使用电力,实行了丰枯季节电力差价、高峰与低谷差价、计划内与计划外电力差价。1985年4月,按中央主管部门的规定,把缝纫机、国产手表、收音机、电风扇等4种产品,下放给企业定价,小商品价格全部放开。大部分轻工产品,实行浮动价格,其中主要的品种,规定了浮动的幅度。总的说来,1985年四川的价格改革跨了一大步,在价格改革难度最大的方面,改革是成功的,取得了显著成效。价格改革还面临一些新的问题,还需继续推进。

3 工资制度改革有了新的进展 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1985年四川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进行了工资改革,企业的工资改革也有新的举措。

1985年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改革,是实行以职务工资为主的结构工资制,由基础工资、职务工资、工龄津贴和奖励工资组成。经过改革,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都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工资,简化了工资标准,初步解决了工资方面的一些矛盾,为进一步理顺工资关系打下了基础。

1985年国营企业的工资改革,按

照中央的统一安排,四川大多数企业仍然实行国家规定的奖励基金按照第二步利改税核定的比例提取,随着企业的经济效益浮动的办法;奖金税的起征点由两个半月改为4个月。全省绝大多数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过对职工套改新工资标准和浮动升级,职工工资水平均有所提高。对少数企业试行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浮动的办法。全省126个国营大中型工业企业1985年试行的结果,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上交税利和职工工资均有较多的增加。

4 城市经济持续发展 1985年,在城市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推动下,随着企业活力的逐步增强,城市经济有了新的发展。

在工业方面,1985年全省完成工业总产值454.19亿元,比1984年增长16.2%。工业增长的速度是“六五”期间最高的年份。钢、原煤、天然气、发电量、水泥、农用化肥等68种主要工业产品,都超额完成了年度计划。其中,能源生产发展较快,增长幅均略高于当年的全国平均水平。全省集体工业有了较大发展,产值达到108.23亿元,第一次突破百亿大关,比1984年增28.2%。在全省工业总产值中,集体工业产值的比重由23.7%上升到26%。工业的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均有所提高。1985年,经过考核的95种工业产品的100项质量指标稳定提高

率达到 89 %。有 375 种产品获优质产品称号,均比上年度略有提高。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实现了产值、收入、利税增长“三同步”。1985 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93.1 亿元,比 1984 年增长 58.2 %。其中,地方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49.95 亿元,比 1984 年增长 76.5 %。建设项目 8048 个,全部建成投产的 4838 个,占 60.1 %。施工的大中型建设项目 57 个,建成投产和部分投产的 9 个,完成投资 13.5 亿元。全年新增的生产能力主要有:煤炭开采 48 万吨,天然气配套能力 4.03 亿立方米,发电装机容量 8.04 万千瓦,铁路电气化里程 271 公里,新建公路 920 公里,一次精轧钢材 1.25 万吨,水泥 24.8 万吨,合成氨 3000 吨,原盐 2.5 万吨,棉纺锭 3.15 万锭,水库容量 5725 万立方米,各类学校学生席位 26.77 万个。全部建成投产的技术更新改造项目 3683 个。

在交通通信方面,1985 年客运周转量完成 268.9 亿人公里,比 1984 年增长 23.1 %;货运周转量完成 367.4 亿吨公里,比 1984 年增长 9.3 %。铁路运输继续把煤炭列为重点,对煤炭、外资、支农商品、路料等都优先安排,安全正点情况明显好转。水运优势进一步发挥。参加 1985 年川江航运的单位达到 72 家、153 个船队、278 条船,全年货运周转量 22.6 亿吨公里。

四川的民用航空运输 1985 年在航运周转量上创历史新纪录,总周转量比 1984 年增长 57.3 %,超过全省交通运输行业的增长速度;产值比上年增长 67.2 %,利税增长 3.5 倍,每吨公里成本下降 10 %,经济效益较好。1985 年,四川的通信能力、服务质量和经济效益均有提高。邮电业务总量为 1.51 亿元,比 1984 年增长 13 %,业务收入超过年计划 15 %,实现利润 244 万元。全年函件投递达 29428 万份,比 1984 年增长 13.2 %;报刊期发数 2125.5 万份比 1984 年增长 4.9 %。

在商业方面,国营商业较好地发挥了主导作用,集体和个体商业均有较快发展。市场调节范围扩大购销两旺,经济效益明显提高。1985 年,国营商业收购总额为 206.9 亿元,比 1984 年增长 12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 274.3 亿元,比 1984 年增长 21.7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222.2 亿元比 1984 年增长 22.7 %。农村供销社扩大购销和服务范围,扶持农村商品生产,仅为农民推销农副产品,使全省农民人均增收 17.5 元,比 1984 年增加 0.8 元,1985 年,个体商业进一步发展,个体商业户达到 67.02 万个,比 1984 年增长 23.26 %,从业人员达到 84.58 万人,比 1984 年增长 27.99 %。个体商业活动的范围和规模也大大扩展。在 1985 年全省社会商品零售额中,国营商业零售额增长 8.1 %,集体

商业增长 28.6%，个体商业增长 77.4%。

(三) 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

1 对外贸易 1985 年是四川外贸基本实现全面自营出口的第一年。除国家统一经营的商品和政府间贸易的商品，由有关公司对外成交后，分合同给四川执行的以外，其余的商品，省内各外贸分公司可直接对外谈判、成交、出运、结汇。仅有少量的商品，由于经营手段不足，仍与沿海口岸公司维持调拨关系。过去只能由沿海口岸公司出口的大宗骨干商品，如厂丝、罐头、冻猪肉、棉布、茶叶等，都转由四川各外贸公司出口。与四川建立经贸往来的国家和地区有 80 多个，客户 3000 多家。1985 年完成出口商品 600 种左右，总值 34939 万美元，比 1984 年增长 61.2%。其中，现汇出口总值 29007 万美元，比 1984 年增加 10730 万美元，记账外汇出口总值 5380 万美元，比 1984 年增加 2203 万美元。1985 年进口到货完成 16991 万美元，比 1984 年增长 89%。全省自营出口和进口共完成 51930 万美元，比 1984 年增长 69.1%。1985 年全省出口商品收购额完成 14.8 亿元，比 1984 年增长 18.3%。

在利用外资方面，1985 年全省实际利用外资 2000 多万美元，比 1984 年增长约 3 倍。新签利用外资项目合同 91 项，可利用外资 14680 万美元比

1984 年增长 1.8 倍。引进技术成交额 20550 万美元，引进项目 196 个，签订合同 332 个。到 1985 年，全省有中外合资企业 27 家，合作企业 10 家。

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1985 年 4 月，在成都举办了四川省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洽谈会，有 28 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约 1000 人参加，签订了一批经济技术合同，扩大了四川的影响和经贸往来。1985 年新签订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合同 63 个。其中，承包工程 15 项，劳务 48 项，成交额 7783 万美元，比 1984 年增加合同 22 个，增加成交额 2096 万美元。海外合营企业 8 家，已开业两家，合营企业投资总额 490 万美元，其中中方投资 179 万美元，占 37%。1985 年，四川承担计划援外项目 15 个，年计划投资 5154 万元，实际完成 5055 万元。1985 年对外生产技术合作及技术转让项目 17 个，进出口总额 1083 万美元，比 1984 年增长 1 倍多。接受联合国和友好国家援助项目 39 个，其中 100 万美元以上的项目 3 个。

在外贸体制改革方面，1985 年主要对地县外贸体制进行了改革。在地区一级，实行政企分开，各地区外贸支公司作为一个经济实体，与省公司挂钩；在县级，县外贸公司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利润金额分成，下大上小，这种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2 旅游事业有较大发展 1985 年四

川省内各风景区(点)进一步改善了基础设施,改造和新建了一批宾馆、饭店。改善了旅游交通,成都与香港间直航包机开航。扩大了旅游宣传招徕工作。旅游服务质量进一步提高。综合接待能力有所加强。旅游人数大幅度增加,经济效益显著。全省接待外国和港澳地区旅游者 101940 人,比 1984 年增长 41.2%,创汇总额 3475 万元(外汇人民币),比 1984 年增长 88.8%。接待国内旅游者 2241 万人,比 1984 年增长 21.1%。全省旅游企业的营业总收入 3782 万元,比 1984 年增长 74.6%,企业利润总额增加了 1 倍。

(四)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继续发展

1. 教育事业 普及小学教育的进程加快。1985 年全省小学校达 84747 所,在校生 1427.60 万人。占全省人口 53% 的 85 个县(市、区)基本普及小学教育;其余地区的普及工作也取得较大进展。全省学龄儿童入学率为 94.9%,在校学生年巩固率为 97.3%,毕业生的学业合格率为 80% 左右,小学毕业生升学率为 58.2%。从 1983 年起,分期分批地进行小学学制改革,到 1985 年,全省已有 86% 的班级,由 5 年制改为 6 年制。

普通中学教学质量逐步提高。全省普通中学校,经过设点布局的整顿,到 1985 年有 5822 所,在校学生

387.93 万人,1 万人口中有高中学生 59 人、初中学生 337 人。初中毕业生升入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的比例为 27.1%。

继续进行普通中学学制改革和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全省初中已由二年制改为三年制之后,到 1985 年,全省绝大多数重点中学、城镇高中及近半数农村高中已改为三年制。中等教育结构改革,主要是改革高中阶段,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初、中级技术管理人才。具体措施是,办好现有的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适当压缩普通高中,发展职业高中,在普通高中课程中增设职业技术课。职业技术中学迅速发展,到 1985 年底,全省中等专业学校发展到 257 所,当年招生 4.67 万人,比 1984 年增长 20.9%,毕业生 3.35 万人,比 1984 年增长 14.7%,在校生 11.72 万人,比 1984 年增长 12.6%,专任教师 1.3 万人,比 1984 年增长 2.4%。

农村业余教育(含扫盲)几年来逐步恢复和发展。到 1985 年,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扫盲标准,全省有 147 个县扫盲达标,农村青壮年非文盲率提高到 84.8%。农民业余技术学校迅速发展,已培养结业 120 多万人。

成人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继续发展。1985 年,全省成人高等学校(包括广播电视大学、夜大学、函授大学、管理干部学院等)97 所,设置专业

214 个,在学校生 54 万人;有成人中等专业学校(包括干部、职工中等专业学校和农民技术学校等)100 所,设置专业 109 个,在校学生 94 万人。

普通高等教育,到 1985 年初步形成了门类齐全、学校比较配套的多种办学形式的高等教育体系。普通高等学校由 1984 年的 56 所,增加为 58 所。各校充分挖掘潜力,尽量扩大招生规模。1985 年共招生 28792 人,比 1984 年增加 7549 人。本科在校学生由 1984 年的 936 万人增加到 1128 万人;研究生由 1984 年的 2849 人增加到 4757 人。1985 年毕业生人数由 1984 年的 18 万人增加到 218 万人。

2 科技事业 1985 年 3 月,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以后,四川的科技体制改革在扩大自主权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进展。继续调整用非所学的科技人员到专业对口的技术工作单位,1984 年和 1985 年共调整了科技人员 4000 多人;继续组织科技人员上山下乡,支援中小企业、乡镇企业,1985 年达 15 万多人次,受援企业 3000 多个;在 1984 年试行有偿合同制改革的基础上,1985 年对全省技术开发研究单位普遍减少了事业费。实行有偿合同制的地属以上研究单位 42 个,其中全部取消事业费的 14 个,分别占地属以上科研单位总数的 48.3% 和 16.1%。已有 80% 的市、地、州和 70% 的县、市、区建立了科技发

展基金,制定了基金管理办法。全省科技市场活跃,科技横向交流扩大,科技与经济的结合进一步加强。全年全省举办各种技术交易会 140 多次,成交项目 660 多项,总成交额 9 亿多元。全省已有 78 个科研单位和 16 所高等院校,通过技术转让、技术入股、技术联营等形式,同 400 多个企业建立了 240 多个科研生产联合体,在推广新技术、开发新产品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四川的科技队伍继续扩大,到 1985 年底止,全省从事自然科学技术工作的省属系统的科技人员约有 40 万人,其中高级科技人员占 0.37%,中级科技人员占 10.59%;有科技单位 500 多个,其中,独立的科技单位占 43.3%。此外,还有各企业办的科研单位 500 多个。各种群众学术团体如学会、研究会、协会等 192 个,其中,自然科学团体 110 个,社会科学团体 82 个。1985 年共登记科技成果 1182 项,当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105 项,其中获一等奖 8 项之一的“提钒新工艺”,是中国钒生产工艺上的重大突破,其方法简单,便于操作,且生产稳定。

四川对外科技交流与合作,逐步扩大。1985 年,应邀来四川访问、讲学的外国专家 400 多人次,举办专题讲座、培训 60 多次,并对 42 项技术难题进行技术指导。四川已与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科研机构建立了长期

合作关系。

3 文化事业 1985 年,四川文学创作繁荣,文艺活动活跃。举办了四川籍老作家巴金、阳翰笙、沙汀、艾芜创作学术讨论会,有 16 个省、市、自治区的 120 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讨论会。“郭沫若在重庆”学术讨论会,有 150 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为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40 周年而举办的“重庆雾季艺术节”,有包括抗战时期在重庆从事抗战戏剧运动的曹禺、陈白尘等 40 多位老一辈戏剧与电影艺术家参加了活动。“五省区(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四川)藏族文学创作会议,有藏族作家、诗人、学者及长期从事藏族文学工作的 69 人出席会议,会议评选并奖励了 5 省区 104 位藏族作者的作品。为繁荣四川文学创作事业,四川省委决定拨款 30 万元作基金,设立了“四川省郭沫若文学奖”。四川作家的一批作品,在全国各类创作评奖中获奖。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评选揭晓,四川作者创作的《玛丽·若瑟的选择》、《长江精英》获报告文学奖,峨眉电影制片厂的《红衣少女》获第五届电影“金鸡奖”的最佳故事片奖;在第二届(1981~1984)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中,四川有 4 篇作品获奖,其中彝族诗歌《自画像及其他》获一等奖,其他作品均获二等奖;《散文》月刊第二届评奖中,四川作品《巍巍剑门》等 3 篇获奖;

在全国体育美术作品展览评奖中,四川雕塑《一发千钧》获特等奖,国画《边关习武》获一等奖,还有 4 件作品分别获二、三等奖。

1985 年,全省专业艺术表演团体经过初步调整,共有 207 个,其中包括川剧团 121 个,京、越、豫、汉、花灯剧团共 12 个,以及话剧、歌舞、杂技、曲艺团等 74 个。各剧团上演了一批优秀剧目。1985 年全省民族、民间舞蹈会演中,舞剧《鸣凤之死》荣获创作、表演、音乐、舞蹈 4 项一等奖。凉山州歌舞团应邀赴土耳其演出,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6 月,四川实验川剧院先后应邀赴联邦德国、荷兰、意大利等国的 9 个城市演出,在西柏林参加“85 地平线艺术节”,首场演出《白蛇传》,成为“艺术节的轰动事件”。重庆市话剧团、歌舞团等 8 家文艺团体与工厂建立经济文化联合体,对文艺团体体制改革进行了尝试,得到了文化部的赞扬,称它是“文艺团改革的一条新路子”。

全省群众文艺活动广泛开展,内容新颖,形式多样。许多民间传统工艺,技艺精湛,光彩夺目。1985 年,被誉为“农民版画之乡”的綦江县,选出农民 80 个多人创作的 100 多件作品赴美国展出,铜梁县的民间传统工艺大龙灯,作为民间艺术精品在法国展出,均获得高度的评价。

1985 年底,全省经过正式登记公

开发行的各类报纸 88 种,发行 1074 万份。各类报纸从宣传任务和读者对象出发,在报道内容和版面形式上进行了改革,贴近干部、群众的工作、学习、生活,开辟了各具特色的多种专栏。四川日报 1985 年上半年开辟的“厂长(经理)笔谈会”,共办 13 期,对厂长(经理)更新观念、搞活企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广播电视坚持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推动教育、知识、文艺、服务等类节目的改革,增强了新闻的真实性、时效性和指导性。省广播电台、电视台坚持举办农村节目,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1985 年,省广播电台和省妇联共同创办广播父母学校,学员达 12 万多人,受到全国妇联和国家教委的表彰和奖励。省电视台在 1985 年自己制作和联合制作的电视剧 21 部(40 集),有 3 部(5 集)获奖。

全省 21 家出版社 1985 年共出书 1848 种,为计划的 108%,比 1980 年增长 229%;图书总印数 58250 万册,为计划的 134%,比 1980 年增长 69%。出版各类杂志 309 种,总印数 7374.6 万册。印刷装帧有了改进,几种现代化、高效能的印刷技术逐步引进并投入使用,印刷质量有所提高。1985 年又着手进行发行体制的改革,全省形成了以 213 家国营书店为基干的图书发行网,销售图书 53387 万册。全省人均购书 5.3 册。川版图书向省外发行 135 种,3114 万册。发行到海外的

图书 1500 种,60 万册以上。1985 年冬在香港举办的“中国书展”,四川参展书画 1100 多种,不少书画受到好评。

4 卫生保健事业 1985 年,全省卫生机构发展到 18678 个,其中包括卫生部门的 3131 个,工业及其他部门 7720 个,集体 7827 个。其中,医院有 8399 家,专业卫生人员达 35 万人,医院病床有 187412 张,每 1000 人有病床 1.84 张。全省卫生防疫、妇幼保健机构分别为 232 个和 220 个;专科防治和药品检验机构分别为 555 个和 57 个。在近 1 万个区、乡中,有卫生院(所)7446 个,病床 7.7 万多张,每 1000 人拥有病床 1.45 张和 2.05 名卫技人员。医药科研成果获奖 338 项,其中,获国家发明奖 4 项、国家科技进步奖 2 项、卫生部成果奖 13 项。

1985 年,城乡结合的卫生部门的改革,由点到面、由单一的局部改革发展为综合的配套改革。在卫生单位推行了以院(所、站、校)长负责制为中心的领导体制改革,实行两级管理体制和业务人员聘任制。对乡镇卫生院实行人、财、物 3 权下放,全面推行预防工作的经济承包责任制。农村办医形式向多样化发展,卫生站把办医形式与医疗制度分开,实行“谁受益、谁负担”原则;有条件的地方继续实行合作医疗或劳保医疗制度。城市办医实行多种形式、多种渠道联合办医,打破条块

分割和部门所有制,建立医疗卫生协作联合体。医院开办健康咨询,扩大医疗服务,1985年全省开设家庭病床6352张,相当于新建60多所100张病床的医院。

1985年,计划生育工作进一步加强,建立和健全了基层计划生育组织网络,广泛开展了宣传、技术、药具、培训和推广新技术等服务活动,普遍实行人口指数包干,层层建立了与经济挂钩的计划生育责任制和干部岗位责任制,计划生育干部的工作作风有了新的改进,坚持在提高群众觉悟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生育。全省人口出生率下降到12.79‰,节育妇女占已婚育龄妇女总数的80.41%。

5 体育事业 1985年,四川新增国际健将级运动员8人。等级运动员总计达到1864人。等级裁判员3508人,其中新增国际裁判员4人。全省有各类运动队(组)56个,38个项目。向国家运动队输送运动员31人。为承办1991年在四川举行的第七届全国运动会的三大主体工程,正在按计划进行修建,全运会的海模池、游泳池和郫县体育场已竣工。全省新增各类体育场地52个。在国际比赛中,四川运动员破亚洲纪录的有2人2次2项,平亚洲纪录的有1人1次1项。1985年在国内最高水平比赛中,四川运动员获前三名的人数为133人,其中,第一名为45人。1985年举行的全

国青少年运动会,四川代表团350名运动员参赛,夺得金牌9枚、银牌8枚、铜牌12枚。1985年,举办了四川省第一届工人运动会,选拔150名运动员参加第二届全国工人运动会,获得金牌2枚、银牌2枚、铜牌2枚。当年,四川还举办了全省农民“丰收杯”田径赛、省农村文化站乒乓球比赛、第七届少数民族地区运动会等省级运动会41次,市、地、州级运动会308次,县(区)级运动会3080次,乡(镇)级运动会3926次。1985年加强了学校体育教育,全省新增中小学专职体育教师800多人,各行各业施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面达40%,青少年学生达标的有277万多人,比1984年增长61%。

6 “六五”计划超额完成 四川省第六个五年计划,经过5年的实施,到1985年,计划规定的主要指标已经提前完成或超额完成,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任务已经基本实现,全省国民经济展现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1)“六五”期间,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推动下,全省国民经济持续增长。1985年,全省社会总产值104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下同),比1980年增长65.3%,年均增长10.6%;工农业总产值759.6亿元,比1980年增长59.8%,年均增长9.8%;国民收入491.4亿元。比1980年增

长 57.8% ,年均增长 9.6%。全省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274.3 亿元 ,比 1980 年增长 57.5% ,年均增长 9.5%。各种交通运输工具完成货物运输周转量 367.6 亿吨公里 ,比 1980 年增长 43.2% ,年均增长 7.4%。

(2)“六五”期间 ,经过调整 ,全省农业、轻工业和第三产业都有了较大发展 ,农、轻、重比例关系趋于协调 ,一、二、三产业之间的比例结构也有所改善。1985 年与 1980 年相比 ,农业总产值增长 48.8% ,轻工业总产值增长 67.6% ,重工业总产值增长 69.5% ;农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 ,由 1980 年的 37.1% 上升到 40.2% ,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 ,由 1980 年的 62.9% 下降为 59.8% ;轻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 ,由 1980 年的 45.7% 上升到 1985 年的 46.5% ,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 ,由 1980 年的 54.3% 下降为 53.5%。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由 1980 年的 18% 上升到 20%。

经过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趋于合理。1985 年全省消费总额 370.7 亿元 ,比 1980 年增长 84.6% ,扣除物价上涨因素 ,年均增长 10.2%。1985 年积累总额比 1980 年增加 70.9 亿元 ,扣除物价因素 ,年均增长 11.9%。“六五”期间的积累率为 25.2% ,年度之间相对稳定 ,出现了良性循环的势头。

(3)“六五”期间资金投向得到调整 ,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272 亿元 ,其中 ,基本建设投资完成 156.9 亿元。基本建设中的生产性建设投资的比重 ,由“五五”期间平均 75% 下降为“六五”期间的 49% ;非生产性建设投资比重 ,由“五五”期间的 25% 上升到 51%。多年来欠账的城市公用事业和住宅建设在基本建设总投资额中的比重上升 ,分别由“五五”期间的 2.7% 和年均竣工面积 311 万平方米上升为“六五”期间的 5.2% 和年均竣工面积 686 万平方米。投资方向转向技术改造和具有战略意义的重点建设项目。“六五”期间 ,更新改造投资完成 101 亿元 ,为计划的 285.6% ;1985 年比 1980 年增加 22.3 亿元 ,年均增长 28.6%。投资 1000 万元以上的重点更新改造项目 70 个 ,建成投产 13 个 ,大中小型技术改造项目共建成 15721 个。能源工业和运输邮电事业的基建投资 ,分别比“五五”期间增长 19.2% 和 52.7%。新开工的大中型基建项目 101 个 ,全部建成的项目 25 个。如航天工业的七二〇一工程、成渝铁路电气化工程、华蓥山电厂、煤炭工业的石豪矿井和绿水洞矿井、重庆钢厂扩建工程、长山盐矿、人民渠七期工程、长寿四川维尼纶厂等。新增生产能力主要有 :发电装机容量 50.6 万千瓦 ,煤炭开采力 487 万吨 ,炼焦 30 万吨 ,炼钢 30 万吨 ,初轧钢材 18 万

吨,一次性精钢轧材 37 万吨,天然气配套 26 亿立方米;新建公路 2670 公里,铁路电气化里程 490 公里,新建港口码头 11 个泊位,民航机场跑道 2800 米,钢材 40 万吨,棉纺锭 5 万锭。全省经济实力更加雄厚,发展基础更加坚实。

(4)“六五”期间,在发展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同时,集体经济与个体经济得到较快发展,比重明显提高。1985 年与 1980 年相比全省城镇集体所有制职工增加 53.5 万人,增长 32.7%;城镇个体劳动者增加 25.3 万人,增长 3.9 倍。集体所有制工业产值增长 1 倍以上,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 18.4% 上升到 23.8%;城乡集市贸易成交额增长 1.3 倍,在全省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个体商业的比重,由 0.4% 上升到 7.1%。开始出现了多种经营成份和多种经济方式共同发展的局面。

(5)“六五”期间,经济效益有所提高。国民收入年均增加 45.2 亿元,高于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人均国民收入由“五五”期间 205 元增加到“六五”期间的 366 元。按国民收入计算的社会劳动生产率 1985 年比 1980 年提高 39%,年均提高 6.8%;每万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折标准煤 1985 年为 10.7 吨,比 1980 年的 15.5 吨下降 31.2%。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 1985 年达 11766

元(按 1980 年不变价格计算),比 1980 年增长 38%;利税总额达 71.1 亿元,比 1980 年增长 70.8%;每 100 元资金实现利税 17.9 元,比 1980 年增长 24.3%;企业亏损面比 1980 年下降 4.7%。地方工业企业“六五”期间累计实现利税总额达 138.8 亿元,比“五五”期间增长 63.2%。1985 年重点考核的 95 种产品,100 项质量指标稳定提高率达 89%,优质品率达 11.5%。随着经济效益的提高,财政收入扭转了 1982 年以前连续 3 年下降的局面,从 1982 年到 1985 年连续 4 年逐年大幅度上升。“六五”期间累计财政收入 212.5 亿元,比“五五”期间增长 41.9%,1985 年全省财政收入 58.76 亿元,比 1980 年增长 69.7%,年均递增 11.1%。“六五”计算规定的财政收入指标已经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

(6)“六五”期间,四川对外贸易、经济技术协作和横向经济联系,有了较快发展。1985 年全省商品出口总额 34939 万美元,比 1980 年的 0.78 亿美元增长 4.47 倍;“六五”期间,全省累计签订利用外资协议 222 项,金额 2.2 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 5800 万美元;引进技术从 1983 年的 4 项开始,1984 年增至 241 项,1985 年达到 332 项,技术成交总额 3.9 亿美元,其中,1985 年成交额 2.06 亿美元。从 1980 年以来,与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项目合同 152

项,完成营业额 1 56 亿美元。全省已与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3000 多家客户建立了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往来关系,与 7 个国家的 20 个省、市、州、县建立了友好关系。

到 1985 年,全省已与全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的 35 % 至 40 % 的县建立了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关系。入川商品总值达 87 3 亿元,比 1980 年增长 85 9 %,年均增长 13 % ;出川商品总值达 81 5 亿元,比 1980 年增长 1 3 部,年均增长 18 1 %。

(7)“六五”期间,四川注意把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放到重要位置,较大地增加了投资,累计事业费支出达 71 25 亿元,比“五五”期间增长 84 3 %。“六五”期间共毕业研究生 1785 人,大学毕业生 9 7 万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 19 4 万人。大学毕业生比“五五”期间增长 1 倍以上,每 10000 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由 1980 年的 7 6 人提高到 1985 年的 11 人。大专院校共有专任教师 2 04 万人,比 1980 增长 29 9 %。1985 年全省电大、函大、夜大、职大在校学生人数达 7 25 万人,相当于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 11 28 万人的 64 3 % ;基本普及小学教育的县达到占全省人口 53 % 的 85 个县。学龄儿童入学率由 1980 年的 93 % 上升到 1985 年的 94 % ,在校学生巩固率由 94 1 % 上升到 97 3 %。“六五”期间,取得重大科技成果 3538

项,其中,有 1334 项成果获国家、省的科技成果奖,有 2/3 在生产中推广应用,取得了较好的效益。哲学社会科学为改革和建设服务,也取得一批重要的科研成果。文化、体育、卫生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取得新的成绩。

(8)“六五”期间,全省人民收入显著增加,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改善。1985 年全省职工工资总额达 83 98 亿元,人均工资收入 1033 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分别比 1980 年增长 33 7 % 和 20 65 %。职工家庭人均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 644 元,比 1980 年增加 260 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增长 50 6 %。据抽样调查,1985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315 元,比 1980 年增长 127 元,人均年增加 25 4 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年均增长 9 3 %。农民人均纯收入 200 元以下的贫困户由 1980 年的 59 95 % 下降到 1985 年的 13 33 % ,200 元至 500 元的温饱户由 39 47 % 上升到 77 16 % ,500 元至 1000 元的宽裕户由 0 58 % 上升到 9 22 % ,农村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全省人均消费水平 1985 年达 334 元,比 1980 年增加 142 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人均每年增长 8 7 %。“六五”期间全省用于住宅建设的投资有较大增加,全民所有制单位累计竣工住宅面积达 3446 万平方米,比“五五”期间增长 1 2 倍。农村不少农民都盖了新房,据初步统计,1985 年农村人均使

用房屋面积达 21 56 平方米,比 1980 年增加 8 2 平方米,增长 61 38%。全省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1985 年末达 90 73 亿元,比 1980 年增长 3 1 倍,其中,城镇居民储蓄 61 69 亿元,增长 2 8 倍;农民储蓄 29 04 亿元,增长 3 9 倍。

上述情况和指标表明,“六五”期间取得了很大成绩,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但是,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还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农业基础仍然比较脆弱,生产条件差,农村商品经济不发达。土地审批权下放管理失控,土地乱占滥用和占而不用的情况比较严重;由于耕地面积减少和自然灾害,加上对粮食生产措施不力,1985 年粮食减产。能源、交通还很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电力供需

矛盾突出,1985 年全省发电设备与用电设备装机容量之比,已由 1980 年的 1 2 7 上升到 1 3 7,电力缺口高达三分之一左右。全省公路等外路占 54 9% 还有 624 个山区乡镇不通公路。在拓宽公路和建设山区公路中,摊子铺得过大,资金不足,效益甚差。内河航道缺乏综合治理,管理落后,航道萎缩。城市进出口及场镇集市路段,交通阻塞严重。全省财政收入增长 69 7%,支出却增长 91 5%。每年新增财力,除了用于人头经费的增加外,能用于生产的财力不多,财政仍然拮据。计划外的基建投资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快,有些商品价格上涨幅度较大,等等。这些问题,将是“七五”乃是今后更长时期内的重要工作任务。

国民经济主要指标表

(1985 年)

项 目	单 位	1984 年	1985 年	1985 年比 1984 年 ± %
一、人口				
年末总人口	万人	10111.8	10187.5	0.8
# 非农业人口	万人	1383.8	1483.2	7.2
二、劳动力(年末数)				
劳动力资源总数	万人	6330.9	6499.2	2.7
# 从业人员	万人	4978.6	5166.2	3.8
# 职工人数	万人	799.6	833.5	4.2
# 全民所有制职工	万人	592	615.5	4.0
三、国内生产总值	亿元	497.6	606.4	21.9
国民收入(当年价)	亿元	403.3	491.4	21.8
工农业总产值(不变价)	亿元	671.1	759.6	13.2

项 目	单 位	1984 年	1985 年	1985 年比 1984 年 ± %
工农业总产值指数 (1952 年 = 100)	%	993.3	1124.1	—
工农业总产值构成	%	100	100	—
农业总产值(不变价)	%	41.7	40.2	—
工业总产值	%	58.3	59.8	—
四、农业总产值(不变价)	亿元	280.1	305.4	9.0
五、工业总产值	亿元	391	454.2	16.2
六、运输邮电				
旅客周转量	亿人公里	218.4	268.9	23.1
货物周转量	亿吨公里	336.3	367.4	9.3
函 件	万份	25999	29428	13.2
报刊期发数	万份	2026	2125.5	4.9
七、基本建设(全民所有制单位)				
基本建设投资总额	亿元	31.8	51.1	60.6
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	亿元	23.1	34.3	48.5
八、商业				
全民所有制商业收购总额	亿元	184.7	206.9	12.0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亿元	225.5	274.3	21.7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亿元	181.1	222.2	22.7
九、外贸				
出口商品收购总值	人民币亿元	10.8	14.8	37.0
十、财政				
地方财政收入	亿元	46.4	58.8	26.7
地方财政支出	亿元	47.9	64.2	33.8
十一、物价指数 (1950 年 = 100)				
零售物价总指数	%	186.1	198.8	—
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	%	509.8	544.0	—
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总指数	%	193.5	211.9	—
十二、职工工资、居民收入				
全部职工工资总额	亿元	71.6	84.0	17.3
# 全民所有制经济单位”	亿元	56.6	66.7	17.8
全部职工平均货币工资	元	912	1033	13.3
城镇住户人均生活费收入	元	542.8	644.0	18.6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286.8	315.0	9.8

农业生产情况表

(1985 年)

项 目	单 位	1984 年	1985 年	1985 年比 1984 年 ± %
农业总产值	亿元	280.1	305.4	9.0
农业总产值指数 (1952 年 = 100)	%	351.1	382.7	—
农业总产值构成	%	100	100	—
农业	%	60.4	55.0	
林业	%	5.6	5.7	—
牧业	%	21.1	22.3	—
副业	%	12.3	16.4	—
渔业	%	0.6	0.6	—
主要农产品产量				
粮食	万吨	4079	3831	- 6.1
棉花	万吨	15.8	11.3	- 28.5
油料	万吨	118.0	151.2	28.1
甘蔗	万吨	224.7	264.2	17.6
麻类	万吨	17.1	31.1	81.9
茶叶	万吨	4.9	5.3	8.2
蚕茧	万吨	10.5	10.7	1.9
水果	万吨	71.6	81.7	14.1
水产品	万吨	10.4	12.9	24.0
猪牛羊肉	万吨	241.2	117.6	- 51.2
造林总面积	万公顷	67.6	64.8	- 4.1

工业生产情况表

(1985 年)

项 目	单 位	1984 年	1985 年	1985 年比 1984 年 ± %
工业总产值	亿元	391	454.2	16.2
工业总产值指数 (1952 年 = 100)	%	3036	3526	—
工业总产值构成				
轻工业	%	47.7	46.5	—
重工业	%	52.3	53.5	—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布	万米	68683	75699	10.2
丝织品	万米	5718	6877	20.3
呢绒	万米	277	287	0.3
机制纸及纸板	万吨	54.7	64.0	17.0
盐	万吨	149.0	155.8	4.6
食糖	万吨	17.2	19.3	12.2
天然气	亿立方米	55.9	56.4	0.9
发电量	亿度	199.9	221.4	10.8
生铁	万吨	316.5	318.5	0.6
钢	万吨	385.8	392.7	1.8
成品钢材	万吨	237.1	256.0	8.0
水泥	万吨	849.6	1019.2	20.0
原木	万立方米	418.5	392.4	- 6.2
汽车	辆	4503	13610	202.2
农用化肥	万吨	144.5	135.2	- 6.4
化学农药	吨	7023	5157	- 26.6
硫酸	万吨	66.6	54.8	- 17.7
烧碱	万吨	15.1	16.0	6.0
纯碱	万吨	13.4	14.6	9.0

各类学校在校学生数表

1985 年

项 目	单 位	1984 年	1985 年	1985 年比 1984 年 ± %
总 计	万人	1883.3	1851.6	-1.7
一、高等学校	万人	9.4	11.3	20.2
二、中等学校	万人	401.4	412.8	2.8
# 中等专业学校	万人	10.4	11.8	13.5
普通中学	万人	378.2	387.9	2.6
农职业中学	万人	12.8	13.1	2.3
三、小学	万人	1472.6	1427.6	-3.0
四、每万人口平均在校学生数				
# 高等学校	人	9.3	11.1	19.4
中等学校	人	398	407	2.3
小学	人	1461	1407	-3.7

各类成人教育在校学生数表

(1985 年)

项 目	单 位	1984 年	1985 年	1985 年比 1984 年 ± %
总 计	万人	133.8	152.9	14.3
一、高等教育	万人	5.0	5.4	0.7
广播电视大学	万人	4.3	4.3	—
高等学校	万人	0.8	1.1	37.5
二、中等专业教育	万人	75.1	94.0	25.2
中等技术学校	万人	51.8	54.9	6.0
业余中学	万人	23.3	39.1	67.8
三、初等教育	万人	53.5	53.5	—
业余小学班	万人	30.9	33.7	9.0
扫盲班	万人	22.6	19.8	-12.4

卫生事业情况表

(1985 年)

项 目	单 位	1984 年	1985 年	1985 年比 1984 年 \pm %
卫生机构数	个	18675	18678	0.02
# 医院	个	10448	8399	- 19.6
医院病床数	万张	18.4	18.7	1.6
卫生技术人员	万人	28.4	28.4	—
# 医生	万人	12.4	12.4	—

文化艺术、文物事业机构数表

(1985 年)

项 目	单 位	1984 年	1985 年	1985 年比 1984 年 \pm %
电影放映单位	个	15510	16031	3.4
艺术表演团体	个	216	207	- 4.2
文化馆	个	219	214	- 2.3
公共图书馆	个	111	115	3.6
博物馆	个	23	31	34.6

注：上列 1~7 表资料来源为 1985、1991、1994 年《四川统计年鉴》

编 后 记

1994年1月,省地方志编委会批准《四川省志·总述编纂方案》,编纂工作正式起步。当时编写人员及分工情况是:主编秦宜雅,副主编张学君、黄友良;分担各部分撰稿责任的学者有:赵汝植(西南师大)、黄友良(省志编委)、陈世松(省社科院)、张学君(省志编委)、王治国(《当代四川》编辑部)。1994年底,自然地理概貌、社会概貌、古代史、近现代史部份基本完稿,部分初稿已开始审查修改。

1995年8月,主编秦宜雅因病去世,为不影响编纂工作,省地方志编委会于当月召开《四川省志》总编会议,调整了工作分工。张学君改任《四川省志·总述》主编,岳忠任责任总编。当年底,《总述》初稿基本编纂成型。此后因多种客观原因,志稿往返审查、修改2次,2000年8月,经主编张学君修订定稿。

《四川省志·总述》各部分分工撰稿和完成情况如下:

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概况:由西南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赵汝植执笔;

社会概貌:由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编审、总编室主任、《四川省志》副总编黄友良执笔;

古代社会历史: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世松执笔;

近现代社会历史:由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审、《四川省志》副总编张学君和成都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张莉红执笔;

当代社会历史: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的四川》编辑部编审王治国、黄一龙、吴畏、李鸣志执笔。

在《四川省志·总述》即将付梓之际,对本书稿本作出重要贡献的下列人士表示特别的感谢:

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四川省志》总编秦安禄在布置本书编写任务、落实编写经费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使本书得以按计划如期完成;

在二审和终审中,老领导何郝炬、岳忠同志以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审阅书稿校样,改正了许多错误和疏漏;

在本书交付出版后,承蒙方志出版社初审、复审编辑细心审阅,改正了不少错讹之处。

最后要提到的是,已故总编秦宜雅在本志编写大纲的策划、启动和协调方面作了奠基工作,在此我们对他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

编 者

2000年8月25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川省志. 卷首/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03. 4
ISBN 7-80122-933-9

I. 四... II. 四... III. 四川省—地方志
IV. K2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8424 号

四川省志·卷首

编 者: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责任编辑:秦 放 曾新苗(特约)

出版发行:方志出版社

(北京市丰台区角门北路甲 8 号院 1 号楼)

信箱 丰台区西罗园邮电局 7713 信箱 邮编 100077)

网址 <http://www.fzph.org>

邮箱 zbsh@fzph.org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成都飞机公司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36

字 数:610 千字

版 次: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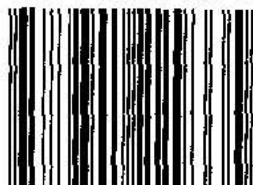
印 数:0001—2000 册

ISBN 7-80122-933-9/K · 530

定价:150.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ISBN 7-80122-933-9



9 787801 229335 >

